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徐通锵自选集

大象出版社

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图书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徐通锵自选集

顾问　吕叔湘　曹先擢　李行健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通锵自选集/徐通锵著. －2 版. －郑州:大象出版社,
1993.11(1999.8 重印)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顾问吕叔湘等)
ISBN 7-5347-1311-0

Ⅰ.徐… Ⅱ.徐… Ⅲ.汉语-语言学-文集 Ⅳ.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598 号

责任编辑 齐 耕　　封面设计 秘金通
大象出版社出版(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 001—3 500 册　　定 价 20.7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5957860—351

序

在我国，语言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它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信息的开发和利用，文字和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语言学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我国现代语言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十年动乱结束后，一批中年语言学家涌现了出来，并且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河南教育出版社愿意为这些中年语言学家出一套论文集，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一年多以前，他们专门派人到北京商谈此事。我们深感他们的设想和决定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众所周知，现在出版一本语言学论文集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出版这种书要赔很多钱。而这也是我们早想做而又力不从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计划表示赞同和支持。但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编自己的论文集，而是将我国当代贡献大、在各自学术领域成绩突出的中年语言学家推荐给他们。为了表示对河南教育出版社这一计划的实际支持，我们在百忙中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协助他们，编辑出版这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的任务。

为了把这套书编好，我们迅即向吕叔湘先生作了汇报。他很高兴，并欣然答应出任这套书的顾问。我们深知，这也是吕老兼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十年来未及实现的心愿之一。正是在吕老的关怀和

指导下，我们同河南教育出版社一起拟订出了出版的计划和有关细节。在广泛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后，列出了一个可供入选的中年语言学家名单。经过反复权衡比较，确定了名单。他们是：徐通锵、邢福义、陆俭明、刘叔新、李新魁、裘锡圭、吕必松、鲁国尧、蒋绍愚、李临定。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未能编选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和青年语言学家的自选集，即使是中年语言学家，也不可能全部选入，特别是有的同志，刚超过规定的年龄上限，虽然他们学术成果累累，也未能入选。还有的同志，由于其他原因，要求暂不入选。我们工作中难免有不全面或疏漏的地方，敬希语言学界的师友们谅解和批评，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年高德劭的吕叔湘先生为每本自选集题写了书名。这里饱含着他对语言学界的殷切期望和亲切的关怀。我们也要代表语言学界的朋友，向河南教育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特别是他们的社领导专程到北京来商讨计划，并亲自审读书稿。负责这套书的责编查道元同志，多次往来于郑州北京之间，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和审稿工作。我们也要感谢入选的这些同志的配合和支持。没有上述的各种支持，这套书是无法同广大读者见面的。

曹先擢　李行健

1993年1月26日于北京

再 版 序

目前，学术著作出版困难较多，而语言学著作出版似乎更难。大象出版社(原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书出版后，在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中荣获提名奖，社会上也获得广泛的好评。现第一版的书已售罄，为满足读者的需要，决定再版印行。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是在吕叔湘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出版的。先生对后辈关爱有加，他为每本书题写了书名。回想1993年《自选集》出版时，吕老手摸着书，脸上浮出欣慰的微笑。他对语言学后起之秀，寄予了多么深厚的爱，多么殷切的希望哟！吕先生于1998年4月9日仙逝，他的风范长留人间。《自选集》的作者之一，著名的音韵学家李新魁同志1997年9月13日英年早逝。我们借《自选集》再版的机会，谨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语言学是一门先行性的学科，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还远远没有被我们全面认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信息的开发和利用，文字和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语言学的地位和作用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的语言学在建国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十年动乱中学术研究遭到了破坏。文革结束后，语言学研究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开展起来，语言学的队伍，有了新的壮大和提高。一批中年的语言学家，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起着骨干带头作用，学术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在吕叔湘先生指

导下，选编出了这套《自选集》。我们作为参与者，认为这套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首先挑选有丰富学术成果，在当前我国语言学中发挥中坚作用，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的著作为出版对象，意在展现我国语言学的优秀成果和高水平的队伍。这套丛书的作者徐通锵、邢福义、陆俭明、刘叔新、李新魁、裘锡圭、吕必松、鲁国尧、蒋绍愚、李临定等，都是在我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的佼佼者，大多蜚声海外。他们的学术成果，反映了我国当代语言学在各有关学科中已达到的水平，大致可以代表我国语言学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他们的成果不仅在海外各地出版，有的作者还多次被邀请出国讲学，他们的著作甚至被作为学生的教材或必读参考书。因此，把他们作为我国语言学界的首批代表，出版他们的选集，虽说有些管中窥豹，但也可以从中看到我国语言学的概貌。

二、作为"自选集"，有它独具的特色和作用。首先，作者选入的文章都是他们的"精品"，不是有新的发现，就是有新的研究方法或新的材料的优秀论文。自然，从总体上看，这套丛书可以说是精中选精了！其次，作者选文时，吕叔湘先生一再希望他们按照《吕叔湘自选集》那个模式操作，即除了选自己精品之外，还要求这些文章能代表自己独特的见解，能够按自己学术思想和成长发展的足迹来选文，也就是说，每位作者的书，都要能代表他自己，让读者看到他成为知名学者的跋涉过程。

应该说，每本"自选集"收录的文章经过作者和有关同志及出版社的共同反复筛选，都达到了预定的要求，所以它们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也正因为它们具备了上面的特点，我们在研究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上述著名学者时，"自选集"就成为不可不先读的重要著作。特别是每本书后附的"跋"和"作者简介"

更是难得的资料。在“跋”中作者自述了学术成长的过程和经验教训，在“简介”中全面地评价了作者的成就以及他们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我们可以说，研究中国语言学时，读这套丛书，可以“用少的时间，获取多的知识”。所以广大读者认为大象出版社（原河南教育出版社）为语言界做了一件好事！原有计划分批出版此类著作，因为我国著名的中年语言学家还有不少，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就将不会有太多的遗珠之憾！但由于各种原因，原计划未能实现，只好留给后来者去完成了。

因工作关系，我们在吕先生手下，为《自选集》出版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语言学界人才辈出。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语言学著作问世。

曹先擢　李行健

1999年4月

目　录

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历史比较研究
——语言史研究中的空间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初探 ……（1）
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
——附论音变规律的三种方式 ……（22）
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
——从残存现象看语言的发展 ……（70）
音系中的变异和内部拟测法 ……（88）
山西方言古浊塞音、浊塞擦音今音的三种类型和语言史的研究……（113）
文白异读和历史比较法……（124）
语言变异的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164）
变异中的时间和语言研究……（193）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218）
语义句法刍议
——语言的结构基础和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初探……（244）
跋……（282）
作者简介……（285）

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历史比较研究

——语言史研究中的空间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初探

一

语言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一条规律。过去的《语言学概论》之类的著作，都说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组成部分的发展速度不同上，其中词汇的发展直接反映社会的变化，因而速度最快，而语音和语法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速度慢。诚然，这是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的一种表现。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而对于深入的语言研究来说，我们更不应该满足于这种一般性的叙述。其实，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在语言系统的各个方面；对于这种不平衡性的具体分析，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比较法的兴起和广泛运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客观根据就是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

任何规律都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就语音来说，一个音位由于所处的结构位置不同，所受相邻的音位的影响不同等等，都可以引起不同的变化。或者说，同一个音位在有些位置上维持原状，而在有些位置上却发生了变化，因不同的条件造成了同一个音位的变化的不平衡性。例如，汉语中古的"见"母/k/在开口呼、合口呼前保持/k/，而在齐齿呼、撮口呼前，在今天的北方方言以及很多其

他方言中都变成了/tɕ/。人们说，这是语言变化的条件性。这自然不错，但这种条件性同时也正是语音发展的不平衡性的一种条件，说明音位系统的发展往往不是以音位为单位，而是以处于不同条件中的音位变体或区别特征为单位。由不同的语音条件造成的语音变化的不平衡性，会使规则的音位系统出现不规则的现象，这可以为探索语音的历史发展提供一种诱人的线索。①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着眼于不同的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语言现象，就会发现原来相同的语言现象在不同的地区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差异。这也是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中古汉语的声调有平、上、去、入四类。入声在现代汉语的方言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反映形式。例如“纳”、“擦”、“百”都是入声字，它们在北京、苏州、广州的表现是：

	纳	擦	百
北京	na	tsʻa	pai
苏州	naʔ	tsʻaʔ	pɒʔ
广州	nap	tsʻat	pak

“纳”、“擦”、“百”每一个字的不同语音在古代是同源的，应该有相同的语音形式。但是在今天，这三个字在广州话分别以[p][t][k]收尾，苏州话只有一个喉塞音[ʔ]，而北京话则没有任何辅音韵尾的痕迹。这些不同的语音表现形式是同一种语音现象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它说明，处于相同条件下的语音变化，可能甲地这样变，乙地那样变；或者甲地变得快些，而乙地变得慢些，因而表现出语言的地区差异。一般说来，社会的分化是形成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社会原因；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形成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语言本身的原因。

同一地区的相同的语音条件会使同一个音位发生同样的变

化，这就使音变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规律性使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呈现出清楚的条理性和地区之间的对应性，这就为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语言的地域差异（方言或亲属语言）在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差异可能代表着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语言发展在时间上的序列。以上述的汉语入声字为例，三种共存的状态构成历史演变的三个阶段：最早是[p][t][k]，它们后来合并成[ʔ]，这个[ʔ]后来又脱落，变成北京话的开尾韵。这是根据现有的材料而作的推断，即使没有古代的韵书，也可以肯定这是唯一正确的推断。因为，如果说北京话代表最初的状态，无法说明苏州话的[ʔ]是怎么产生的，广州话的[p][t][k]又是怎样出现的；如果说苏州话代表最初的状态，同样无法解释广州话[p][t][k]的出现条件；要是没有别的材料的补充，我们就可以根据今天的汉语方言的差异推断汉语中有一类辅音韵尾经过了从[p][t][k]合并为[ʔ]到最后脱落的过程。所以，语言的地域差别反映着时间上的发展序列，也就是说，语言的空间差别包含着时间的差别，考察空间的差别可以为语言的历史发展找出符合情理的线索。

上面的分析说明语言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时间上，也表现在空间上。空间的差别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的结果。所以语言史的研究可以从时间的序列和空间的差异两方面入手。从文字、文献材料反映出来的时间的先后顺序去研究语言的发展，早就为人们所认识，而利用语言在空间上的差异去研究语言的发展则到19世纪才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语言史的研究应该把时间的因素和空间的因素有机地、辩证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研究时间的发展序列一定要参照语言在空间上的差异，这差异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来说，是研究语言史的最重要的途径；即使对于有文字记载的语言

来说，语言在地域上的差异也可以补充说明时间上已经消失的因素，即可以用现存的活材料去弥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死材料的不足；另一方面，研究语言在空间上的差异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比较现存语言状态的差别以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的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就是试图把语言发展中的空间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结合起来，以从空间中找时间，从地域的差别中找发展的序列。正确地处理空间和时间的关系，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二

汉语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先人早已知道语言的变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明朝的陈第说过："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又说："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变，系乎时者也"②这种音变理论为清代古音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的先辈虽然在语言的发展中分出时间和空间两方面，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两方面的有机联系，不认识语言的地域差异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价值。因此，传统的音韵研究只注意书面材料，想从这些材料的分析中清理出语音的发展历史。例如，由顾炎武开始的清代的古音学，就利用《诗经》的用韵和汉字的谐声去分析先秦的古音，从面归纳出《诗经》的韵部、汉字的谐声系统和从上古到中古的韵类分合的演变情况。这种语言史的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所以王国维在他的《观堂集林》卷八中指出："古韵之学，自崐山顾氏，而婺源江氏，面休宁戴氏，面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面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

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但是，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成就只是整理出韵部系统，却无法对它进行具体的语音学的描写。这说明语言史的研究如果只局限于时间的方面，终久有一天要走到尽头，无法继续前进。章炳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用汉字去描写古韵部的音值，企图找出一条新的路子。但这种"新的路子"并不"新"，因为它没有摆脱汉字等书面材料的束缚，仍旧局限于时间的方面，不认识语言的地域差异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价值，因而仍旧找不到继续前进的道路。

关于切韵系统的韵书的研究，情况与先秦古音的研究相似，也只局限于时间的方面。编纂韵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做诗押韵，大体上根据当时通用的语音编纂而成。清代潘耒曾因这种编纂没有顾及古音而大为惋惜。他在《古今音论》中说："齐梁之时去古未远，三代两汉之音独可考见；而作谱者一切不问，仅就当时通用之音编次成书，遂使古音荡然无存，致烦千载而下，好古之士，多方考求，仅得十之三四。"这些议论说明，单纯依靠书面记载的材料，难以清楚地分析语音的历史发展。而且，韵书是按韵编排的，并不直接反映声母的情况；一个韵可能包含若干个韵母，韵母的类并没有明确分开，这些都难以确切地记述当时真实的语音状况。宋元时期相继出现的等韵图是声韵调的配合表，并且用"等""呼"之类的差别暗示韵母的差别，这比韵书的编排自然有所前进，但还没有摆脱音类描写的格局，说不清每个音类所代表的具体的音值。语音史的研究，只是把不同时期的韵书或韵图加以分析，比较它们的异同，整理出音类的发展概况。这就是说，它们只研究语音在时间上的发展，而不管在空间上的差异。如果说先秦古音距离现代汉语的时间过于久远，今天的方言差异难以清楚地反映先秦的语音面貌，那么切韵音系的研究，如果不参照现代汉语的方言差异，就无法进行具体的

语音描写。切韵音系的研究由于只局限于时间的因素，因而到“五四”前后也出现了危机，如“等韵图的编制，至劳乃宣已走到穷途；宋元等韵的解释，至黄季刚亦陷入绝境”③。

汉语音韵的研究只局限于时间方面的因素，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古代的音韵学家尊经崇道，他们研究音韵的主要目的是分立韵部，为训诂服务，替读通先秦的典籍做铺路工作；韵书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做诗押韵；编制韵图也只在于分析汉字的语音结构，简化反切，制成汉语的音节总表，使每一个字在这种总表中有它的固定地位。这些因素使音韵学的研究只着眼于书面材料，局限于时间的方面，而忽略空间的因素。这种研究形成一种强大的传统，左右着人们的研究方向。即使是一些为数不多的语言地域差异的分析，也往往以古为是，以古为准，是古非今，以古正今。不少人以《广韵》为标准定当时方言的正误。明代陆容认为“天下音韵多谬”，“如吴语‘黄’‘王’不辨”，“京师人以‘步’为‘布’，以‘谢’为‘卸’，以‘郑’为‘正’，以‘道’为‘到’，皆谬也”，“非聪明特达，常用心于韵书者，不能自拔于流俗也”（转引自罗常培，1933，146）。清潘耒也有与此类似的议论，认为“北人诋南为缺舌之音，南人诋北为荒伧之调；北人哂南人‘知’‘之’不分，‘王’‘黄’不别，南人笑北人‘屋’‘乌’同音，‘遇’‘喻’同读；是则然矣，亦知其各有所短、各有所长乎？……倘能平心静气两相质正，舍己之短，从人之长；取人之长，益己之短；则讹者可正，缺者可完，而本有之音毕出矣”（同上，144）。潘耒虽然想从各方言中取长补短，求“本有之音”，但这与历史比较法从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中找出语言发展的轨迹及拟测语言的原始形式无关。陈第尽管提出语言发展的时间与空间的区别，但实际的语言研究还远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历史比较法要在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中找出语音的对应关系，而“集南

北之长”的取长补短式的求“本有之音”，只是想建立一个各方言的最小公倍数。说到底，旧时的语言学家还不认识在方言的差异中反映着语言发展的序列，在空间的因素中包含着时间的序列，因而在具体的语言研究实践中无法把这两种因素辩证地结合起来。割裂语言发展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只局限于时间方面的研究，进展到一定的限度就会无法继续前进。汉语的音韵研究到“五·四”前后出现危机，一时不知如何前进，这不是偶然的，是方法论上的片面性造成的一个结果。旧方法的危机促使学者们去探索新路。他们发现历史比较法可以用来改进汉语的音韵研究，看到过去的成就“只能使我们约略地知道古今变迁的大齐，不能使我们明白声韵发展的程序”④。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就是要在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中研究语言的发展序列，把语言发展中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结合起来。

三

把空间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结合起来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而取得显著成就的第一个语言学家，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他的四卷本《中国音韵学研究》中专门有一卷研究“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为的是“要能用它作成中国音韵的历史的研究”⑤。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今天的方音，为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清理出一个清楚的轮廓。

历史比较法起源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印欧系各语言大多采用拼音文字。不同时期的文字的拼写法大体上可以反映语言的变迁。不过这只能涉及语言的有史时期，要探索史前时期的语言史，书面文献就无能为力了。比较现存的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别，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是重建史前时期的语言史的一种重要的方

法，梅耶甚至把它看成为“建立语言史的唯一方法”，认为“一种语言只要是孤立的，就没有历史可言”，“如果我们想不出办法把巴斯克语拿来和某种别的语言对比，那就永远没有建立这种语言的历史的希望”⑥。历史比较语言学正是比较了印欧系语言之间的差异，往前探索史前时期的语言状态，重建语言的始原形式，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以今证古的研究路子一般称为“回顾”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此有过很高的评价，指出历史比较语言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成就”⑦。汉语是有悠久历史的语言，有浩繁的书面文献。照理，凭借文字、文献资料就能有效地进行有史时期的汉语史的研究。但是，方块汉字不反映具体的语音面貌，它有跨时代、跨地域的特点，同一个写法的汉字，古今的读音不同，不同地区的读音也不同。这与拼音文字很不一样，它的写法难以反映实际的语言状态。因此，即使是有史时期的汉语史的研究，只根据文字、文献资料的年代先后的顺序而进行从古到今的“前瞻”的研究，也还不能对汉语的发展进行具体的语音学的描写(“五·四”前后汉语音韵研究的危机具体地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只有进一步结合“回顾”的研究路子，才能使汉语史的研究别开生面，从“山重水复疑无路”中找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路。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

《切韵》是高本汉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枢纽。他认为《切韵》所代表的语言是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的始原“母语”，现代的方言都是从它发展出来的。至于《切韵》以前的汉语，现代的方言就够不到了，只能另想办法去研究。因此，要研究《切韵》以后的汉语语音发展史，高本汉认为必须使所拟测的古音“跟这个语言的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而且“还要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不只一两处方言)，解释

到一种可信的程度"⑧。这就是说，研究《切韵》以后的语音史要抓住两头，一头是《切韵》(古材料)，一头是现代汉语方言，用音理把这两头贯穿起来，以解释从《切韵》到现代汉语方言的变化。

韵书是按韵编排的，不能反映整个音系的面貌。高本汉抓住和《切韵》"同是一回事"⑨的《广韵》的反切，比较切字"互相系联的关系，把同切字一套一套的求出来"，最后找出二百九十个上下的韵母和四十七个声母⑩，制成"古音字类表"，用以代表《切韵》的音系。这是根据"历史上的旧材料"整理出来的，只有音类，没有音值。而要进行音值的描写，就要参照现代汉语各个方言之间的差异和借词的语音表现，即"把所研究的方言的全体的音类(声母跟韵母)检查一道，看每种音类的见次……看哪些音跟中古音的什么什么声母韵母相当"⑪，从中选择某些既与"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又能说明现代方言的语音变化的语音形式，"把古代音类表里所有的那些 x，y 的类名用确切的音值代出来"⑫。这样，高本汉根据"历史上的旧材料"定音类，比较方言的语音差异定音值，从而对切韵音系进行语音学的描写。

把方言的语音表现同"历史上的旧材料"结合起来，在有史时期的语言史的研究中，这自然是一条正确的方法论原则。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大体上要经过四个步骤：1. 收集材料；2. 根据语音的对应规律确定同源关系；3. 确定所比较的材料的年代先后顺序；4. 拟测所比较材料的始原形式。这些步骤中隐含着历史比较法的两个严重缺点。第一，拟测的结果决定于材料所提供的线索，如果古代语言的一些特点在现存的方言或亲属语言中消失了，我们就无法收集到这些材料，因而也就无法从现存的语言状态中推知古代已经消失了的语言特点。第二，在比较中最复杂、最困难的是确定所比较的材料的先后年代顺序，在没有文字的语言中，

只能根据音理加以推断，在此基础上拟测始原形式。这样的始原形式属于什么时代，我们无法确定。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根据方言的差异而拟测的古音要和“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的原则，如果处理得好，可以克服历史比较法的这些缺点．因为反切、韵书等“历史上的旧材料”都有确切的年代，大体上都能反映当时的语言状态。高本汉的确想用这一原则来克服历史比较法在汉语研究中的缺点。他既然把《切韵》看成现代方言的始原“母语”，他就可以放心地从《切韵》出发来解释现代方言的变化，既不用考虑所拟测的始原形式的年代，也不用担心方言材料的遗漏。因此，关于音类的分合，高本汉严格地以“历史上的旧材料”为根据，然后用方言的差异来说明这种分合的理由并拟测相应的始原形式。我们在这里不妨以合口介音的拟测为例说明他的工作程序。

在《切韵》的系统里，某些韵摄的等的开口与合口同韵（如山摄二等的开、合口都是山或删），而有些等的开口与合口不同韵（如山摄开口一等是寒韵，合口一等是桓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歧异的现象？高本汉用合口介音的强弱来解释：开、合口同韵的是一个弱的合口介音 w，不同韵的是一个强的合口介音 u。如山摄：

	开口	合口
一等	kân	kuân
二等	kan	kwan

然后高本汉用方言的差异来说明他的拟测。他认为弱的合口介音容易消失，变成开口字。象山摄开口一等“般”等字在《切音指南》和《广韵》的反切、《切韵指掌图》等材料中都为合口字，而二等“班”等在反切、《切韵指掌图》属合口，而在《切音指南》中变成了开口，w 失掉了。在现在的方言中也有同样的反映，象山摄一等的唇音字在归化、广州、福州、厦门、汕头等方言中还保留着合口的 u，而二等

字则没有合口介音的反映形式；在广州话中，一等合口的强介音u在从中古到现代的发展中吞没了主要元音(如“官”kuân>ku:n)，而二等字则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如“关”kwan>kwan)。高本汉通过这样的途径为《切韵》的每一个音类拟测出具体的音值。这个音值，一要和“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二要能解释从《切韵》到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的语音演变，三要符合音理。这样，高本汉为现代汉语的方言拟测出始原“母语”——切韵音系的语音形式。这是汉语音韵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虽然他对《切韵》和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的关系的认识有些简单化(参看下一节的分析)，但把《切韵》作为汉语史研究中联系古今的一个作业框架，这是合理的，有价值的。有了这样一个音系，现代的方言在它们的历史发展中大体有了一个汇聚点，或者说，为解释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找到了一个方便的、有效的参照点，可以具体地说明从《切韵》到现代方言的语音演变过程和演变规律。要是没有这样一个汇聚点或参照点，那只能是不同时期的语言材料的堆积，很难整理出具体的语音发展规律。所以，这是传统的音韵研究无法达到的一个成就。

高本汉为汉语的音韵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这种新路也就是在欧洲兴起的历史比较法和传统的汉语音韵研究的结合，或者说，是语言的空间差异与时间的发展序列的结合。没有传统的汉语音韵研究，高本汉要取得这样的成就也是不可能的。高本汉自己说过，他在汉语音韵的研究中碰到两次好运气：研究切韵音系的时候有《切韵》系统的各种韵书、韵图和日、朝、越等各种借音材料；研究上古音的时候有谐声、诗韵，使他“有可能拟测周初王都的发音的主要特征”。(参看 Grammata Sericd，1940)这一说法是符合他的实际情况的。高本汉的实践说明，把语言在空间上的变异和时间上的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汉语的历史，无论从目的、材料、方法等各

个方面来说，都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汉语音韵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

语言史研究中空间与时间的结合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材料不全，研究不细，推敲不密，都会给语言史的研究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高本汉虽然在这方面开辟了新路，取得了进展，但是不少地方有疏漏，需要修正。

高本汉把历史比较法用于汉语的研究，如前所述，基本上是抓两头：一头是"历史上的旧材料"，一头是现代的方言，利用汉语方言的差异给"历史上的旧材料"作音值的描写。这种研究的成效主要决定于材料的准确性和音理解释的合理性。如果方言材料或者"历史上的旧材料"有了疏漏，就会直接影响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果。高本汉关于合口介音的拟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根据《广韵》的开、合口是分韵还是合韵拟测两个合口介音，分韵的是强 u，合韵的是弱 w。但是，《广韵》开、合口的分韵和合韵的区别在《切韵》残卷里不一定存在，例如《广韵》戈韵字在《切韵》残卷里并入歌韵，同样，桓韵并入寒韵，这就否定了高本汉分立 u 和 w 两个合口介音的"旧材料"的根据。高本汉还用唇音字的开、合口作为分立 u 和 w 的佐证，但恰恰是唇音字在《切韵》系统里难分开合或不分开合。赵元任、李荣对此有很好的分析。李荣根据唇音字反切上下字不分开合的情形指出"唇音字无所谓开合"，"唇音字可开可合，不分开合"⑬。高本汉拿不分开合口的唇音字作佐证，自然会留下很多矛盾。至于说到近代方言的演变，赵元任认为"困难的是它们证明得太多。因为广州仙si̯än 跟宣si̯wän 变成 si：n 跟 sy：n，正和干 kân 跟官 kuân 变成 ko：n 跟 ku：n 一样。事实上，从歌分出戈，可

以认为是后来元音的变迁，完全跟仙(si:n)分出宣(sy:n)一样，虽然前者比后者早⑭。赵元任、李荣认为高本汉所拟测的两个合口介音 u 和 w 不对立，是同一个音位的两个不同的变体，在写法上可以改成一个符号。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本汉无论在旧材料的整理上，还是方言材料的运用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我国的学者为改进切韵音系的拟测进行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从而补正了高本汉的一些疏漏。例如，赵元任、李荣否定三等韵声母的 j 化说，陆志韦、董同龢、周法高提出三等韵的重纽问题，等等⑮，都对尔后的汉语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国外的评论，认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到四十年代已经超过了高本汉⑯；高本汉自己在 1954 年回忆他的音韵研究工作的文章中也特别提到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学者的启发而使他改变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的比较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拟测的可靠性决定于材料的丰富性、准确性和典型性的程度。高本汉在拟测切韵音系的时候收集了三十三种方言(包括日译吴音、日译汉音、高丽译音、越南译音等四种域外方言，即借音)，其中二十四种是他实地调查得来的。一般说来，三十三种方言材料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这些方言的代表性有些问题：一是过于集中北方方言，约占三分之二；二是对一些南方的重要方言如吴、闽、粤、客家等注意不够，而经过高本汉自己"审核过"的只有上海、广州、福州三点；三是没有湘、赣这两个重要方言的材料，因而对于拟测如此复杂的汉语方言的始原形式并且要使拟测"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不只一两种方言)，解释到一种可信的程度"来说，这些方言材料就显得不够了。方言材料的欠缺与高本汉的认识有关。他认为《切韵》代表长安方言，是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的始原"母语"，可

以“把一切方言都直接跟《切韵》的语言连接起来”，用《切韵》来解释现代方言的分歧。后来他说得更明确：“几乎所有现在分歧巨大的方言都能一个个合理地、系统地从《切韵》导出”⑰。基于这种认识，高本汉在研究中以《切韵》为起点，追溯现代方言的演变，而不是反过来，根据现代方言的差异去分析它们与《切韵》的关系。因此，方言材料的使用在高本汉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只是被动地处于陪衬的地位，只替《切韵》的音类作注释，能够用方言材料解释《切韵》音类的分合，他就满足了；他不想用分歧的现代方言的差异去检验他的《切韵》“母语”说的可靠性。高本汉使用方言材料的片面性，对于方言差异的比较研究的不充分性，即没有充分利用语言的地域差异去探索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序列，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上的原因。

把历史比较法用于汉语有史时期的研究确有很多有利的条件，除了有不同时期的“历史上的旧材料”以外，方块汉字也是一项重要的财富。在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确定同源成分有很大的困难。汉语使用方块汉字，尽管方言的分歧超过一些印欧系语言之间的分歧，但确定同源成分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汉字的相同的书写形式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哪些是同源成分。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同源成分在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语音表现形式，使各方言区之间呈现出相互看得懂、但是听不懂的奇怪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对分歧的方言进行全面的、谨慎的分析，再参照“历史上的旧材料”，就可以从方言的差异中整理出语言发展的线索。这是研究汉语史的一个有利条件。汉语的历史悠久，从《诗经》的语言到现代的方言，将近三千年。利用现代方言的差异整理出三千年的汉语发展史，这是困难的，不可能的。高本汉选择《切韵》作为联系古今的枢纽和语言史研究的作业框架，这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应该

承认，这是高本汉高明的地方。但是，把它说成是现代方言的“母语”，现在有巨大分歧的方言都能直接“从《切韵》导出”，这就把复杂的语言现象简单化了。如前所述，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方言的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因而在不同的方言中都可能保留一些代表不同发展阶段的语言现象；这些现象，有些(可能是多数)可能是从《切韵》的语言发展出来的，有些可能还保留着《切韵》以前的语言状态，因而对方言的差异和“历史上的旧材料”的关系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一刀切。高本汉用《切韵》这把刀把汉语史一切为二，说明现代的方言只能跟《切韵》联系，而与《切韵》以前的汉语无关，这就不能不与实际的语言事实发生冲突，而且也必然会影响高本汉对汉语史的研究。实际上，有些方言的某些特点很难从《切韵》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赣方言的“知”“章”“端”三母同读[t]，“彻”“昌”“透”三母同读[tʻ]；厦门话的舌头舌上不分，齿头正齿不分，等等⑱。这些现象在切韵音系的研究中可能作用不大，但对《切韵》以前的汉语的研究，却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高本汉在拟测汉语上古音的时候认为汉语的方言够不到上古，只能根据诗韵、谐声定音类，根据所拟测的切韵音系，通过内部拟测的方法定音值。这从总体上说是对的，但从某些局部的现象来说，就不尽然。高本汉在填补《切韵》咸摄合口的空格的时候，曾在汕头话中找到几个残存的收-m尾的合口字，真是如获至宝，立即作为重要的根据。⑲如果他看到赣方言的“章”母读[t]，肯定会在这里大做文章。高本汉根据谐声系列里端、透、定既能与知、彻、澄互谐，也能与章、昌、船、禅互谐的情形，拟章组为[ȶ](章)、[ȶʻ](昌)、[ȡ](禅)、[ȡʻ](船)。赣方言的“章”母读塞音[t]，可以为“章”等上古读塞音的拟测提供一个有力的方言材料的根据。至于上古的[ȶ]如何变成赣方言的[t]，罗常培有一个解释：“由知彻澄没有经过颚化一点来看，

可见这个方言是不惯于发舌面塞音的，那么上古的舌面塞音[ȶ；ȶʻ]，如果不变成同部位的舌面塞擦音[tɕ；tɕʻ]，就很容易变成方法相同，部位相近的舌尖塞音[t tʻ]了。这种情形和上古音里章昌船同端透定互相谐声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我觉得临川音的这种现象并不是晚近的演变。”[20]（这一段的评述，请参看文后的附记。）

在语言史的研究中，有《切韵》那样的韵书，自然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但是不要因此而影响方言材料的运用和历史比较研究的进行。高本汉在方言材料处理上的疏漏，与《切韵》和现代方言的关系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高本汉后来也感到原来的解释有毛病，稍稍作了一点补正，认为“只有少数南部沿海的方言，如厦门话、汕头话、具有不能从《切韵》得到解释的特点，而提示《切韵》以前的语言情况”[21]。不过他没有根据这种新的认识而对原来的拟测作一些必要的修正。

五

前面的分析说明，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如何把语言在空间上的差异和时间上的发展结合起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只顾一个方面，研究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陷入困境；如果结合得不大好，也会给语言史的研究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历史语言学的这种方法论原则要求我们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兼顾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注意语言在空间的差异中所反映出来的时间的序列，以此补充象汉语那种非拼音文字材料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不足。

书面材料的研究在汉语研究中有悠久的传统和丰硕的成果。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只要我们加以总结、继承并与复杂的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定能使语言史的研究放出异彩。就现阶段来说，如何深入调查汉语方言，并把这种成果运用于汉语史的研究

上，是一项迫切的任务。自李荣的《切韵音系》以后，我们还没有一本把汉语方言的差异和文字、文献材料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语言史著作。有些外国学者对此感到奇怪，认为解放后对汉语的方言进行了大量的、广泛的调查，但是还没有见到把这些调查的成果用来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22]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用不着在这里评述，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而且不能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相反，国外的一些学者倒比我们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在1968年开始的汉藏语学年会的汉语组讨论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些研究汉语的学者提出一种被称为"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 hypothesis)的观点，认为高本汉关于汉语从上古经过《切韵》发展到现代汉语的方言的观点和以此观点为基础的古音系拟测，都是不正确的。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比高本汉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主张在汉语史的研究中严格采用欧洲式的历史比较法，从复杂的汉语方言的差异出发，不管历史上的文字、文献的材料，先为每一个方言群拟测出它们的始原语(Proto-languages)，如始原北方话、始原闽语、始原粤语、始原吴语等，以后再在此基础上拟测出始原汉语。罗杰瑞(Jerry Norman)关于始原闽语的研究就是这一假设的具体实践。把有历史的语言，即有文字、文献材料的语言作为没有历史的语言来研究，完全抛开书面材料的有利条件，这在方法论上未免失之片面。但是，这一假设要求注意方言的分歧，从歧异中研究语言的发展，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完全可以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作为我们改进语言史研究的借鉴。

注意方言差异的比较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语言演变的具体的轨迹，而且也可以为改进古音的拟测提供方言材料的根据，这是语言史研究的需要。

方言的差异反映语言演变的轨迹，这是很明显的。我们平常说在相同的条件下处于同一聚合群中的音位如果发生变化，那就一律都变，而且在同一地区内一定沿着同一方向演变（例如[k kʻ x]在齐、撮呼前变成[tɕ tɕʻ ɕ]）。这是就某一个历史阶段来说的；至于在这一时间阶段内，同一聚合群中不同音位的变化速度可能有先后、快慢的区别。方言内部的一些差异可以反映这种变化的过程。比方说尖、团音的问题，在吴方言中的苏州话声母不分清浊一律分尖团，宁波话不分清浊一律不分尖团，而在一部分人的上海话中清音和浊塞擦音不分尖团，而浊擦音分尖团。这种差别可以具体反映尖、团合流的过程。对这种差别的分析现在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类现象的分析研究，可以为历史比较研究中确定音变的先后顺序提供有说服力的根据。

古音的拟测是以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别的比较为前提的，即使是象汉语那样有书面文献材料的语言的古音拟测，也得有方言或亲属语言的材料的根据。由于我们现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不够，因而有些古音的拟测根据不足。切韵音系的四丙等的介音的拟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高本汉根据山、咸两摄见组字的高丽译音认为三等韵带有一个弱的辅音性的介音 i̯，四等韵带有一个强的元音性的介音 i。李荣不同意这种拟测，他的理由是：一，山、咸两摄的不少三等字的高丽译音也带有 i 介音；二，根据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一、二、四等一组，三等一组，一、二等是没有介音的，因而对四丙等有 i 介音的说法是不利的，而且带弱的 i̯ 介音的三等韵的反切上下字要求介音和谐，那带有强的 i 介音的四等韵为什么没有这种介音和谐的要求呢？不好解释；三，带有弱的 i̯ 介音的三甲等韵能与章[tɕ]组配合，为什么带强的 i 介音的四丙等不能与章组配合？这从声韵配合的规律来说，也难以解释。因此李荣主张在

切韵音系的拟测中取消四等的介音，只保留主要元音e。[23]这种看法主要是根据书面文献材料和音理作出的理论上的推断，而没有方言材料的根据。周法高根据三、四等韵在现代某些方言中的语音表现以及反切上字，认为《切韵》的四等韵还是有i介音的。[24]他的解释与《切韵》的三、四等韵在已知的现代方言中的语音表现比较合拍，但于反切的解释又嫌勉强。出现这种分歧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对现代汉语的方言缺乏全面的调查研究。《切韵》的三、四等韵在今天的方言中究竟有哪些表现形式？有哪些不同？我们现在还缺乏一个全面的了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面材料是"死"的，而方言材料是"活"的，如何把"死"的材料作出活的、准确的解释，离开现代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就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所以，对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进行全面的调查，实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把语言在地域上的差异同"历史上的旧材料"结合起来，比较汉语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探索语言发展的历史，前景是很广阔的。现在已不是高本汉写作《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时代。那时候的汉语方言除了一些传教士作了一些不大高明的调查以外，鲜有研究。解放以后，我们对汉语的方言已经作了相当广泛的调查，虽然质量不平衡，但比高本汉开始研究汉语音韵的时代要好得多了，这就为比较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方言》编辑部为这种比较研究提出了四条共同的要求，指出"方言比较不怕资料少，就怕各地的资料对不起来，为方言比较积累资料起见，这类文章最好有共同的要求，一致的调查表格"。[25]这说明对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已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可以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进一步促进、指导调查研究的深入展开，从而使语言史、现代汉语乃至语言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的方向发展。汉藏语系的

历史比较研究在近几十年来也有了很好的发展，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为汉藏系语言的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总之，把语言的空间变异和时间的发展辩证地结合起来，定能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开出新的花朵。

1981 年 7 月

（原载《语言研究论丛》第三辑）

【附注】

①参看徐通锵、叶蜚声《内部拟测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1 年第 1 期。

②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和《读诗拙言》。

③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 1957 年版，第 315 页。

④潘尊行《原始中国语初探》，《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3 期第 422 页。

⑤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合译本，第 142 页。

⑥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1 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18 页。

⑧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第 4 页。

⑨同上，第 20 页。

⑩同上，第 59 页。

⑪同上，第 162 页。

⑫同上，第 452 页。

⑬李荣《切韵音系》第 130 页。

⑭赵元任 Distinction within Ancient Chinese；见《哈佛燕京学报》第 5 卷第 2 期第 215 页。

⑮参看徐通锵、叶蜚声《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见《语文研究》1980 年第 1 期第 36—39 页。

⑯参看 Sebeok 主编的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卷二（1967）中 N. C. Bodman 关于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情况的述评。

⑰B. karlgren，The Chinese Language，New York，1949。

⑱参看罗常培的《临川音系》和《厦门音系》。

⑲高本汉《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见史语集刊第 245—249 页。

⑳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11 页。

㉑参看 The Chinese language.

㉒同⑯注。

㉓参看李荣《切韵音系》，第 105—106 页。

㉔周法高《古音中的三等韵兼论古音的写法》，见史语集刊第 19 本第 216 页。

㉕参看《〈方言〉两年》，见《方言》1981 年第 1 期第 2 页。

【附记】

关于赣方言章、昌、禅母字的塞音读法，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现在已有新的认识。它们是《切韵》以后语音演变的结果，不是上古塞音读法的保留。请参看拙著《音乐的结构格局和内部拟测法》（《语文研究》1994.3—4 期或《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二编第一章。

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

——附论音变规律的三种方式

一、目的、材料和方法

1.1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一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设法理清音变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中总结音变规律的方式及其特点，并作出理论性的解释。

1.2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选用了如下材料：

(1)《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W. T. Morrison, 1876, 上海，以下简称《汇解》。)

(2)《宁波方言的音节》(The Ningpo Syllabary, P. G. von Möllendoff, 1901, 上海，以下简称《音节》)。

(3)《宁波方言手册》(The Ningpo Colloquial Handbook, P. G. von Möllendoff, 1910, 宁波，以下简称《手册》。)

(4)《宁波方音和国音比较的札记》(寒涛，《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2期，1922年。以下简称《札记》)。

* 本文发表后，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汪维辉先生提了一些补正性的具体意见，非常感激，谨此致谢。

(5)《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1928,北京,以下简称《研究》)。

(6)作者所作的鄞东五乡碶方言调查,1956年。发音人:荆逸民(男,23岁,五乡碶离宁波二十余里)。另外同时又调查了周义庆(男,19岁,南门外)、邵式平(男,19岁,鄞南邵江村)、傅璇琮(男,25岁)、金凤英(女,25岁)、朱纪鹏(男,22岁)等人的宁波方言的声调。

(7)作者所作的宁波方言调查,1980至1982年。有十余个发音人,从中选择下列有代表性的几个同志的语音作为本文的分析材料:

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住区	职业	文中简称
郑芳怀	男	46	城中心	教员	城心(郑)
何汉英	女	47	小时曾住南门外,后迁入城区	工程师	城区(何)
沈亚萍	女	23	南门外	大学生	南门(沈)
王纲平	男	27	西门口	大学生	西门(王)
袁 逸	男	28	江东	大学生,曾做八年工人	江东(袁)
梁晓瑜	男	24	城区,曾有数次迁徙	大学生	城(梁)

上述七项材料,前五项是书面文献材料,即一般所说的"死"材料;后两项是现实的语言调查,即一般所说的"活"材料。五项"死"材料,其价值是不一样的,赵元任的《研究》是当时宁波方言的最可靠的语音描写,我们可以以它为枢纽,承前启后,考察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是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通商口

岸之一，文化上自然也就成为传教士的一个重点活动地区。《汇解》的作者睦里逊是一个传教士。他于1860年到宁波。为了学会宁波话，他广泛收集宁波方言的口语材料，并记上音。《汇解》就是他根据十六年中所积累的材料整理出版的一本资料集。据作者自已说，书中每一个词例的记音都经过五个汉语教员的帮助和检查。总的看来，作者对语言事实的态度是严肃的，记的音也大体可靠，至少音类的区分是可靠的，音值的记录可能有些出入，但如果抓住音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比较后来发生的变化，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抓住当时宁波音系的实质。《汇解》不失为一百年前反映宁波方言面貌的一幅难得的"照片"。

莫棱道夫是当时宁波海关的一个官员。他于1897年到宁波，1901年去世。从他给《音节》写的导言来看，他的语言学修养比睦里逊高。他几乎给每一个音位都作了具体的语音描写，这一点正好弥补了《汇解》的不足。莫棱道夫研究宁波方言的计划很庞大，《音节》与《手册》只是他的总计划中的一部分。可惜他死得早，没有完成计划。《音节》是在他死前几个月整理出版的，至于《手册》，他只留下了一堆材料，是由别人帮他整理于1910年出版的。据《音节》的前言所说，它反映四十年间(1860年以后)的宁波方言的情况。这就是说，他接受了睦里逊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研究，整理出版《音节》这部书。所以它的记音与《汇解》完全一致，可以看成《汇解》的续篇。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曾谈到莫棱道夫的记音采用"传教师的记载"，与 Parker 的"记载关于韵母相差得太远"，高本汉因自己不懂宁波方言，因而"没敢收在这字汇里"(见中译本第542页)。我们没有看到 Parker 的著作，但根据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所引的材料，我们发现有很多矛盾，如"纱"记为[so](494页)，又记为[sɔ](461页)；又如把宕摄字一会儿记为鼻

化韵[－õ][－uõ]，一会儿记为[－o](499 页)[－ia](496 页)，因而这项材料无法利用。至于睦里逊和莫棱道夫的记音，体例统一，前后一致，如果剔除汉字使用上的一些明显错误(如在 k'ô 音下有"捏白"，Dziao 音下有"群白"(一～人)，这显系"掆""潮"的训读)，还是相当可靠的，我们感到可以放心地使用这两种材料。

从 1876 年《汇解》的出版到 1980 年我们对宁波音系的调查，前后 104 年。本文所考察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宁波音系的发展。由于《汇解》反映 1860 年后的宁波方言的状况，我们也可以说，本文所考察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宁波音系的演变。

1.3 上面的几项材料(《音节》与《手册》可算作一项)，按时间的顺序排下来，前后两项(《札记》难以自成一项)的间隔大概是 20—30 年。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宁波方言的发展，这为我们从时间的角度考察语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六、第七两项材料我们注重语言的变异，希望从变异中观察演变的过程和趋向。鄞东五乡碶方言虽与宁波话有些距离，但可用来比较。语言的变异和差异使我们有可能从空间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的演变。本文的基本方法就是把语言发展中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结合起来，把"死"材料与"活"材料结合起来，把语言的系统性和变异性结合起来，考察百余年来宁波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想从语言在时间的差异中看发展，从语言的内部变异和方言间的差异中看发展的过程和趋向，从中揭示音变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整理出语言发展的线索。

二、调类的简化和连读变调

2.1 声调是传教士感到头痛的问题，他们一般都采取回避的态度。《汇解》没有声调材料，只在"前言"中提到"水"(shü)和"书"(shü)不同音，"冰"(ping)与"饼"(ping)不同音(页 6)，说明阴平和

阴上有明显的区别，属于两个调类。至于当时的宁波话究竟可以分几个声调，我们从《汇解》中找不到答案。《音节》关于声调的说明比《汇解》详细，但也只能让人看到一个大致情形。它说宁波方言的声调有平、上、去、入四类。根据它的描写，平声是平调，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的发音急而短；其中每一个声调又因声母的清浊而分为高低两个，即阴调字和阳调字的调值不同。这样看来，当时的宁波方言有八个声调，不过平声和去声的区别很小，要有很好的听音能力才能分辨（5—7 页）。莫棱道夫关于声调的观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我们虽然不能从他的描写中了解具体的调值，但每个声调因声母的清浊而分高低两个这一观察是可靠的，而且关于平、去两调难以区分的观察还相当细致。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指出："阴平、阴去不易分。阳平、阳去起音低，所以有一种特别'浊重'的'宁波腔'。"（84 页。）

2.2 《研究》有完整的声调记录，当时的宁波话有七个或八个声调：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3 1	2 4 1 #	54 # 6♭	＝阳去？	32 # 3	7 2	5	2 # 3
(31)	(231)	(435)		(323)	(13)	(4)	(23)

《研究》用乐谱记调值，这自然比五度制精确，不过使用起来不大方便，因此我们只能勉强折合成五度值，放在括号内，以资参考。这里有七个声调，阳上存疑。这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的参照点。

2.2.1 当代宁波方言的声调，内部分歧相当大，多的有七个，少的只有四个，反映出声调的发展有简化的趋向。请先比较表 1 中的语音现象：

这个声调表说明，宁波方言的声调内部分歧相当大。从语言的

共时状态来看，调类的分合相当“乱”。这个“乱”在表中反映出来了。另一方面，这个“乱”还表现在每一个调类内部和各调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这在表中反映不出来，需要逐个加以说明。

城区。原来的三个舒声阴调字合并为一类，调值42，但有一部分字偶尔也会念44的调值；有少数原阴上字也可以念435调值，但不稳定，而且其间也缺乏规律，发音人对这些调值差别已无分辨能力，因面无法分成不同的声调。原来的三个舒声阳调字已合并为一类。

【表1】

调类/例字/调值/地区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阴入	阳入	总数
	诗高	时题	纸走	在美赵	正醉	识滴	石食	
城区（郑，何）	42(44,435)	24	(435)			5	23	4
西门（王）	42(44)	24(313)	435			5	23	5
江东（袁）	42(44)	24(313)	435			5	23	5
南门（沈）	42(44)	24	435	313		5	23	6
郊区（荆）	42	24	435	313	44	5	23	7

西门（王）。原阴去与阴平合并，阴上字大部分也与阴平字合并，但《方言调查字表》中还有84个字保留435的调值。①三个舒声阳调字已经合并为一类，但内部包含有两种调值，有65个字可念313调值，阳平、阳上字都有，无规律可循。②这与南门（沈）的情况不同。另外，这里所列的保留某一调值的字数只是根据某一次发音的统计。不同时间发音，数字可能有出入，而且某些字属A调还是属B调，也可能不一样。但就多数字来说，前后的读法大体一致。下面谈到其他人的发音状况与此相同。所以统计数字只表明

一个大致的趋向，不能绝对化。

江东（袁）。原阴上字大部分已经与阴平类合并，但还有 114 个字保留原调值；③三个阳调舒声字已合并为一类，但 313 的调值仍有残存，如“胃”“伟”“魏”念 24 或 313 均可。

南门（沈）。阴去字多与阴平字合并，但有一部分字仍保留 44 调值。阴上这个调类还相当完整，只有 65 个字归入阴平，④占字表中阴上字总数的 17%。阳上字是一种残留，有 34 个字念 313 调值，其中有阳上字 32 个，占字表中阳上字总数的 11%左右。⑤沈的发音比其他人稳定，通过同音对比，313 仍是一个固定的调类，与 24 的阳平调不同。所以字数虽少，仍可自成一类。

郊区（荆）。三个舒声阴调字的调值经常互混，但还可以分出三个独立的调类。阳去和阳平合为一类。313 调值中包括大部分阳上字和一部分原阳去字。

声调的这些复杂情况为我们分析声调的演变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

2.2.2 语言的变异反映语言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没有完成以前，这些变异形式看起来是乱糟糟的，我们需要从这种“乱糟糟”的变异中清理出语言演变的线索和规律。

《研究》的七个声调是清楚的，看不到有相互牵扯的现象；阴平、阴去也只是“不易分”，而不是不能分，而在往后的发展中不同的声调就出现了相互交叉的情形。总的看，声调调类的演变可分舒、入两类：入声类的变化不大，各个材料都记载着它们各自的独立性，我们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舒声调的变化比较大，而这里又因声母的清浊而分为阴、阳两类，各自顺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变化。在阴调类中，首先是阴去与阴平“不易分”，进而逐渐合流为一个声调，声调的共时变异反映了这种过程。其次，阴上逐步归入阴平

(去)类。如以"＋"代表合,"－"代表分,那么,阴上类的合并情况可以归纳如下:

城　区	西门(王)	江东(袁)	南门(沈)	郊区(荆)
＋	＋ (－)	＋ -	－ (＋)	－

城区和郊区各据一端,在城区,三个阴调全合,而郊区的三个声调可以分。西门(王)、江东(袁)、南门(沈)代表城区的边沿,但又各有自己的特点,西门(王)以"合"为主,南门(沈)以"分"为主,这些差别象台阶一样,逐级而下,反映出演变的过程和层次。如果我们再进而仔细检查西门(王)、江东(袁)所保留的阴上字,可以发现多为常用字;而南门(沈)从阴上流入阴平的多为非常用字。这种现象说明宁波话声调的合并不是一刀切,而是一个一个地逐步过渡,非常用字先变,而后才逐渐波及到常用字。正由于声调合并过程的这种渐变性,才使单字调的归类不仅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有先后次序的不同,呈现出参差的局面,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有些字的声调也会处于可变可不变的状态之中,一会儿这么念,一个儿那么念,不那么固定。例如"死",江东(袁)的第一次发音是阴平(42),第二次读阴上(435);"蒋奖"两字开始时读阴平,"桨"读阴上,但后来又肯定这三个字同音,其调值都为435。这些现象都说明,宁波方言的调类简化还处于发展过程中,因而在共时状态中充满着变异,表现出离散式音变过程的特点。

(详见§5.5)

2.2.3 阳调类的三个声调的发展线索看来没有阴调类那样清楚。《研究》中的阳上栏写着"＝阳去?",似乎说明两类字有纠缠。是一个调类还是两个调类,作者难以下结论。但从作者的意图来

看，阳上字已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其发展的去向与历史上的“阳上归去”的规律相符合。施文涛的《宁波方言本字考》（《方言》1979年第3期）也只有阳去而无阳上，处理办法与赵元任一致。根据我们的调查，情况似乎有点不同。在反映市区语言面貌的几个发音人中，南门（沈）的语言最“古老”，而且发音也很稳定，在34个念313调值的字中有32个原阳上字，占94%强。这些字虽然是残存现象，但却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的声调表中有阳上而无阳去。

阳上字的不同处理涉及到三类阳调字的归并次序。根据《研究》和《本字考》的处理，那是阳上和阳去先合并为一类，而后这类字又与阳平字合并，但是这很难解释“残留现象为什么绝大部分都为原阳上字”的问题。我们在1956年调查时，已发现阳调字可以分为城里、城外两派，城里派（傅、金、朱等人）的三类阳调字已合并为一类，而城外派（周、邵、荆）还分两类，大体上是：原阳平、阳去和少数原阳上字为一类，绝大部分原阳上字为另一类，调值为313。南门（沈）与周（义庆）都住南门外，沈的发音虽然离1956年的调查已有25年，但仍保留城外派的特点，阳上字还有相当数量的残留。根据这样的考察，三个阳调类的合并次序与阴调类相似，即阳去和阳平先合并，而后阳上字通过离散的方式再一个一个地归并到阳平类里头去，只是这一归并过程至今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三类阳调字的合并次序作如是的推断，还可以从变调中得到有力的支持。

2.3 百年来，宁波方言的八个声调（或至少是七个）通过什么途径而变成现在城区的4个声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跳出单字调的范围去进一步考察连读变调的情况。

2.3.1 对立的声调在连读变调中可能会失去相互的对立性，产生对立的中和（neutralization）。这种中和的现象是对立的音类

实现合并的一种重要途径。宁波方言调类的简化大体上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实现的。下页的表 2 是六个声调的南门(沈)的变调情况。为了防止可能的遗漏,原属阴去、阳去的字也单独作为一类列出。入声字的发音急而短,它作为下字的变调调值,数字上都隐含着一个连音符"$\overset{\frown}{\times\times}$",例如:"亲戚:22+44=22+$\overset{\frown}{44}$=22+4";凡能独立地表示入声的特点的(如作上字),则仍以单字符表示。调类组合时的变调格式往往有好几个,一般都以第一个格式为主。

先看三类舒声阴调字的变调。原阴平、阴上、阴去字作为连读变调的上字,大体上都还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作为下字,在同一变调格式中都已发生了对立的中和,调值完全相同。三类舒声阳调字的变调,从上字看,原阳去与阳平已合为一类,只有少数例外,而阳上字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下字看,三者在同一格式中也发生了对立的中和。清、浊两类声母的声调,在单字调中泾渭分明,绝不相混,但作为连读变调的下字,相互也发生了对立的中和,例如阴平之后,阳调字多为 42 或 44;阳平之后,多为 44 或 42,都与相应的阴调字相同。从这里可以看到,声调在连读变调中的对立的中和是宁波方言的一种重要现象,单字调的混乱可以在这里找到合理的解释。阴平、阴上都有一个只为自己所特有的变调格式,而阴去字没有,因而它易于与其他声调合并。

另一方面,如 § 2.2.1 所述,同一调类的字可以念不同的调值,或不同调类的字可以念同一调值,与这种连读变调有关,因为在实际中单字调并不都是常用的,而连读变调的调值经常挂在嘴边上。如果要确定一个单字的声调,发音人往往需要从语词的连读中去寻找它的调值;如果他依据的是不同的语词,那么他就会找出不同的单字调调值,从而造成单字调的某种不固定性。这种不固定性自然有利于调类的简化。

【表 2】

上字调	变调 \ 例字 \ 下字调	阴平 42	阳平 24	阴上 435	阳上 313	(阴去)	(阳去)	阴入 5	阳入 23
阴平 42	22+42	西瓜	安全	光彩		高兴	工会		
	22+44			青草	真理	车票	鸡蛋	亲戚	科学
	44+33				纲领				
阳平 24	11+44	农村	调查	门口	朋友	奇怪	材料	颜色	民族
	11+42	长江	篮球	模仿	杨柳	群众			
阴上 435	42+21	火车	海洋	手表	管理	火箭	土地	解释	坦白
	44+33	普通	典型	欣赏	手段	解放	讨论	寝室	企业
	22+44		散文		寡妇		主义		狡猾
阳上 313	24+33	耳光	码头	理想	领导	眼睛	眼泪	道德	马力
	24+21	导师	野人			女婿			
	11+44	尾巴		旅馆				语法	满月
(阴去)	44+33	汽车	证明	懊悔	介绍	照相	错误	信壳	记录
	22+44								纪律
(阳去)	11+44	外甥	地图	地板	糯米	恋爱	胃病	办法	艺术
	24+33				运动		电话		
阴入 5	5+33	客观	发条	色彩	裌里	急躁	设备	发作	积极
	2+44	竹竿				适意		节约	毕业
	54+21		足球					角色	法律
	2+435		秃头	结果	瞎眼				
	2+42	结婚				勿对			

续【表 2】

上字调＼变调＼例字＼下字调		阴平 42	阳平 24	阴上 435	阳上 313	（阴去）	（阳去）	阴入 5	阳入 23
阳入 23	1+44	目光		录取		白菜		蜡烛	特别
	1+435	学生	月球	石板	物理		学校		

2.3.2 变调表显示，同一类字可以有不同的变调形式。从语言的共时观点来看，这是变调形式的变异，这就是说，不仅单字调有变异，而且变调也有变异。这种变异提醒我们，不能单凭一个人的变调材料，不然可能有片面性。表3是四个例词在不同的发音人中的变调形式：

【表 3】

例字＼变调调值＼地区	城心（郑）	城区（何）	南门（沈）	西门（王）
农村	11+42	11+44	11+44	11+42
导师	24+33	11+44	24+21	11+44
纲领	42+21	44+33	44+33	44+33
崇拜	24+33	24+33	11+44	24+33

比较表中变调形式的异同，可以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第一，同一例词在不同的发音人中的变调形式可以不止一种，说明宁波方言的变调内部有变异；第二，变调格式则是有限的，变来变去，总跳不出这几种格式。这种现象表明，如果把歧异的变调形式再加以整理，归纳成变调格式，那也许能清楚地看到调类简化中的一些规律性现象。表4是根据南门（沈）的变调材料归纳而成的变调格式：

【表 4】

调类/变调格式/调型		舒＋舒	舒＋入	入＋舒	入＋入
低平＋高降	A	22＋42 西瓜		2＋42 结婚	
	B	11＋42 长江			
低平＋高平	A	22＋44 青草	22＋4 亲戚	2＋44 竹竿	2＋4 节约
	B	11＋44 农村	11＋4 民族	1＋44 白菜	1＋4 蜡烛
高平＋中平		44＋33 汽车	44＋3 信壳	5＋33 客观	5＋3 积极
高降＋低降		42＋21 火车	42＋2͡1 解释	5͡4＋21 足球	5͡4＋2͡1 角色
低升＋中平		24＋33 眼睛	24＋3 马力		
低平＋降升	A			2＋435 结果	
	B			1＋435 石板	
低升＋低降		24＋21 女婿			

这是宁波方言的基本变调格式。除了首行的“2＋42”和末行的“24＋21”以外，所有的变调格式的基本特点是：阴（A，上字清声母）阳（B，上字浊声母）相配，⑥舒入相配，相当完整。阳上还保留着自己特殊的变调格式（24＋33）。从语言的发展趋向看，这些变调格式已为调类的合并、音系的简化准备好结构的框架。“2＋42”和“24＋21”两种格式没有与之相配的格式，这可能是语言发展中的残存现象。我们在城心（郑）、城区（何）等人的发音中没有发现“2＋42”的格式；而“24＋21”的格式，城心（郑）只“有趣”一词，城区（何）只“野人”一词，即使南门（沈）也只有少数几个例词。它们有可能会随着语言的发展而消失。

变调格式也就是语音规律，原来分属不同调类的例字都正在按照这种变调格式进行归属。宁波方言单字的调类归属是歧异的，

但实际口语中的变调格式对全体宁波人却是统一的，虽然少数的例字归入哪一种格式，人们可能不尽相同，但没有破坏统一的变调格式。这就是说，歧异的单字调要接受一种统一的变调规律的支配。

2.3.3　宁波方言的变调格式说明语言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事实：调类的简化、调值的改变都是通过变调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变调是宁波方言调类简化的桥梁和调值改变的途径。

三、声母的变化

3.1　下面是一百年前《汇解》的宁波话声母系统：①

p 比	p'批	b 皮	m 米	m̥哔	f 法	v 伐		
t 低	t'体	d 第	n 奴	n̥ 奶			l 里	l̥拉
k 古	k'苦	g 共	ŋ 呆	ŋ̊	h 海	ɦ 含		
ts 枝	ts妻	dz池			s 师	z 事		
tɕ居	tɕ去	dʑ具	ȵ 愚	ȵ̇	ɕ 虚			
tʃ 掌	tʃ'窗	dʒ 常			ʃ 商	ʒ 尚		

0　阿，约药，汪王，郁月

① 《汇解》《音节》《手册》均采用拉丁字母注音，其中多数符号与国际音标一致或大体一致，不需要在这里作特别的说明；有一部分标音的符号与国际音标差别较大，为便于分析，我们一律把它改写为国际音标。现把改写的音标对照列表如下：

原文	m̆	n̆ ĭ	ng	n̆g	ky	ky'	gy	hy	n̆y	ŏy
国际音标	m̥	n̥ l̥	ŋ	ŋ̊	tɕ	tɕ'	dʑ	ɕ	ȵ	ȵ̇

原文	ç	ç'	dj	sh	j	'!l	ü	ô	ŏ	(a)h	R
国际音标	tʃ	tʃ'	dʒ	ʃ	ʒ	ɦ	y或ɥ	ɔ	ø	ʔ	l̥

（零声母的齐、合、撮三呼，阳调字开首都有明显的摩擦，齐齿为 j-，合口为 ɦ-，撮口为 ɥ-，《汇解》分别用 y、w 表示）

百年来声母系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线方框中舌叶音音位的消失、虚线方框中的清鼻、边音音位的衰退和尖团对立的消失。

3.2 先讨论舌叶音。舌叶音的出现条件是：

例字	条件	《汇解》注音	现代宁波音
扯	假开三麻章组	tʃ‘ɔ	ts‘o
猪	遇合三鱼知章组	tʃy	tsɥ
取	虞精章组	tʃ‘y	ts‘ɥ
制	蟹开三祭章组	tʃy	tsɥ～tsʅ
知	止开三支知母	tʃy	tsɥ
置	之知组	tʃy	tsɥ
然	山开三仙(薛)禅日	ʒyn	ʑiʏ，zø
钻	合一桓 精组	tʃyn，tsøn	tɕiʏ，tsø
专	合三仙(薛)精知章组	tʃyn，tsøn	tɕiʏ，tsø
振	臻开三真(质)精知章组	tʃiŋ	tsʏŋ
俊	谆(术)精知章组	tʃiŋ	tsʏŋ
章	宕开三阳 章组	tʃɔŋ，tsɔŋ	tsɔ̃
椿	江开二江(觉)知庄组	tʃɔŋ	tsɔ̃
中	通合三东(屋)知章组	tʃoŋ	tsoŋ
钟	鍾(烛)章组	tʃoŋ	tsoŋ

这些例字说明，舌叶音声母大体来自精、知、章组的三等字。三等字原有介音 *-i-或 *-iu-，舌叶音的形成至少开始时候与这类介音有联系。某些桓韵字也念成舌叶音，大概是它先与仙韵字合流，尔后声母一起变成舌叶音。不管 tʃ 组字的来源是开口韵还是合口韵，后面都有一个圆唇元音；《汇解》中只有“振”“俊”类字是展唇元音[i]，但是根据《音节》的描写，tʃiŋ 中的-i-接近[y]的发音（页 7），这

说明这个-i-有圆唇作用，既非[i]，也非[y]，但是它又既象[i]，又象[y]，根据后来《研究》的描写，它是[y]，这可以印证《音节》的描写是正确的。看来，这组舌叶音与圆唇元音有密切的联系。

3.2.1 在一个语音系统中的塞擦音和擦音系列既有舌面音和舌尖音，又有舌叶音，三套系列共存，这是很少见的。由于这个缘故，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怀疑这套舌叶音的合法性，认为这可能是没有经过语言学训练的传教士误把某些韵母前舌尖音记为舌叶音的缘故。弄清这套音的性质，对弄清精、知、照系字的合流非常重要。

舌叶音在印欧系语言中是一种常见的音素，一般说来不致引起传教士的误听。《汇解》的作者在前言中说，cing[tʃiŋ]的发音是ching；英语的 ch 是一个舌叶音，至少在传教士听来，汉语的"振"[tʃiŋ]的声母[tʃ]与英语的 ch 是相似的。另一方面，作者发现有些字的音，如"失"，读 siʔ 还是读 ʃiʔ，"叔"读 soʔ 还是读 ʃoʔ，在宁波人中有很大差别(页 16)。从这一点看，作者很清楚地区分舌尖音和舌叶音，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语音现象。但两读的现象也可能只是一个音位的两个自由变异形式，不一定就代表两个不同的音位。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得作进一步的推敲。我们查阅《汇解》的例字，发现 tʃ 与 tɕ、ts 都是对立的：

经[tɕiŋ]≠谆[tʃiŋ]	钟[tʃoŋ]≠宗[tsoŋ]
轻[tɕ'iŋ]≠春[tʃ'iŋ]	充[tʃ'oŋ]≠聪[ts'oŋ]
极[dʑiʔ]≠绝[dʒiʔ]	虫[dʒoŋ]≠从[dzoŋ]
欣[ɕiŋ]≠舜[ʃiŋ]	爽[ʃɔŋ]≠桑[sɔŋ]
	床[ʒɔŋ]≠上[zɔŋ]

这就迫使我们承认《汇解》所说的舌叶音是一套独立的音类。

3.2.2 比较§3.2所列的《汇解》和现代宁波方言的语音，可

以发现舌叶音都变成了舌尖音。至于-yn韵前的tʃ不是变成舌尖音，而是变成舌面音，这可能与语音的发展有关。据《音节》的描写，tʃ-与-y-之间有一个-i-，即tʃyn＝tʃiyn（页8），随着尖团对立的消失（§3.3），-yn前的tʃ-在变成ts-之后又进一步变成tɕ-。

3.2.3 舌叶音声母tʃ-，tʃʻ等合并于ts-，tsʻ-等，表明精、知、庄、章四组音完成了最后的合流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据乾隆53年（1788）的《鄞县志》记载："四明人齿音多不正，而精照、从床、心审诸母为混尤甚，如呼'招'为'焦'、'张'为'将'、'震'为'晋'、'潮'为'谯'、'全'为'传'、'陈'为'秦'、'雪'为'湿'、'升'为'星'、'少'为'小'、'寿'为'就'之类"，说明远在1788年以前就开始了这种合并的过程，但那时还没有完成，因为还是"齿音多不正"，而不是"全不正"；是"精照……为混尤甚"，而不是都相混。所举的例字都是三等字，说明其他情况下（如二等庄组）已经合流；而这种三等字在过了百把年之后到《汇解》《音节》的时期在有些韵母前仍分为舌尖、舌叶两套，不过在《汇解》的时期舌叶音已开始向舌尖音转化，表现在有些字tʃ-、ts-两读。《音节》的"导言"在描写这些舌叶音时说，在-o-前tʃ-听起来象ts-、dʒ-听起来象dz-（页10）。《汇解》中两读的例子都表现在有-o-，-ɔ-元音的音节上，说明《音节》的作者的观察是可靠的。下面都是《汇解》中两读的例子：

粥	tʃoʔ～tsoʔ	章	tʃɔŋ～tsɔŋ
嘱	tʃoʔ～tsoʔ	娼	tsʻɔŋ～tsʻɔŋ
终	tʃoŋ～tsoŋ	常	dʒɔŋ～dzɔŋ
中	tʃoŋ～tsoŋ	脏	dʒɔŋ～dzɔŋ
充	tʃʻoŋ～tsʻoŋ	商	ʃɔŋ～sɔŋ
辱	ʒoʔ～zoʔ	钻	tʃyn～tsøn

就总体说，这些两读的例字还是少数，但已开始了合并的进程。这

说明音类的合并不是一刀切、齐步走，而是通过扩散的方式逐步合并。大概到了《研究》的时期才完成了合并的过程，因为《札记》中还有舌叶音的痕迹，"晋"字(原文的例子恐有误，应为"真""珍"之类的字)的声母与"焦酒尖"等的声母"ㄐ"[tɕ]不一样，标为ㄓ；宁波话没有卷舌音，这个"ㄓ"看来是舌叶音的标志。

3.3 《汇解》的声母系统没有舌面浊擦音 ʑ，在语音的聚合系统中出现了一个空格。当代宁波方言有声母 ʑ，已填补了这个空格。这个 ʑ 从哪里来，这就涉及到音位组合关系的发展了。

从《汇解》到《音节》《手册》，语音系统中尖、团音严格分立，例如：

继[tɕi]≠祭[tsi]　　弃[tɕʻi]≠妻[tsʻi]

薑[tɕiaŋ]≠将[tsiaŋ]　　腔[tɕʻiaŋ]≠枪[tsʻiaŋ]

桥[dʑiao]≠朝[dziao]　　希[ɕi]≠西[si]

尖、团的对立只限于齐齿，在《汇解》等书中撮口呼的尖团只限于舌面音对舌叶音。例如：

捐[tɕyn]≠专[tʃyn]　　权[dʑyn]≠全[dʒyn]

如§3.2.2所述，舌叶音后的撮口介音有它的特点，即-y-前有一个-i-，在语音的发展过程中以-iy-为介音的韵母转化为-iʏ(参看§4.2.1)，因而这组音也就变成齐齿韵，留下撮口韵尖、团对立的空格。

大概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由于语音的同化作用，介音-i-前的ts-组音被腭化为tɕ-组，于是尖、团合流，语音系统中出现 ʑ。尖、团合流，这是百年来宁波音系的一个重大发展。

3.4 《汇解》等书的鼻音、边音声母各有清、浊两套：

m　n　ŋ　ȵ　l

m̥　n̥　ŋ̊　ȵ̊　l̥

所谓清鼻音、清边音，指的是带有这些声母的字可以念阴声调。有

这种声母的音节大多有音无字。《汇解》只有下列几个字：

l̥ 拉[l̥a]（～牢弗放） 镂[l̥œʏ]（～～挖挖）

攏白[l̥oʔ]（～铃——摇铃）

m̥ 无白[m̥]（～底坑） 没白[m̥]（～teʔ——没有）

姆白[m̥]（阿～——母亲） 妹[m̥ɛɪ]（小～～）

n̥ 奶白[n̥ɛ]（吃～～）

此外还有，"买白闷白哶美妈麻冒"等字，不一一注音。

这里的"白"都是《汇解》的注释，是不是都是"白"，还有待于推敲。

这里所列的许多字（如无、没、买、美、妹、麻、蔴、冒、奶等）也清、浊两读，说明清边、鼻音是一种趋于消失中的现象。到《札记》时，清、浊两套的鼻音和边音仍未消失，因而在当时推广"国语"的运动中还需要设计一套特别的字母以表示这套清鼻音和清边音。据《定海方言志》记载："七年（1918）之春，旧宁波府属七邑教育联合委员会审定土音为国音所未有者，计声母十有四，就原有字母加之标识，以为区别。左拂者谓之浊音，右曳者谓之反浊音。"鼻音和边音都有一套"反浊音"。《札记》一文也有这一套"反浊音"。从这种情况看，在阴、阳两类声调中可以同时出现鼻音和边音。在当代宁波方言中，阴调字中还有鼻、边音，例如"妹"，阴，阳两调都可以念，但"小妹妹""林妹妹"中一般念阴调。

3.5 声母中还有一些零星的变化，例如语音的弱化，有些字的浊塞擦音失去塞音成分而变成一个浊擦音（如"造"[dzao→zɔ]，"前"[dzin→zin→ʑi]等等），有些擦音的发音部位由于受语音同化作用的影响而有转移（例如"虎琥"等之由[hu→fu]）。但这些变化不影响声母数量的增减，与声母系统的变动关系不大。

3.6 一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声母有 38 个(包括零声母)减少到 34 个，五个舌叶音声母已完全消失，增加一个浊擦音声母 ʑ-；而五个清鼻音、清边音的使用频率已大为降低；另外，在音位的组合关系上则尖团合流。这些都使声母系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四、鼻韵尾的发展

4.1 下面是《汇解》的韵母系统(汉字下面加一横道的为白读的语音形式)：

ɿ 枝辞	i 比西	u 都古	y 居去
ʮ 知趣			
a 大他泰	ia 茄借	ua 怪快	
ɛ[7]改开	iɛ 且	uɛ 怪快	
e 悲美		ue 贵危	
o 波多			
ɔ 巴沙		uɔ 挂花	yɔ 家嘉
ao 包刀	iao 表招		
eo[8]谋口	iu 流酒		
aŋ 打生	iaŋ 将相	uaŋ 横梗	
ɛn 班赞	iɛn 验念	uɛn 关患	
øn 团乱钻			
en 干暗	in 边见	un 官欢	yn 捐劝
eŋ 本更	iŋ 冰林	ueŋ 棍昏	yŋ 均允
oŋ 东公			yoŋ 穷永
ɔŋ 当章		uɔŋ 光汪	yɔŋ 降
aʔ 百阿	iaʔ 贴约	uaʔ 刮挖	
eʔ 割色	iʔ 笔力	ueʔ 骨活	yiʔ 决血

oʔ 北哭 yoʔ 鞠玉
ɔʔ 各恶 yɔʔ 觉确
m̩ 亩姆
ṃ 无没
ŋ̍ 你鱼儿
l̩ 耳而

以上共有韵母 52 个，声化韵 4 个，一共 56 个。《汇解》中没有发现声化韵 n̩，现代宁波方言有这个韵，如"孥孬"的"孥"念 n̩，"你"有时也可以念꜀n̩ 或꜀n̩꜀nəu。这可能是《汇解》的遗漏。韵母的演变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分三部分讨论：一、鼻韵尾的演变（§四、）；二、元音系统的推移（§五、）；三、韵类的合并（§六、）。

4.2 《汇解》有-n、-ŋ 两个鼻韵尾。以-n 收尾的鼻韵尾有：-ɛn、-iɛn、-uɛn、-øn、-en、-in、-un、-yn，共 8 个。这些鼻韵尾在今天的宁波方言中都已消失。这种消失的过程看来是极其缓慢的，通过逐步弱化的途径实现。在《汇解》和《音节》的时期，-ɛn、-øn 等韵中的元音已经鼻化，-n 尾已"几乎听不到"（页 7、8）。这说明-n 尾早就开始了它的弱化进程，到《汇解》时已接近消失，但还没有完全消失。到了"五·四"时期，-n 尾就完全消失，只留下鼻化元音。据《札记》记载："宁波韵母中的彡，就是国音韵母ㄟ的阳音，读如ㄟ的直喉音，再放一半从鼻孔出来就是，读如安"。于是"国音ㄩ的阳音，读如怨的尾音"，宀"是国音ㄧ的阳音，读如烟的尾音"。文中没有提到〔u〕的阳音，可能-u 后的-n 的消失要晚一点。这里提到的"尾音"，从表面现象看，好象也可能是鼻韵尾，但实际上不可能。宁波方言的注音符号是以当时的"国语"注音符号为基础制订的。凡注音符号能用来标注宁波方言的，不再另创新字母；所以这些新字母表明它们所标写的是宁波方言特有的现象，说明"于≠ㄩㄣ[yn]""宀

≠丨ㄣ[in]”。像这种既不是鼻韵尾但又是阳声的现象，自然是元音的一种鼻化现象。到了《研究》的时候，这种“阳声”又有了新的变化，即前元音[ε][e][i][y][ø]之后的“阳声”全部消失，只是后高元音[u]后的“阳声”还有保留，如“官”[kũ]，而到了当代宁波方言，连这个[u]后的“阳声”痕迹也进一步消失了。这样，上述几个以-n为韵尾的阳声韵，全部因-n的消失而变成阴声韵。大体的情况（《札记》提供的材料太少，无法列表比较）是：

《汇解》	《研究》	当代
嵌[k‘εn]≠开[k‘ε]	嵌[k‘ε]≠开[k‘e]	嵌[k‘ε]≠开[k‘e]
还[ɦuεn]≠怀[ɦuε]	还[ɦuε]≠怀[ɦua白] [ɦue文]	还[ɦuε]=怀文[ɦuε]
贪[t‘en]≠推[t‘e]	贪[t‘EI]=推[t‘EI]	贪[t‘εɪ]=推[t‘εɪ]
颠[tin]≠低[ti]	颠[ti]=低[ti]	颠[ti]=低[ti]
捐[tɕyn]≠居[tɕy]	捐[tɕy]=居[tɕy]	捐[tɕy]=居[tɕy]
半[pun]≠布[pu]	半[pũ]≠布[pu]	半[pu]=布[pu]

4.2.1 -øn韵的发展别有一些特点。它原属桓韵端系字，由于声母的不同，在往后的发展中向两个方向演变。端组只是丢失-n韵尾，主要元音未变；而精组字的情况要复杂一点。查阅《汇解》的有关例字，-øn韵精组字已可两读，如“钻”有tʃyn和tsøn两种语音形式（§3.2.3）。这两种不同的读法往后就有两种不同的变化，-øn变成-ø，与端组同；而tʃyn中的-yn并没有象“捐”[tɕyn]中的-yn那样变成-y，而是变成-iy，这可能与舌叶音后的介音的特点有关。§3.2.2说过，舌叶音后的-y-介音，其前面实际上包含一个-i-，即-yn=-iyn。随着鼻韵尾的消失和舌叶音向舌尖音转化，其实际音值就成为tsiʏ，这就与尤、幽韵字（秋周体纠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幽韵字在《汇解》的时候读-iu，到《研究》的时候，多数读-ʏ，少数人读，-i-ʉ，音值的接近使来源于-(i)yn的-iʏ和尤幽韵字合

流,都读-iɣ。

4.2.2 -n 韵尾的消失在宁波方言的音韵系统中引起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主要是:在半高元音或高元音之后表现为韵类的合并(半高元音后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详见§5.2),在低元音或半低元音之后表现为元音音位的逐级推移(均见§五、)

4.3 和-n 韵尾的消失相对应,-ŋ 韵尾也发生了变化,大体上是低元音后的-ŋ 消失,而元音鼻化;高元音或半高元音之后的-ŋ 仍旧保留。由于以-ŋ 收尾的韵至今还保留着阳声韵的特点,因而它的弱化与-n 韵尾的消失不一样,没有引起音韵系统的相应变化,我们用不着在这里多费笔墨。不过,我们想在这里附带地说一说,宁波方言的鼻韵尾的演变过程在汉语方言的有关音韵演变中具有普遍意义,即-m 首先消失(这在《汇解》以前早就完成),合并于 n;然后-n 消失,而且前元音后的-n 比后元音后的先消失;与-n 的消失同时或稍后,-ŋ 开始弱化,而且这种弱化在低元音后先实现,表现为元音的鼻化。根据这种发展趋向,这个-ŋ 韵尾最后也可能会消失。

五、元音音位的推移和连续式音变

5.1 在-n 韵尾还未消失的时候,"泰带派"类词的韵母-a 已开始通过文白异读向-ɛ 转化,与-ɛ 韵字的"戴"等合流;-n 韵尾的消失使-ɛn 韵也向-ɛ 发展,这就增加了语音演变的复杂性。-a 韵向-ɛ 的转化问题留待§7.3.2 讨论,这里先分析-ɛn 韵的-n 的消失给音变带来的影响。先请比较《汇解》、《研究》和当代宁波方言这三个时期的语音状态:(详见下表)

比较三个时期的元音,除复元音韵-ɛɪ 外,《研究》和当代宁波方言比《汇解》的时代要高一度,说明元音音位已因-n 韵尾的消失

而发生逐级的高化。大体的过程看来是这样的：

例字	条件	《汇解》	《研究》	当代
一、班单堪杉 赞山晏白	覃谈咸衔凡 寒山删元合唇	-ɛn	-ɛ	-ɛ
二、戴来再爱	咍	-ɛ	-e	-e
三、贝对追虽	泰灰，支开脂开帮组	-e	-Eɪ	-ɛɪ
四、干竿敢看	覃谈寒见组	-en	-ɪ	-i
五、贪潭男蚕	覃端系	-en	-Eɪ	-ɛɪ

第一步，-ɛn 韵中的-n 韵尾消失，-ɛn 变成-ɛ，与第二类“戴”类字发生冲突，这样，原来的-a、-ɛn、-ɛ 三韵挤在一起，相互竞争。由于-n 韵尾的消失所产生的冲击力大，因而-ɛn 演变为-ɛ 的力量一方面阻止了-a 的转化（§7.3.2），另一方面“驱逐”原有的-ɛ 并且取而代之。-ɛ 由于无力“抵抗”-ɛn→-ɛ 的“入侵”，因而，

第二步，“戴”类字的-ɛ 韵只能迁徙，向-e 高化，以求自存。但是，这样它又与第三类的-e 韵（“贝”类字）冲突，因而又迫使-e 迁徙。

第三步，不过-e 的运气没有-ɛ 那么好，它后有-ɛ 的“入侵”，前有-i 韵字的“堵截”（由于原咸、山摄三、四等字和相当一部分二等见系字的韵母都变成-i，因而语言系统中的-i 韵字特别多。同音字过多会引起交际的麻烦，这自然会阻止-e 的高化），只有-i、-y 前的见组 k-等因已颚化为 tɕ-，在语言系统中没有 ki，k‘i 这样的语音组合，因而在组合位置上有一个缺口，有利于-e 的高化“突破”。这样，-e 韵就依条件的不同分两路迁徙：k-、k‘-之后的-e（←en）高化为-i（第四类“干”类字），其他情况下-e 复元音化为-ɛɪ。宁波方言中的 k-，k‘-能与-i 组合，这显然是语音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中古时候的语音结构的保留。高元音复元音化在语言演变中是一种普遍现

象，英语等语言也都经历过这一类的变化（Lehmann，1973，150—151）。宁波方言所不同的，只是-e 在还没有高化为-i 之前就复元音化，这反映了不同语言（方言）的具体的语音结构的特点。

元音的这种逐级高化的过程到《研究》的时候已经完成，当代宁波方言的元音系统已与《研究》一致。

5.1.1 宁波方言的这种元音高化规律是整齐的、统一的，一个音位只要所处的条件相同，大体上都以同样的方式演变。这属于一般所说的青年语法学派式的语音演变的类型，我们下面称之为连续式音变。这类音变的特点是它的条件性，时间性和地区性，表现出严格的规律性。但是，这并不是说连续式音变就没有例外，只是这种例外总有其特殊的原因。咸、山摄一等韵的见母字，-e（←-en）都高化为-i，但溪母 k'在《汉语方言调查字表》中只有一个"看"念 k'i，其他如"堪龛坎砍勘瞰"（覃谈）"刊侃"（寒）的韵母都为-ε，与这两摄的端系字"丹""单"等相同。这是一批非常用字，细查《汇解》的材料，这批字读-εn，与"干"类字的-en 不同。同韵字的这种分化可能与使用频率有关。"干"类字是口语常用字，⑨其声母都是舌根音，在-n 韵尾消失以前，这类常用字的韵母已经由-εn 变成-en，而非常用字仍留在-εn 韵里。这样在后来的演变中就出现来源相同的字产生不同的变化的情况。就《汇解》以后宁波方言的元音高化规律来说，这里没有例外，凡-e（←-en）韵字在 k，k'之后都高化为-i。

5.1.2 混乱的是被《研究》称为 h 系（晓匣影喻）的那些咸、山摄字。请先看下页表 5：

从当代宁波方言的语音情况来看，几份材料都有参差。这说明，-ε 高化为-e，而-e 的发展去向在 h 系字中有差异。城区可能变得快一点，h 系的-e 韵字已随着演变的大势复元音化。这与《研究》

的材料一致。在城区(何)的语言中h系的e韵字没有因-ɛ的高化的影响而复化,因而-ɛ,-e两韵合流,"哀""安"同音,"孩""寒"同读。南门(沈)和西门(王)的语音应该说与城区(何)是一致的,但各有几个字念成-ɛɪ,这可能是青年人接受离散式音变(§5.5)的影响的结果。江东(袁)的语音现象最特别,-i,-e,-ɛɪ三种形式都有,但以-ɛɪ为主,动摇于上述两类现象之间。这四种语音现象的成因很复杂,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表5】

例字	条件	《汇解》	《研究》	现代				
				城心(郑、梁)	城区(何)	南门(沈)	西门(王)	江东(袁)
汉	寒,晓	hen	hᴇɪ	hɛɪ	he	he	he	he,hɛɪ
罕	寒,晓	hen	hᴇɪ	hɛɪ	he	he	he	hi
寒	寒覃,匣	ɦen	ɦᴇɪ	ɦɛɪ	ɦe	ɦɛɪ	ɦe	ɦɛɪ
安	寒覃,影	en	ᴇɪ	ɛɪ	e	e	ɛɪ	ɛɪ

5.2　后元音的变化与前元音的变化相平行,也发生了逐级的高化。先请比较下列语言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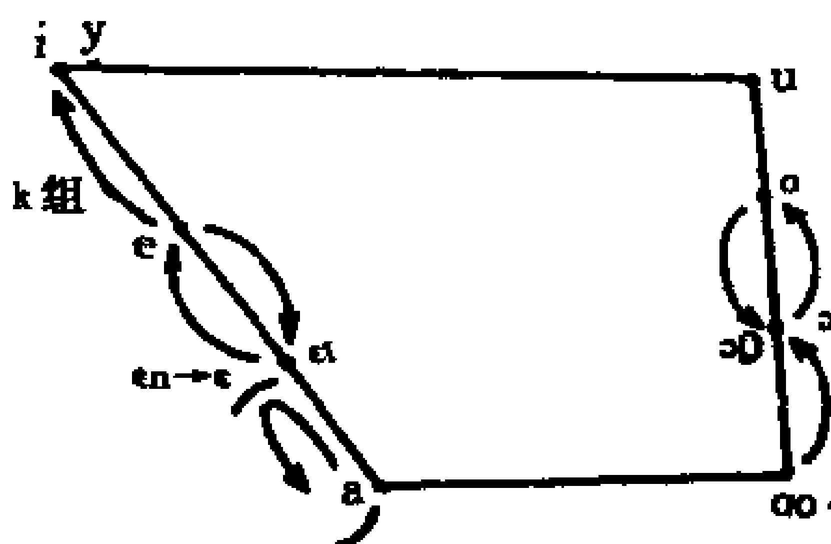
例字	条件	《汇解》	《研究》	当代	变化结果
胞	豪、肴	pao	pɔ	pɔ	ao→ɔ
标	宵、萧	pɪao	piɵ˧	pio	iao→io
巴	麻开	pɔ	po	po	ɔ→o
瓜	麻合	kuɔ	kuo上多,ko上少	kuo,ko	uɔ→uo或o
波	歌,戈	po	pə˧ʊ	pɔʊ(ɐʊ)	o→ɔʊ(ɐʊ)

这个表所显示的后元音音位的转移：ao→ɔ，ɔ→o，o→ɔʊ，与前元音音位的 ɛn→ɛ，ɛ→e，e→ɛɪ，完全是平行的，对称的。前后元音的这种平行的、对称的变化有其发音的生理基础，因为口腔的开合前后是一致的，前元音的舌位高低或前后的变化会使相应的后元音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反之亦然。所以有人说，“前后的对称性是语音演变中的一种近乎普遍特征的条件”（Weinreich 等，1968，175）。英语由于前、后高元音的复元音化而引起的低元音的高化，就是这种对称性的变化的一个著名例子。百年来，宁波方言元音的推移也具体地说明了这种“近乎普遍特征”的前后元音音位的平行的、对称的变化，即前元音的逐级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半高元音的复元音化，在后元音系列中也引起了同样的变化。这种对称性的演变方式是语音结构的系统性、发展的规律性的具体表现。

5.3 语音演变中有推链（push chain）和拉链（drag chain 或 pull chain）两种方式。假定语音系统中有 a，b，c 三个音位，如果 c 先变成 d，留出结构空格，从而吸引 b 变成 c，a 变成 b，这种演变方式谓之拉链。反之，如果 a 先向 b 的方向演变，b 为了避免与 a 合并，就向 c 的方向演变，而 c 为了避免与 b 合并，就变为 d。这种演变方式谓之推链。在语音的演变中一般以拉链的方式为主，日耳曼辅音的转移规律和英语长元音音位的转移规律都是以拉链的方式进行的⑲。宁波方言的元音转移规律是拉链的方式还是推链的方式？这决定于-n 韵尾的消失在前，还是元音-e 的复元音化在前。如果是元音-e 的复化在前，那自然是一种拉链的方式；如果是-n 韵尾的消失在前，它就是一种语音演变中比较少见的推链的方式。从各种迹象看，是-n 韵尾的消失在前。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男”“贪”等覃韵字先由-en 变成-e，与“内”“推”等合流，然后才有可能一起变成复元音-ɛɪ；如果是-e 的复化在前，那“男”“贪”等就不可能与

"内""推"合流。所以，元音推移的方式主要是由-n韵尾的消失引起的。还有一个证据也说明宁波方言的元音转移是一种推链的方式，这就是-ø(←øn)韵字(桓端组)在演变中"岿然不动"，没有象-e那样变成复元音。为什么？因为在《汇解》的时代只有-ɛn韵，没有-œn韵，只有-ɛ韵，没有-œ韵，因而-n韵尾的消失没有引起前列圆唇元音的高化，-ø(←øn)韵没有受到新成员的"威胁"，因而字数虽少(端短锻团糰断段缀)，但仍能保持它的固有领域。另外，如果是半高元音的复化在前，那语言系统中也不会有上述§5.1.2所分析的那种歧异的形式了。

5.4 综合前面的分析，宁波方言的元音音位的推移规律可以用下图表示：



-a通过文白异读向-ɛ转化与元音高化规律本身无关，但它的演变去向与-ɛn韵中-n韵尾的消失有关(§7.3.2)，因而放在括号中，以资参考。

六、韵类的归并和离散式音变

6.1 《汇解》有52个韵类(不包括4个声化韵)，现代宁波方言的韵类，如以城区中年人的发音为标准，有44个(不包括m̩，n̩，

ŋ,l̥四个声化韵),其中-yŋ,-øʔ两个韵类,《汇解》中没有。简单的数字已清楚地显示百年来宁波方言的韵类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以青年人的发音为准,变化的幅度还要大一些。

6.2 韵类的归并主要表现在阳声韵和入声韵上,阴声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元音音位的推移(§5),但也有一些音类归并现象。《汇解》的-iɛn(念,验)与-iɛ(者,且)分属两个音类,依照元音推移的规律,-iɛn→-iɛ,-iɛ→ie,仍旧是两个音类。在当代宁波方言中这两个音类有纠缠,但大体上已合并为一类。请比较表6中的语言现象。

【表6】

例字	《汇解》	《研究》	当代		
			城(梁)	城区(何)	城边(沈、王、袁)
皆	tɕiɛ	tɕie	tɕie	tɕie	tse 多,tɕie 少
且	tɕʻiɛ	tɕʻiE	tɕʻie	tɕʻie	tsʻe
念捻	ȵiɛn	ȵiɛ	ȵiɛ	ȵie	ne

城(梁)仍分两类,与《汇解》《研究》的系统一脉相承。城区(何)已把两类归并为一类,但仍保持齐齿韵的特点,与开口呼的"灾、猜"等仍属两个不同的韵类。青年人不仅把这两类原来的齐齿韵合为一类,而且进一步丢掉了介音-i,从而与"灾,猜"等字的韵母合流。这样,《汇解》的-iɛn、-iɛ、-ɛ三韵在今天"最先进"的宁波人中已合并为一类。

麻韵二等的开、合口在《汇解》的时候是不同音的,开口念ɔ,合口念-uɔ,现在这两韵趋于合流:

【表 7】

例　字	《汇解》	《研究》	当　　代	
			城区(郑、何)	城边(沈、王、袁)
沙	sɔ	so	so	so
花	huɔ	huo ho少	huo	ho多， huo少

看来这一合流过程还没有最后完成，因为青年人中还有念"花"为 huo 的。

6.3　阳声韵中由于-n 韵尾的消失而与相应的阴声韵合并的现象，已见于 § 4.2 的分析；原来以-ŋ 为韵尾的阳声韵，有六个韵类与合并有关。请看表 8：

【表 8】

韵类归并方向	例字	条件	《汇解》	《研究》	现　　代			
					城区(何)	城心(郑)	城边(袁，王等)	南门(沈)
yɔŋ→ɔ̃	降	江，见	tɕyɔŋ	tɕyɔ̃	tɕyɔ̃	tɕyɔ̃	tɕyɔ̃(少) tsɔ̃(多)	tsɔ̃
yɤŋ→yoŋ	均匀群	谆文，见系	-yŋ	-ʏŋ	-yɤŋ(多) -yoŋ(少)	-yɤŋ(少) -yoŋ(多)	-yoŋ	-yoŋ
ʏŋ→oŋ	春旬神	谆，精知章；真，知系	-iŋ	-ʏŋ	-ʏŋ	-ʏŋ(多) -oŋ(少)		-oŋ

比较这些歧异的形式大体上可以看到韵类合并的过程。《汇解》没有立出-ʏŋ 韵，这可能与声母有关。与这个韵母相拼的声母上溯到《汇解》，全是舌叶音。根据§3.2的考察，舌叶音后的-i-的发音接近-y，是既非[i]，也非[y]，但又既象[i]，又象[y]的一个音。《汇解》《音节》等已发现这个音的特殊性，只是没有用一个特殊的符号来标写罢了。即使在《汇解》出版后四十年的1922年，在推广“国语”的运动声中有人为拼写宁波方言创制注音字母时也没有为它创制一个特殊的符号，难怪《札记》的作者抱怨说，用“国语”注音字母的丨ㄣ和丨ㄥ来注辰、春等字都不合适，宜另制一新字母。这些现象都说明实际的语言现象是有区别的。《研究》第一次用-ʏ-把这类音分立出来。所以，后来的-ʏŋ 中的-ʏ-就是这个原来既象[i]又象[y]的音的延续和发展，不是现代宁波方言的新产品。

6.4　从《汇解》到现代宁波方言，入声韵合并大体如下表：

aʔ	iaʔ	uaʔ	
eʔ	iʔ	ueʔ	yiʔ
oʔ			yoʔ
ɔʔ			yɔʔ

方框中的两类音合并为一类：eʔ 并入 aʔ，ueʔ 并入 uaʔ，ɔʔ 和 yɔʔ 消失，各自并入 oʔ 和 yoʔ。这一归并过程在《汇解》的时候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不少字都可以两读，例如“割”：kaʔ～keʔ，“挖”：uaʔ～ueʔ，“国”：koʔ～kɔʔ，等等。《汇解》的凡例对这一点已有明确的说明，说-oʔ 和-ɔʔ 的区别很多人认为已无关紧要；keʔ 还是 kaʔ，heʔ 还是 haʔ，本地人的读法很分歧（页16）。《研究》时大体上已完成了合并的过程，所以作者说，宁波话的入声“分的最妈呼”，浦东分成

五个音类的，它只有一个 æ（页 71）。

宁波方言中还有一个 øʔ 韵（"这出失拾"等的韵母），它是与阳声韵-ʏŋ 配对的入声韵，究其来源，在《汇解》的时代声母都是舌叶音。同没有分出-ʏŋ 韵那样，《汇解》也没有分出一个独立的入声韵类，都混在-iʔ 里头。随着声母由 tʃ-变 ts-，韵母的区别就必须突出，不然，ts(←tʃ)ieʔ("这")和 tsieʔ("节")就无法区分。在《研究》的时候，这类韵母已单独分立出来，记为-ʏeʔ，后来变成-øʔ，而在当代的宁波话中，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已念成-oʔ，如"日"：zoʔ，"出"：tsʻoʔ，等等。这种合并的情况与-ʏŋ 韵的归并去向相呼应。

6.5 音类（韵类、声类、调类）归并的音变方式和 §4 所分析的连续式音变的方式不同。连续式音变以音位为单位，在相同的条件下某一音位大体上以统一的、整齐的"步伐"向前推进，例如-ɛn 韵中-n 韵尾的消失，凡是在-ɛ 后的都消失，"班"由 pɛn 变 pɛ，"三"决不会保持不变而仍为 sɛn，表现出语音演变的整齐的规律性。而音类的归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以声母、韵母、声调为单位，但实

【表 9】

例字 \ 语音 \ 时期	《汇解》	《研究》	现代 城心（郑）	城区（何）	西门（王）	江东（袁）	南门（沈）
镇	tʃiŋ	-ʏŋ	tsʏŋ	tsʏŋ	tsoŋ	tsoŋ	tsoŋ
春	tʃʻiŋ	-ʏŋ	tsʻʏŋ	tsʻʏŋ	tsʻʏŋ	tsʻʏŋ	tsʻoŋ
荀	ʃiŋ	-ʏŋ	sʏŋ	sʏŋ	soŋ	sʏŋ	soŋ
人	ʒiŋ	-ʏŋ	zʏŋ	zʏŋ	zʏŋ	zʏŋ	zoŋ
送	soŋ	soŋ	soŋ	soŋ	soŋ	soŋ	soŋ

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从演变的结果看，既然是音类的合并，它自然以音类为单位；而从演变的过程看，它好像以“字”为单位，不影响语音系统中的音类。先请比较下列原来为-ɤŋ韵的例字的当代语音差异（表9附列通摄的“送”，以资比较）。请看表9：

-ɤŋ合并于-oŋ，共时的读音差异说明，演变的时候不是以韵类为单位，不是-ɤŋ韵一律变成-oŋ，而是以含有这个韵母的“字”为单位，某些“字”先念成-oŋ，而另外一些“字”仍保持着原来的-ɤŋ韵（比较西门(乙)和江东(戴)的读音），显出演变的参差状态。我们在§2中所分析的声调的归并过程、§3所分析的舌叶音合并于舌尖音的过程都是以“字”为单位的。例如舌叶音tʃ-，并不是所有“字”中的声母tʃ一下子都整齐地变成ts-，而是某些“字”（例如“中”）通过自由变读（tʃoŋ～tsoŋ）而合并于ts-，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含有tʃ-的“字”的读音一个一个地念成ts-，最后完成合并的过程。我们把语音演变的这种方式叫做离散式音变。离散式音变与连续式音变有重要的区别。第一，连续式音变以音位或语音特征为单位（如浊音清化），而离散式音变以“字”为单位。第二，音位有严格的分布条件，音变如以音位为单位，那么处于某一条件下的音位在演变的时候会同时涉及包含这个音位的全部词汇项目，表现出音变过程的齐整性和同时性（例如-n韵尾的消失，元音高化等）。这就是所谓语音规律无例外；而如果有例外，那也是所谓“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维尔纳）。音变如以“字”为单位，由于“字”的读音不受分布条件的限制，因而只能一个一个地变，在词汇项目上表现出逐一过渡的参差性、音类合并的渐进性，显示每一个“字”在演变中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速度，好象“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第三，连续式音变会产生音位系统的变动，而离散式音变在过程没有完成以前只表现为“字”的读音发生了某种变化，而不涉及

语音系统的变动(例如"镇"的读音,有些人读成-oŋ 韵,但还有很多其他的"字"仍念-ʏŋ 韵,-ʏŋ 并没有从语音系统中消失),只有等到音变的过程完成以后才会对语音系统产生影响。所以,离散式音变与连续式音变是两种不同的语音演变方式,代表两个不同的音变层面。连续式音变以音位为单位,是最低层面的语音演变;而离散式音变以"字"为单位,是高于音位层面的语音演变。在语音研究的时候我们需要分清楚这两种不同的音变层面,把有关的音变现象归入有关的层面,分别进行分析;如果把不同层面的现象混杂在一起,音变的规律和特点就清理不出来了。

有人说,离散式音变以"字"为单位,而每个"字"(词)的变化又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所以演变没有规律。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从演变过程的某一个时点来看,-yɤŋ 韵字归入-yoŋ 韵,或-ʏŋ 韵并入-oŋ 韵,乱糟糟的似乎没有规律。但是,如果我们把观察的时间尺度放得长一点,就会发现-yɤŋ 韵字一个一个地归入-yoŋ 韵的规律,决不会毫无规律地 a 并入-yoŋ,b 并入-yɔ̃,c 并入-uã。所以从音变的结果看,离散式音变也是有规律的,它和连续式音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历史上的一些已成的音变,哪些是连续式音变造成的,哪些是离散式音变造成的,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或许从一些残存现象中可以看到一点痕迹。所以我们说,两种音变方式只是语音演变规律的实现方式有差别,连续式音变犹如一列横队向前走,所有的成员差不多同时到达目的地,表现出整齐的规律性;离散式音变犹如一列纵队向前走,每个成员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不一样,有先有后,只有等到音变的过程完成以后才能看出它的演变规律。

离散式音变由于以"字"为单位,采取逐个过渡的方式实现音类的归并,需要经过一定长度的时间才能完成音变的过程,因而在

演变过程中可能发生变故；过程的时间越长，发生变故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个别“落后分子”走得太慢，脱离队伍太远，它就可能找不到自己的伙伴而走错门，归错队，这样就出现了音变的例外；如果在演变过程中遇到一种干扰的力量，挡住演变的去向，那么就会展开竞争，最后可能出现中断的变化(thwarted change)。

6.5.1 在现代宁波方言中，-yɔ̃韵字只有一个“降”，根据《音节》，-yɔ̃(←yɔŋ)韵字有“降讲江洚绛筀笁”，这些都是原来的江韵字。《研究》的时候这些字的韵母还都念-yɔ̃。现在的宁波方言，除了“降”字以外，其他的字如“讲江”等早已发生音变，口语读kɔ̃，与唐韵字“刚”等合流；读书音念 tɕiã，与阳韵字“疆”等合流。“降”字很“顽固”，人们一直念 t ɕyɔ̃。但是它在语音系统中只有一个字，势孤力单，经不起其他韵类的“推”与“拉”，结果被迫与其他韵类合并。但它脱离自己的队伍太远，没有跟着“江讲”等字变，而变成tsɔ̃。我们所调查的青年人tɕyɔ̃，tsɔ̃两念，但以tsɔ̃为常，而南门(沈)已只有一个tsɔ̃的语音形式。见母字变成 ts-，在宁波方言中还鲜有其例。这种例外就是离散式音变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例子。

6.5.2 两种语音现象向着同一个方向演变，中途碰头，相互展开竞争，其中的强者迫使另一种现象停止其顺着预定的方向演变，于是出现了中断的变化。覃韵字为什么与谈、寒韵字不一样，有-ɛɪ 的读者？就是由于-n 韵尾的消失而在音系中留下来的一种中断的变化(详细情况请参看第 109—112 页的分析)。⑪。这是离散式音变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也是语言系统中呈现某种不规则、不系统现象以及产生音变例外的重要原因。

七、方言的相互影响和文白异读

7.1 《汇解》《研究》都忠实地记录了不少文白异读的现象，这

是考察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的一项非常宝贵的材料。

《汇解》反映的文白异读主要有下面几类情况(只记第一个字的字音,其他类推):

例字	条件	白	文
人(仁认忍韧,绕,日)	日组	ȵiŋ	ʒiŋ
家(驾嘉价虾下)	麻开见系	kɔ	tɕyɔ
教(胶叫交敲)	肴见组	kao	tɕiao
间(奸拣监)	咸衔山删见系	kɛn	tɕin
降(讲江……)	江 见组	kɔŋ	tɕyɔŋ
拜(带泰……)	泰皆佳夬	pa	pɛ
姐(且写谢耶也……)	麻开三精组,喻三	tsia	tsiɛ
生(烹碰猛庚硬省)	庚开耕开	saŋ	seŋ
停(宁顶……)	清部分青端组,泥来	deŋ	diŋ
脂(子死世迟持自……)	支脂之精知章组	tsi	tsɿ

还有其他一些例子,不一一列举。

7.2 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大致说来,代表两套语音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文读则是外方言影响的结果,它以该方言的语音系统所许可的范围接近某一个标准语,即向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的威信方言靠拢。所以,文白异读,简单地说,体现语言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土语和标准语的关系。

宁波方言的文读形式大体上是在北方方言的影响下产生的。这种影响始于何时,我们无从查考。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宁波辟为商埠,和外地政治、文化和贸易的往来日益频繁,因而加强了方言间的相互影响,使北方方言在宁波方言中的影响日益加深,《音节》的作者莫棱道夫已经清楚地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导言"中明确

指明宁波方言有很多字分文白异读，白读的口语形式代表较古的读音，文读的现代形式由来自各省的教员带到学校，字的读音一般都是现代官话。他举了三个例子（页11）：

例 字	人	酿	饶
白	ɲiŋ（早期为 ɲin）	ɲiaŋ	ɲiao
文	ʒiŋ	ʒaŋ	ʒao

宁波方言没有象北京话那样的声母 ʐ-，因而当时的宁波话就用语音比较接近的舌叶音去代替。北方方言的这种影响看来在《汇解》的时代已经相当广泛，因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大量的文白异读的例子。

7.3 在外方言影响下产生的文读形式要遵循一定的条件。先请比较《汇解》中 kao 音节的例字：

高告膏羔|胶搅教（～书）觉（调～）叫（～化子）窖（地～）绞（～肠痧）交（～易）较（计～）酵（发～）

竖线前后的字分为两类，后面的十个字有文读形式 tɕiao，如"异教"的"教"读[tɕiao]，而竖线前的"高告"等至今也没有和"教"类字一样具有文读形式 tɕiao。这就是说，上列例字的原来的语音形式是一样的，同为 kao，但在北方方言的影响下产生文读形式，只涉及竖线后的那一部分字，而对竖线前的字的语音形式毫无影响。为什么？因为竖线前后的字的来源不同，竖线前的来自效摄一等豪韵（赅上去，下同），竖线后的来自二等肴韵。来自这两个韵的见系字在北方方言中清清楚楚地分为两类，而在宁波方言中已混为一类。北方方言的影响就是要依照北方方言的标准把见系肴韵字与豪韵字区分开来。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文读形式的产生就是用威信

方言的音类分合标准改造本方言的语音系统。

文读的形式产生以后，其所采用的语音形式往往是以这一方言的语音系统所许可的范围向威信方言靠拢，如“教”的文读形式tɕio(←tɕiao)与北方方言的“教”[tɕiao]近似。在宁波方言的语音系统中，本来有-io(←iao)韵，如“标焦骄刁”等效摄三、四等宵、萧韵字的韵母都为-io，这样“教”类字的韵母形式就与“标刁”类字合流；这种合流符合威信方言的语音系统，从而在这一点上向它靠拢一步。

7.3.1 文白异读的共存一般体现为两类语音现象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随着语言的发展，其中一个形式取代另一个形式而完成发展的过程。一般的情况都是文读形式代替白读形式。下列的文白异读形式的交替比较典型地反映语言发展的替代过程(岭徐系作者的家乡，是宁波南7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山村，标出其音，以资参照)。请看表10：

【表10】

例字	条件	《汇解》		《研究》		当代	岭徐
		白	文	白	文		
停宁顶	清，明来 青，端组，泥来	-eŋ (残)	-iŋ	-iŋ		-iŋ	-eŋ
棚猛省	庚，耕	-aŋ	-eŋ	-ã	-əŋ	-ã -ɤŋ (残)	ã

《汇解》说明梗摄字有文白异读，三、四等清、青两韵的文读形式基本上完成了取代白读形式的过程，只在某些词汇条目中留下一些残存的痕迹：

名 meŋ：夫妻名分

顶 teŋ:屋顶　楼顶　屋瓦顶

停　deŋ:停落　停三餐饭　停工　停一歇　停得稳当

宁　neŋ:宁海　宁使(“宁波”“宁可”中的“宁”读 ȵiŋ)

这些残留的痕迹向我们提供了语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信息,说明清、青两韵的端组和明、泥、来母字曾有过念开口韵的时期。比较岭徐的方言,这些字至今仍念开口韵,与《汇解》时的白读形式相同,也可从侧面说明这种残存现象所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

奇怪的是二等字的文白异读形式的更替过程。《汇解》时,庚、耕韵的绝大部分例字(除“打”等少数字外),都有文白两种形式,但取代的过程和三、四等的清、青两韵以及其他的异读形式的交替过程完全相反。《汇解》时的文读形式-eŋ 在现代宁波话中除少数几个字如“生”“更”之外,已消声匿迹,白读形式恢复了它的正宗地位,如“猛碰撑争亨杏……”都只有一个-ã 的形式。这里没有几种相互竞争的音变力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这需要联系皆、泰等韵的拜、泰类字的文白异读来分析。

7.3.2　我们前面(§4.1.1、§4.4)已经说过,当-ɛn 的-n 韵尾还未消失的时候,宁波方言的-a 韵字已通过文白异读的形式向-ɛ韵字转化,《汇解》已清楚地显示了这种转化。先请比较《汇解》所反映的语言现象和现代宁波话的异同(见下页表 11):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汇解》的-a 韵为假、蟹两摄字的口语音,-ɛ 为文读的语音,两套系统并存。有些字没有文读,这可能是《汇解》没有反映,因为它注重口语;也可能当时这些音只有一种形式。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不影响上述“拜”类字的文白两套系统并存的结论。-a 向-ɛ 转化时,原来的-ɛ 还没有高化,因而出现两韵合流的趋向。从语言史的角度看,文白两套语音代表语言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一般说来,白读的语音代表早期的形式,文

【表 11】

例 字	《汇解》		当 代
	白	文	
拜摆	pa	pɛ	pa
派	p'a	p'ɛ	p'a
排牌败	ba	bɛ	ba
买卖	ma	mɛ	ma
带戴(~帽子)	ta	tɛ(与"歹"同音)	ta(戴~帽子)
太泰	t'a	t'ɛ(与"胎"同音)	t'a
𨂿(走一~)	da		da
奶艿	na	nɛ(与"耐"同音)	na
赖癞	la		la
戒解介芥	ka	tɕiɛ	ka
揩	k'a	tɕ'iɛ	k'a
外	ŋa	ɦuɛ	ŋa 白 ɦua 文
蟹	ha		ha
鞋	ɦa		ɦa
债斋	tsa		tsa
寨匚(怎么)	dza		dza
晒洒	sa		sa
柴豺	za		za
鸦~片矮挨	a		a
借	tsia	tsiɛ	tɕia
者	tsia	tsiɛ	tɕie, tse
且	ts'ia	ts'iɛ	tɕ'ie, ts'e
写泻	sia	siɛ	ɕia
邪斜谢	zia	ziɛ	ʑia
野也夜爷	jia	jiɛ	jia
怪拐乖	kua	kuɛ	kua
快	k'ua	k'uɛ	k'ua
坏	ɦua, ua	ɦuɛ	ɦua, ua(白) ɦuɛ(文)
怀	ɦua	ɦuɛ	ɦua(白) ɦuɛ(文)

读代表晚期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读的语音由于受到文读形式的排挤而逐渐消失，而文读则成为语言中唯一的形式。但从宁波方言的上述“拜”类字的文白异读情况看，其发展的趋向正好相反。正当-a 韵字通过扩散的方式向-ε 韵转移，并开始与原来的-ε 韵字合并的时候，中途杀出来一个-εn 韵，三种演变的力量相互竞争，最后，-εn→-ε 的演变取得了胜利，它一方面迫使原来的-ε 韵高化为-e（§5.1），另一方面使-a 向-ε 的转化过程倒退回去，迫使-a 韵字的文读系统退出交际的领域，而白读的系统则在-εn→ε 的演变力量的支持下在衰退中巩固了自己的阵地；文白并存的现象基本消失，只留下一点残存的痕迹，例如“坏怀外”等少数字还保留文白对立的形式。

表 10 中的“棚猛”类字的演变情况与“拜”类字相似，也是白读形式在与文读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原来在音韵地位上没有关系的两类字为什么在竞争中具有一致的演变趋向？这可能与音系中 a 音位的地位有关。“拜”类字的-a 和“猛”类字的-ã，除鼻化外，元音相同，白读的-a 在向文读的-ε 转化时既然由于受到-εn＞-ε 的支持而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那么其影响所及，自然也会涉及到“猛”类字-$\tilde{a}_{白}$ 和-$eŋ_{文}$ 的竞争，使白读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维持音系中 a 音位的独立性。

文白竞争的一般发展趋势都是文读形式取得胜利，白读退出交际领域，而宁波方言的“拜”“猛”两类字的文白竞争的发展趋向正好相反，是白读取得了胜利。这是比较少见的，或许可以把它叫做倒退的变化。这是只有在文白竞争中才有可能出现的一种重要演变方式。

7.3.3 既然文白异读的交替体现了语言的发展，我们自然可以从这种交替过程中去观察语言发展的时间层次。先请比较表 12

所列现象(见 42 页表 12)：

【表 12】

例字＼音值＼时期		《汇　解》	《研　究》	当　代
江讲降	白	kɔ̃ŋ	kɔ̃	kɔ̃,(t ɕyɔ̃)
	文	tɕyɔŋ	tɕyɔ,但“腔”:-iã	tɕiã
家嘉佳	白	kɔ	ko⊥	ko,tɕyo,tɕio
	文	tɕyɔ	tɕyo,tɕia 少	tɕia

这两类例字,文白异读的交替过程看来是平行的,韵母的变化,介音的改变都可以在同一时期中找到相互对应的痕迹。《研究》的时候看来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时期,因为新的文读形式已经出现,在往后的发展中它把旧的文读形式挤入白读层,使白读层同时具有几种并存的形式。这一过程充分显示方言间相互影响的持续性和宁波方言向北方方言靠拢的几个时间层次：

一、无文白异读的统一时期,大概在鸦片战争以前或更早一点。

二、文白异读并存的时期,大概在鸦片战争(?)之后至“五·四”或“国语运动”以前的时期,§7.1 所列《汇解》的文白异读表是这一时期的见证。

三、新旧文读形式并存的时期,这大概是“五·四”时期(也包括“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或者说是在国语运动的时期,与北方话的语音形式更接近的新的文读形式-iã、ia 开始出现。

四、当代,新的文读形式在竞争中取得胜利,老的文读形式转入白读的行列,因而“家”类字有三种白读形式,“江”类字的“降”的

白读形式则由于tɕyɔ̃变成tsɔ̃(§6.5.1)而掩盖了几种白读形式并存的现象。

文读形式可以转入白读层,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语言现象,它对认识文白异读的性质、语言演变的过程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并存形式以及并存形式的交替都是考察语言发展的时间层次的重要突破口。

7.4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连续式音变和离散式音变,由文白异读的交替所体现的音变属于哪一种类型?仔细分析文白异读的音变特点,我们就会发现,文白异读的形成和交替与这两种类型的音变虽有联系,但却有原则的区别,它代表一种独立的音变类型和音变层面。

连续式音变以语音特征或音位为单位,要受到严格的语音条件的制约:只要条件相同,该语音特征或音位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起变化。文白异读所体现的音变与此不同。它不是以语音系统中的音位为单位,因为同样是kɔ(←kao)音节,并不是所有的-ɔ都变成-io,而只涉及其中的一部分例字,可见并不是在相同条件下的-ɔ都发生了相同的变化。但是,文白异读的形成也不是与语音条件无关,kɔ中的-ɔ变为-io只涉及原来的肴韵见系字。这样看来,两种音变都要受到语音条件的限制,但这是两种不同的语音条件:连续式音变是本方言音位系统中的共时语音条件,而形成文白异读的则涉及古代的某些音类和不同方言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使某一方言按照威信方言的音类分合的模式进行音系所许可的调整。

离散式音变由于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音变的全过程,因而在过程没有完成以前,某一类字经常有两种不同的语音形式,象"军"类字既可以念-yɤŋ,也可以念-yoŋ(§5.3),与文白异读的交替类似。请比较:

“军”类字	-yɤŋ 变为→ -yoŋ	与“穷”类字的-yoŋ韵合并
“教”类字	-ao(ɔ) -iao(io)	文读形式与“骄”类字的-iao(-io)一致

仔细分析这两类字的关系，就会发现彼此有原则的区别。第一，“军”类字从-yɤŋ到-yoŋ是一种“变”的关系，在这种“变”还没有完成以前，两种形式人们可以自由变读；而“教”类字的两种形式之间不是“变”的关系，即文读形式-iao(-io)不是从白读形式-ao(-ɔ)变来的，而是以其语音系统所许可的范围向威信方言或标准语“借”来的，因而在当地人的社会心理意识中有“文”与“白”之分，而“军”类字的两种形式在说话人的心理意识中没有这种反应。第二，文白异读既有对立的语音形式，又有各自的使用范围；而“军”类字虽可以有不同的语音形式，但每种形式没有自己特定的使用范围，在各种场合都可以自由变读。第三，离散式音变只能出现中断的变化，即已经变了的就不能再变回去，而没有变的，自然也就不会再变。这样，已变和未变这两种形式就在语言中共存，无法统一。文白之间的竞争与此不同，已经变了的还可以变回去，出现倒退的变化。这是两种音变方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别。所以，“军”与“教”两类字的不同语音形式之间的关系是貌同神异，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另一方面，文白异读的交替过程与离散式音变也有类似之处，就是它们都以历史音韵的分合为条件，都采用扩散的方式，相互之间是一个一个地交替的，而不是象连续式音变那样采取整齐、划一的方式。

总之，文白异读所体现的音变与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有原则的区别。它代表一种独立的音变类型。由此看来，语音演变的规

律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代表三种不同的音变层面：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是系统内部的音变规律的两种方式，而文白异读是语音系统之间通过相互竞争而表现出来的一种音变规律新方式。

八、结　束　语

8.1　百年来宁波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些语言现象，看起来相当纷乱，内部变异很大，但是纷乱中有统一，变异中有规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表面上看来是纷乱的变化中找出音变的规律。

8.2　要理出音变的线索和规律，一定要把不同的音变层面区别开来，把表面上看起来是“乱糟糟”的语言现象，按其性质，归入不同的音变层面，而后分别加以分析。如果把不同层面的现象混在一起，我们就没有可能整理出音变的规律。历史语言学中曾有两个对立的口号，一个是“语音规律无例外”，一个是“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前者强调音变规律的绝对性，后者否定音变的规律性。每一个口号的拥护者都论证自己的口号正确而把另一个看成谬误，相互论争了一百多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分清不同的音变层面，把不同性质的现象混在一起，因而陷入迷魂阵。1979年末，威·拉波夫(William Labov)在就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发表题为《解决青年语法学派的争论》(Resolving the Neogrammarian Controversy)的演说时曾从微观的音变(micro-sound change)中去考察这两个口号的适用范围，认为这两个口号都是对的，只是每个口号都有自己起作用的条件。我们的办法与拉波夫不同。我们着眼于中观的音变(meso-sound change)，从一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中理清音变的线索，找出音变的不同层面，说明“语音规律无例外”是以音位或语音特征为单位的音变层

面的理论概括，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则是对以"字"为单位的音变层面的理论陈述；这就是说，每一个口号只适用于某一个特定的音变层面，超出这一层面，真理就变成了谬误。从一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来看，两个口号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只有区分不同的音变层面，我们才能在对立口号的迷雾中走出来，说明音变的规律和特点。

同理，文白异读所体现的音变也必须同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区别开来，不然，就会搞乱音变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搞乱语言发展的时间层次。

8.3 要理出音变的线索和规律，还要抓住音变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各种音变的现象中，往往有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音变，它牵一发动全身，引起整个语音系统的变动。在百年来宁波方言音系的发展中，-n 韵尾的消失是整个韵母系统发生大变动的关键，其影响所及，波及到音变的三个结构层面。抓住这种关键性的音变，就可以从表面上纷乱的现象中理出语音的发展规律和音变的先后顺序。

1984 年 8 月初稿

1985 年 3 月定稿

【附记】本稿送印之后我在宁波天一阁看到《鄞县通志·文献志·方言志》，感到很遗憾，因为我们的讨论遗漏了这一项重要的材料；但另一方面也感到宽慰，因为方志的音系描写，包括音类的分合、鼻韵尾的状态、文白异读的分布等大体上都与《汇解》一致，说明《汇解》不失为考察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的一项可靠材料。

方志"原稿在抗日以前已大部完成"(2655)。它的编

写晚于《研究》，但音系特点显然早于《研究》，与《汇解》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由于言语社团中的语言变异隐含着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长度，调查对象的差异可以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语言状态。

1990年3月

（原载《语言学论丛》第16辑）

【附注】

①这84个上声字是：锁火补土煮举取改海摆矮挤腿纸死嘴水鬼讨草早好饱炒吵表小少舀鸟了抖走狗口酒手惨减藤品钦赶铲拣板版剪短碗转卷鼹（老鼠～）紧忖滚稳准准粉党抢想厂赏养绑讲港等肯打省丙饼井请顶懂哄捧冢种（～类）拥。另加一个阴平字"斤"，共85字。

②可以念313调值的65个字是：磨和（～气）马惹奴路女语壅耐买弟泥赔雷队兑宜眉你随危位巍违围伟胃毛熬猫咬瓢嫖了愁蚕寻甚团饭痕恨辰晨引盆笨遁嫩存忙床狂防腾膛藤能擎瀛屏蓬隆穷，其中阳平字占一半以上。这种情况异于南门（沈）、郊区（荆），看来是一种反常现象，原因不清。

③这114个字是：火夥写补堵赌土煮举数（动词）上採睬改海洒矮蟹洗腿纸死旨指几比耻止趾址嘴水鬼讨早蚤澡草扫嫂稿考好饱炒吵巧表錶鯛小少鸟[tio]抖走狗笱口酒手守九惨敢减险藤品赶铲产拣板版剪茧短管馆碗转卷宛婉紧滚稳筍粉党蒋奖浆抢想鲞长（生～）厂晌养讲等肯打丙饼井请顶鼠懂桶哄捧。此外，在435调值中还杂有几个原来的阴平字，它们是：猜支枝肢之芝。

④流入阴平类的原阴上字有：哑估坞处府腑俯斧矩宰载（年～）楷鄙侈徙姊纪诡委轨晷匪非爪狡铰拗沼矫缴晓哎殴斗叟帚纠坎斩掩忝佩秆展鲜癣款晚犬撙榜倘嗓蒋恍谎纺枉拯景颈矿顷捅汞，共65字。

⑤这里念313调值的字有：鲁在美稻赵鸟亩牡母拇厚后纣懒演软远忍混莽朗浪两丈技瘪网忘冷逞静拢陇垅，共34字，其中"忘""浪"系原阳平和阳去字。

⑥表中上字变调调值为高平（44）、高降（42）、低升（24）的变调格式只有

一种，或阴或阳，不分A与B，因阳调字起音低，因而首字的起音不可能有高音点；24的低升调是阳调字的特点，阴调字无低升。

⑦原文为æ，根据《音节》的描写，它的实际音值为ã，而这个ã是[ɛ]的一般代用品，本文一律用[ɛ]。

⑧这个韵的音值可能有出入。据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所引Parker的材料，此韵为-œy，《研究》记为-œʏ，看来这种记音较为准确。

⑨这类字有：感甘柑泔（～水）敢干肝竿（竹～）乾（～湿）杆秆（稻～）擀（～面）赶杆幹疳（～积病）坩（～锅）

⑩参看布非菲尔德：《语言》第456页，商务1980年版。

⑪这里原来是用文白异读的例子来分析的，不确切，因而作了调整。

宁波方言的"鸭"[ε]类词和"儿化"的残迹

——从残存现象看语言的发展

一

宁波方言的"鸭"字有两个读音：[aʔ]和[ε]。* 当地人认为[ε]是"鸭"的口语形式，即[aʔ]和[ε]是"鸭"的文白异读。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也说："鸭白：E上"。总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从专家到普通老百姓都认为[ε]是"鸭"的口语形式。如果说[aʔ]与[ε]是"鸭"的文白异读，那么，这种"文白异读"与一般的文白异读现象有原则的区别。首先，文白异读是一个语言的不同时期

* 宁波方言的声调比较复杂，多的有七个(阴平42，阳平(包括浊去和大部分浊上)24，阴上435，阳上313，去声44，阴入5，阳入23)，少的只有四个：原清平、清上、清去合为一类，单念时调值多为42，原浊平、浊上、浊去合为一类，调值多为24，再加上阴入5和阳入23。"鸭"读[ε]音的声调，据《鄞县通志》(抗战前编成，解放后出版)第2892页说"作'晻'平声"，据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读上声，根据我们在调查中所听到的调值则为44，似又应属去声。这种不一致的情形可能与宁波话的声调正处于简化的过程有关。今天即使能读出七个声调的人，其中去声字多与阴平混，一小部分阴上字也已归阴平。"鸭"[ε]念44的调值又可能与连读音变有关，因为宁波话的舒调清声字在作连读变调的后字时常念44的平调，而"鸭"[ε]类词不用作复合词的前字，因而又有此类调值。鉴于这些复杂的情形，本文在行文中不标声调。

的语言状态在语言共时系统中的共存形式,大体上体现为标准语与土语的关系,文读形式以方言语音系统所许可的范围接近某一种标准语,而白读形式则代表本方言的土语;在语言发展的时间层次上,白读早于文读形式还是晚于文读形式,需要根据不同方言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就宁波方言来说,文读形式大多是受北方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形式,而白读形式还维持本方言的旧读,它自然早于文读形式。例如"蚊"字,口语读[mʏŋ],书面语读[vʏŋ];"蚊"是文韵微母字,[mʏŋ]的读法还保留着微母字音值的痕迹。有时候,两个音类在方言中已经合并为一类,但在另一方言的影响下仍有可能使这种已经合为一个音类的语音重新分化为两个音类,因而出现文白异读的共存形式。例如宁波方言以[kɔ]为语音形式的字有:

高膏羔糕稿告;胶~水 绞~~毛线 铰~链 教~书 觉调~ 叫~化子 酵发~(早时还有)交~易 较计~。分号前的[kɔ]是原效摄一等豪韵(赅上,去,下同)字,分号后是二等肴韵字。在宁波方言中这两个音类早就合并为一类,后来可能是由于北方官话的影响,分号后的二等字出现文白异读的形式:口语为[kɔ],文读为[tɕio];①文读形式是其他方言影响的产物。一般说来,文白异读的并存是语言发展的过渡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读的语音形式会让位于文读形式而退出历史舞台,上述"胶"等读[kɔ]的口语形式现在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语词中出现,一般都读[tɕio]。从文白异读的这种性质来看,"鸭"的[aʔ]和[ε]两种形式似乎与这种性质无关。"鸭"原来是咸摄二等狎韵字,收[-p]尾,今天的[aʔ]是狎韵字[*ap]的发展,不是在其他方言影响下的产物;从文白异读的时间层次看,如果说[ε]是早于[aʔ]的语音形式,我们从文献资料、从现实的汉语方言的比较来看,都找不到根据,也无法从音理上加以解释。

其次，语言中一个音类的文白异读一般不会和另一个音类的文白异读形式相同，这就是说，不同的音类不可能有相同的白读语音形式，例如"胶"与"家"，前者在宁波话中的白读形式为[kɔ]，后者为[ko][tɕyo]或[tɕio]，相互间泾渭分明，绝不相混。但是"鸭"类词的所谓"文白异读"现象，情况正好相反，不同的音类有相同的"白读"形式。请比较下列现象（我们把上述的所谓"文读"形式称为"本音"，"白读"形式称为"变音"）：

例字	韵类	本音	变音	读变音的语词举例
鸭	狎	aʔ	ɛ	水～，野～
猫	肴	mɔ	mɛ	小～，香狸～
帕	祃，陌②	(p'aʔ)	p'ɛ	绢～
牌	佳	ba	bɛ	纸糊～，扑克～

不同的韵类有相同的"白读"形式（韵母都为[ɛ]），我们在方言中没有发现先例，而且，这与前述的文白异读的性质大相径庭。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否定[aʔ]和[ɛ]是"鸭"的文白异读形式。

不同的音类有相同的语音表现形式，从语言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异常现象，说明在语音的发展中隐含有一种高于语音结构层面的结构规则；对于这种规则来说，音类只是一种个别的事实，犹如词相对于语法规则来说是一种个别的事实那样。不同的音类受到这种一般规则的支配，才能使不同韵类的音值发生相同的变化。不过这类规则现在似已消失，至少在说话人的意识中已不再存在，只是在日常的口语中还留存着一点残存的痕迹。现在我们需要顺着这种残存痕迹去恢复或重建已经消失了的一般规则，然后进一步弄清有关现象的发展线索。

宁波方言的[-ɛ]是原来的咸、山摄字的发展。请比较下列现象：

pε 扮班斑颁板扳般(山)　p'ε 盼攀襻纽～(山)
bε 办瓣爿(山)　mε 迈慢漫幔(山)
tε 耽担胆(咸)丹单旦(山)　t'ε 坍毯(咸)滩坦炭叹摊(山)
…………

咸摄字原来以[-m]收尾,山摄字以[-n]收尾,在语言的发展中,[-m]合并于[-n],这就是说,现代宁波方言的[-ε]韵字原来都有一个[-n]韵尾。根据这种音变规律,上述的“鸭”类词的[-ε]原来也应该有一个[-n]韵尾,否则就无法解释它今天何以会与咸、山摄字同韵。“鸭”类词就其所属的韵类来说,本身不可能有[-n]韵尾,它之所以能随同咸、山摄字演变,说明在“鸭”类词的后面曾经外加了一个[-n],而且加上这个[-n]之后,使不同韵类的区别趋于消失,即:使不同的韵类具有相同的语音形式。这个[-n]应该是高于语音层面的语言单位。

和“鸭”类词类似的还有一种“伯”类词。“伯”在宁波方言中有两个读音:[paʔ]和[pã]。据《鄞县通志》记载:“甬呼父之兄曰‘伯伯’,下‘伯’字读若‘浜’,俗音去声……”“甬呼父之弟曰‘叔叔’,亦呼‘阿叔’,下‘叔’字皆读若‘宋’。至对人称其父弟,虽曰‘阿叔’,然‘叔’字读若‘宋’平声,有时亦读本音,略有区别。”“浜”在现代宁波话读[pã],“宋”读[soŋ]。读音与“伯”“叔”类似的还有“脚”和“雀”,“脚”的本音为[tɕiaʔ],但在“拐脚”(瘸子)一词中“脚”读变音[tɕiã];“雀”的本音为[tɕ'iaʔ],变音为[tɕiã],如“麻雀”[mo tɕiã]。“雀”的本音与变音除韵母有区别外,声母也不同,本音的声母送气,变音不送气。“雀”原来是精母字,应该不送气,变音的声母还保留精母字的特点。

现代宁波方言的鼻化音[ã][ɔ̃]来自庚耕、江、唐和阳韵字,[oŋ]来自通摄的舒声字,古代都收[-ŋ]尾。这就是说,上述的“伯”

类入声字的[-ŋ]韵尾与“鸭”类词的[-n]韵尾一样，不是原有的，也是外加上去的，因而同样也是一个高于语音层面的语言单位。

以上都是根据音变规律作出的推断。这个推断如果能找到历史材料的印证，那它就更有说服力了。很幸运，我们找到了一本1876年出版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W. T. Morrison, 1876年，上海，以下简称《汇解》)，其中收录的宁波方言材料相当丰富，记音也大体可靠，为研究宁波方言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在这本著作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上面所推断的[-n]和[-ŋ]，而且还可以在其他韵类后看到这两个鼻音尾，这就使我们的分析有了更可靠的根据。现在先把含有鼻音尾的有关“鸭”“伯”类词摘录如下(原文没有标声调；标音的符号与国际音标类似，这里照录原文，只在有碍理解的情况下加注国际音标)：

例字	《汇解》注音	语词举例	例字	《汇解》注音	语词举例
鸭	ah	～蛋，～肉	眉	me	
	æn	野～，水～		min	～眼
猫	mao	～拌饭	味	mi	～道
	mæn	小～，香狸～		min	气～
帕[3]	p'æn	绢～	孩	'en[ɦen]	木头～，菖蒲～，玉～
娃[4]	wæn	小～			
牌	ba		挖	w̌ah	爬山～岭(此例仅取字音)
	bæn	纸糊～，神主～，一副纸～		w̌æn	镂耳朵～(挖耳勺)
筷	k'uæn		虾	hó[hɔ]	～仁，～米
茄	gyia[dʑia]			hon	一只～
	gyiæn[dʑiæn]	小辣～，番～	锯	ken	～齿
头	deo[dœʏ]	奶～	雀	tsiang	麻～
	den	门口～，奶～，娘子～，山顶～，老～，脚指拇～	叔	song	阿～
			伯[5]	pah	～～，阿～(指父亲)
				pang	阿～(指伯父)

这些带鼻韵尾的语音形式，就其本音的发展来说，都是违背语音发展规律的。但是另一方面，不同的韵类可以具有相同的语音形式，特别是不该有鼻韵尾的韵类出现鼻韵尾的情况，为语言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说明语音层面的变化隐含着非语音层面的（语素的、语法的）因素。现在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是这种残存因素的性质及其与音变的关系。

二

要弄清“鸭”“伯”类词的[-n][-ŋ]的性质，可以比较“鸭”“伯”类词的本音和变音在意义和使用范围上的异同。本音和变音在使用范围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本音在使用上没有什么限制，单用或在复合词中作前字、后字都可以，而变音一般只能单用或作复合词的后字。例如：

例字	本音	变音
猫	mɔ　～头鹰，～眼	mε←mæn 小～，一只～
雀	tɕʻiaʔ～斑，燕～	tɕiã←tɕiaŋ 麻～，麻～牌

也有几个例外，《汇解》收录了这样几个例子：

眉毛	min-mao	雁鹅	ngang ngo
眉眼	min-ngæn	锯齿	ken tsʻ[tsʻɿ]

这些例外大概是后起的，“眉”“锯”原来都是单音词，后来在复音化过程中这些词的带[-n]的单词形式仍保留在复合词中，犹如“牌”加在“麻雀”[mo tɕiã]后面构成“麻雀[tɕiã]牌”一样。现在很多人已不知“麻雀[tɕiã]牌”中[tɕiã]的本字，误认为“麻将牌”。

本音和变音在意义上的区别，宁波话已不甚明显，但在有些复合词中还可看到一些感情色彩的痕迹。请比较下列现象：

例字	本音意义	变音意义
鸭	泛指一般鸭子，现在一般不单说。	意义同前。
猫	泛指一般的猫。	同前，但在“小猫”一词中“猫”的口语总念[mɛ]。
牌	大小牌子都可用。	多指小的牌子（“神主牌”）和玩具（“纸牌”）。
麻雀	一种小鸟。	同前。
老头	泛指老年男子，“头”读[dœʏ]。	“头”现在读[dɛɪ]，⑥与“队”同音。原指使人讨厌的老年男子，《汇解》还特别注明“not respectful”。“老头”一词的感情色彩现在似有变化，有亲昵色彩
伯	指父亲的哥哥。	同前。

这些情况说明，本音和变音之间意义已无多大区别。语言的交际讲求经济性、明晰性和区别性，本音和变音所表达的意义闪烁于同与不同之间，这一点很可疑，但宁波话的例子太少，前一节列举的，差不多就是我们所发现的全部例词，我们很难从中窥知本音和变音之间原来有没有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求助于同其他临近的方言的比较。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第55页中注明“鸭”在余姚的口语中读“（小者）：Ē˪”，可以从中知道一点变音所表达的意义。但《研究》只举了一个例子，难以有效地说明问题。宁波旁边的定海县（舟山群岛）的方言与宁波话大同小异，据“五·四”前夕出版的《定海县志·方言志》记载：“宁属七邑，鄞慈镇自成一音系，奉象南又自成一音系，定海则得鄞系十之八九，而得奉系十之一二。”定海方言的“鸭”“伯”类词虽然也是一种残存现象，但

比宁波话多一些。现把"鸭""伯"类字列举如下(原文用改进的注音符号注音,这里参照《汇解》的注音和方言情况,改写成国际音标):

"鸭"类词	**本音**	**变音**	**"鸭"类词**	**本音**	**变音**
哥	ko	kuøn	奶	na	næn
弟	di	din	泪	le	lin
姊	tsi	tsin	瞎	xaʔ	xæn
妹	me	men	鸡	tɕi	tɕin
		m̩en	鹅	ŋo	ŋuøn
婆	bo	buøn	鸭	aʔ	æn
眉	me	min(～毛)	狗	kœʏ,kiɵʏ	kin
	mi(皱～头)		猫	mao	mæn
头	dœʏ	den	梅	me	men
背	pe	pen	茄	dʑia	dʑiæn
"伯"类词	**本音**	**变音**	**"伯"类词**	**本音**	**变音**
伯	paʔ	paŋ	雀	tsʻiaʔ	tsiaŋ
叔	soʔ,syʔ	soŋ	虾	hɔ,ɕia	hɔŋ(城)
脚	tɕiaʔ,tɕiʔ	tɕiaŋ			hiɛ(乡)
鹊	tɕʻiaʔ	tɕʻiaŋ	镬	ɦoʔ	ɦoŋ
鸦	ia,yɔ,ɔ	ɔŋ	六	lɔʔ	loŋ

这些词的本音和变音,不少在意义上还有明显的区别,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宁波方言"鸭""伯"类词的变音的性质。现抄录几例,以资参照(文中"读音"指文读,"土音""城乡土音"指白读,"语音"系泛指,兼指文、白两种语音形式):

例字　注释

猫　读音为[mao],语音有二,在名词之首者为[mao],如"猫头"

“猫饭”；在名词之末或独用者为[mæn]，如“小猫”“一只猫”。

婆 读音、土音皆为[bo]，惟称老年妇人曰“老太婆”（习惯以为不尊称之称呼），“太”呼[tʻao]音，“婆”呼[buøn]音。

背 读音为[pe]，语音有二，通常皆呼[pe]，惟名词之人格化者则呼[pen]，如“驼背”。

奶 读音为[na]，语音有二，如“乳母”称“奶娘”及有身份之妇人称“奶奶”，皆呼[na]音；而“乳房”“乳汁”及“乳母”亦皆称为“奶奶”，惟音变为[n̥æn]。

瞎 读音为[haʔ]，语音通常皆为[haʔ]，惟名词之人格化者，乡间呼为[hæn]，如推星命之瞽者曰“算命瞎[hæn]”。

脚 读音为[tɕiaʔ]，语音有三，通常皆呼[tɕiaʔ]，乡间或呼[tɕiʔ]，惟名词之人格化者则呼[tɕiaŋ]，如“拐脚”“烂脚”等。

鹊 读音及城乡语音皆为[tɕʻiaʔ]，乡间语音则为[tɕʻiaŋ]，如“鸦鹊”呼为[ɔ tɕʻiaŋ]。

六 读音、语音皆为[loʔ]，惟俗语望日前后曰“十五六”，则“五”呼为[ŋ̍]，“六”呼为[loŋ]。

这些例词对我们了解“鸭”“伯”类词的[-n][-ŋ]尾的性质很有帮助。它们明确地显示出“鸭”“伯”类词加上[-n][-ŋ]之后，在意义色彩上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说，这个[-n][-ŋ]本身是有意义的，与“班”“晏”和“浜”“将”等词的纯语音性的韵尾[-n]和[-ŋ]，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定海方言虽然与宁波城区的方言有些小区别，但这无关紧要，比较同源成分在两地的差异，有助于分析语言的演变，一般说来，中心城市比边缘地区变得快一些，城市比农村快一些，边缘地区和乡间的语言的一些特点往往代表城区语言的早期

状态。拿定海话与宁波话比较，定海话的“名词之人格化者”的“鸭”“伯”类词，在宁波话中已极为罕见，这说明有明显的构词作用的“鸭”“伯”类词首先消失，而残存的只是一些构词作用在发展中已被磨损，即不大明显的语词，因而才显出本音和变音没有多大差别的状况。所以，定海方言的“鸭”“伯”类词为宁波话所没有的特点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宁波话“鸭”“伯”类词的变音的性质。

“鸭”“伯”类词变音的上述（使用范围和意义）两个方面的特点，说明这两类词中的[-n][-ŋ]不是语音单位，而是一种语素。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素，我们从这两个特点中自然会联想到北京话的“儿化”，或者说，这个语素就是“儿”，所谓“变音”就是“儿化”。李荣（1978、1983）在谈到温岭方言、广州方言与连读变调不同的特殊变调时把这些特殊变调称为“变音”，认为“变音跟北京的儿化一样，如‘花儿’‘鸟儿’，这个‘儿’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虽然很含混，很概括，但是能说出来”。宁波方言的“鸭”“伯”类词的变音与温岭方言的特殊变调（升变音和降变音）的作用一样，也是一种儿化形式。我们如把宁波话、定海话的变音与北京话的儿化作一比较，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宁波话的变音的儿化性质：

例字	宁波　定海	北京
牌儿	bε←—bæn	pʻɐr
鸭儿	ε　←—æn	iɐr
（麻）雀儿	tɕiã←—tɕiaŋ	tɕʻiaor

北京的“儿”已与前面的韵母“化”为一体，语音上已经难以自成一个音素，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区，如房山县，“儿”在构词中还是一个自成音节的儿尾，说明北京话“儿化”的“化”的时间还是不太久远的事情。如果北京话的儿化象书面语所写的那样（“牌儿”“猫儿”），宁波、定海方言的[-n][-ŋ]与北京话的“儿”的对应关系就显

得很清楚。现在，北京话的"儿"在儿化中"化"掉了，但还有明显的痕迹；宁波话的"儿"在"儿化"中也"化"掉了，但是比北京话"化"得早，"化"得彻底，甚至连痕迹都难以找寻。所以，两地方言的这些共同的特点(意义上、使用范围上和语音的"化"的特点上)都说明宁波话的"鸭""伯"类词的变音相当于北京话的儿化，就是说，宁波话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个儿化的时期。

"儿"在今天的宁波方言中有两个读法，文读[ɨ]，白读[ŋ̍]；[ɨ]是在北方话影响下产生的后起的语音形式，这里可以不予置理，因为这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从与宁波周围的一些方言(如宁海、奉化等)的比较来看，宁波话的"儿"在念[ŋ̍]之前还有一个念[n̩]的时期；[ŋ̍]是[n̩]的发展。"鸭""伯"类词的[-n][-ŋ]既然是语素"儿"的语音形式，那么，为什么同一个语素有不同的语音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是代表时代的先后？还是同一语素的两个语素音位变体？仔细分析这两个鼻音尾的出现条件，大体看来，应该说它们是同一语素的两个变体，"鸭"类词的变音大体来自原来的阴声韵和以[-p][-t]结尾的入声韵，"伯"类词来自以[-k]结尾的入声韵；宁波、定海两地没有发现原来阳声韵的儿化形式，这可能是由于儿化与阳声韵的语音形式完全相同，两者早就混在一起，分不出来了。这就是说，入声韵在儿化时随着有关的舒声韵演变，因而同一语素呈现出不同的语音形式。宁波、定海两地的"鸭""伯"类词的变音大体符合这一规律，但有几个例外。宁波话的"雁"[ŋã←ŋaŋ]、定海话的"鸦"[ɔŋ]、"虾"[hɔŋ]，按规律应属于"鸭"类词，而现在却属于"伯"类词，这可能与语音的同化作用有关。"雁"只在"雁鹅"一词中可读[ŋã←ŋaŋ]，这可能是由于受后字"鹅"[ŋo]的声母的同化；定海话的"鸦""虾"的主要元音都是后元音，后元音后的变音根据定海方言志的材料无[-n]尾。

三

儿化是一种指小爱称形式。指小爱称可能是人类共同具有的心理状态，所以不同的语言都有自己的指小爱称形式，例如俄语的книжка、книжечка是книга(书)的指小爱称形式，俄语中这一类词很丰富；德语名词后如加-chen，-lien就表明这是一种指小爱称形式；英语的mammy(妈妈)、dad(爸爸)也是mother、father的一种爱称形式。汉语的各地方言的情况大体与此类似，都可能有自己的指小爱称形式。随着方言研究的深入，汉语中各种指小爱称的儿化现象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过去一般认为只有北京话有儿化，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会。

"儿"是支韵日母字，它的中古音，高本汉拟测为ȵʑjiẹ̭，李荣拟测为ȵie，其声母是一个鼻音。随着语言的发展，这个词的语音在不同的方言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在吴方言的口语中还保持着鼻音的读法，只是原来的韵母全部丢失，变成一个声化韵，读[n̩]或[ŋ̍]，宁波方言现在都读[ŋ̍]，而在北方方言中它大多演变为一个卷舌元音[ɚ]。"儿"的读音的音质差异必然会给不同方言的儿化带来差异。从语言发展的阶段来看，鼻音早于卷舌元音，宁波方言的儿化现象也早于北京话的儿化现象；宁波话的儿化已是处于消失中的残存现象，而北京话的儿化却是发展中的新兴现象。残存现象也好，新兴现象也好，都是观察语言发展的一个窗口。

儿化是一种构词现象，是语素平面的问题，就其本质来说，不是语音问题。青年语法学派、布龙菲尔德(1933，452—453)等人认为"语言包含两个习惯层次。一个层次是音位的……组成了语言的音系。另一个层次包含形式-意义习惯……这些习惯组成了语言的语法和词汇"，而音变是纯粹的语音过程。如果情形确实是那样，那

么为什么在宁波方言中的构词现象会成为语音的变化，表现为本文第一节所述的语音规律(从本音来说，则是语音规律的例外)?也就是说，语音变化中为什么会包含非语音的事实，从而表现为非纯语音的过程？这可能与汉语的语音结构特点有关。

根据《切韵》以来的韵书、韵图的记载和汉语各地方言的语音表现，汉语的音节结构只有[-p][-t][-k](或[-ʔ])和[-m][-n][-ŋ]等少数辅音可以做韵尾。⑦汉语语素的语音结构基本上是单音节的，只有少数语素(如"玻璃"之类)不止一个音节。"儿"是一个语素，儿化就是在一个语素之上再加一个"儿"，然后达到"化"，使原来属于两个不同音节的语素挤进一个音节的框架，实现单音节化。在实现这种"化"的过程中，由于"儿"在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语音表现，因而在儿化时与前面的音节就发生不同特点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儿化形式。北京话的儿化是使前一音节的韵母发生语音变化，山西的平定方言(徐通锵，1981)、山东济宁的金乡方言的儿化(马凤如，1984)是使"儿"([ḷ]或[r])插入声母和韵母之间而成为一种构词中缀；这些特点与"儿"的读音有关，因为北京话的"儿"[ɚ]和平定的"儿"[ḷ]、金乡的"儿"[r]在实现单音节化的时候不允许处于音节末尾的位置上。吴方言的"儿"在口语中读[n̩]或[ŋ̍]，儿化时把[n]或[ŋ]加在音节的后面，与传统带[-n][-ŋ]韵尾的音节结构的特点没有矛盾，因而在实现单音节化时可以"岿然不同"，充当韵尾，使儿化的形式与传统带[-n][-ŋ]的阳声韵在语音结构上出现相同的面貌。当然，儿化的"化"的过程的实现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先请比较下列几点的浙江方言现象：⑧(见下表)

这些方言差异大体上可以说明从儿尾到儿化再进而到消失的

音值 例字 方音点		刀儿	被儿	茄儿	李儿	狗儿	碗儿[8]	鸡儿	鸭儿
平阳		tœ^{44}ŋ^{13}	bi^{45}ŋ^{13}						
		tœ：ŋ^{34}		dʑi：ŋ^{13}	li：ŋ^{21}				
义乌						kɤ：n^{ɔ}	ua：n^{ɔ}	ʨi：n	
金华		tɯn			lin^{ɔ}	kɯn^{ɔ}	uan^{ɔ}	ʨin	uan^{ɔ}
定海				dʑiæn		kin		tɕin	æn
宁波	1876			dʑiæn		kɪ[10]			æn
	现代			dʑiɛ dzɛ					ɛ

发展过程。平阳方言的儿尾看来是一种残存形式，可看成为发展的第一阶段，犹如北方有些地区的儿尾那样。由于音节后加一个[-n]或[-ŋ]的鼻音韵尾符合汉语的音节结构特点，因而“儿”([-n]或[-ŋ])逐渐粘附在前一音节的后面，但开始时还有粘附的痕迹，因为它使前面的元音变成长元音。这时候两个语素已开始“化”成一个音节，平阳方言的多数儿化形式和义乌的儿化都还处于这一阶段。金华方言的儿化在发展的时间层次上又比平阳、义乌前进了一步，连元音的音长色彩也消失了，说明两个语素已融为一体，与传统的阳声韵的语音结构完全一样。“碗儿”[uan^{ɔ}]中的[-n]是一个假韵尾，真语素。在金华方言中，由于前低元音后的阳声韵的韵尾早已丢失，因而人们还容易意识到[uan^{ɔ}]是“碗”的儿化形式。但是，定海、宁波两地的情况就不同了，在儿化的时候原来阳声韵的韵尾还没有消失，因而在“化”为一个音节的时候语音上就与相应的阳声

韵合并，因而在宁波方言中找不到原来阳声韵的儿化形式。宁波方言的儿化发展到这一步就进入走向消失的关键时期，因为语言中的儿化形式为数不多，而阳声韵的字是大量的，这样，少数的儿化形式就淹没在多数的阳声韵字中，随着儿化的构词等语法作用的消退，人们对儿化的心理意识也就逐渐淡薄。《汇解》的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到的 na-hwun（指"婴儿"infant）一词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na 是"奶"，人们没有分歧；hwun 的汉字该怎么写，众说纷纭，有的人说是"欢"，有的人说是"唤"，还有人说是"花"（hwô [huɔ]），都弄不清该写什么字。据《定海方言志》记载，hwun 是"花"的"转音"："俗呼食乳之婴儿曰'奶欢'，或作'奶花'，谓乳汁培养若花也。'花'音转为'欢'。"所谓"音转"也就是儿化，只不过当时人们已经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罢了。这样，儿化混迹于阳声韵中，而它在人们的意识中又逐渐消失，因而在语言的发展中就随着同形的阳声韵以"语音规律无例外"的整齐、划一的连续式音变演变，即处于音节末尾的鼻音尾或消失（[-n]），使"鸭儿"与"晏"同音，现代同为[ɛ]；或弱化（低元音后的[-ŋ]）为鼻化音，使"雀儿"和"酱"同音，同为[tɕiã]。这样，语素平面的事实在变化的时候完全等同于纯语音的过程。从宁波方言的发展来看，青年语法学派和布龙菲尔德认为音变是纯语音过程的看法需要作一点修正，至少需要作一点限制，因为在实际的音变现象中确实可以包含一些非语音的事实。萨丕尔在《语言论》（1921，116）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今的趋势，把语音和语法孤立起来当作互不相关的语言学领域，是一件不幸的事。它们之间和它们各自的历史之间可能有基本关系，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掌握而已。"这个论断是对的，萨丕尔当时的假设现在已得到语言事实的支持，因而我们在研究音变的时候不能完全局限于纯语音的过程，而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联

系它与其他结构层面的关系才能弄清某些音变的性质。

儿化韵虽然随着阳声韵演变，但它毕竟是一种异类分子。阳声韵中的每一个字只有一种语音形式，而儿化韵字现在都已变成单字音，本地人又已意识不到“儿”的任何痕迹，因而出现一个字两种读法的情形，如“鸭”，一为[aʔ]，一为[ε]，[aʔ]是[ε]的本音。这样，混迹于阳声韵中的儿化韵字又面临着一次拉锯战：是继续同原阳声韵混为一类呢，还是回到本音中去？本音字的使用频率高，范围广，而且随着文化的普及与提高，与读书音不一样的口语形式在使用中逐步消退，这些情况都会使儿化韵字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逐步与原阳声韵字摆脱关系而向本音靠拢。不过这次演变的方式与原来跟着阳声韵一起演变的连续式音变不一样，因为儿化韵字各有自己的本音，每一个本音的各方面条件（如使用频率、使用范围等）都不同，不象音位及其变体那样有机械的分布条件，因而只能采取散兵式、扩散式地一个一个地回到各自的本音中去，变得快一点的，就失去了任何儿化的痕迹，变得慢一点的，就在语言中留下了残存现象，正是这种残存现象为我们根据音变规律去探索语言的发展线索提供了可能的条件。拿定海方言与宁波方言相比，由于宁波是中心城市，这方面的语言现象变得快一些，因而儿化的残留现象也就少一些，到“五·四”前，当定海话还留存着“哥”“姊”“弟”“妹”之类的儿化残存形式的时候，《汇解》时代的宁波话，这些词的儿化形式已无踪影；不是与临近方言的比较，我们就无由得知宁波话也曾可能有过这方面的儿化现象。即使就每一个儿化韵的残存形式的消失来说，它也是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一般是在一些不常用的语词组合中先消失，而在一些常用的语词组合中消失得晚一些。我们现在还可以从“狗”的儿化形式的消失中得到一点启示。据《定海方言志》载：“狗”的“读音为[kœʏ]，语音有三，城厢为

[kœʏ]，乡间为[kiɵʏ]，唯‘黄狗’连言则呼[kin]”，即只有在常用的“黄狗”一个词中还留存着儿化的痕迹。宁波方言在二十年代“狗”还有[ki]的说法，现在已经没有了。儿化的残存形式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一步一步地走向消失，越是中心城市，消失得越快，宁波比定海消失得快，而上海又比宁波消失得快。根据1911年出版的材料(Silsby，1911)，“筷”的上海话读 khwan，与安徽休宁的“筷”[k'uan]、宁波、定海的“筷”[k'uɛ←k'uæn]一样，说明上海话也曾有过儿化的现象；“虾”在现代上海话的口语中念[hø]，与“安”[ø]同韵，似应看成儿化的残存形式之一，不过上海话已难得见到这类现象了。

根据现代学者对吴方言的研究，看来吴方言在其发展过程中曾有过自己的儿化韵。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吴方言的儿化现象在现在江、浙、皖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状态，就总的情况看，南部(如温州)比北部(如皖南的休宁)丰富，西部(如金华、义乌等地)比东部(如宁波、上海等地)明显；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北方的休宁比南部的温州变得快，东边的宁波、上海比西边的金华、义乌变得快，已接近于消失。总之，吴方言的儿化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和消失的规律，与北方方言很不一样；宁波方言的儿化韵的残存形式以及我们从中所能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发展规律的一个缩影。

(原载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3期)

【附注】

①根据1876年出版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W. T. Morrison，1876年，上海)的材料，文白两种形式当时已经相当普遍，但在日常交际中似以白读的形式为主。这一类文白异读现象，更早始于何时，现在无从查考。

②“帕”有两个反切，一为普驾切，玛韵，根据音变规律，宁波话应念

[p'o]；一为莫白切，陌韵，根据音变规律，宁波话念[p'aʔ]。现代宁波方言“帕”字单念时只有后一种读音。“帕”的[p'ɛ]音，从意义上看，应该是来自杩韵的“帕”。

③在《汇解》中没有发现“帕”的本音。本表中只有一种带鼻音尾的，其他例字情况同此。

④《汇解》没有找到合适的汉字，只在英文 Child 后注“siao w̃æn 一小儿”。“娃”字是我改加的，因为宁波话称女孩儿为“小娘”，“siao w̃æn”是“小娘”的对称说法。

⑤《汇解》的“伯”类字还有“骨”(kwang)，如“脚骨”的标音是 kyiaʔkwang(第 270 页，原文标音送气，恐系排印错误)，Arm(手臂)条下标 siu-kwang，汉字也应写“手骨”。按宁波人的语感说，“手骨”与“手 kwang”、“脚骨”与“脚 kwang”同义，认为 kwang 是“骨”的变音。实际上 kwang 是“梗”，即“手梗”“脚梗”。李荣的《〈切韵〉与方言》(见《方言》1983 年第 3 期)一文曾对此字有很好的比较研究，可参考。另外，《汇解》中还有一些字的注音似有变音的可能，例如“烂泥 kwang 着”(现在也有“面包上 kwang 点奶油”的说法)、“水 kwang 清”中的 kwang，我们弄不清这些音所代表的本字，为分析的可靠起见，本文暂时不予置理。

⑥宁波方言的[-ɛɪ]韵来自[-e]，而[-e]韵中有一部分字来自[-en]。“老头”的“头”，《汇解》时读 den。

⑦赣方言的[-l](如“笔”[pil])是[-t]的转化。

⑧平阳、义乌的材料引自李荣的《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40—141 页。金华的材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80 级学生朱加荣提供的。定海的材料据“五·四”前出版的方言志，宁波的 1876 年的材料据《汇解》。

⑨“碗”原是阳声韵，但它在义乌、金华方言的口语中早就丢掉了鼻韵尾，两地都读[ua]，所以这里的[-n]不是原来鼻韵尾的遗留，而是儿化的标志；上声字读成去声的变调也证明了这一点。“鸭”“狗”在儿化后也念去声。

⑩《汇解》没有“狗”的儿化材料，这里据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

音系中的变异和内部拟测法

一

内部拟测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是语言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可以弥补历史比较法的不足,使难以运用历史比较法的领域也可以进行语言的历史研究。

内部拟测法一般认为是结构分析法在语言史研究中的运用,是西方语言学家比萨尼(V. Pisani)、侯尼希斯瓦尔特(H. M. Hoenigswald)、蓬芳特(G. Bonfonte)等学者在本世纪 30—40 年代作为工作原则提出来的,目的是从语言材料的共时分析中得出历时的结论。著名的结构语言学家库利洛维奇(J. Kurylowicz, 1962)在《论内部拟测法》一文中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全面的讨论,认为内部拟测法就是要从语言系统的事实本身、即语言要素的相互关系去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而排除一切非语言的要素,例如社会变动、移民、战争、发音……去解释语言的发展,“被研究的因素之间的内部关系的变化才是唯一有关的事实。变化的外部动因与音位系统的变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研究的范围看来应该限制在所研究因素的语言的方面,也就是变化前后的实际状况。变化应该作为系统的变化而加以分析和说明……”根据这种方法论原则,音系结构中的空格(例如北京话的舌根音声母 k,k‘,x 在音位组合中没有齐、撮二呼)、对立的中和(例如中古见、精两组声母在

i、y 前的合流）、不规则的形态交替（morphological alternation）等就成为内部拟测法首先注目的对象；①特别是不规则的形态交替，很多语言学家认为它是进行语言内部拟测的主要突破口，因为这种交替是由有规则的条件音变造成的，可以从此入手找出音变的规律，使不规则的现象规则化。例如，拉丁语的 genus（种类）的主格genus和属格generis 的 s～r 的不规则交替被认为是由元音间的 s 变成 r 这一条件音变造成的。“根据共时形态交替的个别例证进行历时音系规则（phonological rules）的拟测称为内部拟测法”（Bynon，1979，90）。

内部拟测法着眼于规则系统中的不规则现象，实际上就是从语言系统中的结构差异入手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差异，这是语言史研究的基础。历史比较法比较同源成分在各方言或亲属语言中的成对应的语音差异去探索语音的发展、即从语言在空间的差异中去寻找时间的发展序列；方言地理学注意音变在地域上扩散的差异；词汇扩散理论研究音变在词语读音上的扩散的差异。它们各自都以某种差异为基础在语言史的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内部拟测法研究音系中的结构差异，从中理出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在历史语言学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这是它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到一些不足，因为内部拟测法只能从以语音为条件的共时结构差异中去探索语言演变，而无法处理系统中的其他差异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例如，现代宁波方言的“酒”字在人们的读音中有 tɕiɵʏ、tɕi^{ə}ʏ、tɕiʏ、tɕy（这时“酒”与“举”同音，现在还只限于少数年轻人）的差异，这些差异与语音的分布条件无关，因而内部拟测法无法从这种差异中去分析音变的过程和趋向。其次，内部拟测法只能从结构差异中重建有规则的原始结构，即只注意音变的两头，而无法清理出音变的具体过程和发展的时间层次。第

三，内部拟测法可以处理以语音条件为转移的音位的分化，而无法处理音变中音位的合流；中和，虽然它与音位的合流有关，但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依据，也很难从共时音系的音位对立中和中推知历史上音位对立的中和。内部拟测法的这些局限看来与它的语言理论基础不无关系。

内部拟测法的理论基础是德·索绪尔(1916,36)的语言系统同质说，认为语言是一种同质的系统(homogeneous system)。所谓"同质"，简单地说，首先就是要分清语言的"内"与"外"，认为语言的研究只能着眼于语言系统的事实本身，而不能参照非语言的因素。第二，认为语言是由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一种纯粹的价值系统，因而在语言研究中可以追求齐整性、对称性、规律性，不承认语言系统中存在着变异(variation)。第三，认为语言系统是一种共时的结构，在研究中要绝对排除历时的干扰。把这三点归纳起来，就是：语言系统是由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完全静态的结构。把语言看成为一种结构，从而为语言分析的形式化、精密化奠定语言理论的基础，这是语言系统同质说的重要贡献，但问题是它把语言结构的静态性绝对化了，认为语言结构中没有变异和变化。这是以个人方言(ideolect)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语言理论，假定言语社团中的每个人的语言都一样，没有变异。实际上，这是为了语言研究的方便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理想的语言状态，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例如，上述宁波方言"酒"的四种读音就告诉我们，在共时音系中有变异，而变异体现着历时演变的趋向，说明语言系统"静"中有"动"，在"不变"的结构中隐含着变化的因素。这是语言系统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语言系统的同质说只着眼于系统中不变的、共时的方面，自然就会舍弃语言结构中的一些重要特点。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发展，同质说在理论上的一些局限性也就

日益显露出来了。内部拟测法以这种语言理论为基础，自然也就只能着眼于规则结构中的不规则的差异，限制了研究的范围。

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客观规律的反映，集中体现人们对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我们现在既然认识到内部拟测法的语言理论基础的局限性，那就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正前人的缺漏，以改进语言内部拟测的研究。这就需要我们摆脱个人方言的束缚而着眼于言语社团中实际运用着的语言状态，设法在无穷无尽的变异中找出语言的结构规律和发展规律。实现这种设想的办法是在言语社团中选择并研究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个人方言，仔细地比较它们的异同，找出其间的差异；根据差异的特点理出音系中的变异层，使杂乱的变异形式分部别居，各得其所；而后分别探索各层变异形式所体现的音变趋向、过程和规律，对共时音系的结构进行动态的分析。根据我们对浙江宁波方言、山西闻喜方言、祁县方言的调查和分析、以及我们所接触到的其他方言的情况，言语社团中个人方言之间除了彼此相同的部分以外，相互间还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不是"遍地开花"，而是集中表现在某些因素上。彼此相同的部分是共时音系中的稳定层，相异的部分是音系中的变异层；变异层又可以因变异的不同特点分出三个层次：以语音分布条件为转移的音位变异层、体现为语素读音的逐一变化的音类（声、韵、调）扩散层和以文白异读为代表的异读叠置层（徐通锵，王洪君，1986）。以语音条件为转移的音位变异在语言发展中固定下来就体现为连续式音变，其特点就是青年语法学派所说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如果有例外，那也是"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维尔纳语）。以语言系统同质说为基础的内部拟测法分析的基本上就是由这种性质的音变而在音系中留下来的结构差异，所谓"根据共时形态交替的个别例证进行历时音系规则的拟测"和利用空格等

进行语言史的研究，实质上也是为"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的信条进行结构理论的解释。所以这种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只是音系中的一种变异形式及其所体现的演变规律，而还没有考察其他两个变异层的变异形式及其有关问题。语言史的研究既然以语言中的差异为基础，内部拟测法的研究范围就不能排除音类的扩散、异读叠置之类的差异。这也是以同质说为基础的内部拟测法的一个重要缺点。另一方面，内部拟测法基本上是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如汉语等东方语言的特点，其语言基础也不够广泛。所以，要改进内部拟测的研究，一需要改进它的语言理论基础，跳出语言系统同质说的框框，面把语言看成为一种有序异质的结构(orderly heterogeneous system)，充分注意各种类型的变异形式及其所提供的音变信息，从中理出语音演变的线索和层次；二需要扩大内部拟测法的语言基础，根据不同语言的特点进行内部拟测的研究，使内部拟测法的内容得到不断的充实。总之，在我们看来，只要着眼于音系中的变异，从变异中进行结构的动态分析，用语言事实本身来说明发展的原因、过程、趋向和规律的，都是语言内部拟测的研究。

汉语是有历史的语言，有大量的书面文献，但跨地域、跨时间的方块汉字掩盖了语音发展的实际状态，因而在汉语有史时期的研究中内部拟测法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这种方法由于可以得到汉语方言的印证和书面材料的帮助，其有效性和可靠性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从中总结出来的分析原则也可以成为研究史前时期的语言的一种重要的借鉴。

二

汉语与内部拟测法的改进关系最密切的首推以文白异读为代

表的语音差异。文白异读在汉语方言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是语词中能体现雅/俗两种不同风格色彩的音类差异。语言系统的同质说由于只注意条件音变所造成的语音结构差异，自然就不会去注意类似文白异读之类的现象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价值。

“文”与“白”代表两种不同的语音系统，大体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文读则是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某一标准语(现代的或古代的)的成分，从而在语音上向这一标准语靠拢。比方说，山西闻喜方言的“床”(代表知照系的合口)字，它的文读形式原来为꜀pfʻʌŋ，白读为꜁pfʻə、解放后由于推广普通话和在学校中进行普通话教学的结果，“床”字产生新的文读形式꜁tsʻuʌŋ。声母为什么是tsʻ-而不是tʂʻ-？因为在闻喜方言音系中多数人已没有tʂ-类声母，说明它在吸收标准语的音类时其音值还得适应本音系的特点。宁波方言也可以为这种考察提供一个重要的根据。鸦片战争后，宁波辟为商埠，与外地的交往比较多，方言的分歧造成相互间交际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却为北方官话的影响敞开了大门。本世纪初，宁波海关的一个德籍官员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指出宁波方言有很多字具有文白异读的形式，白读的口语形式代表较古的读音，文读的现代形式由来自各省的教员带到学校，字的读音一般都是现代官话(Möllendoff，1901，xi)。据1876年出版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W. T. Morrison，1876，上海)的材料，肴韵见系字(交胶教绞酵……)的白读为-ao，文读为-iao，文读形式大体上与北方官话相似。这些情况说明，文读形式的产生是外方言、主要是权威方言影响的结果，是某一个语言系统的结构要素渗透到另一个系统中去的表现，因而音系中文白异读之间的语音差别实质上相当于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如果说，方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是语言分

化的结果，那么音系内部由文白两种形式的差别所体现的对应关系则是语言汇合或统一的产物。由语言的分化所造成的不同音系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是历史比较法的基础，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那么同理，文与白两种语音形式的对应关系同样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只是由于它们共处于一个音系之中，人们不易发现它们的价值而已。文白异读的产生体现方言间的接近，与语言分化的过程正好相反，因而对文白异读的分析不能机械地套用历史比较法，而需要对文读形式产生之后音与音之间的关系进行内部结构的分析。

一个方言向另一个方言吸收一个语音结构要素，产生文读形式，这就在系统中出现了叠置。这里以山西闻喜方言宕摄字的文白异读以及它与果摄字的关系为例来看这种叠置的情况：

糠——［文 ꜀kʻʌŋ｜白 ꜀kʻə］——不同系统同源音类的叠置

科　꜀kʻə］——同一系统异源音类的叠置

同源音类的叠置是同一语素具有不同的音类交替形式，这种交替与前面所说的不规则的形态交替是两回事情：由不同音系同源音类的叠置而形成的交替反映语言发展中两个姊妹方言之间的关系，而形态交替则是音系中由条件音变而给音系带来的结构差异。同一系统中异源音类的叠置是原来不同的音类取相同的语音形式，这反映同一语言系统的不同音类在发展中的相互关系。这里的关键是文读形式的产生；没有文读形式，“糠”与“科”合流，不会象现在那样既合又分，成叠置的状态。两种不同性质的叠置决定了白读的语音在演变中的命运：它在语言系统中能否取得生存的权利，决定于它与文读形式的竞争；白读形式的语音本身如何变化，决定于它与之叠置的那个异源音类的语音变化。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叠

置为内部拟测法的运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叠置，它隐含着不同的时间层次，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在一个语言系统中，一个语素具有几个不同的文白交替形式，粗略地说，它就至少隐含着几个不同的时间发展层次。山西闻喜方言的文白异读比较复杂，而且青少年与中老年还有不同。请比较：

年龄层＼语音＼例字	床		水		社		车		苏		陪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中老年	꜁pfʻʌŋ	꜁pfʻə	꜀fi	꜀fu	꜁siɛ/꜁sa	꜁sa	꜀tsʻiɛ	꜀tsʻɛ	꜀səu		꜁pʻi	
青少年	꜁tsʻuʌŋ	꜁pfʻə	꜂suei	꜂fi/꜂fu	sə꜄	—	꜀tsʻə	꜀tsʻiɛ	꜀su	꜀səu	꜁pʻi	꜁pʻi

比较两代人之间的文白异读的差异，就不难发现中老年的文读在青少年中已成为白读，而与汉语普通话接近的新的文读形式已活跃在青少年的话语中。这种参差的叠置状态是运用内部拟测法探索语言发展的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根据这种参差的叠置状态，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时间层次：

1. 新文读层；
2. 旧文读层；
3. 土语层。

新文读层的时间层次比较明确，是解放后普通话影响的结果。中老年人认为这种新的文读形式有明显的外来色彩，因而在交际中取排斥的态度。不过"社会主义"的"社"字，即使在最"顽固"的老年人中也已念成新的文读形式꜁sə（韵改调未改），它虽然只在这个词中读꜁sə（其他如"人民公社""社会"中的"社"还都读꜀siɛ），但也说明

排斥的防线已被冲破。

旧文读层的有些语音形式对于青少年来说已成为白读，但相对于土语层来说它仍旧是文读。它反映哪一时期的语言，难以确指。旧文读的主要内容是：知照系合口字读 pf、pfʻ、f；麻$_{开三}$读-iɛ；蟹摄一等咍、泰韵读-æe、-uæe（白读为-i、-uei）；蟹合三和止合三各韵读-uei（白读音在唇齿音后为-u、其他声母后为-y）；宕（江）、曾、梗、通五摄均读-ʌŋ、-iʌŋ、-uʌŋ，与臻摄的-eĩ、-ieĩ、-ueĩ 不同，等等。从 1918 年出版的闻喜县志来看，麻$_{开三}$似还没有读-iɛ 的痕迹，因为它用-ia、-a 的麻二注音：

麻马祃韵		斜	邪	些	爷	野	夜	爹	赊	捨	借	惹
方音	读如韵	霞		虾	衙	讶	压	貂牙切	纱	纱上声	假	

今天老年人的白读仍维持这种语音状态，看来当时的麻$_{三}$还没有今天那样歧异的读音。宕（江）、曾、梗、通的文读是否同音，在方志中反映不清楚，它只是分列宕（江）、梗、曾各摄的韵类在当时的闻喜方言中叶什么音，如"庚青梗迥敬径韵""叶佳蟹泰韵"，指明"惊"读"街"；至于"惊"的文读与"江"等是否同音，没有说明。五摄的文读同韵而与臻摄异，我们在闻喜周围的权威方言（晋中、关中、河洛）中还找不到任何痕迹。这大概是它们在文读形式产生以后又在往后的发展中合流了。知照系字读 pf、pfʻ、f，方志中已有清楚的反映。它在"中、壮、追、吹……"字下注明"以下无字可注，唇音改唇齿音读即合"；在"音变第二表"的说明中也说到"……凡不注者皆无字可注，以雅音缺此类音也，但以唇音改唇齿音读之即得"。这种读音似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它何时开始变化，现在无从查考。从 pf、pfʻ在关中地区的实际发音特点来看，估计时间不会太

长。白涤洲对这些音的音值曾作了如下的描写："知照系字读时以舌尖抵齿龈，若不嫌累赘应写作 pfʻ"（1933 年 4 月 15 日给罗常培的信），又说，"周至知照系读 pfʻpfʻ 'ʻ时上齿紧抵下唇，舌尖位于上齿龈，发破裂音，盖 tʂ tʂʻ变 pf pfʻ之过渡音也。"（喻世长，1954，6）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由 tʂ tʂʻ变来的 pf pfʻ还没有丧失演变过程中的过渡痕迹，说明此类音变的时间距今不会太遥远。从这些迹象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闻喜方言的旧文读反映近古时期的语言状态。

闻喜方言的土语层，除了帮组声母开口三、四等读舌尖音（例如"饼"的文读为ᶜpiʌŋ，白读为ᶜtiʌŋ，"米"的文读为ᶜmi，白读为ᶜni（≠ᶜȵi"你"）或ᶜli 等）之外，其主要特点是：中古全浊声母的塞音和塞擦音，不论声调的平仄，一律送气；宕（江）与果摄合流；曾（-eĩ、-ieĩ，与臻摄的开口韵同）与梗（-iɛ、-uiɛ、yɛ）分立；通摄字读-ueĩ 等等。在其他方言中很难找到这种音变的特点，但它却与西夏文的注音所反映的宋西北方音一致（王洪君，1987），说明这一土语层反映千年以前的汉语西北方言的一些情况。

这样，我们根据闻喜方言音系内部的叠置状态分出三个时间层次，前后相距约千年。至于这三个层次之间，我们还可以通过别的办法再进一步把时间层次细密化。比方说，语素读音中声、韵、调之间的文白错杂的配合关系就是考察这种细密的层次划分的一种办法。请比较语素"名"在闻喜话中的三种读音：

1. ꜀liɛ（四乡为꜀niɛ） 声、韵均为白读形式；

2. ꜀miɛ 声母为文读形式而韵母为白读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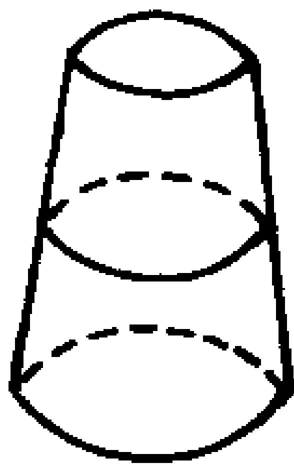
3. ꜀miʌŋ 声、韵均为文读形式。

这说明在白·白的声、韵组合和文·文的声韵组合之间还有一些过渡的状态。大致说来，这种错杂的配合方式花样越多，其所提供的语言发展的时间层次的信息就越细密。

以上都是从共时音系中挖掘出来的语言发展的历史层次。语言系统的同质说由于把语言看成为由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完全静态的结构，把一切因素都纳入语言的共时系统之中，因而在分析共时形式的时候不管其来源，绝对排斥系统之外的因素的干扰，而在共时结构中寻找历时痕迹的时候又只局限于系统中由连续音变所带来的结果。这样，音系中文白异读之类的差异就成为谁也管不着的领域。这清楚地暴露出语言系统同质说在语言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我们根据音系中叠置式的变异，把压成扁平状的共时音系拉开成由不同音系叠置着的历时音系。这犹如一个折叠式的旅行杯，语言系统的同质说只把它看成为一个压成扁平状的平面结构（如图一），看不到图中由虚线表示的历史沉积；而我们把折叠成的平面结构拉开来，如果暂时不管各平面结构之间的细微的层次划分，那么音系的结构就成为如图二所示的状态。



图一



图二

图二上面两个不同的平面犹如不同层次的白读音所代表的音系。语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越丰富，语素的异读形式越歧异，我们能从共时结构中抽取出来的历史层面就越多。各个叠置着的音系虽然代表不同的时间层次，代表不同的方音系统，但是由那些没有文白对立的音类联系着，使它们分中有合，异中有同，共居于一个

音系之中。这就是说，异读的语音是方言音系之间由于语言的发展而形成的相异的部分，而没有异读的音类则属于方言音系从始原方言中继承下来的部分。相异的部分通过借用和吸收，形成文白异读，使其中的一个音系向另一音系靠拢和接近。接近的途径就是文读形式与白读形式之间的竞争，各自争取在语素读音中的发音权。竞争的总趋势是文读形式节节胜利，在语素的读音中逐步扩大文读形式的范围，而白读形式则节节"败退"，最后只能凭借一些特殊词语（如地名等）的读音与文读形式相抗争。没有特殊的原因，一般不会违背这种竞争的趋势。竞争的一方一旦在竞争中彻底失败，退出交际的领域，音系中就失去了叠置的痕迹，完成了叠置式音变的替换过程。这样，内部拟测法在这里也就失去了其用武的客观根据。所以，语言中残存着的文白异读现象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从中窥知语言发展中不同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内部拟测法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同一音系异源音类的叠置"的性质与上面分析的"不同音系同源音类的叠置"不同，因而其在内部拟测中的价值也不一样。先请比较山西祁县方言的宕摄字的白读及它与之叠置的假、效摄有关韵类之间的关系：

例字	桑白	沙	缰白	家	光白	高白
条件	唐开 阳开知、章组	麻开二 非 见 系	阳开 非 知 照系	麻开二 见系	唐合，阳合 阳开，庄组 唐开，帮组	豪，见系 宵，知照系
语音	꜀sa		꜀tɕia		꜀kŏu	

宕摄字的文读形式祁县方言为-ã、-iã、-uã，效摄的文读形式为

-ao、-iao，表中略。这里为了简化分析的手续，引入了一些书面材料。比较白读形式与有关韵类的叠置关系，我们可以用语言内部的事实来分析语音单位的合流，并从中揭示语音发展的线索和层次。这是以语言系统同质说为基础的内部拟测法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表中的例子呈三种叠置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中窥知三种类型合流的状态。

首先，以"桑白"为代表的宕摄开口一等唐韵(包括开口三等阳韵的知、章组，各赅上、去声，下同)的白读音与假摄开口二等的麻韵叠置，同读-a，说明宕摄字(＊-aŋ、＊-iaŋ、＊-uaŋ、＊iuaŋ)在丢掉鼻韵尾念阴声韵的时候，果摄字的元音＊-a已经高化，因而没有象闻喜方言那样形成宕、果合流，而是与麻二的＊-a叠置。

其次，以"缰白"为代表的阳韵字在丢掉鼻韵尾后读-ia，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与麻二的见系字-ia合流(缰白＝家)，既符合音系结构的系统性原则，也于音理无碍。但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麻二见系字的-ia是文读音，与白读的-a对立。请比较：

例字	文	白
下	ɕia⁼	xa⁼
夏	ɕia⁼	xa⁼
哑	꜀ia	꜂ŋa
暇～腰		꜀xa

这个文读形式显系后起的形式，晚于阳韵字的白读形式-ia。麻二见系字的白读形式-a应与非见系字的"沙"类字的-a同时间层次。麻三原来的语音形式为＊-ia，后高化为-iɪ，(如"姐"现在读꜂tɕiɪ，

"写"读ˇɕiɪ），阳韵字的白读音-ia 为什么没有与它叠置并一起高化？前面说过，白读音的语音形式的变化决定于它与之叠置的那个异源音类的语音变化（例如闻喜方言宕摄字的白读音与果摄字叠置，它就跟着果摄字元音的高化而一起高化，现读-ə），现在的阳韵白读形式为-ia，而不是-iɪ，说明阳韵字在读-ia 之前麻三的元音 *-ia 已经高化；这就是说，麻三的 *-ia 与阳韵字读-ia 不是同一时间层次里的现象。

第三，以"光白"类字为代表的宕摄合口字的白读形式为-ʊᵘ，而不是象唐开一白读-a、阳开三白读-ia 对称地、平行地读-ua，与麻二合口字（"瓜"之类）合流。这种于系统不一致的差异可以提示一些新的音变线索。首先，合口字丢掉鼻韵尾的时间和方式与开口的唐、阳韵字不一样。如果是读*-ɑŋ、*-uɑŋ 时代同时以连续式音变的弱化方式丢掉鼻韵尾，那"光白"类字的韵母应该是-ua，与开、齐的-a、-ia 配套，但是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这只能推断"光白"类字鼻韵尾的消失在时间和方式上不同于唐、阳韵字。其次，"光白"类字丢失鼻韵尾的时间看来比开口的唐、阳韵字早，因为如果是相反的情况，即*-ɑŋ、*-iaŋ 先丢失鼻韵尾，其结果必然会波及"光白"类字的韵尾。从这种迹象看，合口字的鼻韵尾似先消失，这样开、合口的音变才能分道扬镳。再次，"光白"类合口字的鼻韵尾为什么会先于开口的唐、阳韵字而发生变化？这可以结合祁县方言音系的特点，从结果追原因，从它和它与之叠置的"高白"类效摄字的关系中去探索、重建它的演变轨迹。读-ʊᵘ 的"光白"类字包括宕摄合口字、开口阳韵的庄组字（如闯白霜白……"）和唐韵的帮组字（如"帮白忙白"等）。阳韵的庄组在北方方言中一般都有-u-介音，在音系中早已由开口转为合口；帮组唇音字本来"可开可合，不分开合"（李荣，1952，130），在祁县音系中它随合口字演变。这就是说，"光白'

所代表的这三组音都是合口字，有一个-u-介音。在现代的祁县方言中，-ŋ 前的合口介音-u-的双唇作用有移到韵尾位置上去的趋向，使以-ŋ 为韵尾的通、臻等摄的合口字产生新的韵尾-m(-u-的双唇作用移至韵尾并与原韵母中的鼻音成分相结合)；由于-u-的转移，合口转为开口，如"东"读[.tʊm]，撮口转为齐齿，如"军"读[.tɕiʊm]。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可以借此推知宕摄合口字也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变化：* -uɑŋ 中的-u-的双唇作用移至韵尾，它本身在音系中的地位由合口转为开口。祁县的东邻榆社(南河底)[14]的宕摄-ŋ 韵尾今天都转化为-ʊ，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据 1964 年的调查。发音人王铁钢，男，18，学生，宕摄字的读音分别为-ɔʊ、-iɔʊ、-uɔʊ)。这样，* -uɑŋ 转化为-ɑu，与效摄的豪韵字(包括宵韵的知照系字)叠置合流。它们在以后元音高化的演变中一起变成今天的-ʊᵊ。至于豪韵字今天的文读形式-ao，那是后来从别的方言输入的，与中古时期的 * -ɑu 不是一个时间层次里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从异源音类的叠置中看到语言发展的一些轨迹。语言系统的同质说由于把语言看成为一种纯粹静态的结构，因而无法从-a、-ia、-ua 的共时结构中探索它的历史沉积，理出不同的时间层次。

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叠置各自为内部拟测法开拓了新的领域：一是把多层叠置着的扁平状的共时音系历时化，理出发展的时间层次，二是可以从叠置看语音单位的合流以及它给音系带来的影响。这些都是以语言系统同质说为基础的内部拟测法难以做到的。

三

某一音类在语素读音中的逐一变化和更替，我们称之为离散

式变异。这种变异及其所体现的音变的特点是变化的速度在语素读音中的反映参差不一，显得零乱而没有规律，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式音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词汇扩散理论曾对这种现象有过很好的研究（王士元，1969，1983）。但是，如何运用这种类型的变异去解释历史上的音变，补充内部拟测法，似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这里可以用宁波方言的声调来说明。

现代宁波方言的声调相当复杂，单字的声调多的有七个，少的只有四个；除了说四个声调的宁波人单字有定调（原清平、清上、清去念阴平，原浊平、浊上、浊去念阳平，外加阴入和阳入，共四个）以外，操五个（或六个、七个）声调的宁波人单字调的归类相当杂乱。请比较下一页表中的差异现象。

从这里可以看出宁波方言声调系统的内部差异。象方言或亲属语言间的差异被历史比较法用来考察语言发展的过程那样，这种系统内部的差异也可以用来说明音变的过程，充实内部拟测法的内容。首先，比较不同发音人之间的声调差异，我们可以作出推断：宁波方言的声调正处于从七个到四个的简化过程中。赵元任写《现代吴语的研究》的时期宁波话也是七个声调，可以作为这一推断的一个旁证。其次，简化的途径不取诸如i、y前的k、kʻ、x变为tɕ、tɕʻ、ɕ之类整齐划一的连续式音变方式，而是取扩散的方式，除清浊、舒促的界线不混外，都是采用逐个归并的方式，即原清去、清上字一个一个地并入阴平类，原浊上字也是一个一个地并人阳平类。而且，总的趋势是，非常用字先变，常用字后变，每个发音人所保留的原调的残存字大都为常用字，即使是只有四个声调的宁波人，有些经常使用的字，如“走”“纸”等，也可以间或念435的阴上调值。由于扩散的速度在不同的发音人中不一样，因而在音系中呈现出参差。即使是同一个发音人，他在不同时候的发音状态也有

调类＼调值＼发音点	城中心①	西门②	江东③	南门④	城郊⑤	例字
阴平	42(44,435)	42(44)	42(44)	42	42	诗高专
阳平	24	24(313)	24(313)	24	24	时题陈
阴上		435	435	435	435	纸走短
阳上				313	313	在赵美厚
阴去				(44)	44	盖正醉
阴入	5	5	5	5	5	识滴急
阳入	23	23	23	23	23	石笛月
调类总数	4	5	5	6(7?)	7	

① 发音人郑芳怀，男，48，教员；何汉英，女，47，工程师。有一小部分舒调阴声字他们偶尔也念44调值；有极少数原阴上字也间或念435调值，但没有规律。发音人已不计较这种调值差别，如认为可念435调值的"纸"和念42的"支"是同音字。

② 发音人王纲平，男，27岁，住西门。原阴上字有八十多个可念435调值。原浊平、浊上、浊去已合为一类，但内部有两种调值，约有六十余个字的调值为313，分布上没有什么条件。

③ 发音人袁逸，男，28岁、学生，住江东．约有一百一十多个原阴上字可念435调值；原阳调舒声字已合为一类，但有些字有两种调值，如"胃、伟、魏"念24或313均可。

④ 发音人沈亚萍，女，23岁，学生，住南门。阴去字多与阴平字混，但有一部分仍保留44调值。相当完整地保留阴上的调类，在方言调查字表中约有83%的清上字仍念上声；只有六十多个原清上字归入阴平；约占17%．阳上是一种残留，在念313调值的34个字中有32个是原阳上字，占字表阳上字总数的11%左右。这些字虽然是一种残存现象，但发音稳定，与24的调值对立，所以单立为一个调类。

⑤ 发音人荆逸民，男，23岁，学生，鄞东五乡碶，离宁波市约20里。阴平、阴上、阴去字的调值经常互混，但还可以分出三个调类。原浊去字基本上已与阳平字合；念313调值的字包括大部分的原阳上字和部分阳去字。

差别。以江东点的材料为例，“死”字的第一次发音是阴平(42)，第二次读阴上(435)；“蒋奖”两字开始读阴平，只有“桨”字读上声，但后来又肯定这三个字同音，调值都为435。所以，声调表附注中的统计数字只据其中的某一次发音，代表一个大致的趋向。这些看来杂乱而没有规律的现象正是离散式音变的一些典型特点。第三，简化的步骤，去声似先并入平声(阴去归阴平，阳去归阳平)，而后是上声字再逐一归入平声(阴上归阴平，阳上归阳平)。第四，根据声调表所提供的线索，宁波方言调类简化的始发点似没有阳去，与其他各调各分阴阳的结构格局不对称，说明它是结构上的一个空格，我们可以参照其他的材料填补这个空格，重建阳去调。这样，即可从系统内部的差异中找出宁波方言的声调从八个简化到四个的具体过程和先后的时间层次。这是一种重要的变异形式和音变类型。语言系统同质说由于以个人方言为基础考察语言的结构，自然就看不到这种杂乱的变异，以此为基础的内部拟测法自然也就不可能去从中探索语言的发展。

每一种音变的类型都有自己的特点。连续式音变的特点，如前所述，是所谓“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离散式音变的特点与此不同：第一是两头整齐中间乱，即变化前的阶段和变化完成后的阶段，其语言状态是整齐的，有规律的，例如宁波话的声调在变化前是八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在变化完成之后是四个，但是在音变进行过程中却是杂乱的，好象没有规律，有点象词汇扩散理论所说的“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样子。第二是这种音变所经历的时间很长，象宁波话的声调，差不多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还没有完成它的音变过程；今后还要多长时间，现在还无法预计。所以，根据音系内部的离散式差异而进行内部拟测、探索音变的过程、趋向和规律的时候要充分考虑音变的这种特

点。

音系中的离散式变异及其所体现的离散式音变是系统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性质，不仅今天的语言系统有这类现象，历史上也应该有。因此，我们在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的时候不要只局限于连续式音变一种类型，而需要根据音变的不同特点进行一些具体的探索；特别是对那些先杂乱后整齐的音变，就不能套用“语音规律无例外”或任何规律都有例外的框框去解释。比方说，先秦时期的汉语有没有声调？有几个声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从陈第、顾炎武以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别之，有人根据《诗》韵的一些异调相押的现象说上古汉语没有声调；②有人根据同调相押的情况说那时的汉语有声调，只是有不少例外而已。③这两种意见本身是对立的，但它们观察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却是一致的，都是根据连续式音变的规律去观察那个时期的声调，因而难以驾驭那些杂乱的现象。用“例外”来解释《诗》韵异调相押的现象，有很多问题难以说清楚。第一，“例外”的现象为什么那么多？根据丁邦新(1981，277—278)转引张日升的统计，《诗》韵异调相押的情况是：

	上	去	入
平	361	293	10
上		166	39
去			161

此外还有平上去三调相押或平上去入四调相押的情况。那么多异调相押，都笼统地归之于“例外”，不免牵强。周祖谟(1984，82)根据新近出土的汉代竹书、帛书的通假字指出“在《周易》帛书里甚至平上去之分也不严格”，“在金文里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就更难

用例外来解释了。第二,如果是"例外",那必有产生例外的条件和原因,即例外也有它的规律,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人们对这种"例外"的原因作出理论上的解释,看来今后也难以作出这种解释。第三,如果是"例外",那么这些例外的字调后来又为什么会分门别类地归入有关的声调,形成整齐、划一的平上去入的声调系统?看来先秦时期的不很整齐的声调很难用连续式音变的规律来解释。它好象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离散式音变,提示汉语声调从无到有、从逐步形成到最后定型是通过扩散的方式进行的;《周易》、《诗》韵的时期由于还处于演变的过程中,因而显得杂乱而不那么有规律。可能在沈约等发现平上去入的声调系统以前不久的时期,汉语的声调系统才最后定型,完成了从杂乱到整齐的离散式音变的过程。周祖谟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可能比较接近先秦时期汉语声调发展的实际状况。他认为"这应当跟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使用文字在记录语词时声音有没有变易转移有关系""可以分别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认识",周、秦时期的三个或四个声调"是经过长时期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周秦时代不同韵部的调类多寡不同,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去声成为一个调类,发展比较晚。去声所以由平上声或入声发展出来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字义有引伸而音有改变,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声母有变易或韵尾有变化甚至失落而产生另一种声调"。这种考察比较客观,摆脱了"语音规律无例外"、例外有例外规律的信条的束缚。它与我们从共时音系的离散式变异中所得到的启示是一致的。音系中的离散式变异及其所体现的音变规律的精神也应该象连续式音变的精神那样,好好地用之于语言史的研究。

离散式音变的过程由于其经历的时间长,中间可能发生变故。如果在语音演变的过程中有一种新的音变力量拦腰斩断离散式音

变的过程，那么就会发生中断的变化，即已经起了变化的音和还没有来得及发生变化的音从此分家，各不相涉，因而在音系中留下了坎坷参差的差异，而不象前述的声调那样最后有一个整齐的结构格局。这种现象给语言内部拟测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但仍有可能从中探索语言发展的痕迹。先请比较中古覃、谈、寒三韵端系字在现代宁波方言中的语音差异：

韵类 例字 音值	覃	谈	寒
-ε	耽 潭谭 婪(多数人) 参惨	担胆 坍毯 谈痰淡	丹单旦 滩摊坦炭叹 檀坛弹诞但蛋 难 兰拦栏懒烂 餐灿 ……
-ɛɪ	贪探 南男 婪(少数人) 簪 蚕		

谈、寒合流，没有问题，而覃韵字却显出参差的情况，有的与谈、寒韵合流，有的自成一类，内部不一致。如果把语言看成为一个静态的、同质的结构，这些有差异的音各自归入有关的韵类(-ε都为谈、寒韵字，-ɛɪ归入“杯梅……”等灰韵字)，掩盖了系统内部应有的参差。由于汉语有韵书等书面材料，有其他方言可资比较，就呈现出同源字的音类差异。这类现象的出现使语言学家感到惶惑。张琨(1983,8)在《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消失》一文中在分析覃韵

字的内部参差时有一个脚注："黄岩、温岭方言中切韵覃韵舌头声母的字读 * an。宁波方言中读 E，究竟代表什么，不大明白。"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式音变规律，这类现象确实很难解释。看来覃韵字在宁波方言中的读音参差不是连续式音变造成的，而是离散式音变中断的结果。覃、谈、寒三韵高本汉、张琨、李荣分别拟测为：

韵类 拟音 作者	覃	谈	寒
高本汉	ậm	âm	ân
张　琨	əm	âm	ân
李　荣	ɐ̂m	âm	ân

从这三韵在吴方言中的反映来看，张、李的拟音比较接近于语音的实际。由于-m 韵尾在语言发展中并入-n，因而谈与寒合流，而覃韵由于其元音与谈、寒韵有较大的差异，在古宁波方言中仍保持它的独立性。根据 1876 年出版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提供的线索，谈、寒韵字读-æn，覃韵字有些读-æn（"耽谭"等），有些字读-en（如"探南"等），看来-en 是-m 并入-n 之后覃韵字的读音。音系中的谈、寒韵是字多势众，而-en 韵却相反，字数甚微，在音变中经不起别的音类的"推"与"拉"，因而以扩散的方式一个一个地并入音值比较接近、历史上有联系（反映在其他方言中即为同韵字）的-æn 韵。何时开始这种变化，无从查考，但在《汇解》的时代（1860—1876）这种变化似正处于进行过程中，一部分字已经读-æn（"耽谭"等），一部分字仍读-en（"探南"等）。正当覃韵字进行这种离散式音变的时

候，可能是由于鼻韵尾-n的消失迫使这种音变中断。根据《汇解》和《宁波方言的音节》两书的说明，那时的鼻韵尾-n已经很微弱，“几乎听不到”(hardly audible)，而其前面的元音则已发生鼻化(《音节·前言》第7页)。随着语言的发展，-n和元音的鼻化成分都消失。这样，-æn变成-æ；而-en变成-e，和“杯胚培梅堆推……悲丕眉”类字的-e韵合流。这就改变了音系内部的结构格局。读-æ(<-æn)的覃韵字由于已与谈、寒韵字合流，因而它们一起发生变化；从-en韵变来的-e在共时音系中则与覃韵字的读音脱离关系，面跟随它的“新朋友”-e韵一起演变，不再受原来的离散式音变规律的支配，因而在音系中留下了参差和坎坷。-æn>-æ的演变引起了宁波方言元音系统的高化：-æn>-æ，-æ>-e，-e>-i(声母k之后和k'之后的“看”)，-e>-ɛɪ(详细情况参看第46—48页的分析)。这就是某些覃韵字读-ɛɪ的由来。这种离散式音变的中断为解释音变中的例外、寻找语言发展的轨迹提供了新的线索。

考察离散式变异及其所体现的音变，可以使音变的时间层次细密化，并使语言内部拟测的研究深入到以语言系统同质说为基础的内部拟测法难以探索的领域。

四

前面的分析说明，音系中充斥着各种类型的变异，每种变异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各有自己的价值，都可以为内部拟测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第98页图二所示的平面叠置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叠置图，实际上，每一个平面都被那些叠置式变异、离散式变异、连续式变异弄得犬牙交错，坎坷不平。这些由变异造成的坎坷是语言史研究的向导，因为语言发展中的时间是无形的，一发即逝，难以捕捉，只有语言中的差异才是有形的，是听得见、看得清(把实际的音值

记下来)的,是时间留在语言中的痕迹,可以成为观察已经消失的时间的窗口。所以,从差异中探索语言的发展是语言史研究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前面的讨论就是以此为基础有层次地考察音变的痕迹和先后的时间层次,重建发展的序列,对以语言系统同质说为基础的内部拟测法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补正。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克服了以语言系统同质说为基础的内部拟测法的缺点,如果语音的发展在共时音系中没有留下任何差异的痕迹,就是说,既没有文白对立的残存形式,没有离散式音变留下的参差,也没有空格、不规则的形态交替之类的结构差异,我们仍旧没有办法探索语音的演变。

其次,汉语是有历史记载的语言,有丰富的书面文献,我们前面的讨论不少地方都得力于韵、摄之类的书面材料的帮助。设使没有方言的比较,没有书面材料的帮助,完全根据音系中的共时差异,那进行语言内部拟测的研究就要困难得多。比方说,假定我们现在不知道山西闻喜方言哪些语素是中古的果摄字,哪些是宕摄字,只从共时差异着眼,那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这样三类语素:

科 ꜀k'ə　　糠 ꜀k'ə～꜀k'ʌŋ　　康 ꜀k'ʌŋ

網 ꜁və　　忘 ꜁və～꜁vʌŋ　　望 ꜁vʌŋ

如不管声调和声母,光从韵母看,它们是一类?两类?还是三类?一时弄不清楚。不过这只能造成和增加语言内部拟测研究的困难,而不能宣告内部拟测法的无效,因为我们还可以通过别的办法(例如民歌的押韵之类)把它们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语音的演变。

差异,这是语言史研究的客观基础;比较,这是语言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不管是文献资料的考订、历史比较法、词汇扩散理论,还是内部拟测法,都离不开"比较"两个字。"比较"可以沟通各种方法

之间的联系。因此，除了那些没有书面文献资料、没有亲属语言可资比较的语言的历史研究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历史比较法、书面材料等进行语言内部拟测的研究。方言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共时音系内部的差异(例如前面关于覃韵字的分析)，书面材料可以提供确切的年代和语源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对音系中的差异进行内部拟测的研究，可以找出音变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音变的原因，看清音变的过程和时间层次，丰富音变规律的内容。这还是一块有待于我们去开垦的处女地。

(原载于《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1989年)

【附注】

①例如，德·索绪尔关于原始印欧语喉音的拟测，高本汉关于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都借助于这种空格之类的结构变异而进行原始音系的重建，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参看徐通锵、叶蜚声：《内部拟测方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见《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

②例如陈第："四声之辨，古人未有……旧说必以平叶平，仄叶仄也，无亦以今泥古乎"(《毛诗古音考》)。江有诰："古无四声，确不可易"(《古韵凡例》，他后来在《唐韵四声正》里改变了这种看法)。

③例如董同龢："按理说，韵语对声调的要求是不必如对韵母那样严的"(《汉语音韵学》第313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又如谢纪锋："同调相押是《诗》韵的基本规律之一，但并不绝对排除例外，少数例外也不影响规律的存在。"(见《罗常培纪念论文集》第342页，商务1984年)。

山西方言古浊塞音、浊塞擦音今音的三种类型和语言史的研究

一

古全浊塞音、塞擦音指并、定、群、从、澄、床诸纽。它们在现代山西方言中的语音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

（一）依声调的平仄而分化为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这与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的语音发展相同，其代表点如兴县、大同、忻州、太原、寿阳、长治、晋城等。为行文方便，下面称它为平仄分音区。

（二）有文白异读，文读系统与平仄分音区一致，而白读系统，不管声调平仄，一律都送气。这主要在晋南，如洪洞、临汾、新绛、闻喜、万荣等。下面称它为送气音区。

（三）有文白异读，文读系统与平仄分音区一致，而白读系统，不管声调平仄，一律不送气。这主要在汾河两岸的晋中地区（包括吕梁山东侧的某些方言点，下同），代表点如太谷、祁县、平遥、文水、孝义、介休等。下面把它称为不送气音区。全浊塞音、塞擦音的平声字读不送气音，这在汉语方言中不多见，北方方言除胶东的文登、荣城（钱曾怡，1981）外，核心地区恐怕就在汾河两岸的晋中了。下面以文水方言（胡双宝，1984，另据李守业补充）为例，把并、定、

群诸组的平声字白读音列举如下(顺序依《方言调查字表》。例字下划横道的无文白异读,依其声韵地位列入白读。后面各字表与此同例):

并:婆꜀pəi　爬琶꜀pa　脯胸~꜀pu　培陪赔꜀pe　刨꜀pau
　盘꜀pen　盆꜀pəŋ　棚꜀pia　旁꜀pʊ

定:驼驮꜀təi 臺꜀te　蹄啼꜀tɿ　齐脐꜀tsɿ　桃萄꜀tau
　调~和꜀ti　头꜀tou　潭弹~琴꜀taŋ　甜田填꜀tien
　团꜀tuen　屯饨꜀tuəŋ　腾疼꜀təŋ　同铜꜀tuəŋ

群:箝꜀tɕi　渠瞿꜀tsɥ　骑꜀tsɿ　桥荞꜀tɕi
　拳꜀tɕyen　勤꜀tɕiəŋ　群裙꜀tɕyəŋ
　强꜀tɕiu　鲸꜀tɕiəŋ　穷꜀tɕyəŋ

从:才裁꜀tse　瓷慈磁꜀tsɿ　槌锤꜀tsue　曹槽嘈꜀tsau
　蚕꜀tsaŋ　钱前꜀tɕien　泉꜀tɕyen,꜀tsuen　藏~起来꜀tsʊ
　墙꜀tɕiʊ　曾层꜀tsəŋ　晴꜀tsɿ

澄:储~蓄厨꜀tsu　迟꜀tsɿ　稠꜀tsou　沉꜀tsəŋ
　缠꜀tsen　椽꜀tsuen　陈尘꜀tsəŋ　长肠肠꜀tsʊ
　惩꜀tsəŋ　虫重~复꜀tsuəŋ

一共83个字。这里没有床(崇、船)、禅二组。这二组的字如有文白异读,其白读音都为擦音。例如(这里只管声母的文白异读):

床:锄	꜀tsʻu	꜀su	谗馋	꜀tsʻaŋ	꜀saŋ
柴	꜀tsʻai	꜀sai	唇	꜀tsʻuəŋ	꜀suəŋ
愁	꜀tsʻou	꜀sou	床	꜀tsʻueŋ	꜀sʊ
禅:尝	꜀tsʻaŋ	꜀sʊ	城	꜀tsʻəŋ	꜀sɿ

这反映山西方言的早期,床、禅二组都读擦音。其他各个方言点的例字虽有参差,字数多寡也不一致,但大体情况一样,文水方言可以代表这一地区的这种方言面貌。

山西方言古全浊塞音、塞擦音这三种类型的语音表现是从某一种状态“变”出来的呢？还是本来就有并存的三种方言？我们认为“并存”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要是在三种类型的语音表现中确定某一种类型为“正宗”，其他两种类型都是从它“变”出来的，那在音理的解释上就会碰到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困难。假定说，如果认为不送气音是“正宗”，那晋南地区的送气特征是怎么“变”出来的？平仄分音区为什么会分化为送气和不送气两种音值？平声字为什么会变成送气音？为什么在同一方言中“变化”前后的两种形式（即“文”与“白”）能够同时并存？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语音学的解释。相反，如果承认山西方言的早期即浊音还没有清化的时期有三种并存的方言差异，这样的假设倒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在语言结构上也可以得到符合音理的解释。汉语的清塞音、清塞擦音有不送气和送气两个系列（帮、端、见、精、知、照/滂、透、溪、清、彻、穿），而浊塞音、浊塞擦音只有一个系列，一浊配二清，这就为浊音的发音留下了广阔的活动余地。送气，或不送气，都不违背音系中的“清：浊”相互制衡的结构规则；不同方言区的不同音值（全送气，或全不送气，或以声调的平仄而分为送气和不送气）都只是“清：浊”这一结构规则的不同表现形式。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方言状态，某一部位的浊塞音、浊塞擦音的音位只有一个，区别只在于有的地区一个音位只有一种语音表现形式，而平仄分音区则有两个不同的条件变体。

汉语现代有方言差异，古代自然也会有方言差异，山西方言古浊塞音、浊塞擦音的三种语音表现形式正是汉语早期方言差异的一种残存痕迹。不过这种残存痕迹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它给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前提是谱系树理论，假设语言是不断分化的，分化以前的始原语（proto-lan-

guage)内部一致，没有方言分歧；在分化的时候不同的地区又以“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形式发展，因而在方言的差异中可以找出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能循此去探索语言的发展。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在山西方言留存下来的痕迹似与这种理论假设矛盾：始原时期的语言本身就有方言差异，而不是内部一致的系统；现在三种不同的语音形式是始原时期方言的遗存，而不是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形式从某一种状态“变”出来的。这就需要对语言的发展进行一些新的探索，以补正历史比较研究的某些不足。

二

三种并存的方言差异既然不是从某一种状态“变”出来的，那么它们在语言发展中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是竞争，而竞争的主要形式就是文白异读：权威方言凭借使用它的言语社团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而不断地向周围地区扩散，从而使它的语音结构要素(声、韵、调)渗入其他的方言区，使这些方言产生文白异读，形成两种方言系统的叠置(徐通锵等，1986a)。一般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而文读则是在本方言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接受某一权威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形式，它们体现雅俗两种不同的风格色彩。文、白两种系统共存于一个系统之中，相互就展开了竞争。竞争的总趋势，一般都是文读形式逐步扩大它的运用范围，把白读形式排挤掉，直至使它销声匿迹；白读形式在节节败退中有时只能凭借它在某些特定土词中的读音而坚守它的最后阵地。竞争，这是语言演变的一种重要方式。如果说，语言从古至今的发展体现语言在时间上的纵向变化，那么文白竞争就是语言在空间上的波浪式横向扩散的重要表现形式。纵向发展的特点是“变”，即 A“变”为 B，或 B 从 A“变”来，变化前后的两种形式有继承关系，而横向扩

散的特点不是“变”，而是竞争，即 A 与 B 同时存在，相互竞争，最后其中一个取得胜利，完成取而代之的竞争过程。王士元(1969)的词汇扩散理论也讲竞争，不过他说的是一个语言系统内部的语素读音的渐变性扩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离散式音变，仍旧属于“变”的范畴，因而不能把文白异读的竞争和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混为一谈。我们可以通过文白异读的竞争机制来考察留存在山西方言中的始原汉语的三种并存方言之间的关系。

在古浊塞音、浊塞擦音今音的三种类型中，平仄分音区的方言显然占有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既是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也是历史地位的继承。语言的各种迹象显示，浊塞音、浊塞擦音以声调的平仄为条件而分化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方言自宋元以来一直是一种权威方言，而且分布区域也很广。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反映中原地区北方方言的特点，它已清楚地显示全浊塞音、塞擦音有两种不同的音值：浊平声配送气清音，浊仄声配不送气清音，送气不送气是有条件的，说明它们是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李荣，1952，165—174)。随着语言的发展，浊音清化后，这两种不同的音值就从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转化为不同的音位。汉语的北方方言大体上都是这一系方言的发展。《中原音韵》已经完成了这种类型的发展过程。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的首都，它的方言自然会对山西等地的方言产生积极的影响。山西方言的平仄分音区显然就是这一系方言的继承，再加上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的支持，它的影响自然会不断扩大，使不送气音区和送气音区都产生文白异读。闻喜方言(徐通锵、王洪君，1986b)的古浊塞音和浊塞擦音，不管声调平仄，原来都读送气音，但在平仄分音的方言的影响下已经产生文白异读，古浊声母的仄声字现在已出现大量的不送气文读音，而且这种文读音的运用范围还在不

断地扩大。比较青、老两代的语音差异，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竞争的演变趋向(表中的“老”指陈可喜，男，59，干部；“青”指任海红，女，19，农民。任的文化水平低一些，有少数字不认识，因而总字数偏少)：

	文	文/白	白
老	96	34	97
青	129	72	20

很明显，青年人的文读形式在增多，而白读形式在减少。有些字在同一词语中可以文白两读，例如：

打败꜁pæe/꜁pʻæe　　鸡蛋꜁tæ/꜁tʻæ

舅舅꜁tɕiau/꜁tɕʻiəu　　白头发꜁pæe/꜁pʻiɛ

黄豆꜁təu/꜁tʻəu　　座位꜁tsuə/꜁tsʻuə

同一个字的文、白两种形式可以出现在相同的语境中，说明竞争的历史还不太长，不然白读形式就只会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土词中。例如闻喜“王”的꜁uʌŋ、꜁yɛ 两音，꜁yɛ 音只见于地名(王村)中。文白之间的竞争不会永世长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多数情况下文读形式会战胜白读而完成波浪式扩散的替代过程。闻喜方言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一过程，但波浪式扩散的演变趋势是明显的。这可以代表晋南、晋中两个方言区的今后演变趋向。

文读在竞争中的扩散渐进性和白读在退却中尚能凭借它在一些特殊词语中的读音而坚持它的阵地，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从一些残存形式中去考察语言的波浪式扩散的演变轨迹。古浊塞音、浊塞擦音的送气音区和不送气音区的中心地带在晋南和晋中，地理上的这种分布自古而然，还是经过文读形式的“蚕食”而保存下来的最后阵地？这可以从各方言点中保存下来的一些异于语言演变规律的残存现象中去考察。晋南古浊塞音、浊塞擦音读送气音，这与

千年以前的汉语西北方音的特点一致(王洪君,1987)。这说明,汉语方言早期的送气音区的分布地区远远大于现在的范围。从现在的山西方言来看,吕梁山西侧的方山、柳林、离石、中阳一带某些残存的白读还显示它与晋南方言有密切的联系。请看离石方言(刘勋宁,1980)异于一般北方方言发展规律的例字:

婢 ꜂p‘ʅ　　避 ꜂p‘ʅ　　稻 t‘ou꜄ ꜂tou　　造 ts‘ou꜄

噍~牛倒~~ tɕ‘iou꜄

沓 t‘aʔ꜁　　杂 ts‘aʔ꜁　　炸~用油~~ ts‘aʔ꜁

集 tɕ‘iəʔ꜁ tɕiəʔ꜁　　拔 p‘aʔ꜁

铡~~刀~ ts‘aʔ꜁　　截 tɕ‘iəʔ꜁　　叛 p‘ɛ꜄ p‘ou꜄

钹 p‘əʔ꜁　　掘 tɕ‘yəʔ꜁

勃埻饽 p‘əʔ꜁　　突 t‘uəʔ꜁　　簿 p‘əʔ꜁

昨柞 ts‘aʔ꜁　　着~睡~~ ts‘əʔ꜁

撞 ts‘uo꜄　　镯 ts‘uəʔ꜁　　特 t‘əʔ꜁

泽择宅 ts‘aʔ꜁　　笛 t‘iəʔ꜁ tiəʔ꜁

仆曝瀑 p‘əʔ꜁　　犊 t‘uəʔ꜁　　族 ts‘uəʔ꜁　　毒 t‘uəʔ꜁

轴 ts‘uəʔ꜁　　局 tɕ‘yəʔ꜁~~子~ tɕyəʔ꜁

如果参考柳林,还可以补充下列一些例字:

步 p‘u꜄　　捕 ꜂p‘u　　佩 p‘ɛᴇ꜄　　鼻 p‘iᴇʔ꜁

夺 t‘uəʔ꜁ tuəʔ꜁

弼 p‘iᴇʔ꜁　　侄 ts‘əʔ꜁　　术~白~~ ts‘uəʔ꜁　　倔 tɕ‘yᴇʔ꜁

铎 t‘aʔ꜁

凿 ts‘aʔ꜁　　直值 st‘əʔ꜁ tsəʔ꜁　　白 p‘iᴇʔ꜁

一共52个字,其中以入声字为主。这些现象显示,这一地区的方言原来与晋南方言大概是联成一片的,由于以声调平仄而分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大北方方言的影响,它的固有特点逐步消退,今天

只留下一些残存的痕迹。

汾河两岸的晋中方言地处山西的核心，受外方言的影响可能也小一些。可以说，它是山西方言的典型代表。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全读不送气音的分布区域是不是仅仅限于前面提到过的那几个方言点？好象不是，至少是太原也应该划入这一方言区。太原历来是山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军事重镇，历史上曾经过几次重大的变迁；它交通发达，居民五方杂处。这些都会使它的语言状态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汉语方音字汇》(1989)，发现古浊塞音、浊塞擦音的发音与北京话等北方话一致，而且连文白异读的痕迹也找不到，好象与晋中的不送气音区没有任何瓜葛。但是，如果求助于太原方言词汇(温端政，1981)某些字的读音，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联系的蛛丝马迹。现在把其中与晋中不送气音区的发音特点相同的例字摘录于下：

例字	古读	今音	例词
婆	并	꜀pɤ	老～　姊妹～夫　后婚～姨　大～针　老娘～　善～～　～～(外祖母，与“丈夫的母亲”·pʻɤ·pʻɤ有别)
钯	并	꜀pa	～儿
脯	并	꜀pu	～子头
盘	并	꜀pæ	～头闺女　底～～
填	定	꜀tiɛ	～房婆姨
头	定	꜀təu	木～　～前　外～　顶～　丢～不来　猴儿～　四合～院　半～砖　舌～　崩～　指～儿
脐	从	꜀tɕi	不～儿　肚不～
墙	从	꜀tɕiɛ̃	～儿
前	从	꜀tɕiɛ	～家家　跟～　跟跟～

钱　　从　　tɕiɛ　～工
场　　澄　　꜀tsa　～儿

这些读音只存在于这样的一些土词中，是白读在同文读的竞争中坚持下来的最后阵地。它体现语言的底层，虽然字数不多，但却能提供语言演变的一些重要信息，说明它的底层与晋中的不送气音区相同。其他地方由于材料的限制，现在还难以推断。比方说大同（马文忠等，1986，21，96），"瓷磁慈词辞"读꜀tsɿ，"曹夫楼儿"（地名）中的"曹"读꜀tsɐo，与晋中方言一样，相互间有没有联系，还有待于研究。

透过残存现象所提供的信息，我们有理由认为古浊塞音、浊塞擦音读送气音或不送气音的地理范围远远大于现在的地区。由于以声调平仄而分化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北方权威方言的波浪式扩散的影响，文读形式逐渐渗入"蚕食"送气音区和不送气音区，使其运用范围（地理范围、语用范围）日渐缩小。这说明，文白之间的竞争正在使一个方言的一些固有特点走向消失。

三

始原时期的各个方言通过相互竞争而留存在现实语言中的残迹对始原语的研究无疑有重要的价值，因为我们从残存的白读中就可以窥知始原语的状态，而不必老是在 A"变"B 之类的"变"字上做文章。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在现在汉语方言中的语音表现形式，客家方言和赣方言读送气音；湘方言和闽方言读不送气音，吴方言一般认为是送气音，但根据现代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它是不送气的（曹剑芬，1982），应该把它和湘、闽方言归为一类；粤方言与北方话系统一致，以声调的平仄而分化为送气和不送气两类。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史的研究中由于恪守着上一世纪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

比较法的理论和原则，把《切韵》看成为现代各个方言的始原语，因而就只能在A"变"B的"变"字上去解释方言之间的歧异和汉语的发展。他根据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在客家方言中读送气音的特点以及其他的某些理由把并、定、群诸纽拟测为送气音，这就给语言史的研究留下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吴、闽、湘三大方言的不送气特点是怎么"变"出来的？北方方言和粤方言的仄声字又何以会丢掉送气成分？这些都无法得到音理上的解释。A"变"B，这只是语言演变的一种方式，它不能包括相互竞争的方式。用"变"去解释相互竞争的横向演变，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非常重视山西方言在研究汉语语音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所用的材料竟有11个方言点（除145页所列的八个方言点之外再加天镇、运城、蒲州），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大同、太原、太谷、文水、临汾等都是高本汉本人亲自"审核过的方言"；文白竞争的演变方式，他也接触到了，例如，"平阳（今临汾）话，它在平声读送气清辅音；在仄声亦有一大部分送气清辅音，极象客家话；但是它也很有偏于官话的倾向，就是在仄声也读作弱清辅音。三水（今栒邑）话有些同平阳话相近的地方"（251）。但是，由于高本汉只考虑语言在时间上的纵向变化，而没有考虑语言在空间上的横向扩散；只有"变"的考虑，没有"竞争"的观念，因而把已经拿在手里的语言通过竞争而发生演变的重要线索弃置一边，在方法论上留下了一个漏洞。我们现在根据山西方言白读音所提供的线索承认始原汉语有方言差异，这就比较容易解释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客家和赣两大方言源自原浊塞音、浊塞擦音的送气型方言，闽、吴、湘三大方言源自原不送气型方言，而北方话和粤方言则源自原平仄分音型的方言。这可能比较接近语言发展的实际状况，说明汉语方言的形成不完全是谱系树式的分化，张琨（1985，

248)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断是正确的。

承认始原语中有方言差异,这对音值的拟测也有启示。古全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性质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曾有过争论。高本汉(1915—1926,251—254)、罗常培(1933,27—30)认为它是送气的浊音,陆志韦(1947,7—8)、李荣(1952,109—112)认为是不送气的浊音。这种争论现在还在进行中,施向东(1983,31—32)、尉迟治平(1982,20—21,1985)根据梵汉对音的材料认为并、定、群等浊声母不送气,支持陆、李的说法;刘广和(1984)根据不空的汉译梵咒的材料则得出了和高本汉、罗常培相同的结论。两种对立意见的立论根据大多是援引汉语和其他语言、其中特别是梵语的对音材料。对音在始原形式的拟测中有重要价值,但无疑有它严重的局限性(徐通锵、叶蜚声,1980,91)。梵语的浊音有不送气、送气两套,而汉语只有一套,从理论上说,用汉语的浊声母去对译其中的哪一套都是可能的,只要用其他的附加办法把另一套分离出去就可以了。这可能是浊塞音浊塞擦音在各种对音材料中呈现出互相矛盾状况的一个原因。现在,根据山西方言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古浊塞音、浊塞擦音本来就存在着方言差异,因而说它是送气的,或不送气的,都有道理,区别只在于所依据的方言有差异而已。我们似乎不必在送气说和不送气说之间争论,而且,如果坚持只有一种音值的说法,在解释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时也会遇到上面提到过的那些困难。

山西方言古浊塞音、浊塞擦音今读的三种类型给语言史的研究确实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它和其他方言的关系也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索。

(原载于《语文研究》1990年第1期)

文白异读和历史比较法*

一、语言演变的两种方式:变化和竞争

语言演变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变化"和"竞争"两种类型。"变化"的方式是A变为B,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连续式变异和离散式变异,体现语言在时间上的纵向自我演化。"竞争"是A与B同时并存,相互排挤,相互竞争,在交际中力图"吞并"对方,完成取而代之的过程;A与B之间没有继承关系,即B(或A)不是从A(或B)变来的,而是外系统渗入本系统的结果,从而在语言中形成了两种系统的叠置。它体现语言在空间上的横向波浪式扩散,是不同语言(或方言)系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产物。汉语方言中广泛存在的文白异读就是语言演变中"竞争"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

把文白异读定性于方言间的相互影响,这不是我们的新发明。李荣(1965,115)早就指出:"方言内部的文白异读,大概是方言互借的结果。概括地说,北京的文白异读,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话音往往是从外地借来的。其他方言区的文白异读,白话音是本地

---

* 本文曾在1989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语言学会第五届年会上宣读过,原已编入《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1990年秋,我收到拙著《历史语言学》的初校校样,因该书缺本文讨论的内容,征得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同意,将本文的主要内容编入《历史语言学》,成为该书的第16章。为避免重复,本文从《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中抽出。现将原稿发表于此。

的，文言音往往是外来的，并且比较接近北京音。"这里的叙述言简意赅，只是对北京话文白异读的说法有点笼统。就李荣所举的例子"搞"、"尴尬"来说，分析完全正确，而就"勒"、"白"、"薄"、"轴"之类原收-k 尾的入声韵字的文白异读来说，就不能说它们的白读音꜀lei、꜁bai、꜁bau、꜁zhou"是从外地借来的"。不过这不涉及对文白异读的性质的认识。张琨（1984，417）对文白异读也有很好的分析，认为"文白异读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文读是外来的，白读是本地的。文读比较晚，白读比文读早。文读和白读没有直接的历史关系，并非一个是从另一个演变出来的。文读白读代表两种汉语方言的传统。"这些论述对认识文白异读的性质、澄清人们思想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自罗常培在《厦门音系》中提出文白异读这一概念以来，"文白异读"就在语言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什么是文白异读？很多人似不甚了了，甚至一些有声望的专家也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探索，往往想当然地把一个语素的两个读音、一个归人"文"，另一个归入"白"，结果把与方言间的相互影响无关的现象也列入"文"或"白"的范围。这就模糊了文白异读的性质，使语言研究很难科学地利用这一批有价值的材料。李、张两位学者的论述为研究文白异读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对文白异读进行了一些理论性、结构性的探索，提出语言演变的一种新的方式：竞争，并据此研究不同系统的共存叠置关系，讨论它在语言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徐通锵（1989，见第88—112页的分析）重点讨论的是文白异读与内部拟测法的关系，提出了一些补正性的设想；而文白异读与历史比较法的关系，还需要在这里进行具体的讨论。

历史比较法是语言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它的基本前提是谱系树理论：假设语言是不断地分化的；分化以前的语言内部一

致，没有方言差异；在分化的时候每个方言或语言都按照"语音规律无例外"的方式发展，因而在语言的空间差异中能够呈现出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这是对语言"变化"这一演变方式的研究。这种研究在理论上隐含有一些严重的弱点：只考虑语言内部的一致性，不考虑语言内部的方言差异；只能考虑语言纵向的谱系树式的分化，而无法顾及语言间横向的相互影响；只能考虑语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而无法考虑语言之间可能出现的平行的独立发展。这些弱点，仅仅根据历史比较法的"语言的空间差异反映时间的发展序列"这种方法论原则是无法克服的，所以布龙菲尔德(1933,393)说，"比较法既不考虑母语内部存在分歧，也不考虑亲属语言间发生共同的变化，所以只能带领我们走很有限的一段路程"。如何改进历史比较法，弥补它的弱点，使它能带领我们走一段比较长的路程，这是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找到了文白异读，发现它的特点与历史比较法所根据的材料和原则正好相反，相互处于互补的状态：语言中叠置着不同的方言系统，说明语言内部有方言差异；它的演变方式不是"变化"，而是"竞争"，体现方言间横向的相互影响。互补，这就有可能用彼之长，益己之短，在一种理论框架中结合起来，补正对方的欠缺。文白异读是补正历史比较法的欠缺的一种理想的材料。

历史比较法是一种成熟的理论模式，要把文白异读纳入它的框架似乎格格不入，但不是没有可能，只是需要在理论上弄清楚一些原则问题：文白异读中零散的残存现象是不是含有系统的性质？语言的波浪式扩散或系统中的竞争是不是具有规律性？方言间横向的相互影响能不能进入纵向的发展序列？这些问题如能得到肯定的回答，文白异读不仅可以进入历史比较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把历史语言学中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型即谱系树理论和波浪理论的

基本精神结合起来去研究语言的发展。谱系树理论着眼于时间，着眼于语言的分化；波浪理论着眼于空间，着眼于语言间的相互影响。这两种理论本来就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罗宾斯，1979，221）。我们有可能以文白异读的研究为基础，通过上述问题的解决去探索两种理论模型的结合的可能性和实现结合的途径。

二、竞争的规律性和它与历史比较研究的关系

历史比较法的基础是语言发展的规律性。文白异读的材料看起来是零散的、参差的，而且数量不等，分布也不均匀，似与规律性大相径庭。这些零散的现象有没有系统的、规律的性质？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文白异读引入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前提。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面积不大，但文白异读现象比较丰富的山西方言来讨论这个问题。

山西方言在北方方言中有特殊的地位。它的内部有分歧，但以中部汾河两岸的晋中地区（包括吕梁地区的某些方言点）最有特点，可以说那里是山西方言的典型代表。为行文的方便，我们下面称它为晋中方言。《切韵》同时具有一、二等韵的蟹、效、咸、山各摄，一等和二等在北方方言中大多已经合流，基本的途径是用二等韵的语音形式去“合流”或“吞并”一等韵，因而韵母中的主要元音与麻二相同，一般都为-a，而晋中方言的一、二等韵还有分立的痕迹。这种痕迹是讨论文白异读有无规律性的一种重要材料。

山（咸）摄开口一、二等韵的语音表现在晋中方言分见系和非见系两组，非见系字无文白异读，而见系字有文白异读。请看表1（只列开口，以后各表都与此相同，不再说明）：

【表1】晋中方言山(咸)摄一、二等韵的语音表现

	非见系		见系		见系一等白读的残存例字
	一	二	一	二	
太原	-æ̃	-æ̃	-æ̃	-æ̃	
榆次	-ɛ	-ɛ	-ɛ文 -ie白	-ɛ	干肝竿泔杆擀(k-)看(kʻ-)俺(ŋ-)
太谷	-ã	-ã	ẽ	-ã	-ẽ 韵辖见系的全部一等字
祁县	-ã	-ã	-ã文 -əŋ白	-ã	感甘柑泔敢橄干肝乾竿杆秆擀赶幹(k-)龛坎砍看刊(kʻ-)庵揞暗安鞍按案(ŋ-)鼾罕汉寒韩旱汗焊翰(x-)
文水	-aŋ	-aŋ	-ən	-aŋ	-ən 韵辖见系的全部一等字
汾阳	-ã	-ã	-ã文 -i白	-ã	肝竿乾~湿杆秆擀赶(k-)看(kʻ-)庵揞安鞍按安(ŋ-)鼾汉旱(x-)
离石	-ɛ	-ɛ	-ɛ文 -i白	-ɛ	竿乾~湿杆秆擀赶(k-)砍看(kʻ-)庵揞暗安鞍按案(ŋ-)憨鼾汉寒韩旱汗(x-)
平遥	-aŋ	-aŋ	-aŋ	-aŋ	

方言点大体上按地理位置从北向南排列。离石(刘勋宁,1980)的地理位置偏西,由于它与汾阳方言(任瑚琏,1980)有相似点,因而放在平遥(侯精一,1982,1988)的前面。表1说明,除太原、平遥两点外,其他各方言点见系一等字有文白异读,这为我们了解一、二等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一等的非见系字无文白异读,但它与见系字的文读音相同,与二等字同韵,说明它在音韵地位上属于文读层,只是没有白读与之竞争,因而在言语社团的心

理意识中没有文白对应的观念罢了。太原、平遥两点的状态与此相似，它们的语音形式对应于其他各点的文读层，说明它们已经像其他各地的北方方言那样，完成了一、二等合流的过程。文水（胡双宝，1984）、太谷（杨述祖，1983）见系一等字没有文白异读，但它们与二等韵不同，可见文水的-ən，太谷的-ẽ 在音韵地位上相当于其他方言的白读。处于文水、太谷之间的祁县（徐通锵、王洪君，1985），见系一等字的文读音不多，而白读音-əŋ 却与文水的-ən、太谷的-ẽ 相似，也可以从侧面说明文水、太谷见系一等字的读音相当于周围方言的白读层。文读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它正在逐步吞并白读，只是各地的发展速度不平衡，才呈现出参差的状态。参差，这有助于方言间的比较，例如太谷、文水两地见系一等字的语音形式就可以反衬榆次（李守秀，1980，270—271）、汾阳、离石等地的零散白读现象的系统性质。山（咸）摄一、二等字通过文白异读表现出来的基本发展趋向与其他各地的北方方言一致，用二等韵的语音形式去合流或吞并一等字，实现合流的过程。

语言的结构是成系统的。《切韵》中同时具有一、二等对立的还有蟹、效两摄。着眼于语言的系统性，那蟹、效两摄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也具有类似山（咸）摄一、二等字的那种关系，用二等字的形式去改造一等字的读音呢？回答是肯定的。请看表2和表3：

【表2】晋中方言蟹摄一、二等字的语音表现

	一	二	一等白读的残存例字
太原	-ai	-ai	
太谷	-ai文 -ei白	-ai	呆逮戴带（t-）台胎苔抬（tʻ-）来（l-）灾栽宰载再在（ts-）才材财猜裁（tsʻ-）改概溉丐盖（k-）开（kʻ-）艾爱（ŋ-）海害（x-）

续【表2】

	一	二	一等白读的残存例字
祁县	-æɛ文 -ei白	-æɛ	戴~帽子袋带(t-)耐~用奈没~何(n-)栽(ts-)猜採菜(tsʻ-)腮鳃(s-)该改盖(k-)开(kʻ-)艾爱可~人(ŋ-)害(x-)
文水	-ai文 -e白	-ai	怠逮带戴代袋待(t-)台胎抬太态(tʻ-)奈耐(n-)栽灾再在(ts-)才材裁猜彩睬菜(tsʻ-)改盖该(k-)开(kʻ-)艾爱(ŋ-)孩害(x-)
汾阳	-æɛ文 -ei白	-æɛ	戴带代袋(t-)胎(tʻ-)耐奈(n-)来(l-)灾栽宰载再在(ts-)猜彩採睬菜綵才财裁缞(tsʻ-)腮赛(s-)改盖(k-)艾爱(ŋ-)害(x-)
离石	-ɛe文 -ie白	-ɛe文 -ie白	代大~夫(t-)态太泰(tʻ-)赖癞(l-)踩(tsʻ-)哀(ŋ-)
平遥	-æ	-æ	

【表3】晋中方言效摄一、二等字的语音表现

	一	二	一等白读的残存例字
太原	-au文 -u白	-au	堡抱(p-)袄(0-)
清徐	-ɔo文 -u白	-ɔo	堡抱(p-)峁(m-地名)
太谷	-aɯ文 -uo白	-aɯ	高羔糕膏告稿(k-)考烤(kʻ-)熬鏊(ŋ-)耗薅毫号~叫蒿(x-)

续【表2】

	一	二	一等白读的残存例字
祁县	-ao文 -u白	-ao	萢(p-)高膏~油(k-)鳌(ŋ-)蒿(x-)(见系字的实际音值为-ɐ^{u})
文水	-au文 -əɪ白	-au	高糕告膏~油(k-)靠铐(k'-)熬鳌(ŋ-)蒿毫好~吃豆腐(x-)
汾阳	-ao文 -əu白(帮) -ɯ白(见)	-ao	堡抱萢(p-)膏~车,~油(k-)槁(k'-)熬鳌熝~白菜(ŋ-)蒿(x-)
离石	-ou文 -u白	-ou	抱萢~小鸡堡(p-)毛(m-)
平遥	-ɔ文 -u白	-ɔ	抱(p-)毛(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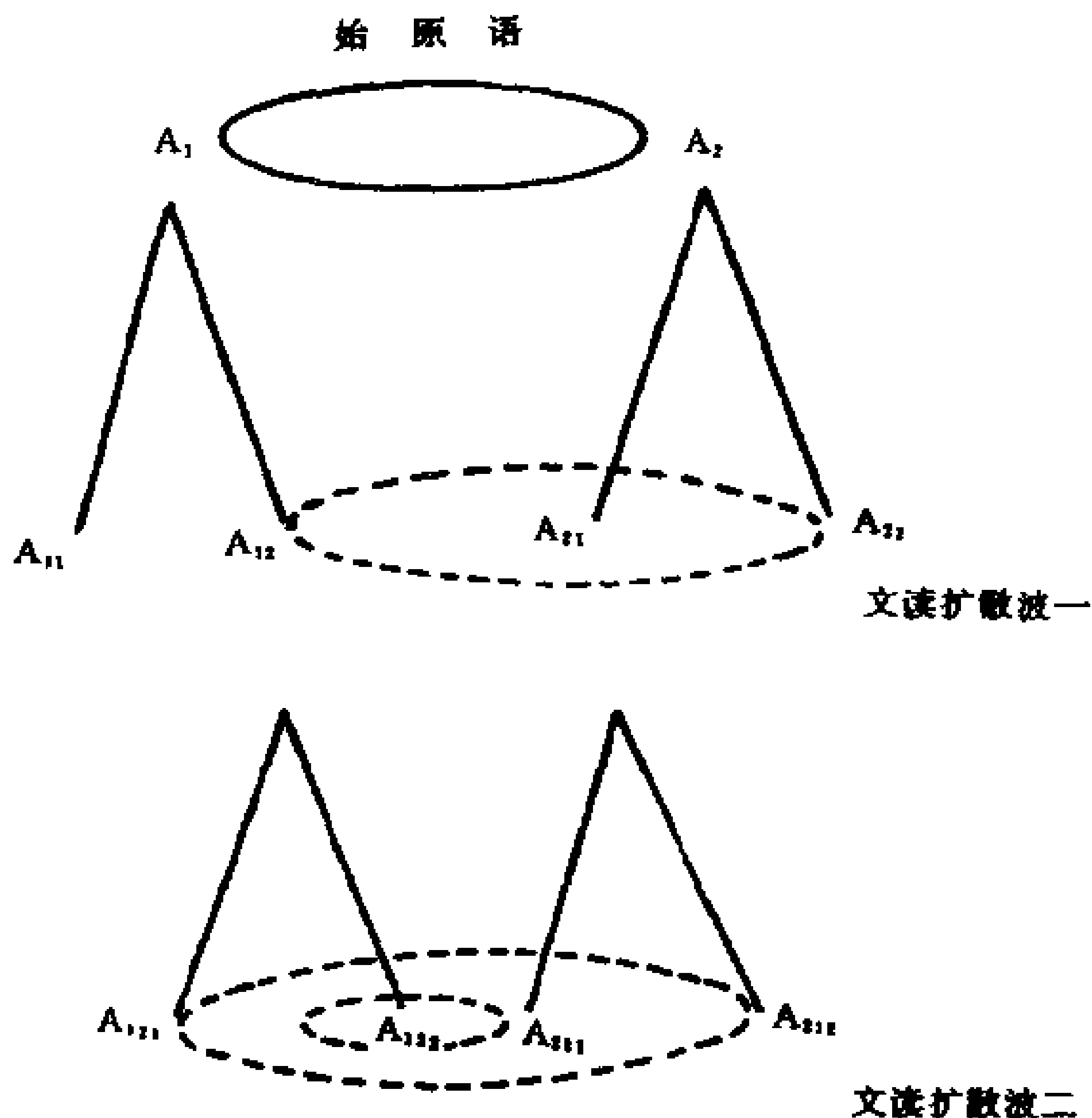
蟹、效二摄文白异读的分布情况与山(咸)摄大体相同，都是南(平遥)北(太原)的白读音少(或无)，而中间的几个方言点的白读音多，总的趋向也是白读由强而弱，一等韵通过扩散的方式向二等韵靠拢，可能在今后的某个时期会实现一、二等的合流。太原、清徐(潘耀武，1989)、平遥三点效摄一等字的几个残存的白读音很有意思，说明一、二等韵在那里本来也是分的，现在蟹、山(咸)的合是语言发展的结果。残存的白读可以帮助我们透视语言演变的线索。

晋中方言山(咸)、蟹、效各摄一、二等韵都通过文白竞争的途径渐趋合流，这给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第一，文白同源，体现不同系统同源音类的叠置。同源关系的确定是历史比较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来说，梅耶(1925,23)认为这会“遇到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阻力”，而现在我们所考察的“文”与“白”却明确无误地示意它们的同源关系，这就可

以省却很多求证的功夫。第二，外系统的影响需要通过本系统才能起作用。不同方言点的音值有很大的差异，但音类之间的关系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用二等韵的语音形式去"吞并"一等韵。这可能反映这样一个事实：权威方言的二等韵麻二（以平赅上、去，下同，后面不另说明）*a 很稳定，而一等的歌（戈）韵 *ɑ 却发生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变化，与此相呼应，各摄一等韵的地位也发生动摇，通过文白异读的途径向二等韵靠拢，逐步实现音类的合并。第三，历史比较法需要就同源音类之间的语音差异进行语言发展层次的研究，并进而拟测始原形式。文白异读已经暗示演变的层次，"白"早"文"晚，只不过它是通过"竞争"的方式实现语言的演变。这三点的核心，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制约着波浪式横向扩散的规律性。

规律，一般都理解为事物在时间（从古至今）中的发展公式，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青年语法学派所说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自然，这是语言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因为文白异读所体现的语言在空间上的横向扩散也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把表现在时间上的"变化"规律叫做纵向的演变规律，而把表现在空间上的"竞争"规律叫做横向的扩散规律。"纵"与"横"只是语言发展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不是规律的性质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横向扩散规律的主要作用是调整纵向发展规律的发展方向，终止它的作用，取而代之，以便使不同的方言日趋接近和汇合。如果实现了这一点，横向的扩散规律就进入了纵向的发展序列。

根据上面的分析，文白异读进入历史比较研究框架的一些理论障碍已经排除，我们完全有可能把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型结合起来，画出新的语言系谱图：



"变化"与"竞争"相结合的语言系谱图

A_1和A_2代表始原语(proto-language)中的方言差异，虚线代表语言的横向扩散波。文读扩散波1以语言A_{21}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其波及的范围涉及A_{12}和A_{22}，使它们产生文白异读。A_{12}的文读与A_{21}、A_{22}(文读)是近亲姊妹关系，而它的白读与A_{11}构成近亲姊妹关系。关系近的方言优先比较，然后逐层推开。在文白竞争过

程中如果文读战胜了白读，那 A_{21}的规律就会取代 A_{12}的相应规律。比方说，晋中的太原方言，根据效摄一等白读音提供的线索，一、二等还有对立的痕迹，而蟹、山(咸)的一、二等已经合流。这说明太原方言已经在外方言的影响下基本上实现了一、二等韵的合流，因而其原来一、二等对立的规律失去了作用。用这一例子注释图中的语言关系，就是：A_{21}的横向扩散规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改变方言 A_{12}的发展方向，使其向己方靠拢；A_{12}往后的发展只能以 A_{21}的这一规律为基础而分化为 A_{121}和 A_{122}；A_{122}的文读扩散波2又可以继续影响其他的方言。分叉的每一个节点都可能有扩散波的痕迹。今天的方言或亲属语言大概都是通过这种谱系树式的分化与波浪式扩散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的：分化中有接触和汇合，而汇合后又可以继续进行谱系树式的分化和发展。辩证地理解这两种既有区别而又有内在联系的演变方式就有可能为继承、改进、发展历史比较法提出一些补正性的设想。

三、音类分合的层次划分和语言的历史比较

历史比较法的一个先天性弱点就是把所比较的材料统统纳入一个时间层次，拟测出来的各种始原形式也分不出时间上的先与后。把文白异读引入历史比较研究，我们就有条件利用文白的不同层次对语言进行有层次的历史比较研究。这或许对补正历史比较法的欠缺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文白异读的"异"是以音类(声、韵、调)为单位的，我们可以以这种"异"为向导去探索语言演变的时间层次。曾一和梗二的关系在汉语方言中的表现形式比较复杂，有些合，有些分，有些通过文白异读而表现出分中有合；如以舒、入相比较，则入声韵德、陌(麦)的关系比舒声韵登、庚(耕)的关系更复杂。这些都为考察时间层次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先请看表4所列德、陌(麦)在汉语方言中的语音表现(除兰州、洛阳两点外均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汉语方音字汇》,下面简称《字汇》):

【表4】德、陌(麦)韵在汉语方言中的语音表现

	德			陌(麦)			
	北	勒	黑	百	择	策	格
北京	꜂pei	lɤ꜄ ꜀lei	꜀xei	꜂pai	꜁tsɤ文 ꜁tʂai白	tsʻɤ꜄	꜁kɤ
太原	pieʔ꜆	lieʔ꜆	xəʔ꜆	pieʔ꜆	tsəʔ꜆文 tsaʔ꜆白	tsʻəʔ꜆文 tsʻaʔ꜆白	kəʔ꜆文 kaʔ꜆白
兰州	pɤ꜄	nɤ꜄	xɤ꜄	pɤ꜄	tʂɤ꜄	tʂʻɤ꜄	kɤ꜄
西安	꜀pei	꜀lei	꜀xei	꜀pei	꜁tsei	꜀tsʻei	꜀kei
洛阳	꜀pei	꜀lai	꜀xɯ	꜀pai	꜁tsai	꜀tsʻai	꜀kai
济南	꜀pei	꜀lei	꜀xei	꜀pei	꜁tʂei	꜀tʂʻei	꜀kɤ文 ꜀kei白
成都	꜁pe	꜁ne	꜁xe	꜁pe	꜁tsʻe	꜁tsʻe	꜁ke
武汉	꜁pɤ	꜁nɤ	꜁xɤ	꜁pɤ	꜁tsɤ	꜁tsʻɤ	꜁kɤ
苏州	poʔ꜆	lɤʔ꜇	hɤʔ꜆	pɐʔ꜆	zɤʔ꜇	tsʻɤʔ꜆文 tsʻɒʔ꜆白	kɤʔ꜆文 kɒʔ꜆白
双峰	꜁pe文 ꜁pia白	le꜅文 lia꜅白	꜁xe文 ꜁ɕia白	꜁pe ꜁pia	꜁tse文 tso꜅白	꜁tsʻe文 ꜁tsʻia白	꜁ke文 ꜁kia白
南昌	pɛt꜆	lɛt꜆	hɛt꜆	pɛt꜆文 pak꜆白	tsʻɛt꜇文 tʻɔk꜇白	tsʻɛt꜆	kiɛt꜆文 kak꜆白
梅县	pɛt꜆	lit꜆	hɛt꜆	pak꜆	tsʻɛt꜇文 tʻɔk꜇白	tsʻɛt꜆	kɛt꜆文 kak꜆白
广州	pɐk꜆	lɐk꜆	hɐk꜆ hak꜆	pak꜆	tʃak꜆	tʃʻak	kak꜆

续【表4】

	德			陌(麦)			
	北	勒	黑	百	择	策	格
厦门	pɔk꜆文 pak꜆白	lɪk꜇文 leʔ꜇白	hɪk꜆	pɪk꜆文 paʔ꜆白	tsɪk꜇文 toʔ꜇白	tsʻɪk꜆文 tsʻe꜆白	kɪk꜆文 keʔ꜆白

除少数几个方言点之外，各地都有数量不等的文白异读。文读与白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 文读系统德与陌(麦)合流，而白读系统德与陌(麦)分立(只有双峰文或白都合而为一)；2. 德韵的主元音高，陌(麦)韵的主元音低。这两条可以成为考察德、陌(麦)演变的基础，但要清理出演变的前后时间层次，还得着眼于系统，看白读的音类与系统中哪些音类有叠置关系，从中考察它在系统中的地位的变化。叠置，这是观察音类分合演变的一个重要线索。先看没有入声韵的方言，我们可以用叠置的观点为德、陌(麦)的演变分出如下的时间层次：

1. 德、陌(麦)合流，与歌(戈)韵叠置、合流，代表点有兰州和北京、济南的文读，读音这里都为-ɤ。与歌(戈)韵叠置的入声字还有宕(江)摄的铎、觉(非见系)和山(咸)摄的合、盍、曷等的见系字。

2. 德、陌(麦)合流，读音与麻三的知照系字相同，而与此相联系的铎、觉则与歌(戈)韵叠置，代表点有武汉、成都等。

3. 德、陌(麦)合流，与蟹摄合口一等灰韵和止摄开口的唇音字合流、叠置，代表点有西安和济南的白读。

4. 德、陌(麦)分立，德韵字与灰韵和止摄的唇音字合流，而陌(麦)与蟹摄开口一、二等韵的读音相同。它们分别相当于《中原音韵》的齐微韵和皆来韵，代表点有北京话的白读和洛阳方言，不过洛阳话读-ei的德韵字只有"北贼墨"三个字，其他如"默德得特肋勒则塞"都读-ai，已合流于陌(麦)。

这四个层次，北京话的白读系统最早，文读系统最晚，其他两个层次介于两者之间。入声韵独立的方言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去分析，从入声韵之间的分合离异去分析它们的层次。麻烦的是闽方言。厦门方言的元音高低有很大的差异，白读除-e' 反映曾、梗合流外，其他的韵值都反映曾与梗的分立。音值如此差异，说明它们不是语言系统内部自我演化的结果，而是受外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不同层次的文白异读。由于新文读的产生，老文读就被挤入白读层，从而使白读的音值呈现出重大的差异。不同的形式究竟代表哪一个时间层次，就得根据音类的分合、系统的叠置等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了。

各地的方言虽然有很大的歧异，但相互有共同点，这就是文读系统的一致性，都是梗二合流于曾一，舒入都一样；没有文白异读的方言，根据前面提到的几条标准，可以确定它们对应于其他方言的文读系统。这种一致性就是引导梗二与曾一的演变去向的一种重要力量：文读扩散波逐步渗入各地的方言，在竞争中逐步排挤和替代白读，使语言向接近、汇合的方向发展。这是语言实现自我调整的一种机制，也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文读扩散波的源泉在哪里？从语言的地域分布看，梗二和曾一在南、北两边都有歧异的文白异读，遥遥相对，而以黄河、长江（除下游外）为代表的两河流域却没有或很少有文白异读的现象。我们猜想文读扩散波的最早发源地可能是在黄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区，它由西向东，并向南北两翼扩散，从而形成今天那种地理上南北不相联结的歧异分布格局。就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书面资料来看，梗二和曾一的合流可以上溯到八九世纪的汉藏对音时代（罗常培，1933，37—42，56，64），各地方言的文读系统可能是这一系的方言随着我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的渐次东移（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而扩散开来的结果。那么，

这一系统何时扩散到北京?看来不会早于元蒙时期。根据《中原音韵》(1324)提供的线索,德韵字当时归入齐微韵,陌(麦)韵字归入皆来韵,和现代北京话的白读系统相当。这就是说,德、陌(麦)韵的文读扩散波当时还没有扩散到北京。作为参考比较,我们可以看看其他收 * -k 尾的入声韵铎、药、觉、屋(沃)的语音表现。铎、药、觉三韵有16个小韵"薄缚铎浊凿着杓学萼略若虐岳幕诺落"分见于萧豪和歌戈(剥阁鹤角等其他小韵还只见于萧豪韵),屋(沃)韵的"轴逐熟竹烛粥宿肉褥六"十字除"肉六"只见于尤侯韵之外,其他的字分见于尤侯和鱼模(杨耐思,1981)。列入萧豪和尤侯的小韵相当于现代北京话的白读系统,列入歌戈和鱼模的相当于现代的文读系统。这说明铎、药、觉、屋(沃)诸韵的文读扩散波已部分地进入北京方言,它们产生文白异读的时间比德、陌(麦)韵早,不过"早"的时间不会很久,因为稍早于《中原音韵》的《蒙古字韵》,连铎、药、觉等韵也只有一读,收在萧部,相当于《中原音韵》的萧豪韵。这说明《蒙古字韵》时期还没有后来称为文读的那种读音。元蒙虽然征服了中华大地,北京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但是经济和文化还处于落后的状态,需要向汉族学习,文读扩散波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渗入北京方言的。至于其他的北京方言,接受文读扩散波的影响的时间一般都晚于北京话。济南方言文读-ɤ 的产生看来还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它在文白的竞争中现在并没有占有优势的地位。兰州方言(高宝泰,1985)与北京话的文读系统一致,但根据本世纪初高本汉(1915—1930)的记音,德、陌(麦)的音值都为-ei,与现在的西安话一样。这么看来,新的文读在本世纪内才取代旧的白读。不过笔者对此有些怀疑,二高所依据的方言基础可能不一样,不然,文白异读中不会没有它们的沉迹的。

我们前面以文白异读为基础考察语言演变的层次,说明语言

的横向扩散同样会在语言的演变中留下它的痕迹。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层次：一种是“竞争”性的，表现为系统中的文白异读；一种是“演化”性的，表现为语言成分自古至今的延续性变化（例如德韵由 * -ək 演化为-ei）。“演化”性时间层次的研究原则就是历史比较法的“从空间的差异中去寻找时间的发展序列”，根据音理（如果没有书面材料的印证）加以确定。把文白异读引入历史比较研究之后出现的新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与“竞争”性时间层次之间的关系。根据我们的认识，分出“竞争”性的时间层次是有层次地进行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前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把不同层次的语言现象压缩在一个共时平面之内，才能避免把没有“变”的关系的语言现象纳入“变”的框架里头去研究，不然，语言演变的线索就会被搞乱，语言研究就会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曲折（详见第六章的分析）。

把“文”与“白”区别开来，分清两种类型的时间层次，这就可以为有层次地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开辟前进的道路。历史比较语言学有一条原则，就是关系近的语言先比较，远的后比较。要有层次地开展历史比较研究，就得分头为“文”与“白”寻找各自的近亲姊妹方言（参看135页的系谱图），先解决“远”与“近”，而后进行由近及远的比较。文读系统产生的时间较晚，为它寻找近亲姊妹方言还比较容易，而要为白读系统寻找它的近亲姊妹方言，那就相当困难，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一些残存现象。在这方面，求助于结构格局或结构关系的比较，或许是一条可行的、有效的途径。

四、结构格局的比较和方言亲疏关系的确定

结构格局是语言系统的核心，萨丕尔（1921，48）早就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认为在表面的语音系统背后“还有一个更有限制的、

'内部的'或'理想的'系统",这种系统"是一个完成的格局、一个心理机构","是语言生命里一个真正的、非常重要的原则。甚至在它的语音内容久已改变了之后,它还能作为一个格局坚持下去,包括语音成分的数目、关系和作用。两种在历史上有关的语言或方言,可能没有任何共同的语音,但是它们理想的语音系统却可以是同格局的"。这段话的基本精神是:"语音内容"容易变化,而"结构格局"却很稳固、保守,"变得远不如语音本身那样快"。比较这种保守的结构格局,可以比语音对应的比较更能深入地了解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关系的亲疏远近。困难在于如何确定音系的结构格局和如何进行结构格局的比较,或者简单地说,如何运用结构分析法的基本精神去进行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以弥补历史比较法的"原子主义"的欠缺。

结构格局是通过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出来的。我们前面的讨论主要涉及一、二等韵,但还没有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去考察结构格局的演变。相互关系的最好表现形式是区别特征。Lyons(1977,123—126)曾用它解释第一次日耳曼语辅音的变化(格里姆定律),清楚而明确,我们可以吸取这种分析法的精神去考察一、二等韵的结构关系的变化。

一、二等韵配对的各摄和与此相关的一、二等韵的主元音,一等是*ɑ,二等是*a。它们在现代方言中的语音表现,张琨(1985)曾有全面的讨论。前a和后ɑ对立,说明元音的结构格局是一种四角构型(configuration)的系统(i,u,a,ɑ)。*ɑ和*a的区别,除了"后"与"前"之外,其他如高低、圆展等都是相同的。因此,一、二等韵之间的结构关系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公式:

一等:二等=*ɑ:*a=后:前

这可以成为我们考察一、二等韵在语言演变中的相互关系的一个

视角或观察点。歌(戈)和麻二、宕一和梗二都不是同摄的一等和二等，但由于它们在结构上有联系，特别是歌与麻的“*ɑ：*a”是对比的基础，因而都放在一起考察。先看表5的北京话：

【表5】一、二等韵在北京话中的语音表现

摄	等	韵	例字		一、二等结构关系
			非见系	见系	
果	一	歌(戈)	多꜀tuo	歌꜀kɤ	高：低
假	二	麻	爬꜁pʻa	家꜀tɕia	
蟹	一	咍泰	戴 tai꜄	盖 kai꜄	一等＝二等＝低
	二	皆佳夬	排꜁pʻai	街꜀tɕiɛ	
效	一	豪	宝꜂pau	高꜀kau	
	二	肴	包꜀pau	交꜀tɕiau	
山(咸)	一	覃谈寒	贪꜀tʻan	甘꜀kan	
	二	衔咸删山	单꜀tan	监꜀tɕiɛn	
宕	一	唐	汤꜀tʻaŋ	钢꜀kaŋ	后：前(白读)
		铎(觉)	薄꜁po文 ꜁pau白	鹤 xɤ꜄ 郝꜂xau	
梗	二	陌(麦)	伯꜁po文 ꜁pai白	格꜁kɤ	

二等见系字都腭化，这里不讨论；梗二没有列庚(耕)韵例字，因为它们的读音与入声字的文读相配，不是本方言的底层。从结构关系来看，这里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歌(戈)的*ɑ已高化为-ɤ(-o是它的变体，出现在唇音和u之后)，它与麻二的关系已由“后：前”变为“高：低”。同摄的一、二等韵都已合流，“后：前”的对立消失，原来的羡余特征“低”上升为区别特征。这些都说明四角构型的元音

系统已变为三角构型(i,u,a)的系统。前述的方言可以列入这种变化格局的有兰州、西安、洛阳、成都、武汉、济南等。

北京话宕一和梗二的入声韵的白读很特别，它们相互之间仍旧保持着“后∶前”的结构关系。这虽然是残存现象，但在历史比较研究中却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是一种语言“化石”，犹如生物的化石可以用来解释生物的演化和确定地层的年代一样，它也可以用来分析语言结构的演变。如以这一“化石”为背景考察北京话一、二等韵结构关系的变化，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清楚的脉络。

粤方言地处我国南端，一般都认为它最能反映《切韵》音系的特点。现在来看看一、二等的结构关系在那里的演化。请看表6：

咸、山两摄的非见系字的一、二等已经合流；蟹一的泰韵有“艾赖泰太大~夫带”六字读-ai，与二等字合流。除此之外，一、二等完全对立：一等的主元音为-ɔ，二等为-a。ɔ 与 a 虽有高低的差异，但根据区别特征的研究，它们都属于“低”的范畴，相互只以“圆∶展”相区别。一、二等韵的结构关系从“后∶前”变为“圆∶展”，说明元音系统的四角构型已让位于三角构型，一等韵的元音 *ɑ 顺着“后”的路线高化为-ɔ。我们进行这样分析的一个重要根据，是与-ɔ 构成“前∶后”对立的-ɛ 是后起的：由于 *ɑ 高化为-ɔ，在前元音 ɛ 的位置上就出现了一个聚合空格，因而吸引麻三的 *ia变为-ɛ(爹꜀tɛ，蛇꜀ʃɛ……)，填补了这个空格。与粤方言的结构格局相同的有客家方言和赣方言。赣方言据高安话(王洪君，1986)列表，因为南昌是大城市，受外方言的影响大，不如高安话更能反映赣方言的音系特点。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的一、二等韵的结构关系见表7(如有文白异读，只列白读，因为只有它才能代表本方言的底层。表中例字从略)：

【表6】 一、二等韵在粤方言的语音表现

摄	等	韵	例字		一、二等韵结构关系
			非见系	见　系	
果	一	歌	多꜀tɔ	哥꜀kɔ	一：二＝圆：展
假	二	麻	爬꜁pʻa	家꜀ka	
蟹	一	咍	袋 tɔiᵓ	该꜀kɔi	
		泰	带 taiᵓ	盖 kɔiᵓ	
	二	皆佳夬	排꜁pʻai	街꜀kai	
效	一	豪	宝꜂pou	高꜀kou	
	二	肴	包꜀pau	交꜀kau	
咸	一	覃	贪꜀tʻam	感꜂kɐm	
		谈	谈꜁tʻam	甘꜀kɐm	
	二	衔咸	斩꜂tʃam	监꜀kam	
山	一	寒	单꜀tan	干꜀kɔn	
	二	删山	扮 panᵓ	奸꜀kan	
宕	一	唐	汤꜀tʻɔŋ	糠꜀hɔŋ	
梗	二	庚耕	冷꜂laŋ	耕꜀kɐŋ文 ꜀kaŋ白	

【表7】客家、赣两大方言一、二等韵的结构格局

		果	假	蟹	效	咸	山	宕	梗
梅县	一	ɔ		ɔi	ɔ(高)	am	ɔn(见)	ɔŋ	
	二		a	ai	au		an		aŋ
高安	一	ɔ		ɔi	ɔu	ɔn		ɔŋ	
	二		a	ai	au	an			aŋ

一、二等韵的结构关系与粤方言一样，都已经由“后：前”变为“圆：展”。*-a 高化为-ɔ 也引起了结构的调整，使 ɛ 位置的聚合空格出现了新的音类：梅县主要是蟹四的齐韵字（齐白契鸡细系白），南昌还有音无字（据《字汇》），高安连 ɛ 这个音类都没有产生，还是一个空格，有待于调整和填补。这种结构特点说明粤、客家、赣方言的三角构型的元音系统是从四角构型的系统中脱胎出来的，用不着修正前面提到的“一等：二等＝后：前”的假设。

除了闽方言之外，一般都认为广州话较好地保存着古音系的结构特点。但从一、二等韵的结构关系来看，北京话铎、觉、陌、麦、屋（沃）、德的白读系统所反映的结构格局似还早于粤方言。不过应该承认它们的关系最接近，因为粤、客家、赣方言的语音系统还保持着脱胎于“后：前”对立的痕迹。结构格局的异同或者相互接近性的程度可以为语言的演变提供一些信息。

这里不准备讨论闽方言，一是它的文白异读太复杂，一时难以理清头绪，二是需要费的笔墨太多，会冲淡、干扰这里讨论的主题。现在集中讨论吴方言一、二等韵之间的结构关系。请看表8：

【表8】 一、二等韵在吴方言（苏州）中的语音表现

摄	等	韵	例字	
			非见系	见系
果	一	歌	多꜀təu文 ꜀tɒ꜄白(?)	歌꜀kəu
假	二	麻	爬꜁bo	家꜀tɕiɒ文 ꜀kɒ白(?)
蟹	一	咍	戴tE꜄文 tɒ꜄白(?)	该꜀kE
		泰	带tE꜄文 tɒ꜄白	盖kE꜄
	二	皆佳夬	埋꜁mE文 ꜁mɒ白	街꜀ke

续【表8】

摄	等	韵	例字	
			非见系	见系
效	一	豪	宝ᶜpæ	高꜀kæ
	二	肴	包꜀pæ	交꜀tɕiæ$_{\text{文}}$，꜀kæ$_{\text{白}}$
咸	一	覃	胆ᶜtᴇ，贪꜀tʻø	感ᶜkø
		谈	淡꜁dᴇ	甘꜀kø
	二	衔咸	斩ᶜtsᴇ	监꜀tɕiɪ$_{\text{文}}$꜀kᴇ$_{\text{白}}$
山	一	寒	单꜀tᴇ	干꜀kø
	二	删山	扮pᴇ꜄	奸꜀tɕiɪ$_{\text{文}}$꜀kᴇ$_{\text{白}}$
宕	一	唐	汤꜀tʻɒŋ	糠꜀kʻɒŋ
梗	二	庚耕	冷ᶜlən$_{\text{文}}$ᶜlaŋ$_{\text{白}}$	羹꜀kən$_{\text{文}}$꜀kaŋ$_{\text{白}}$

表8与表5、表6不一样，没有列出一、二等韵的结构关系。这是由于表中呈现出一些复杂的交叉状态，不作一番清理，无法弄清结构关系的特点。

山、咸摄的音值差异比较奇特，但其结构关系还比较简单，大体上与前面分析过的山西晋中方言类似；分见系和非见系两组，非见系除覃韵有9个字（贪潭镡探男南参蚕惨）读-ø外，其他的覃韵字和谈、寒韵合流，与二等字的读音相同，都为-E。覃、谈、寒三韵见系字的语音形式，一等与二等明显对立：二等念-E，一等念-ø，与合口一等的桓韵相同。开、合口合流，这恐怕是苏州一系吴方言的特点，宁波一系的吴方言见系字的开、合口仍然有别，例如开口的"感甘肝"读꜀ki，"看"读꜀kʻi，合口的"官"读꜀ku，"宽"读꜀kʻu。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见系字的演变方式不同于非见系字，它还保存着古

一、二等韵结构格局的一些残迹。这为它与粤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以及北方的山西方言的比较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线索。

比较麻烦的是果、假、蟹三摄的文白异读，它们相互交叉，有相同的白读形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是这三摄的底层形式本来就相同？还是我们误解了文白异读的性质而把语言中某些现象错归到文白异读中去？恐怕是后面的那个原因造成的错乱，不是音系结构的杂乱和不规则，所以我们在果、假、蟹三摄的文白异读后面打了一个"？"。为了弄清楚结构格局，这里不得不逐一讨论这三摄的"文白异读"。

先谈蟹摄字。一等与二等有相同的文白异读形式，文读-E，白读-ɒ。这种"相同"可能是貌合而神离。根据《字汇》提供的材料，蟹摄一等共53字，其中读-E的50个，读-ɒ的7个：戴带大~夫太泰赖蔡（带黑点儿的文白两读）。这里只有一个"戴"是哈（代）韵字，其他都是泰韵字。比较赣、客家、粤等方言哈、泰韵有差异的方言，"戴"与泰韵字的语言形式一致，与二等字合流。吴方言的情况可以与此相比拟，说明"戴"的-ɒ音是随泰韵端系字变化的结果，与哈的-E不是文白异读的表现。具体地说，哈韵的-E是本方言的"土产"，不是外方言的渗透。不弄清这种个别例字的特殊音韵地位，就会模糊、扰乱语音的结构关系。二等字的情况不一样，《字汇》共收35字，其中读-ɒ的有33字，而读-E的只有5个字（埋文奶文挨文迈豺）。这是真正的文白异读，-ɒ代表苏州话，-E是外方言影响的结果。宁波方言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有力的旁证。鸦片战争以后至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蟹二各韵和蟹一的泰韵端系字（包括哈韵的"戴"字）都有文白异读：文读-ɛ，白读-a，与苏州方言一致。两地不同的是，宁波方言的文读形式-ɛ在几种音变力量的竞争中因失败而退出语言系统，现在只留下合口字"坏怀"两字还可以有꜀ɦuɛ文꜀ɦua白两种读

法，算是失败的文读在语言中留下来的痕迹（参看60—64页的分析）。这可以从侧面印证苏州话二等字-ɛ 音的文读性质。

再看歌（戈）韵的"文白异读"。歌（戈）韵的白读-ɒ 在《字汇》中只有"多""拖꜀tʻəu$_{文}$꜀tʻɒ$_{白}$"两字，宁波方言没有"多"字，而有"破"字：꜀pʻo$_{文}$꜀pʻa$_{白}$。多、拖、破三字上古属歌部，吴方言中的-a（或-ɒ）音当是古音的残存，它与-əu 的关系是离散式变异的中断（thwarted changes）而在系统中留下来的不规则现象，不是文白异读。这就是说，歌（戈）韵原来的读音为 *ɑ，在语言发展中由于 *ɑ 的高化和复化（分析详后）而变成现代的-əu。这是语言系统自我演化的产物，与方言之间的借用无关。多、拖、破之类的字由于使用频率高，还保留着低元音的旧读，与由蟹摄二等字变来的-ɒ 混用。它不是因文读的渗入而形成的白读。

麻韵的文白异读-o 和-ɒ 的情况与歌（戈）韵字的两种读音一样：-o 是 *a 的高化，-ɒ 是 *a 的遗存，它们反映离散式变异的中断，不是不同方言系统的叠置。为了把这种因离散式变异的中断而产生的不规则现象与文白异读区别开来，我们这里再用一个宁波方言的例子作一些补充的分析。《鄞县通志·方言志》载有这样一首歌谣："大大大姑娘，抬到大咸乡，大家堂前拜家堂"（2765页）。这里的一个"大"字"甬语有五音"："第一大字读作毒，第二大字读作陀，第三大字读作驮，盖三大字连言先入声最短，次平声较长，次去声最长"。如不管连读变调（第一个"大"字系舒声入化，原因不清楚，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人读作"毒"），"大"字的读音是 dɐʊ。"大咸乡"的"大""与书中读音同"，读 da。"大家之大读作陀哑切，此为甬语最古之俗音，仅遗存于大家一语中"（还应补充一个"我"：[ŋo]字）。"哑"是麻韵字，宁波话读-o，陀哑切就是读 do。这样，"大"字如不计连读变调就有三个读音 da、dɐʊ、do，其中 da 是受外方言的影响

而产生的文读，而 dɐʊ 和 do 都是白读，它们之间不是文白异读的关系。根据百年前《宁波方言字语汇解》(Morrison，1876)提供的资料，歌(戈)韵那时读-o，麻韵读-ɔ，由于元音的高化，-ɔ 变为-o，而-o复元音化为-ɐʊ。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大"字的 do、dɐʊ 两音体现语言自我演化的两个时间层次，是离散式变异的中断，与方言间的借用无关。这个例子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离散式变异的中断和文白异读之间的差别。

前面的清理排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文白异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一、二等韵的复杂表现形式中理出如下的结构关系。请看表9(已与二等韵合流的一等韵形式，表中未列)：

【表9】 苏州方言一、二等韵的语音结构关系

	果	假	蟹	效	咸	山	宕	梗
一	əu		E		ø	ø(见)	ɒŋ	
二		o	ɒ	æ	E	E		aŋ

总的特点是一等韵的元音比二等韵"高"，但它与"等"的关系却呈现出杂乱的状态：山(咸)摄二等韵的元音与蟹一同，宕一的元音与蟹二同，即不同的"等"有相同的元音；蟹一的元音是"展"的，而果、山(咸)、宕等摄的一等韵的元音却是"圆"的，即同"等"的元音有"圆""展"之别；一等韵的元音果、宕是"后"的，而蟹、山(咸)却是"前"的，二等韵麻二、蟹二的元音是"后"的，而其他各韵却又是"前"的，即同"等"的元音还有"前""后"之分；音系中的元音既有 a (阳、梗二的白读和山(咸)一、二等的入声：八 paʔ，搭 taʔ……)，又有 ɒ，那元音系统是三角构型，还是四角构型？等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矛盾的现象，无法像其他方言那样可以整理出一条简单、明

确的线索。这些问题弄不清楚，又将成为结构格局比较的障碍。

一、二等韵的结构关系在粤、客家、赣三大方言中是“圆：展”，但已隐含有高低的差异，苏州方言一等韵的元音总的特点也是高于二等，我们可以由此假设：一、二等韵的“后：前”的结构关系在吴方言的演变中曾让位于“高：低”。百年前《宁波方言字语汇解》所记录的宁波话可以证明这一假设，因为它明显地保留着这种“高：低”的痕迹。这可以用歌（戈）、麻韵为例来说明。请看表10（符号已用国际音标转写，原书未标声调）：

【表10】 百年前宁波方言麻二与歌（戈）的语音差别

麻二					歌（戈）				
怕	沙	驾	虾	哑	拖	搓	罗	哥	科
p'ɔ	sɔ	kɔ	hɔ	ɔ	t'o	ts'o	lo	ko	k'o

这里的元音已无前后之别、圆展之异，而只有高低之分。这说明一、二等韵的结构关系已经由“后：前”变为“高：低”。如果说粤方言的一、二等韵在“圆：展”的对立下隐含着高低的差异，那么吴方言就把这种潜在的高低变为现实的高低，在百年前就比现代的粤方言“高”了一个等级，使圆展的特征不得不让位于高低。空间的差异反映时间的发展。“后：前”>“圆：展”>“高：低”，这可能是一、二等韵自我演化的一条规律，与北方方言通过文白竞争而实现一、二等合流（根据山西方言提供的线索）的规律完全不同。“高：低”，这代表吴方言一、二等韵的结构格局。不过这个“高：低”与北京话的“高：低”，除了一、二等韵是否合流以外，还有两点重要的区别：第一，吴方言以“圆”为前提，而北京话的特点是“展”；第二，北京话歌（戈）的“高”处于定型的稳定状态中，而吴方言则如下面将要分析

的那样，歌(戈)的“高”是链移式音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处于运动的状态。通过上面的分析，高低与“等”的关系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但仍旧留下前后、圆展与“等”的交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看来光靠结构格局的静态比较是不行的，它需要我们对系统进行动态的比较研究。

前面分析了三种类型的结构格局，除闽方言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外，其他方言都可以分别归入这三种类型的格局。方言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可以根据结构格局的异同和相似性的程度来确定：凡是结构格局相同的，就是近亲姊妹方言；相似性的程度越高，相互的关系就越近，或者说，相互分离的年代就越晚。北京话宕(江)、曾、梗、通各摄入声字的白读系统在汉语方言中似还难以找到同格局的姊妹方言，那就只能与它的格局最接近的方言进行比较。

五、系统的动态性比较和语言演变的结构分析

结构制约着变异的方向和目标(参看第175—185页的分析)，因而相同的结构格局有可能产生相同的或相似的演化方式。不同的方言如果在这方面表现出相同的或相似的特点，那就说明它们分离的时间还不太长，是近亲姊妹方言的一个最有力的见证，我们可以就此对语言系统进行动态性的比较，从中探索语言演变的机制、途径和规律，使结构分析法在历史比较研究中具体化。一、二等韵的主元音在吴方言中表现出来的参差、交叉和矛盾为我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活动领域。

一、二等韵的结构关系由“后：前”变为“高：低”，说明元音系统已由四角构型转化为三角构型，各种参差、交叉和矛盾都是在这种模型中表现出来的。粤方言的元音系统也是三角构型，为什么没有这种参差、交叉的现象？这可能与吴方言蟹二*ai 的单元音化有关，

因为这一变化在系统中引发了一系列链移性的元音变化。宁波方言的蟹二*ai 单元音化为-a 后在系统中产生了推链性的元音变移：蟹二的*ai 单元音化为-a，由此把麻二的*a 推挤、高化为-ɔ，歌*-ɔ为避免合流而高化为-o。这是百年前《宁波方言字语汇解》里反映出来的状态。随着鼻韵尾-n 的消失，宁波方言又产生了第二次推链性的元音高化运动，其特点是：凡韵母中有“前”的特征的（如蟹的韵尾*-i、山（咸）摄的韵尾*-n），都顺着前元音的途径高化，韵母中有“后”的特征的（如效的韵尾*-u）顺着后元音的途径高化，呈现出表11所示的状态：

【表11】 百年来宁波方言推链性的元音高化

	山一、二	哈	灰[illegible]	豪肴	麻二	歌（戈）
例字	单	戴	推	刀	巴	哥
百年前	tɛn	tɛ	te	tao	pɔ	ko
现代	tɛ	te	tɛɪ	tɔ	po	kɐʊ

依次比较纵的差异和横的差异就可以了解元音系统的动态性的链移变化：-ɛn 由于鼻韵尾的消失而变成-ɛ，从而使哈韵的-ɛ 高化为-e，灰韵的非见系字、支脂二韵的唇音字和哈泰覃谈寒诸韵的“h 系字”的-e 由于受到排挤而复元音化为-ɛɪ。这是前元音系列的高化。与此相平行，后元音系列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豪肴韵的-ao 单化并高化为-ɔ，从而迫使麻二的-ɔ 高化为-o，歌（戈）韵的-o由于受到排挤而复元音化为-ɐʊ。前后元音的高化完全平行、对称。有了这样一个参考座标，苏州话的参差、交叉、矛盾就容易得到解释了。

由蟹二*ai 的单元音化而引起元音系统的自我调整，这是吴方

言的一致趋向,至于各地如何调整,由于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见第235—241页)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苏州方言自我调整的格局与宁波话相似,但有两点区别:1. 参与链移式变化的音类不完全一致;2. 效摄一、二等韵的元音与蟹二的元音圆展、前后易位,从而使元音的语音特点与"等"的关系呈现出参差和交叉。苏州话的语音系统有音位-a,特点是"低",蟹二·ai 在单元音化时可能是为了保持与"低"的 a 的区别,就后化为 ɒ,其舌位稍高于 a,与前元音系列的 æ 舌位相当。这一变化引起了元音的推链式变移:*ai 单化为-ɒ,使麻二(ɒ或 ɔ)高化为-o。歌(戈)韵当时的音值是什么?书面材料无考,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表明它在各方言点大体上在 ʌɤ 到 u 之间游移。根据链移式音变的规律,它当时在苏州话的读音大概是-o,与宁波方言相似。由于麻二的高化,歌(戈)的-o 只能高化为-u,与模韵的-u 合流,并在往后的发展中一起复元音化为-əu:"u 与唇音 p-,p'-,b-,m-,f-,v-相拼时是个单纯元音,但与其他声母相拼时就产生一个流音 ə 而复元音化为 əu,所以 u 和 əu 可以算作同一个韵母的变体"(袁家骅,1983,62)。歌(戈)、模的复元音化与侯韵的*əu 发生冲突,为避免合流,侯由*əu 变为-ʏ(如走ᶜtsʏ,头꜀dʏ,欧꜀ʏ)。这是后元音系列的链移性变化。与此相应,前元音系列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蟹二的*ai 单元音化为-ɒ,这就堵住了豪肴合流后的演变去向,只能使它前化为-æ;哈韵的*ai 单化后由于受到-æ 的推挤而高化为-ɛ,与麻二的-o 平行、对称。这种链移性的元音变动是一种动态性的结构格局,可以成为探索方言亲属关系的有力根据。台湾的张光宇(1989)根据这种类型的变化对方言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有意思的探索,认为江淮吴楚(湘)的方言是一个连续体,徽州方言的底层是吴语。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对吴、湘两大方言进行系统性、动态性的比较,从中考察两

大方言的亲属关系。

湘方言离吴方言的距离不算近，中间还隔着下江官话和赣方言，但是两大方言的动态性结构格局却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请比较表12（为排表方便，仅举一例，余皆类推）：

【表12】 吴、湘两大方言的音系结构格局比较

	蟹二	麻二	歌	模	侯
	排	怕	河	古	头
苏州	꜀bɒ	p'oᵓ	꜀ɦəu	ᶜkəu	꜀dʏ
双峰	꜀ba	p'oᵓ	꜀ɣʊ	ᶜkəu	꜀de
湘乡	꜀ba	p'oᵓ	꜀ɣʊ	ᶜku tsɯ租	꜀dɛi

双峰、湘乡（王福堂，1974）的元音链移式变化的模式与苏州话相似，其中尤以双峰话为最典型：蟹二的 *ai 单元音化为-a 后，麻二的 *a 就高化为-o，而这个-o 又迫使歌（戈）韵的-o 高化为-ʊ，而这一变化又使模韵的 *u 复元音化为-əu，侯韵的 *əu 为避免被合流而变为-e，一环扣一环，呈链条状推移。蟹的咍和效的肴（豪）也分别高化为-e 或-ue（材꜀dze，袋 dueᵓ）和-ɤ（高꜀kɤ）。湘乡话的情况与此类似，只是模韵的音值分两组：帮、见系为-u，端系为-ɯ。结构格局和演化方式的这种相似性绝不会是偶然的，已故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1977，31）认为“吴语和湘语曾经明显地构成同一个方言地区，很可能后来在客家南下时从中间分割开了”。结构格局和演化方式的相似性可以印证这种假设的合理性。我们根据语言年代学[①]推算，吴、湘两大方言大概是在600—730年前（600±132）分开（即1158—1390）的。“±132”是根据标准误差（即7/10可靠）的计算

公式推算出来的，“-”号显然太晚，我们在推算方言的分化年代时一般都不考虑这个“一”。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知，吴、湘两大方言的分化年代大概在南宋初叶至元蒙灭亡的时期。语言年代学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推算出来的年代仍有其参考价值。

和吴方言的结构格局相似的还有山西方言，区别主要是山西方言的麻二的音值很稳定，读-a，与其他地区的北方方言一样，因而链移式的音变链条以麻二为界，分前后两段。请看表13（“皆”代表“皆佳夬”）：

【表13】 晋中方言一、二等韵的语音比较

	歌	麻	咍	皆	豪	模	侯
	拖	马	猜	排	高	古	头
太原	ᶜt'uɤ 文 ꜀t'ɤ 白	ᶜma	꜀ts'ai	꜀p'ai	꜀kau	ᶜku	꜀t'əu
太谷	꜀t'uo 文 ꜀t'ɤ 白	ᶜma	꜀ts'ai 文 ꜀ts'ei 白	꜀p'ai	꜀kaɯ 文 ꜀kuo 白	ᶜku	꜁t'əɯ
祁县	꜀t'ɤɯ～ ꜀t'ʊᵘ	ᶜma	꜀ts'æɛ 文 ꜀ts'ei 白	꜀p'æɛ	꜀kaɔ 文 ꜀kʊᵘ 白	ᶜkᵊuᵝ	꜀t'əu
文水	꜀t'əi	ᶜma	꜀ts'ai 文 ꜀ts'e 白， ꜀ts'ue 白	꜀p'ai	꜀kau 文 ꜀kəi 白	ᶜku	꜀t'ou
汾阳	꜀t'ɯ	ᶜma	꜀ts'æɛ 文 ꜀ts'ei 白	꜁p'æɛ	꜀kao 文 (-ɯ 白)	ᶜkᵊu	꜁t'ou
离石	꜀t'uo 文 ꜀t'ɐ 白	ᶜma	꜀ts'æɛ 文 (-ie 白)	(-æɛ 文) ꜁p'ie	꜀kou (-u 白)	ᶜku	꜁t'ɐu

太原是大城市，它的语音表现接近于一般的北方方言，白读现象少一些。其他各点的语音状况，如以白读系统为准，可以简化为表14：

【表14】 晋中方言白读系统链移式音变的语音关系

	皆	咍	豪	麻二	歌	模	侯
太谷	-ai	-ei	-uo	-a	-ɤ	-u	-əɯ
祁县	-ɑɛ	-ei	-ʊ^{u}	-a	-ɤ^{ɯ}～-ʊ^{u}	-^{ə}u^{β}	-əu
文水	-ai	-e，-ue	-əi	-a	-əi	-u	-ou
汾阳	-æɛ	-ei	-ɯ	-a	-ɯ	-^{ə}u	-ou
离石	-ie	-ie	-u	-a	-ɐ	-u	-ɐu

比较表中音类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在文读系统渗入以前，白读系统已经开始了它的链移式音变：表中麻$_{二}$以前各韵为链移式音变的前半段，后面为后半段。歌（戈）韵除离石外都已经高化，其中以祁县和汾阳两点最为明显。歌（戈）韵字祁县有-ɤ^{ɯ}、-ʊ^{u}两种读音，但多数人读-ʊ^{u}（徐通锵、王洪君，1986）。它与汾阳的-ɯ体现晋中方言白读系统歌（戈）韵*ɑ的高化方向。这一变化使模韵的-u复元音化为-əu（汾阳）、-^{ə}u^{β}（祁县）。产生新的擦音韵尾，这是山西方言的特点，也是侯韵的音值比较稳定、没有受到链移式音变影响的一个原因。其他各点模韵的音值，精组字已复元音化为-eu（离石）、-ou（汾阳、文水）、-əu（平遥、介休等），其他条件下仍为-u，但已开始链移式音变的变异：太谷、榆次的-u带有唇齿摩擦成分v，榆社（南河底）是双唇的-w，它们都相当于祁县的-β，只是音色较

弱而已（表中未列的方言点的材料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1964年的调查）。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模韵的-u也会向复元音化的方向发展的，因为这是语言发展的一种沿流（萨丕尔，1921）。和链移式音变的后半段相呼应，前半段也发生了相应的高化：哈、泰随前元音高化为-ei或-e，豪韵随后元音高化为-uː-ɯ、-ɤ、-əi、-uo。这种链移式的变化大体上与吴方言是平行的，区别只在于吴方言以皆佳夬代替麻二的位置，因而是整体的链移式音变，不分前后两段。

链移式音变是系统演化的一种方式，从这一角度考察方言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性、系统性的比较，可以从中悟察音系结构格局的运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结构格局的静态比较转化为动态的比较，考察方言之间的相互平行的独立演变，解决同源词的语音对应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

方言间的平行演变是两个系统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证明，萨丕尔（1921，163）曾就此讨论英语和德语的关系，认为这两种语言所出现的平行变化"根源于一个共同的、早于方言的沿流"。山西方言和吴方言在地域上相距千里，在结构格局和演化方式上呈现出那么大的平行性和共同性（除了前面的分析之外，其他如入声韵、阳声韵、山咸摄见系字一、二等的关系、蟹止摄合口字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白读形式（-y：归白tɕy，围白y……），梗二白读的低元音等都有平行演变的痕迹），恐怕不是偶然的，它们在历史上可能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史料提供的线索，吴方言的形成可能与东晋南渡有关。当时，从北方来的士族和平民因避战乱而退居江东。"江东"相当于今日的吴语区（袁家骅，1983，57）。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语言状况，据陈寅恪（1936，4）的考证，大致相当于洛阳附近的方言，认为"东晋南朝疆域之内其士大夫无论属于北籍，抑属于吴籍，大抵操西晋末年洛阳近傍之方言"。"洛阳近傍之方言"，在音类分合、结构格

局、系统演化方式与吴方言相似的只有山西方言。我们把方言的比较与书面材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推断现代吴语大概就是东晋南朝吴语的发展，源自山西一系的北方方言。根据语言年代学推算，吴方言与山西方言[2]大体上是在1303±190年以前分家的。如果以误差值的上限（+190）计算，那末两大方言大概是在南朝齐梁交替的时期开始分家的，比陈寅恪所说的西晋末年要晚200多年。这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语言年代学推算出来的年代，根据汉语方言的情况，一般都晚于语言的实际分离年代。其次，陈寅恪所根据的材料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史书的记载只涉及官场通用语，与普通老百姓的语言有距离。东晋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大批士族大多来自北方，他们的语言自然也就成为人们仿效、学习的一种权威方言，在公众场合通用。这与英国殖民者征服美洲大陆时的情况有点类似：人数虽少，但在各个领域中都处于支配地位，吴语自然也就成为各土著居民学习的对象。至于这种语言要融合、替代各土著居民的语言，那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到本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还能对印第安语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就是一个证明。在商品经济的时代尚且如此，何况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没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洛阳近傍之方言”是无法排挤、替代当时的“江东”方言的。

吴、湘、“晋”三大方言的系统性、动态性的比较说明，演化方式的共同性、相似性和平行性是验证方言亲疏关系的最重要的根据。吴方言与湘方言的共同性大于它与“晋”方言的共同性，所以它们的关系也就更近，分离的年代也要晚得多。语言年代学已经证明了这种假设。动态的、系统的比较以结构格局的静态比较为基础，但显然又比它前进了一步，如果有条件，我们应尽可能进行这种方式的比较。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如果材料可靠，方法

的运用得当,就可以突破历史比较法的"原子主义"的束缚。这对历史语言学将是一个具体的贡献。汉语的研究有条件作出这种贡献。

六　文白异读和始原形式的拟测

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有对应关系的语言差异去拟测始原语,以便使头绪纷繁的语言变化现象有一个汇聚点,音变的解释有一个参照点。这一方法论原则适用于语言"变化"方式的研究,现在把文白异读之类的"竞争"引入语言演变的研究,这种原则也就需要作一些变通和必要的补正。

"变化"的机制是"变",需要在音理上解释清楚 A 为什么会"变"成 B;"竞争"的机制是"选择",在几种形式中"选择"某一种形式。语言演变的两种机制自然会给始原语的拟测提出不同的要求。语言中提供选择的形式都是现成的,"文"与"白"又说明了它们是不同系统同源音类的叠置,这就可以从现实语言的竞争形式中去考察方言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始原状态。比方说,汉语浊声母的性质是送气的还是不送气的?自高本汉以降,曾一再引起争论。其实,这没有多大的必要。根据山西方言文白异读提供的线索,中古的浊塞音、浊塞擦音诸组,或全送气,或全不送气,或以声调的平仄而区分为送气和不送气两类,都是语言中实际存在的方言差异,体现汉语的早期状态。现代方言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都是古代方言的延续和继承,不是从某一种始原形式中"变"出来的(见第113-123页的分析)。始原语有没有方言差异?这本来是历史比较法不易解决的一个难点。现在通过对"竞争"形式的分析就可以透视始原语中方言差异的一些状态,不能不说是对历史比较法的一个补充。

不过,上述的情况究属罕见,在多数情况下还得通过不同形式

的比较去进行拟测。由于白读在时间层次上早于文读，而结构格局的比较又可以衬托出它早期的结构状态，因而它在始原形式的拟测中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比方说梗二，我们从语音结构格局的比较中已经知道它的主元音是 a，这就可以成为拟测的一个重要根据。《切韵》音系的研究忽视了这种有价值的线索，而把梗二的主元音拟测为 *ɐ(庚)、*æ(耕)，与其他各摄二等韵的主元音 *a 不一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拟测？根据高本汉(1915—1926，511)的解释，一是为了避免与宕摄字相混，二是便于解释方言之间-əŋ(北方方言)与-aŋ(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第一个理由是出于逻辑考虑，照顾摄的分野。这一理由似乎不充分。宕一拟测为 *ɑŋ/k，宕三拟测为 *iaŋ/k，江二为 ɔŋ/k，把梗二拟测为 *aŋ/k，不会产生音类上的混淆。障碍可能在梗二和宕三的阳，因为梗二拟测为 *aŋ/k 就会出现不同的摄、不同的等具有相同的主元音，与其他各摄的结构不一致。摄与等是观察切韵音系的结构的两个窗口，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得以语言事实为根据。如果根据白读提供的线索把梗二拟测为 *aŋ/k，与阳的 *-iaŋ/k 发生纠缠，那就只能承认“等”的系统性和平行性，不要过分拘泥摄的限制。梗二和阳发生“纠缠”是有道理的，因为梗二来自上古的耕部(耕)和阳部(庚)，历史来源上和来自古阳部的阳韵字有“纠缠”；有些方言(如苏州话)梗二的读音除介音的有无外与阳韵相同，现实的语言有“纠缠”。把梗二拟测为与阳韵有纠缠的 *aŋ/k，更能反映语言的实际状态，而且也不会影响梗三的拟测。至于庚二耕，在现代方言中没有发现差异，那就可以根据张琨(1985，238—250)的假设，简化为一。

高本汉所考虑的第二个理由恐怕是由音变的偏见造成的。音变可以分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和叠置式音变三种(徐通锵、王洪君，1986)。在音变的研究中一般只有连续式音变的观念，以语音

条件为转移去考察"语音规律无例外"式的变化。高本汉出于这一考虑把梗二的主元音拟测为*ɐ,以便解释它如何高化为ə(-əŋ)或低化为a(-aŋ)。根据史料和现实方言提供的线索,梗二合流于曾一不是通过连续式音变的形式"变"过去的,而是通过离散式变异的途径"变"过去的。在汉藏对音的时代,德与陌(麦)已呈现出有分有合的交叉状态(罗常培,1933,64),类似现实语言中的离散式变异。洛阳方言德归入陌(麦)也是通过离散式变异的方式进行的,因而现在还有"北贼墨"三字读-ei的残迹。至于各方言通过文白的竞争而使梗二合流于曾一,那是"竞争"的结果,与*ɐ"变"ə无关。

所以,高本汉把梗二的主元音拟测为*ɐ的两条理由好像都难以成立,不如根据白读所提供的线索和语言的系统性原则,直接把梗二拟测为*aŋ/k。

前面说过,根据文白异读的线索区分"竞争"性的层次和"演化"性的层次,这是有层次地进行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前提。在始原形式的拟测中如果不顾这种前提,混淆两种不同类型的层次,一切都纳入同一个共时平面去进行研究,那么就会扭曲语言的实际状态,使语言演变的线索纷乱而不规则。始原闽语(Proto-Min dialect)的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教训。

始原闽语的研究始自美国语言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1973、1986)。他撇开历史上的书面文献资料,严格地遵守历史比较法的程序和原则,比较闽方言的内部差异去拟测始原闽语的结构。比方说《切韵》的並母字在现代闽方言中有三种语音表现形式,请看表15:

【表15】《切韵》的並母在闽方言中的语音反映

	切韵	福州	厦门	建阳	邵武
爬	ba	pa^{2}	pe^{2}	pa^{2}	pʻa^{2}
病	biɐng-	paŋ^{6}	pĩ^{6}	paŋ^{6}	pʻiaŋ^{6}
皮	bjie	pʻui^{2}	pʻe^{2}	pʻu^{2}	pʻei^{7}
雹	bȧk	pʻoi^{8}	pʻauʔ^{8}	pʻo^{8}	pʻau^{7}
瓶	bieng	piŋ^{2}	pan^{2}	vaiŋ^{9}	pʻen^{2}
步	buo-	puo^{6}	pɔ^{6}	vo^{6}	pʻu^{6}

一个*b(並)有p-、pʻ-、v-三种形式，罗杰瑞据此拟测，认为始原闽语有三套浊声母b、bʻ、-b，分别对应于现代的p-、pʻ-、v-；与此对应，清塞音、清塞擦音也有三套声母，如唇塞音就有p、pʻ、-p。这第三套声母是弱化声母，是前面的前加成分因消失而留下来的痕迹。这种拟测就是把文白混在一起、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层次的结果。並母字在闽方言的p-、pʻ-两种读音是始原方言差异的反映和延续，体现"竞争"中的两种层次，不是从一种形式中"变"出来的。第三套弱化声母是罗杰瑞的独创，目的是用来解释闽方言的所谓"第九调"："用《切韵》音系作依据来解释某些闽方言的声调的演变是不合适的，需要假设一些另外的声母特征来解释"。所以"第九调"是始原闽语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有没有第三套声母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九调"的字主要来自古平声，占83%，而且其中又以古浊平字为主，所以中国语言学家把它称为阳平乙。确实，这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从《切韵》中无法得到解释。很多语言学家对这种特殊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第九调"和第二调(阳平)是方言中的

文白异读，不是始原闽语的结构的遗存。平田昌司(1988,20,22)根据闽方言的事实对“第九调”和弱化声母的内在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认为“建瓯方言的第二调和‘第九调’的分化就是古浊平字在声调上的文白异读，并不是弱化声母的痕迹。闽北地区的其他地点的‘第九调’现象也可以类推”，建瓯话“第二调(阳平甲)相当于石陂话古浊平(清类)，渊源于闽语……‘第九调’(阳平乙)相当于石陂话古浊平(浊类)，渊源于吴语。这可以说明闽北各地‘第九调’字不很固定的原因：两个方言相互渗透情况各点不平衡，吴语成分的多寡也不会一致”。这给闽方言某些复杂现象的成因提出了一个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说明汉语中根本不存在“第九调”和“弱化声母”。张琨(1988,457)根据他对《建州八音》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建州方言中的词汇似乎是东拼西凑而来的。像这样的方言要经过一番分析的工夫才能进行比较工作。要是不加分析，用一些像《建州八音》中的材料构拟出一个早期的音韵系统，这种构拟的结果一定会是四不像的东西，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解释，在其他汉语方言中找不到对应关系”。这些批评是很有说服力的，它抓住了汉语方言关系的特点。

对闽方言“第九调”的讨论涉及到语言史研究中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一定要把语言中叠置在一起的“文”与“白”区分开来，不能把“竞争”的事实用“变化”的眼光来解释。始原语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文白异读的特殊性。

历史比较法是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种语言史的研究方法，它虽然为语言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仍然需要根据不同语系，不同语言的特点进行一些必要的改进和调整，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机械地模仿，照印欧系语言历

史比较研究的"葫芦"去画汉语历史比较研究的"瓢"，恐怕很难取得有效的成果。梅耶（1925）早就对此发出过严厉的警告："……那些在印欧语领域里得到成绩的办法，并不是随便在什么地方一样可以应用的。我们必须详细的考察我们所采用过的那些方法，看看它们是否合用，以及怎样才能够扩大它们的用途，并且把它们加以改变，以求适合新领域研究的需要，而不至于降低它们的严密性。"我们根据汉语文白异读的特点对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和程序作了一些调整和改进，希望能借此"扩大它们的用途"，"以求适合新领域研究的需要"。

1989、8初稿

1990、5定稿

【附注】

①语言年代学是推算语言分化年代的一种方法，虽有诸多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我们可以据之参考。这里的计算据 M·Swadesh 的百词表。吴（苏州话）、湘（双峰话）方言的材料分别由谢自立（男，51）和凌超凡（男，68）两同志提供。基本词根语素（basic-root-morpheme）所表示的概念如果在方言中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我们选择有方言特点的那个词语。基本词根语素的千年保留率我们没有采用 R. B. Lees 的81%的常数，而是根据古今汉语的比较而得出的83%。详情可参看徐通锵（1991）的分析。

②这里据胡双宝同志提供的文水话计算。

语言变异的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

一

语言研究方法与语言观有关。方法的改进与发展也就是语言观的更替。

语言观，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科学发展的思潮在语言研究中的反映。历史比较法的诞生与运用和研究物种变异的生物学的发展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518)指出：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比较方法的运用是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语言研究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科学。进入二十世纪，科学发展的思潮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以牛顿的物理学为基础的机械论的认识论开始崩溃，"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的中心。到处都碰到那种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甚至在原子这样的基本物理实体内部也是这样。牛顿机械论对这种复杂性作出解释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怀疑。相对论在物理学领域代之而兴起；在微观物理学领域，接替机械论的是关于量子理论的科学"(拉兹洛，1985，9)。"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的

中心"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代替机械论的认识论是科学发展思潮的一次深刻转折，在语言研究中首先反映这种转折的是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过去人们比较注意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与杜尔干的哲学思想的关系，这自然有道理，但杜尔干的哲学思想本身也只是对科学发展思潮的一种总结。我们还需要把语言研究放到科学发展思潮的背景中去认识。从这种角度去考察，《教程》的新思想就在于研究语言中的"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为了实现这一点，德·索绪尔(1916)首先区分语言与言语，认为"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中译本，30页，下同)，因而是异质的(36)，而"语言却是同质的：它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里，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36)，所以语言是一种同质的系统(homogeneous system)；而为了要进一步认清这种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就必须把语言分成共时态和历时态，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只存在于语言的共时态之中，要集中力量研究这种共时态，因为"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同时研究它们在时间上的关系和系统中的关系"(119)。所以，只研究语言，不研究言语；而在语言中又只着重研究共时态，这是德·索绪尔为认识语言中"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而付出的一种代价。有了这样严格的限制，德·索绪尔就进一步规定语言这种同质系统的实质："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158)；所谓"形式"，按德·索绪尔的理解，就是指语言的音韵、语法和语义的结构，即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这样，德·索绪尔就在语言研究中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的中心"这种科学发展的思潮具体化了，使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又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种转折的

主要特点是从上一世纪只着重研究个别语言成分的“原子主义”方法向系统的研究转化，后来的结构分析法和转换分析法是这一转折的深化和发展。

结构分析法和转换分析法一般都认为是两个对立的学派。这诚然有它的道理，因为结构分析法的方法论核心是替换(substitution)，用一种严格的手续去离析语言中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而转换学派的方法论核心在初期的很长一段时期中是转换(transformation)。但是，这些对立和区别并不能掩盖它们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的共同性，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语言系统的同质理论。它们都把语言看成为内部没有变异的、完全纯一的一种静态的系统。就这一点来说，转换学派比结构学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语言理论主要是研究纯粹同质的言语社团中理想的说话者——听话者”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而不管它的语言运用(performance)。“能力”与“运用”也就是“语言”与“言语”的另一种说法，在语言观上是一脉相通的(chomsky，1965，2)。由于两个学派在语言观的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也就不可能没有内在的联系，“转换主义者们对结构语言学所作的批评，给人以错误的想法，实际上转换理论是靠美国布龙菲尔德学派传统而形成起来的。乔姆斯基是哈里斯的学生，不仅因为他发展了哈里斯所提出来的转换思想，短语结构语法要是没有美国结构语言学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尽管结构主义者曾有时怀疑他们的理论和短语结构语法相当，尽管转换主义者曾坚持短语结构语法的有限性，人们一定不要忘记这种语法在转换理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莱普斯基，1970，149)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结构学派和转换学派是语言同质理论的两个分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中“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结构学派通过替换的方法考察语言单位的对立

关系、分布关系以及它们在组合中的层次关系(直接组成成分结构),而转换学派则通过转换的方法着重考察句式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就是说,在语言系统同质说的基础上结构学派和转换学派大体上弄清了语言共时状态中的某些"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在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上完成了从"原子主义"向系统主义的转折。

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系统同质说内部也隐含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由于坚持语言系统的同质说,语言的研究需要纯一的语言材料,没有变异,没有差异,没有其他成分的混杂,但是在言语社团中根本找不到这种纯而又纯的语言材料,因而只能求助于个人方言(idiolect),或者用转换学派的话来说,只研究"纯粹同质的言语社团中理想的说话者——听话者"的语言能力,"一种语言的语法,指的是对理想的说话者——听话者内在的语言能力的一种描写"。(chomsky,1965,5)但是,这么一来,语言的研究就陷入了索绪尔式的矛盾(Saussurian paradox):"研究语言与社会相关的一方面(语言 langue)时,只要观察任何个人就行,而研究语言与个人相关的一方面(话 parole)时,却要从社会环境中去观察。"(拉波夫,1970,18)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这种索绪尔式的矛盾越来越表现出它的一些消极影响,以转换学派为例,很多重要的语言现象都被纳入语言运用而不予研究,这就不能不使语言研究的路子越来越狭窄。其次,语言系统同质说既然要求语言材料的绝对的"纯",自然就把语言和其他现象分离开来而成为一种自足的系统。语言理论对"系统"的这种理解与科学上关于"系统"的看法是矛盾的,因为科学的系统观需要考察系统的输入输出活动,也就是不仅要考察事物本身的结构,而且还要研究它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注意它在时间和空间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把语言看成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就离开了时间和空间的条件,离开了它与周围环境的关

系。转换学派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他认为语言虽然可以偶尔用于交际，但它是人类天赋的产物，与交际无关；语言虽然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但与思维无关，“我认为，事实上我也十分确信：思维无需语言也能进行得十分好……我十分确信：思维是不依赖语言的。”（引自莱普斯基，1970，148）这种认识不能不把语言的结构放进语言学家所建造的象牙塔里，脱离了现代科学思潮的发展。第三，语言系统同质说所讲的系统是绝对静止的，排除一切动态的因素，用德·索绪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同时研究它们在时间上的关系和系统中的关系”（119）。但是，事物恰恰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没有绝对静态的平衡，只有动态的平衡，即只有处于动态中的稳定状态。我们或许可以用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比方大楼里的一部台阶式的电梯正在向上运动，有一个人却从电梯上向下行走，而其走的速度正好与电梯往上运动的速度一样，这样，他尽管在不停地运动，但始终“呆在原来的地方”。语言的动态稳定或动态平衡犹如电梯上逆向运动着的“人”，是在言语社团中运用着的“呆在原来的地方”的静态或平衡。所以，语言的研究不能只是研究个人方言或理想的说话者——听话者的语言能力，而要研究言语社团实际运用中的语言。

上述三方面的情况说明语言系统的同质说与科学的系统论思想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以这种语言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它的局限性。结构分析法只能做到语言材料的分类，即只能体现德·索绪尔所说的语言“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30）的思想，而无法对语言现象作出因果性、规律性的解释。转换分析法虽然能分析句式之间的关系，解决了结构分析法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但研究的对象仍旧局限于个人方言，即“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团中的理想的说话者和听话者”的

语言能力，比结构分析法没有前进多少。转换分析法的贡献主要是对语言研究方法进行了数学化的改造，其具体的分析步骤有些类似计算机的程序设计，使输入的深层结构通过转换规则的作用变成输出的表层结构，语言学家编制、设计转换规则犹如数学家编制计算机的计算程序。但是，语言现象太复杂，决不是仿效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办法所能解决的。运用转换规则从深层结构中转换出来的表层结构，（通过音韵规则），包括大量不合语言规律的句子，说明转换不是语言分析的灵丹妙药。面对实际的语言状态，生成一转换学派也不得不设法限制转换规则的运用范围，降低它的作用，到了今天的支配与约束理论（the theory of goverment and binding，简称 GB 理论），已只有一条“移位 α”（move α，α 代表任何成分）的转换规则。当然，这里的“一条”与这个学派初期的一条转换规则的“一条”意思不一样，它更为抽象和概括，但是转换方法的地位和作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转换——生成学派来说，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退却。这个学派诞生之初，“转换”是它的“革命”的标志，现在它自己不得不降下这面“革命”的旗帜，说明这种方法的实际效用是有限的。把乔姆斯基的学派称为“转换学派”，现在看来有点名不副实，人们只是作习惯的称呼罢了。

所以，语言系统的同质说从理论到实践都陷入了困境。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只是孤立地、静止地考察个人方言中的“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而不是从时间和空间中去考察运转着的语言的结构。要摆脱这种困境，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需要有一个新的转折：把自足的语言系统转化为它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系统，把语言系统的绝对静态的平衡转化为动态的平衡，或者说，把对语言系统的静态研究转化为动态的研究。

二

要实现语言研究方法论的新转折，需要有一种新的语言理论模型，或者说，需要有一种新的语言观，以便把语言系统同质说弃之不用的语言变异(variation)，即实际语言中存在的一些杂乱的现象纳入语言研究的领域，对语言的结构进行动态的分析。

变异，这是语言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早就引起一些语言学家的关注。例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人在他们各自的《语言论》及其相关著作中就进行过很好的分析。语言系统同质说的语言研究，由于要求语言材料的绝对的纯，就把这种重要的语言现象排除出语言研究的范围。随着科学思潮的发展和语言系统同质说的弱点的日益表露，人们认识到这种变异现象的研究在实现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中有重要的价值。首先从方法论角度去认识这种现象的是拉波夫等人的《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一文。他们把语言放到社会环境中去研究，具体地分析语言的变异，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同质的系统，而是一种有序异质(orderly heterogeneous)的结构。"有序异质"，这是一种新的语言理论模型，可以具体地分析语言的变异以及它在结构中的地位。这种理论模型的要点可以概述于下：

每一个言语社团所说的语言可以分为若干个子系统(subsystem)，每个子系统相当于德·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系统。方言交界处的人们的头脑中常常有两个子系统(A 方言系统和 B 方言系统)，来自方言区的人们大多有本方言和普通话两个子系统，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们也可能有古、今语言的两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体系，受共现(co-occurrence)规则支配。比方说，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上海人，在与同乡讲话时使用他

的上海话的子系统，这时候他要同时使用上海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即三个层面的上海话的规则是共现的；在其他情况下他使用普通话的子系统，这时候他就同时使用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他根据交际的需要通过代码转换不断地更换两个不同的子系统，即把上海话的代码转换为普通话的代码，或者相反。一般说来，文化水平高、生活经历复杂、经常在外地跑码头的人，脑子里贮存的子系统比较多；相反，生活单纯、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的人所掌握的子系统就少。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不是互补的，而是相互竞争的，说话人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不同的交际对象而选择某一子系统进行交际。由于在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中可以共存着几个不同的子系统，因而各子系统就有可能相互干扰，使子系统中出现变异成分(variable)。比方说，一个上海人用普通话这个子系统进行交际时会带有一些上海话的因素，这是他的普通话子系统中的变异成分；而在用上海话这个子系统进行交际时同样也可能会带有一些普通话的因素，这是他的上海话子系统中的变异成分。这种变异成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变异形式在平常情况下的分布是随机的，无序的，对其他人的语言表达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某一变异成分在言语社团中被某一社会人群接受，并开始传播，那么无序的变异就进入有序的行列，意味着演变的开始。如果使用这种变异成分的社会人群在言语社团中具有某种特殊的地位，那么这种变异成分就可能会成为其他社会人群的仿效对象，从而使它从这一群人扩散到那一群人，完成演变的过程。所以，变异成分和某种控制因素存在着一种共变(co-variation)关系。这种变异成分可以用变异规则来分析。变异规则的公式是：

A→g【B】/X[Z]Y

g【B】=f(C、D、E)

这个公式的意思是：A 在“$X\left[\underline{\ \ }\,Z\right]Y$”的条件下变成 g【B】。g【B】 表示一组数值，具体表现为哪一个数值由控制因素 C、D、E 决定，即相互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常见的控制因素有风格、年龄、阶层等。比方说，在美国纽约市的英语中有一个变异成分 r，即 car，card，four 等词中的 r，它在二次大战前一般是不发音的，而在二次大战后有些人发音，有些人不发音，而发不发音则与人群的社会地位、阶层划分有密切的关系，“假若纽约市本地人中有任何两个集团在社会分层的阶梯上处于高低不同的地位，那么他们在发 r 音上也会表现出相应的体现声望高低的差异”（拉波夫，1972，121）。如用变异规则来分析这个变异成分，则可表述为：

$$r \to g[r] \quad / \underline{\ \ \ }\left\{\begin{matrix}K\\ \#\end{matrix}\right\}$$

g【r】 =（风格、阶级、年龄）

意思是：r 在辅音前或词末的位置上有变异，具体地如何变异，由风格、年龄、阶级等控制因素决定。下图（见174页）表示变异成分 r 与不同控制因素之间的关系：

图中的纵轴表示 r 的指数，即 car，card，where 等词中 r 出现的百分数，指数越高，表示 r 这个标准形式用得越多。横轴表示不同风格的阶。不同阶级的人在不同风格中使用 r 的情况分别用曲线表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变异成分 r 的出现既受社会阶级的制约，也受风格因素的制约。在纽约市英语中，变异成分 r 是一种威信特征，使用 r 被看成为社会地位高，有教养的一种标志，代表一种标准形式，因而不同阶级的人在说话时总要向这种标准形式看齐；越是在正式场合，r 出现的指数越高。在这方面，各阶级之间大体上表现出平行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下层中产阶级矫枉过正的现象，在正式的场合有两次超出上层中产阶级。这种矫枉过正的现

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威信特征向下转移和完善语言变化的一种重要机制"。

和阶级、年龄、风格等社会因素一起共变的变异成分的变异也有可能会在语言系统中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例如,在纽约市英语的元音中有一个变异成分/ah/①,即 car,father,guard,bar 等语素中的元音,它是另一个变异成分/oh/(coffee,more,lost 中的元音)的函数(function),即它的变异要受/oh/的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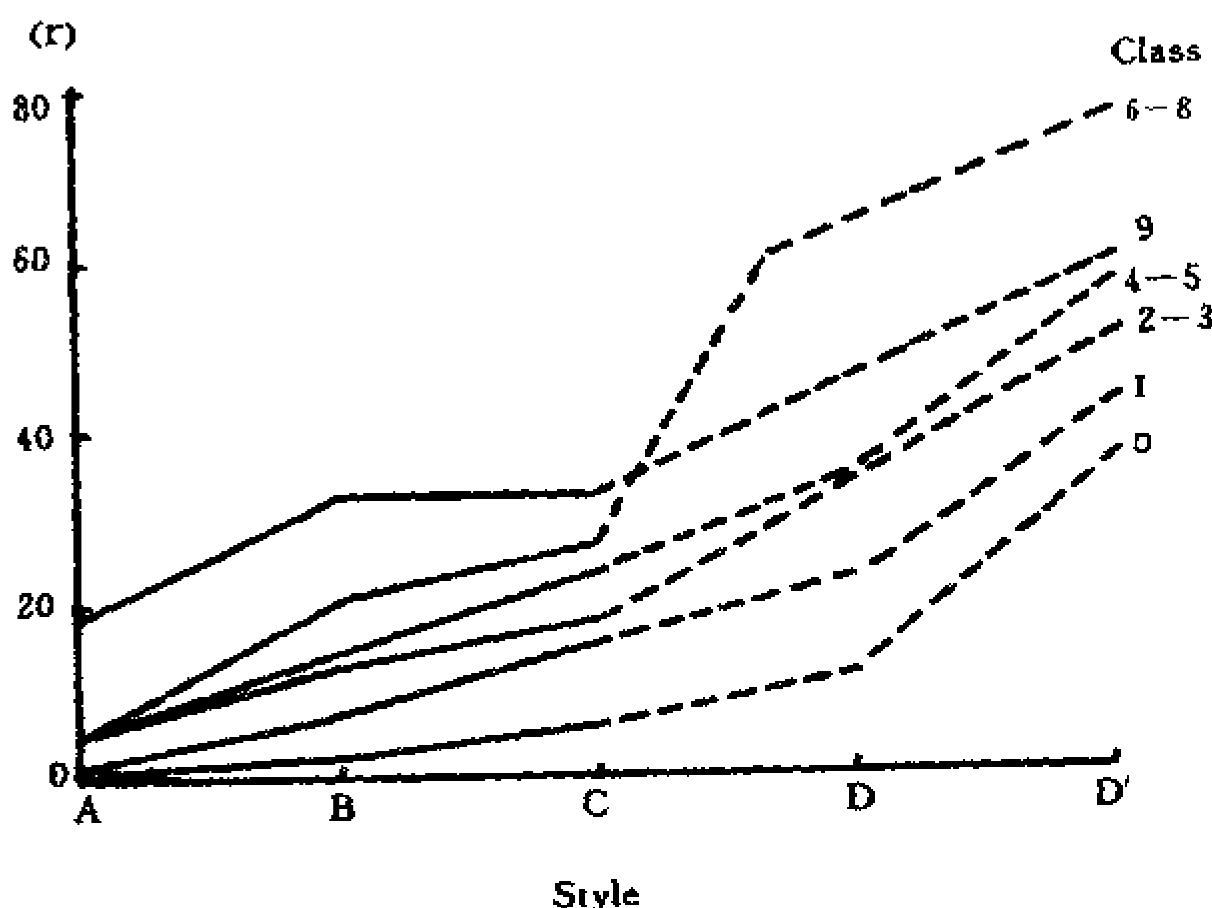
ah = f(oh)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变异成分/ah/的变异还要受第三个变异成分/eh/(bad,dance 中的元音)的制约:

ah = f((eh)(oh))

这种连锁式制约的大体情况是:假如/eh/比/oh/高,那么/ah/相对地要靠前一些;如果/oh/比/eh/高,/ah/就要稍为后一些。这些变异成分的变异还与/ay/、/oy/有关,这里不一一列举(详细情况可参阅 Lehmann & Malkiel eds,171-181)。变异成分之间的相互函数关系,其第一个变异成分的变异和某种社会因素存在着一种共变关系,其他的环节则只受语言内部的变异的制约。

上述的情况说明,与变异成分有共变关系的因素是"异质"的,它既可以是语言的因素,也可以是非语言的如阶级、年龄等因素。这种语言理论和语言系统同质说比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它摆脱了语言的理想状态(以个人方言为基础)的研究,而着眼于语言实际状态的分析;它不是把语言看成为一种自足的系统,而认为它与社会环境有紧密的联系,应该把它放到社会环境中去研究;它不是把语言看成为一种绝对静止的系统,而是通过变异成分的分析对语言进行动态的考察。总之,它开始把语言放到时间和空间的运动中去研究,以显示语言与社会、共时和历时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这



注：

A. 随便说话	0,1下层阶级
B. 留意说话	2-3 } 工人阶级
C. 读书	4-5 }
D. 念词表	6-8下层中产阶级
D′. 最小对比 (minimal pairs)	9上层中产阶级

方面来看，有序异质的语言理论比语言系统同质说前进了一步。这是它对语言研究的一个贡献。

三

有序异质语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吸取了系统论中的"有序"的概念，使现代科学的思潮在语言研究中得到了一些具体的反映。如象许多新生的事物在开始的时候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一样，这种理论现在看来还比较粗疏。第一，它过多地注意变异成分和它的社会分布的分析，而忽视这种变异与语言的整体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以显得零散，不系统，象拉波夫那样，研究变异成分之间的一些相互函数关系，在社会语言学家中还鲜有其人。大多数社会语言学家的注意力基本上循着变异成分和社会控制因素之间的联系而着眼于社会因素的研究。这好象与语言研究的任务有点儿背道而驰。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弄清楚在时间和空间中运转着的语言的结构，语言变异的研究似应服从于这样的一个总目标。语言系统同质说的理论缺陷并不在于它研究了结构，而是它脱离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运转条件；而就结构的研究来说，它是有功的，因为它使人们看清了语言内部的组织状况，从而为语言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老实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我们今天也就没有条件来研究变异，因为分不清什么是结构，什么是变异，一切都处于混沌之中。我们今天研究语言变异的目的是为了改进结构的研究，使它从静态的平衡转向动态的平衡，而不是玩味于个别变异成分的变异。

第二，"有序"，这是有序异质理论的核心，但对它的价值以及它在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中的地位似还缺乏充分的认识。

变异是有序之源，有序是变异改进语言结构的必由之路，只有那些和某种控制因素发生共变关系的变异才能进入有序的行列，不然它们在语言运用中无声无息，逐渐消失。进入有序状态的变异

有它的变异方向，总的目标是改进语言的结构，但有序异质的语言理论恰恰在这方面缺乏具体的研究。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是改进语言研究方法的关键。青年语法学派认为音变是盲目的(见索绪尔，1916，213)。萨丕尔(1921，154，138)已经感到这种盲目性的音变理论是不对的，因而提出有方向的沿流(drift)说，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固定的。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成分、每一种说法、每一种声音和重音，都是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由看不见的、不以人意为转移的沿流模铸着，这正是语言的生命。无可争辩，这沿流有一定的方向"、"任何重要的改变一开头必须作为个人变异存在，这不容怀疑，但是不能就此说，单只对个人变异做一番详尽的描写研究就能了解语言的总的沿流。个人变异本身只是偶然的现象，就象海水的波浪，一来一去，无目的地动荡。语言的沿流是有方向的。或者说，只有按一定方向流动的个人变异才体现或带动语言的沿流，正象海湾里只有某些波浪的移动才勾画出潮流的轮廓。语言的沿流是由说话的人无意识地选择的那些向某一方向堆积起来的个人变异构成的"。萨丕尔在六十多年前就对变异和它的演变方向提出如此精辟的论述，实在难能可贵，只是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他还只是模糊地感到有一种"看不见的、不以人意为转移的沿流"在支配着变异的去向，而没有找到通向这种去向的道路。雅科布逊、马尔盖耶尔(1984，212)等语言学家也不同意青年语法学派关于音变是盲目的理论，认为音变是有目标的，但也没有找到通向目标的途径。有序异质的语言理论引进系统论的有序的概念，找到了通向目标的道路，但遗憾的是它没有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以实现它的目标，去探索有序的变异如何改进语言的结构。这是有序异质的语言理论的一个严重的薄弱环节。

结构、变异、有序、目标，这本来是一个整体的几个不可或缺的

侧面，现在缺少目标的研究，自然会影响到有序异质的理论的价值。作为一种语言观，这种理论的提出已有二十来年，但是它在语言研究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似还不够广泛、深刻，难以与当年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理论、德·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学说、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理论所产生的影响相比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对进入有序状态的变异如何转化为结构、实现它的目标的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探索，因而人们比较容易满足于一些孤立的、零散的变异现象的描写，而不去研究转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拉波夫是有序异质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他的研究或许可以说代表了这一语言理论的发展方向。他虽然没有满足于个别的、孤立的变异现象的分析，而且后来还研究了变异的规律，从微观的音变中去悟察历史语言学中争论不休的两个对立口号("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各自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写出了有影响的《解决青年语法学派的争论》一文，但是也还没有把变异和演变的目标联系起来去考察变异如何转化为结构的条件、机制和规律，真是功亏一篑。

从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来说，有序异质的语言理论与语言系统同质说相比，似乎是进一步，退两步：把语言放到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把变异引进语言研究的领域，从而使语言的结构具有动态的性质，这是它比语言系统同质说"进一步"的表现，而离开结构、主要着眼于孤立的、零散的变异现象的分析，这好象又回到结构语言学所批判的"原子主义"的道路上去，因而比语言系统同质说又后退了一大步。这后退的一大步是致命的弱点，因为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弄清楚在时间和空间中运转的语言结构的特点，不能给结构的研究增添光色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是难以发挥它的有效的影响的。因此，对于有序异质的语言理论，我们只能肯定它的

"进一步",绝不能追随它的"退两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改进语言研究方法的出路恐怕是在于把结构、变异、有序、目标四者结合起来,探索变异转化为结构的规律,对语言系统进行动态的分析。这种"四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公式:

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

处于公式两端的两个"结构"不是一个东西:第一个"结构"是语言的现状,是变异的出发点;第二个"结构"是有序变异的目标和归宿,是经过变异之后而实现的一种改进了的结构;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有序状态的变异"则是从第一个"结构"跃向第二个"结构"的必经途径和桥梁。简单地说,就是从结构出发,经过有序状态的变异而实现一种新的结构,使语言结构呈现出动态的特点。这三个阶段在实际的语言状态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从联系中去把握它们的实质。语言系统的同质说只研究第一个"结构",社会语言学的有序异质理论只研究两个"结构"之间的桥梁和过渡环节。它们对语言研究各有自己的贡献,但也各有自己的片面性。我们希望能在它们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把三个阶段统一起来,为实现对语言结构的动态分析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音系是语言系统中结构性最强的一个领域,我们可以用音系的变异为例来讨论上述"四结合"的研究方法的有关问题。实现这种"四结合"的办法是先在言语社团中选择并研究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个人方言(idiolect),仔细地比较它们的异同,找出其间的差异和变异成分;而后以这些变异成分为基础,编出新的调查表,进一步考察它们的社会分布,理出音系中的变异层次,使杂乱的变异形式分部别居,各得其所;最后探索各层变异的规律和它们对音系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对音系的结构进行动态的分析。根据我们对浙江宁波方言、山西闻喜方言、祁县方言等的调查和研究,

个人方言之间除了彼此相同的部分以外相互间还有一些处于有序状态的变异；这些变异不是“遍地开花”，到处都是，而是集中表现在某些因素上。彼此相同的部分是共时音系的稳定层，处于有序状态的相异部分是音系中的变异层；变异又可以根据变异的不同特点分出三个层次：音位音值的渐进变移层、体现语素读音逐一变化的音类扩散层和以文白异读为代表的异读叠置层。每一个变异层都有自己的变异规律（徐通锵、王洪君，1986）。我们现在想在这个基础上前进一步，把有序状态的变异和演变的目标结合起来，探索变异转化为结构的条件、规律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

四

山西祁县方言的高元音系列有很多杂乱的变异形式②，其中y的变异形式如下表：

语音 例字 / 发音人	女	举	区	虚	鱼
古县（范）	ᶜȵy$^{(u)}$	ᶜtɕy$^{(u)}$	꜀tɕʻy$^{(u)}$	꜀ɕy$^{(u)}$	꜀y$^{(u)}$
城关（阎）	ᶜȵy^{u}	ᶜtɕy^{u}	꜀tɕy^{u}	꜀y^{u}	꜀y^{u}
城关（段）	ᶜȵ^{i}yu	ᶜtɕ^{i}yu	꜀tɕʻ^{i}y^{u}	꜀ɕ^{i}yu	꜀^{i}yu
城关（彭）	ᶜȵi^{y}u	ᶜtɕi^{y}u	꜀tɕʻi^{y}u	꜀ɕi^{y}u	꜀i^{y}u
城关（王）	ᶜȵiu$^{\beta}$	ᶜtɕiu$^{\beta}$	꜀tɕʻiu$^{\beta}$	꜀ɕiu$^{\beta}$	꜀iu$^{\beta}$
城关（青少年）	ᶜȵiu$^{\beta}$	ᶜtɕiu$^{\beta}$	꜀tiu$^{\beta}$	꜀ɕiu$^{\beta}$	꜀iu$^{\beta}$

个人方言的这些差异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渐次变移：两头的差异（范和青少年）是清楚的，相互连接的两种变异形式之间的差异是微细的，难以区别；本地人对这些差异的反应是漠然的，

因为不同的变异形式还没有区别的功能(对立)。这些变异形式,从语言系统同质说的语言共时状态来看,是杂乱的、无序的,因为它们的差异与语音的分布条件无关,也找不到形成这些差异的其他语言条件。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到社会中、放到时间和空间中或者放到语言的整体结构中去考察,我们就能找到控制这些变异形式的条件,发现它们的分布呈有序的、有方向性变异的状态。

与这些变异形式有共变关系的社会控制因素看来与不同的年龄层有关。老年人似刚摆脱单元音-y(祁县的邻县如太谷等地,上表中例字的元音仍为典型的-y)的状态而开始变异的进程。古县音变的起步时间似比城关晚一点,因而古县(范)的发音更接近单元音-y,他只是在发音的末尾舌根有一个略往后收的动作,从而带出一个轻微的、似有似无的-u 的色彩。如果不经仔细的比较,就很难发现这种细微的发音特点(我们在1980年夏天曾调查过范的发音,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在上表中在-y 的右上角加一个带括号的 u,以示它的音色很轻微。城关(阎)等老年人,在-y 韵中已能较明显地听到-u 韵尾的音色,但音程短,音色弱,因而记在右上角。随着年龄的推移,原来-y 的音值逐渐消失而分裂为 iu。城关(段)y 后的 u 的音色较强,已不是附带的寄生元音,而是一个独立的元音。可能是由于两个圆唇元音(y、u)连在一起而发生一点异化作用的缘故,y 前已滋生 i 的音色,而到城关(彭)、城关(王)、城关(青少年),-iu 音色逐渐明晰,其中的 i 成为介音,原来的元音 y 完全退出发音,而-u 则成为主要元音;这个-u 后而还增生了一个-β韵尾的音色,不过这另有原因,下面再说。所以,如果把与-y 韵有关的各种变异形式放到社会环境中去考察,就可以看到它们与年龄有共变关系,因而是有序的,可以排列出上述有序的表格,呈现出变异的大致趋向。空间的差异也可以补充说明这种有序的分布

状态。祁县南部来远乡（发音人张太平，男，教员）的-y 韵已变为-iu$^{\beta}$，演变的进程比城关似乎快一点。比较古县、城关、来远三个点的语音差异，也呈现出空间的差异反映时间的发展序列，与其在城关的年龄层中的分布状态一致。这种一致性不是偶然的。在一个言语社团里，音变总是由某一部分人率先开始，而后一方面有次序地扩散到其他居民层和下一代，表现为言语社团内部的语言变异；另一方面也将有次序地扩散到周围地区，表现为语言的地区差异，这就使语言在言语社团内部的变异和它在地区上的差异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两方面的状况都说明语言的变异呈有序的分布状态。

有序异质的语言理论只讲到变异成分与社会控制因素之间的共变关系，而很少说这种共变关系与语言结构的关系。从我们所研究的祁县、宁波等地的方言来看，这种共变关系显然是受语言结构的制约的。祁县的-y 为什么会发生变异？它与同一系列的高元音 i、u 的变异有关。由于元音的高化，高元音因无法再高化而发生变异：i 向 ɿ 转移，u 向$^{ə}u^{\beta}$ 转移（徐通锵、王洪君，1986），所以 y 的变异与 i、u 处于一种平行的共变关系中；由于-iu 中的 u 正好赶上-u 向-$^{ə}u^{\beta}$ 的变移，因而在部分中年人和多数青少年中也增生了一个-β韵尾，即上表中的-iu$^{\beta}$，只是音色还比较弱而已。高元音系列的这种平行的共变关系，人们早就说过，拉波夫等人在前述的那篇著名文章中也清楚地指出"前后的对称性是语音演变中的一种近乎普遍特征的条件"（175 页），但问题是，祁县方言的 y 为什么不象祁县的邻县如榆社、文水、平遥、介休（东阳屯）等地的方言那样变成 ʮ？既然-i 的舌位发生前化的变移而成-ɿ，-y 一起前化为-ʮ 不是更符合音理吗？为什么偏偏要变成-iu$^{\beta}$ 呢？这就不能不涉及到祁县方言音系的特点和音变的目标了。

祁县方言的韵母系统处于有序变异状态的主要有下面几个音

类(据城关(阎)的发音)：

	i 地镜	^{ə}u^{β} 故赌	y^{u} 雨虚
[ɤ^{ɯ} 河蛇]		uɤ^{ɯ} 锅坐	
	[iɪ 姐耕]		[yɪ 靴]
ʊ^{u} 高烧帮光	iʊ^{u} 条桥		
ɔõ 根争生声	iɔoŋ 精紧心	ʊm 东红	yʊm 云群

方框中的音类-ɤ^{ɯ}、iɪ、yɪ 无有序的的变异，因为它们与其他音类的变异有关，故同时列出。这里有五个系列的音类，每个系列按开、齐、合、撮四呼的结构排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每个音类的音韵地位。这些音类的变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一个音类的音韵地位已经或者将要发生性质上的变化，总的趋势是：开口韵与合口韵相互转化，齐齿韵与撮口韵相互转化，各个音类的有序变异都服从于这样的一个音变总目标。

我们先从-ʊ^{u}、iʊ^{u} 这两个韵类谈起。从其后面所列的例字来看，它们是音系中白读的语音形式。根据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形式将在文白之间的竞争中逐步消失，但在祁县方言中它们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ʊ^{u} 在老年人的音系中属开口韵，是"高"等效摄一等和宕摄一等字的白读语音形式，可能是它的音值接近合口韵，而开口度的大小正好与果摄开口一等的-ɤ^{ɯ} 韵相配，因而它就采取扩散的方式逐一排挤原果摄合口一等字的-uɤ^{ɯ} 的发音而成为果摄字的合口韵。象"锅""火"等字的韵母，在城关(阎)的音系中读-uɤ^{ɯ}，但在一部分老年人和大部分中、青年中这些合口字的韵母已由-ʊ^{u} 代替。-ʊ^{u} 的音韵地位从开口向合口的转化在城关镇已接近尾声，因为即使象城关(阎)这样的老年人也有一部分果摄合口字可以-uɤ^{ɯ}、-ʊ^{u} 两读，而在城关的四周则已完成了这种转化的过

程。-ʊ^{u} 的音韵地位的性质变化还给声、韵母的配合关系带来了一些错杂的不规则现象(徐通锵、王洪君,1986)。-iʊ^{u} 原属齐齿韵,是效摄三、四等宵、萧两韵(赅上去)的白读的语音形式,现在它的音韵地位似有向撮口韵转化的趋势,因为在祁县南部的来远乡它已排挤果摄合口三等韵(即现在的撮口韵)-yɪ 的音韵地位而取而代之,成为"瘸""靴"等字的韵母。这可能预示着城关镇-iʊ^{u} 的音韵地位的转化方向,因为从祁县方言的音变趋向看,如果不是向普通话靠拢的音变,四乡大体上比城关镇先完成演变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ɔõ iɔoŋ ʊm yʊm"这一系列的语音变异。这些音类在老、中、青、少四代的语音中有明显的差异,先请比较:③

发音人 \ 音值 \ 例字	蒸	紧	东	准	稳	群	云
城关(阎)	꜀tʂɔõ	꜂tɕiɔoŋ	꜀tʊ^{ŋ}m	꜂tsʊ^{ŋ}m	꜂ʔə͡um	꜀tɕʻyʊ^{ŋ}m	꜀ɥyʊ^{ŋ}m
城关(陈)	꜀tsɔõ	꜂tɕiɔoŋ	꜀tʊm	꜂tsʊm	꜂ʔə͡um	꜀tɕʻyʊm	꜀ɥyʊm
城关(段)	꜀tʂɔõ^{m}	꜂tɕiɔoŋ$^{(m)}$	꜀təm	꜂tsəm	꜂ʔə͡um	꜀tɕʻiəm	꜀jiəm
城关(彭)	꜀tsɔõ$^{(m)}$	꜂tɕiɔoŋ$^{(m)}$	꜀t^{ə}m	꜂ts^{ə}m	꜂ʔ^{ə}m̩	꜀tɕʻi^{ə}m̩	꜀ji^{ə}m̩
城关(武)	꜀tsɔõ$^{(m)}$	꜂tɕiɔoŋ	꜀t^{ə}m	꜂ts^{ə}m	꜂ʔ^{ə}m̩	꜀tɕʻi^{ə}m̩	꜀ji^{ə}m̩
城关(青少年)	꜀tsɔõ^{m}	꜂tɕiɔoŋ$^{(m)}$	꜀t^{ə}m	꜂ts^{ə}m	꜂ʔm̩	꜀tɕʻi^{ə}m̩	꜀ji^{ə}m̩

这些都是原臻、曾、梗、通四摄的例字在今天祁县(城关)方言中的读音差异。在以城关(阎)为代表的老年人的音系中,这些例字的开、齐、合、撮的音韵结构与一般的北方方言相同,也与中古音系的音韵结构相合,但是已出现了音值的变异。"东、准、稳、群、云"代表上述四摄的合口字,韵尾已由-ŋ 变为-m,只是在老年人的音系中还带有一点原来的-ŋ 韵尾的痕迹,如城关(阎)的-ŋ 韵尾还有残

留。从这些原合口字的读音来看，从老到少，清楚地表现出：合口韵转化为开口韵，撮口韵（群、云）转化为齐齿韵。这样，在同源的一个系列的音类中出现了两个开口韵、两个齐齿韵，这与音系的结构格局是矛盾的。现在，新生的开口韵和齐齿韵似有迫使旧的开口韵、齐齿韵的音韵地位发生转化的趋势，一是已出现鼻韵尾-m 的萌芽，只是音色很弱，大多还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而且音值也还不很稳定（有-m、-ɱ 两种形式），但应该承认它们已向着形成一个新的语音系列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二是原来的开口韵（-ɔ̃）、齐齿韵（-iɔoŋ）有可能向合口韵和撮口韵转化，形成类似北京话的“东”（-oŋ）、“窘”（-ioŋ）那样的合、撮口韵，不过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ʊ^{u} 和-ʊm 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变异：ʊ^{u} 的音值本身在言语社团中没有变异，只是在老年和中、青年的语音系统中的音韵地位殊异，因而它的变异采取扩散的方式，一个字一个字地逐一排挤原来的合口韵-uɤ^{ɯ}，而从-ʊm 到-^{ə}m 的变异采取连续式的音变方式，是音位音值的渐进变移。高元音 i、u、y 的变异方式是音位音值的渐进变移。在祁县方言的韵母系统中，不管采取哪一种变异方式，基本上都服从于开口与合口的相互转化，齐齿与撮口的相互转化这样的一个音系结构格局的局部调整的总目标。高元音系列的变异，如-u 为什么会变成-^{ə}u^{β}？-y 为什么变成-iu^{β}？纳入这一音变的目标去认识，其变异的原因和趋向就会看得清楚一些。这里只有一个 i 的变异去向与这一目标不一致：它变为-ɿ，而不是转化为撮口韵。这提醒人们，变异转化为结构、实现自己目标的时候仍然要受到语音条件的制约。仔细检查上述各个转化中的音类，其主要元音都是圆唇的，i 不符合这一条件，因而不受这一转化规律的支配。

所以，从祁县方言音系来看，结构、变异、有序、目标（音系结构

格局的调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说明变异确实是有序之源，而目标则是无声的命令，它引导着处于有序状态的变异向着一定的方向飘流。这可能正是语言的神秘之处，语言学家化了很大的力量还不一定弄得清楚的规律，言语社团中的人们却规规矩矩地服从它的指挥，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只有有序的变异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之后才能进入语言的稳定层，使控制变异的各种因素退出演变的过程。

五

有序的变异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其他音变力量的影响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发生故障，或中断、或改变演变的方向，没有实现演变的目标，这样在语言中就会出现异于规律的杂乱的、无序的变异。例如宁波方言覃、谈、寒(赅上去，下同)三韵中被赵元任(1928)称之为“h 系字”(晓、匣、影、喻四母)的读音相当杂乱。请比较：④

例字	城(郑)	城(忻)	城(何)	城(洪)	城(陈)	西门(张)	西门(王)	南门(沈)	江东(袁)
感	ki	ki～kie	ki	ki	ki	ki	ki	ki	ki
看	k'i	k'i	k'i	k'i	k'i	k'i	k'i	k'i	k'i
刊	k'ɛ	k'ɛ	k'ɛ	k'ɛ	k'ɛ	k'ɛ	k'ɛ	k'ɛ	k'ɛ
贼	hɛ	hɛ	hɛ	hɛ	hɛ	hɛ	hɛ	hɛ	hɛ
汉	hɛɪ	he	he	hɛɪ	hɛ	hɛɪ	he	he	hɛ～hɛɪ
罕	hɛɪ	he	he	hɛɪ	hɛ	hɛɪ	he	he	hi
蚶	hɛɪ	he	he	hɛɪ	hɛ	hɛɪ	he	he	he～hɛɪ
含	ɦɛɪ	ɦɛɪ	ɦe	ɦɛɪ	ɦɛ～ɦɛɪ	ɦɛɪ	ɦe	ɦe	ɦɛɪ
邯	ɦɛɪ	ɦɛɪ	ɦe	ɦɛɪ	ɦɛ～ɦɛɪ	ɦɛɪ	ɦe	ɦɛɪ	ɦɛɪ
寒	ɦɛɪ	ɦɛɪ	ɦe	ɦɛɪ	ɦɛ～ɦɛɪ	ɦɛɪ	ɦe	ɦɛɪ	ɦɛɪ
暗	ɛɪ	e	e	ɛɪ	ɛ	ɛɪ	ɛɪ	e	ɛɪ
安	ɛɪ	e	e	ɛɪ	ɛɪ	ɛɪ	ɛɪ	e	ɛɪ

上表中"感""看""刊"三类见组字有统一的读音，而"h 系"字除"喊"字外，读音的差异很大：横行说明宁波这一言语社团内部的语音差异，纵行说明同一个发音人的语音异同。毫无疑问，这是音系中的一种变异，但是，无论从年龄、性别、居住区域、文化程度、阶级阶层、文体风格还是语音的分布条件等哪一方面来看，我们都无法说明它们与覃、谈、寒三韵的"h 系"字的变异有什么共变关系。这种杂乱的变异现象对有序异质的语言理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变异的有序性理论就难以成立。

覃、谈、寒三韵的"h 系"字的语音变异呈杂乱的、无序的分布状态是有原因的。根据1901年出版的《宁波方言的音节》一书的同音字表（Möllendoff，1901），覃、谈、寒三韵有两种读音：

-ɛn：端系字⑤、见组除"看"字外的溪母字和晓母的"喊"字；

-en：见组的见母字、溪母的"看"字和除"喊"字外的全部"h 系字"。

这说明在本世纪前覃、谈、寒三韵的语音已经发生分化。它们在宁波方言的早期读音似都为*-ɛn，后来在喉音前因元音高化而读-en⑥，只是溪母字因送气的缘故到本世纪初仍读-ɛn。溪母字的"看"读 k'en，晓母字的"喊"读 hɛn，与其他同条件的字的读音不同，这似乎透露出变异方式的一些重要信息，说明这三韵的见系字从-ɛn 到-en 的变异是通过离散式变异的方式进行的，是见系的-ɛn韵字一个一个地变成-en 韵，因而变得快一点的就读-en，变得慢一点的还读-ɛn。正当-ɛn 韵的溪母字开始向音变的目标-en 飘流的时候，由于鼻韵尾-n 的消失，使这一变异飘流的过程中断了。这样，-ɛn 变成-ɛ，-en 变成-e，改变了它们在音系结构中的音韵地位。-ɛn 变成-ɛ 迫使宁波方言的元音系统发生了一次推链（push chain）式的高化和复化。先请比较现代宁波话与《音节》时的语音

差异：

《音节》	现代	例字
-ɛn	-ɛ	耽担单谈弹丹……
-ɛ	-e	戴胎台灾该开海孩哀……
-e	-ɛɪ	杯胚梅堆推催罪……
-en	-e，-ɛɪ	汉含暗……（"h"系字）
	-i	感甘柑敢干肝竿杆……，看（见组）

由于-ɛn 韵因鼻韵尾-n 的消失而变成-ɛ（"耽"类字），就迫使音系中原来的-ɛ 高化为-e（"戴"类字），原来的-e（"杯"类字）为了避免和新的由-ɛ 变来的-e 合并，就复元音化为-ɛɪ，原来的-en 韵由于丢失鼻韵尾-n 而和-e 韵（即"杯"类字）有纠缠，它就依声母的不同而向着不同的方向变移：在声母 k-、k'-之后高化为-i，在其他声母之后复元音化为 ɛɪ。-e 在 k-、k'-之后高化为-i 的现象比较奇特，一是这类字都是由-en 变来的（音节中原来没有 ke 这样的音组），可能在丢掉鼻韵尾的前后就已在声、韵母之间寄生了一个-i-，"感"字在城（忻）的语音中 ki～kie 两读，可能就是这种高化的过渡痕迹的残留；二是音系中原来没有 ki，k'i 这样的音节，因而在 k-、k'-这两个声母之后容许-e 高化为-i，而在其他声母之后由于音系中存在着大量的-i 韵字，这就阻碍了-e 向-i 的高化（因为同音字过多会影响交际），而迫使它复元音化为-ɛɪ。这种推链式的元音高化和复化是相当有规律的，但"h 系"字的-e（<-en）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在丢失鼻韵尾-n 的前后在声、韵母之间没有寄生-i-⑦，因而就与音系中的新、旧-e 韵纠缠在一起，陷入四种力量的拉锯战的状态：它或随原音系的-ẹ韵字复元音化为-ɛɪ；或与新变来的-e 韵字（即"戴"类字）混在一起，维持-ẹ 的读音不变；或随-e（<-en）高化为-i 而读 hi

(如江东(袁)的“罕”字)；或是“顽固地”坚持读谈、寒韵的本音-ɛ(<-ɛn)；或是动摇于这些读音之间，犹豫不定，因而表现出一字数读的现象。这种种原因就使覃、谈、寒三韵的“h 系”字的读音变异在共时音系中出现杂乱的、无序的状态。这一事实说明，有序的变异在完成它的演变目标以前可能会受到其他音变或别的力量的干扰而出现中断的变化(在离散式变异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此类现象)，使系统中出现异于规律的不规则现象。所以，宁波方言覃、谈、寒三韵的“h 系”字的语音变异呈杂乱、无序的状态是有原因的，不能因此而否定有序异质的语言理论的基本精神。面对着这种杂乱的现象，如不对语言的结构进行动态的分析，就难以对这种类型的变异作出有序的解释。

有序的变异既然可以因某种原因而在语言结构中留下无序的，不规则的现象，这就使系统中的例外现象在语言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例外，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变异，以往在演变过程中与变异有共变关系的各种因素已经消失，想重建这方面的关系是徒劳无功的，但我们根据例外现象在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却可以去追溯它的源流和结构。如果说，有序的变异是向着一定的目标演变，我们可以循此去探索未来的结构，增强观察演变的预见性，那么异于规律的例外则是以往结构的残存形式，我们可以循此去重建已经消失了的结构，增强研究演变规律的自觉性。这是两种不同的目标，前者是“向前看”的目标，后者是“回头看”的目标，语言研究就是要立足于现实语言的各种变异去实现这两种目标，对语言的结构进行动态的研究。

例外这种特殊类型的变异是实现“回头看”的目标的重要线索。例如，宁波方言的“鸭”字可念 $ɛ^{44}$，“伯”字可念 $pã^{44}$，这是一些例外的读音。语言中这类字不多，只有十几个字。但是，通过这十几

个字的语音的分析却可以看到构词的语法规则如何转化为音变的事实，发现宁波方言的儿化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胡坦(1984,12)根据藏语语素的语音变异发现古藏语复辅音的残存形式，认为"今日之特例可能是昨日之通则。我们可以从许多不规则的语素变体中看到某些历史音变的痕迹"。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少数的例外现象中看到一般的原理、原则。文白异读是汉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音系中一种特殊类型的变异，体现两种语言系统的叠置关系(参看第92—102页的分析)。文白异读的"异"也是有序的，大体上与居民的文化程度和语体风格有共变关系：文化水平高、在庄严正式的场合多使用文读形式，文化水平低，在日常随便言谈的时候多使用白读形式。随着语言的发展，文、白两种语音形式在竞争中大体上以文胜白败而告终，白读形式只存在于个别的土词中，类似前面提到的那种个别的例外。但是这种个别的、零散的白读形式却隐含着一般的原则，可以从中悟察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李荣(1965)的《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一文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启示。《切韵》的群母只有三等，传统的韵书、韵图都一直沿用这一说法，但现代的吴方言、闽方言的白读音却保留有一、二、四等群母字的痕迹。李荣所依据的白读字并不多，只有"搁隑寒汗猴厚"(一等)"掼鲠咬环衔怀"(二等)"悬"(四等)这13个字，但却解决了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上面的种种事实说明，对系统中由于各种原因而留存下来的一些不规则的例外现象的探索可以发现整齐的结构，在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上有重要的意义。

六

对语言的结构进行动态的分析是把系统论的某些精神引入语

言研究的结果。它以语言的微观变异的研究为基础，吸取以往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精髓，从语言在空间和时间的运转中去考察它的结构。这在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上是一种转折，我们可以据此把语言与社会、共时和历时、空间和时间、系统和变异联系起来，纠正过去那种把语言仅仅看成为一种自足系统的看法。恩格斯(1877,18)在讲到科学思潮的发展规律时曾经说过：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是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去认识世界的，“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语言研究的发展情况也与这种趋势一致。语言系统同质说象其他的科学一样，在把语言“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现在的问题是要克服这种方法论所带来的一些消极方面的影响，再把语言放回到“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中去研究，以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变异是构成这种联系画面的环节，所以对它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根据变异所提供的线索去考

察无序和有序之间的相互转化的条件和规律，把语言看成为一种“流动的”“本质上变化着的”“活的”东西，并进而对它进行动态的研究。这种研究是符合当前科学思潮的发展的。我们前面着重从音系的结构讨论了与这种方法论原则有关的一些问题，其他如语法结构、语义结构等似乎都应该对它们进行动态的分析，尽可能避免象结构语言学那样的纯共时、纯静态的分析。美籍华裔学者陈宁萍(1987)考察了从名词到动词的连续统(contiunum)问题，其实就是语法结构中的一种动态变异的分析，提出了--些有意思的问题。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无论从语音还是语法去讨论它的动态性的结构都只能涉及语言的一个局部，至于语音结构的动态性变异如何影响语法的结构？或者反之，语法结构的动态性变异如何制约语音的结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有待于深入的探索。应该承认，有序异质语言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现在还处于草创阶段，有待于人们的改进和完善。

(原载于《语文研究》1987.4—1988.1)

【附注】

①这是美国式的音标符号，“h”表示发复元音时舌位向中央移动，如bad/behd/即[be:ᵊd]；“y”表示舌位向前移动，如I/ay/；“W”表示舌位向后移动，如cow/kaw/。

②1985年，我们在祁县调查了二十二个发音人的语音状态，表中所列的几个发音人是从中挑选出来的代表。古县是祁县的一个乡，它与城关、西六支三个乡(镇)的语言公认为祁县方言的代表，俗称老祁县话。该方言不分阳阴平。表中发音人的大体情况是：古县(范)：范俊，男，61，教员，长住城关；城关(阎)：阎沛章，男，72，教员；城关(段)：段达海，男，44，干部；城关(彭)：彭启新，女，35，教员；城关(王)：王艾录，男，39，教员；“青少年”指祁县四中我们所选听的六个学生和阎沛章的孙子阎小泉，他们的年龄都在15—18之间。

③表中城关(陈)指陈效祖,男,49,农民;城关(武)指武德云,男,28,农民。

④我们在宁波市调查了不同年龄层的30多个发音人,表中八人的大体情况是("城"指城市中心区):城(郑):郑芳怀,男,48,教员;城(忻):忻美英,女,51,教员;城(何),何汉英,女,47,工程师;城(洪),洪可尧,男,48,会计;城(陈):陈文豪,男,23,银行职员;西门(张):张明余,男,65,干部;西门(王):王纲平,男,27,学生;南门(沈):沈亚萍,女,23,学生;江东(袁):袁逸,男28,学生。表中例字的注音没有表声调,因为宁波话的声调现在正处于简化的过程中,单字的声调比较杂乱,故这里从简。

⑤覃韵的端系字有一部分读-en,其原因与谈、寒两韵的见系字读-en不同,详情可参看拙作《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

⑥根据语音演变的普遍特征,一般的情况是在i、y、e、ɛ、a这些前元音之前的喉音声母发生腭化(参看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72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从中古到早期宁波话的语音发展遵循着这一规律,所以"基""鸡""建"等字的声母今天的宁波话都读tɕ-。可能是由于这一规律起作用的时间早就过去,近代宁波话的语音发展似乎没有遵循这一规律,而是喉音声母不变,它后面的元音则高化,所以在本世纪前有从kɛn到ken、现代宁波话有从ke到ki的音变。

⑦这种现象在吴、赣等方言中的分布区域好象相当广阔。笔者的家乡在宁波南面75公里处,见系字的语音状态大体上与宁波方言相似:"感"类字读kie,声韵母之间有-i-,"h系"字无-i-,如"汉"读he。江西南昌方言也有与此类似的特点(参看熊正辉的《南昌方言的文白读》,《方言》1985年第3期第206页)。

变异中的时间和语言研究

我们主张用"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这个公式对语言系统进行动态的分析，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在系统中找到了"时间"，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方法去认识语言中的"时间"。"时间"是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不同的认识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把变异引入语言研究之后，"时间"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有关问题也就成了需要进行探索的新问题。

一、时间观与语言的研究

"时间"一般都理解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纵向时轴，用年、月、日、时、分、秒去计量。这种时间在时轴上自然地流逝，一去不复返，因而给以年、月、日为计时单位的历史研究带来了严重困难。为克服这种困难，语言学中与这种时间观相联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只能根据方言或亲属语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去研究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这种假设的前提是：语言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的运转又以时间、地点、条件（语言条件）为转移。青年语法学派把这种原则加以提炼，概括为"语音规律无例外"（A. Leskien）①和"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K. Verner）。方言地理学派虽然反对这种理论，并提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J. Gilliéron）的口号与之抗衡，但就"时间"这一方法论基础来说，它们之间并无多少差异，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去考察"从过去到现

在"这一段已经流逝的时间。这种研究所涉及的时间相当长，短的有几十年、几百年，长的可达几千年、几万年，而且都是"现在"以前的"过去"，已经消逝，无法直接观察，因而只能推测某些成分在千百年时间中的变化，无法了解语言整体的运转机制。因此，以这种时间观为基础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原则被索绪尔和尔后出现的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所否定，而代之以"共时"和"历时"的划分为基础的时间观。

"共时"的"时"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轴上的一个"点"，它的分离服务于语言系统的分析，以便可以集中精力来研究这个"点"上的语言现象，因为"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同时研究它们在时间上的关系和系统中的关系"(索绪尔，119页)。这种时间观虽然为研究语言内部的结构奠定了基础，并且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它毕竟只涉及时轴上的一个"点"，过于狭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给语言研究带来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些忠实于语言事实分析的语言学家在"共时"问题上早就感到迷惘。结构语言学的创始人布龙菲尔德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1923年，他在评论《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版的时候曾就"共时"和"历时"的关系问题谈过如下的看法："言语不仅在系统未确定的地方上有变异，而且系统本身也可以有变异：不同的说话人有时会违反系统的几乎所有特征。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历史语言学'或历时语言学；当言语中这样个人的、暂时的特征在社会中变得一贯或习惯化时，它们就变成语言系统的一个变化。"过了十年，他在《语言论》中又重新强调了这一看法："任何言语社群的语言在观察者看来总是一个繁复的信号系统……一种语言在任何时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词汇和语法习惯的稳定结构。然而这是一种错觉。每一种语言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缓慢而不断的语言演变过程。"(355页，着重号是原

有的)这说明布龙菲尔德早就感到“共时”的“时”是一种错觉,但是他没有能够找出摆脱错觉的途径,以致后来的结构语言学家在这种“错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时间和空间是联系在一起的。“共时”的“时”既然只是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轴上割裂出来的一个“点”,那么空间的含义也只能是一个“点”,即只能从实际语言中选择某一种风格状态的个人方言(idiolect)。这种“点”的实质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是一种无时无空的虚构。结构语言学家早就意识到这种虚构。1942年霍嘘特在《描写音位学体系》一文中就说过:“描写程序设定了一种虚构(fiction),即处理的各种话语均无时间的、空间的或社会的次序(order)。这一虚构只在材料涉及的时间、空间或社会的幅度(span)相当小的情况下才有效,如果我们把古英语的记载当作单个的无秩序的集时它就垮了。如将言语习惯在时间上的实际演变过程描绘成一条曲线,那么描写技术对实际情况的近似值可用在曲线的一定点上的切线来表示。”当时,霍嘘特以及其他的结构语言学家并没有感到这种“虚构”有什么不对,因而循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六十年代末,由于转换——生成学派的兴起和冲击,结构语言学家经过痛苦的反思,才不得不承认以“共时”的“时”为基础的语言研究的严重局限性。霍嘘特(1970,10—18页)在回顾结构语言学的发展之后指出:描写语言学家们不但求助于比喻(如上述的“曲线”“切线”之类),而且充满“错觉”“方便”②“虚构”之类的词语,使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些词语的出现不是抱歉地承认方法论上的缺点,反倒成了语言研究的正当理由。霍嘘特认为结构语言学在这条“虚构”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是哈里斯的研究,并把他的某些文章称之为游戏语言学(game-playing linguistics)。

前面的简单回顾说明,对“时间”的认识是语言研究方法论的

一个重要基础。历史语言学强调时间的“线”，而索绪尔和结构语言学强调时间的“点”，但“线”与“点”是分离的，因而在语言研究中都碰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可见，这些时间观作为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有它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二、变异和横向的空间计时

对于时间，我们除了用年、月、日去计量以外，还可以对它作出综合性、全局性的判断。当我们猜测一个小孩儿的年龄时，这个年龄并不存在于小孩儿的任何一个特殊部位上，而是根据他的各方面的特征而作出的综合性、全局性的判断。过去，科学把时间空间化，现在发现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空间得到了一个时间维，按照地理学家贝里(B. Berry)的说法，我们已被引导去研究‘空间的计时’了”(伊·普里戈金等，51—52页)。这种“空间的计时”有没有可能用于语言的研究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通过语言变异的分析对时间进行综合性、全局性的考察。

语言变异成分通过连续性变异和离散性变异的方式向着某一方向变异是逐步推进的，在语言结构和社会人群中的分布很不平衡，有先后快慢之别。具体分析变异形式之间的关系，即使不用年、月、日之类的计时单位，也可从中看到时间，定出一个概数。下面的分析也引用一些书面材料，目的是想以此印证变异中的时间。

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有 w/v 变异(沈炯，1987)。联系山西、河北等地的方言来看，这种变异大体上反映零声母合口呼由 w 到 v 的演变过程。这种变异的分布特点是：wu 组(wu、wo)念 w 的比例数大，wen 组(wen、wan、wa、wai、wei、wang)则多念 v。这种分布格局早在60年前就形成了。钱玄同(1927)对此曾有明确的叙述：

"至于万(v),北京音倒不是没有,合口诸韵母在单用时,其起首之w多有变为v的(不过这个v比英法的v用力较轻些,吐气较少些)。例如'蛙、为、稳、望',读va、vei、ven、vanq,而不读wa、wei、wen、wanq。但'乌''我'则不变,仍读wu、woo,而不读vu、voo。"这就是说,六十多年来,合口呼零声母w/v变异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说明现在北京话的w/v变异的空间差异至少包含六十年的时间。在钱玄同观察到这些语音差异以前经历了多长时间?今后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由w向v的变异过程?现在都难以预计。根据六十年来变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的情况,说w/v变异蕴含着一二百年的时间,是一点也不会过头的。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宁波方言的例子。

宁波方言的声调在言语社团中的表现很杂乱,有的人有七个声调,而有的人只有四个,正处于变异的过程中。大体情况是:

七个: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阴入、阳入

六个: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入、阳入

五个:阴平、阳平、阴上、阴入、阳入

四个:阴舒(包括清平、清上、清去)、阳舒(包括浊平、浊上、浊去)、阴入、阳入

在这种杂乱的变异中我们可以理出从七个声调简化为四个声调的大致顺序:去声先并入平声,而后上声再与平声合流;在去声和上声内部,阳调字先于阴调字合流。现实语言中这种声调差异的社会分布至少隐含有一百三十来年的时间。《宁波方言字语汇解》(W. T. Morrison)出版于1876年,反映1860年前后的宁波方言状况。该书的前言说,宁波方言有声调,有些字的声调区别比较明显,如"水"(shü)和"书"(shü)、"冰"(ping)和"饼"(ping),但很多字的声调已经很难区分,而且还因人而异。这说明阴平和阴上的区别是清

楚的，但其他声调已呈纷乱状态，开始了变异的过程，弄得《汇解》的作者无法处理，所有的例字只能不标声调。1901年出版的《宁波方言音节》(P. G. Von Möllendorff，1901)，说宁波方言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而每个声调又可以分为高低两类，说明当时的宁波话还能分出八个声调；至于单字调是不是呈杂乱的变异状态，《音节》没有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于1928年，据它记载，宁波方言的声调有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阳上调存疑，作者只是记上"阳上＝阳去？"看来两调已难以区分。当时宁波方言的调类数目已经弄不清是七个还是八个。除阳上调外，其他各调相互间也有参差和变异，因为"阴平阴去不易分。阳平阳去起音低，所以有一种特别'浊重'的'宁波腔'"(84页)。《鄞县通志》中的方言志编成于抗战前的三十年代，其中关于声调的记载与《研究》相似，说"凡浊音之字，上声与去声殊鲜区别"(2666页)，但在《读音转韵表》中两类字仍旧分列，看来还没有完全合流。这些记载都清楚地表明，宁波方言的声调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它的变异进程，现实语言中的声调变异只是这一百多年"竖"着的时间"横"放下来摆在我们面前。这里，"横"与"竖"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最多只是阳上先并入阳去，还是阳上字晚于阳去字并入阳平。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研究》《通志》的记载似有区别。③不过这无关大体，实质的问题是"竖"的时间可以证明"横"的变异蕴含着漫长的时间长度。

宁波方言的声调变异最早始于何时，已无从查考；将于何时完成，也难以预料。完成变异所需要的时间前后各加50年，恐怕还是一种保守的估计。"语音、形态和句法的变异可以共存令人惊异的时间长度"(Y. Malkiel，25页)。这种共存的变异就是我们从变异中探索时间蕴含量的客观基础。

宁波方言的声调变异、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的 w/v 变异，都清楚地说明了在共存的变异形式中浓缩着漫长的时量，着眼于变异的分析可以对时间作出综合性、全局性的判断。如果说，“过去—现在—未来”这种时轴代表纵向的时间，那末浓缩在变异中的时间则是时间的一种横向表现形式。用纵向的时间观去观察语言的演变，由于它的时间跨度大，而且都是“现在”以前的“过去”，人们既没有可能倒转历史去恢复一种变化的具体过程，也没有办法去跟踪“现在”已经开始的变化的“未来”历程直至它的终点，因而不能不给语言研究带来一些实际的困难。布龙菲尔德(1933)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认为：“语言演变的过程是从来不能直接观察的；我们将会看出，纵使我们现在有了许多便利条件，这种观察还是难以想象的。”(432页)“纵使我们掌握了完善而无缺陷的记录，我们也还是不可能确切地指出某些变体的流行的起点，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演变的开始。”(458页)从纵向的时间观来看，布龙菲尔德的上述论断应该说是比较符合事实的，是语言史研究中无法克服的困难。但是，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这就是采用新的空间计时方法，通过变异把历史上“竖”着的时间“横”放，使几十年至几百年时间的漫长过程通过变异形式的共存分析展现在观察者的面前。不过“竖”着的时间“横”放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找出变异形式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弄清变异形式的先后顺序、变异方向和目标。目标，可能由于其他力量的干扰而达不到，但向着某一目标变异的方向是难以改变的。找出了方向和目标，也就把握住了变异所体现的时间的“始”与“终”，因此也就有可能从中悟察语言将在几十年至几百年的时间中演变的机制、原因和过程。我们在《转折》(参看第175--185页)一文中特别强调变异的方向和目标，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通过变异的分析对时间进行横向的空间计量，其实质或许可以说是：吸收历史比较法的基本精神以改进语言结构的共时研究。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原则是：利用方言或亲属语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从语言的空间差异中去探索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利用言语社团中的共存变异形式进行横向的空间计时，这也是从空间的差异中找时间，因而与历史比较法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通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只是历史比较法的翻版。它们之间有原则的区别，除了“空间”的含义不同以外，主要的有：第一，历史比较法只研究“现在”以前的“过去”，需要拟测（reconstruction），而通过变异进行横向空间计时的分析方法，则是观察者立足于现实语言的变异就能够“横”观语言在几十年至几百年时间流程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对语言的运转进行实际的考察，甚至还可以通过仪器来进行实验。第二，历史比较法在方法论上是“原子主义”的，缺乏全面的、系统的观念，而通过变异进行横向计时分析的目的是要把“原子”的变异纳入语言结构的分析，从中具体地考察变异与结构的关系，使语言系统的动态特点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样，我们通过变异的分析就有可能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从而对语言结构进行动态的研究。

三、有序、无序的相互转化和语言结构的动态性

通过变异对时间进行横向的空间计量也就把连续性带进语言的结构。这就与以往对语言结构特点的看法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冯志伟（1985）在总结以往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之后指出：“语言这个符号系统在本质上是由一些离散的单元组成的，它不允许与连续性有半点儿妥协，因此，语言可以看成是一个在严格意义上的量子机制，凡是与连续性有关的一切，都得排除在语言的范围之外。这样，

研究语言的方法，自然也就应该采用离散的、代数的方法。”(60页)通过变异把时间引入语言的结构，就不能把连续性排除在语言之外，不然我们就无法弄清楚一种语言怎么会从这一种状态变成那一种状态。从言语社团对语言现象的态度来看，区分连续性和离散性两种不同类型的单位，也是完全必要的。对于离散性单位，言语社团不允许它离开自己的活动中心而向别的单位靠拢或向别的方向偏离，不然社会就会发挥它的校正功能，迫使你改正；而对于处于变异过程的连续性单位，言语社团的态度就相当宽容，在整个变异过程中，不管你采取其中的哪一种变异形式，都是允许的，因而在系统中才能呈现出不同变异形式的共存局面。离散性单位构成语言稳定性的基础，而连续性单位则体现系统的连续变化，以便保证系统能够顺利地从这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对语言结构进行动态的分析，就需要很好地处理连续和离散的关系，考察变异转化为结构的机理。

变异的指令基本上来自结构的不平衡性。变异产生之初，它在言语社团中的分布是随机的、无序的，与社会因素没有一种带倾向性、稳定性的联系。只有当变异形式比较广泛地被某一社会人群接受、并成为这一社会人群的语言使用标志时，它才从无序转化为有序(U. Weinreich 等，1968)。这里，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有序和无序的相互转化关系。

根据我们的理解，有序的“序”就是变异成分的变异和周围社会环境的相关关系，以及它和系统中其他结构成分之间的相关关系。前者是对系统的外部描写，后者是对系统的内部描写，通过变异把“内”与“外”这两种序联系在一起。在变异过程中，变异形式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就是对系统的一种外部描写，说明语言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运转的。在与变异有相关关系的各种社会因素

中,"年龄"这一因素有关键的意义,因为从总体和全局来看,它与时间的关系最密切。比方说,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 wen 组的 w/v 变异,如消除文化程度、性别参数之后,其在年龄层中的具体分布④是:

年龄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v 出现的比例	0.76	0.82	0.61	0.69	0.59	0.49	0.42	0.19

总的趋向是:年纪越轻,读 v 型变异的越多,呈上升的趋势,但不是一条直线,中间有起落。这是正常的,因为年龄只是相关关系中的一个因素,不同年龄层的人在文化程度、性别方面的比例在抽样调查时可能不一样,因而会影响线的起落升降。不过,我们从总的趋向中可以看到变异与年龄的相关关系。

无序转化为有序,这是变异转化为结构的必由之路,人们容易理解。但是,奇怪的是,有序的变异在转化为结构之前,它又转化为无序,失去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北京话的 w/v 变异,在30岁以下的抽样调查中,与社会因素的联系似又呈无序的、随机的分布。不过这个例子不大典型,因为第一,统计中没有包括 wu、wo 这两个音组的变异;第二,它只是原合口呼零声母改变自己的音值,没有和音系中的其他音类发生分、混的问题,因而还不能充分显示有序转化为无序时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状况以及它可能给结构带来的影响。在这方面,宁波方言与-iʏ 有关的变异可能更为典型。

-iʏ 是尤、幽韵字⑤在宁波方言中的读音,是音系中的一个变异成分。它在言语社团中有如下的变异形式:

-iɵʏ -iᵊʏ -iʏ -iy -y

从-iɵʏ 到-y 的五种变异形式呈前后相接的、渐进的连续变异流,是一种连续性变异。-iɵʏ 和-iy 两种变异形式的音值比较含混,特别是-iy,既象-iʏ,又象-y,被问及"九"与"举"是否同音时,持这种

音值的人颇费斟酌，回答往往是“差不多”。这五种变异形式都只能在 tɕ tɕʻdʑ ɕ ʑ 和零声母之后出现，就我们所调查的35个发音人的总体来说，看不出这两个发音部位对变异形式有什么影响，只有少数几个年轻人在零声母后为-y，在舌面音后为-iʏ。如以年龄这一社会因素为衡量标准，那么它们在35个发音人中的分布情况如下：

	-iɵʏ	-iᵊʏ	-iʏ	-iy	y
人数	4	3	16	5	7
年龄	50—70	40—65	20—55	20—30	20—32

从这里可以看出，“年龄”反应-iʏ/-y 变异的大致去向。当尤、幽韵字的音值为-iy、-y 时，它就与音系中的-y 韵字(鱼、虞韵的见系字和仙合、元合、先合的精、见系字)合流。我们从尤、幽韵和鱼、虞韵中各选出声母、声调都相同的16个字，两两对比，在言语社团中进行读音异同的调查。这16对字是：

鸠:居　求:渠　休:虚　油:榆　救:据　舅:拒　优:于　有:雨

九:举　仇:瞿　朽:许　诱:愈　丘:区　旧:具　邮:盂　又:竽

调查是在上述35个发音人以外的范围中进行的，共选择48人，大都是几代居住在宁波的老宁波。结果是，老年人感到奇怪，因为两个字音的差别非常明显；而在15—17岁的中学生中却引起了读音异同的热烈争论，甚至因自己无把握、或争论无结果而回家去“请示”父母亲。现在，先把这16对字的读音异同的调查结果列表于下(48×16＝768，扣除失去的样品，共得761对例字。括号中的数字为百分比)。先看在年龄层中的分布：

	20岁以下(18人)	20—29(5人)	30—39(7人)	40—49(9人)	50以上(9人)
不同音	169(0.5868)	58(0.7532)	83(0.7685)	108(0.75)	141(0.9791)
同　音	65(0.2256)	8(0.1038)	11(0.1018)	8(0.0555)	——

差不多	54(0.1875)	11(0.1428)	14(0.1296)	28(0.1944)	3(0.0208)

在性别和职业中的分布情况如下：

	男(27人)	女(21人)
不同音	284(0.6620)	275(0.8283)
同　音	61(0.1421)	31(0.0933)
差不多	84(0.1958)	26(0.0783)

	教师(11人)	干部(11人)	工人(8人)	中学生(18人)
不同音	160(0.9090)	127(0.7514)	103(0.8046)	169(0.5868)
同　音	3(0.0170)	19(0.1124)	5(0.0390)	65(0.2256)
差不多	13(0.0730)	23(0.1796)	20(0.1562)	54(0.1875)

最小对比调查与日常的言谈是有距离的，因为它是经过仔细辨认之后而作出的反应；特别是中学生因为经过热烈争论或“请示”父母，自然会加大“不同音”的比例。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变异总的趋向来看，随着年龄的降低，“不同音”的比例逐渐减少，而“同音”或“差不多”的比例则逐渐增加，与35个发音人中的读音分布状况大体相当。在50岁以上的宁波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两两相对的字是同音的。此外，变异在性别和职业中的分布似乎说明男性比女性快，中学生比其他各阶层的人们都快，其中变得最慢的是教员，“不同音”的竟占91%，而“同音”和“差不多”两项加起来也还不到10%。这里，学生的地位比较突出，他们既和教师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与他们的父辈有所差异，说明语言的变异主要是一种自组织的过程，代代相传并不是决定一切的主要途径，“至今所收集到的全部经验证据表明，儿童并不保存他们父母亲的方言特点，而是保存少年期支配他们的同样地位的人群的方言特点”(Weinreich 等，184—185页)。

宁波方言尤、幽韵字从-iɵʏ 经-i^{o}ʏ、-iʏ、-iy 到-y，是一种连续性变异，但变到-y 时，由于与音系中原来的-y 韵字发生纠缠，它就

改变了自己的变异方式而采用离散式变异与鱼、虞韵(-y)字合流,即一个一个地并入-y 韵,从而形成上表中的参差情况。就合流的总体情况来看,宁波方言还没有摆脱它的有序变异状态,因为我们还可以找出它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宁波郊县的有些方言,这一变异的进展速度似比宁波快,可以用来补充说明宁波方言现在还没有出现的情况。笔者的家乡在宁波南约70余公里处宁海县的一个小山村,音系的结构与宁波方言接近而与宁海县城相差较大。那里的环境单纯,交通不便(到1983年才通汽车),居民都是农民。我在50年代初离开那里时,尤、幽韵字都念-iɵʏ,连-iʏ 的读音都没有,而现在以-iʏ 的读音为主流,同时也已出现-y 之类的读音。它的变异开始时间比宁波晚,但变异的速度却比宁波快,因为语言自组织的变异过程,山村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干扰。⑥它现在已经与鱼、虞韵字"难解难分"。我们用上述的对比材料于1988年春对15人次(除一人为53岁的老农民外,其他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农民)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不同音	83(0.3502)
同　音	71(0.2995)
差不多	83(0.3502)

而在这15人次中,我们又特意选择一个家庭的父子四人在不同时间中作了一次重复调查。结果,两次的答案不一样(A 组是一家四人的统计,B 组是53岁老农民的前后辨认差异):

	不同音	同音	差不多
A:第一次	21	18	25
第二次	28	17	19
B:第一次	5	11	—
第二次	4	7	5

上面的统计数字说明，这两个音类的合流与社会因素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相关关系，已由有序转入无序。这是变异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如果说，从无序转化为有序是变异寻找自己的相关因素，那么从有序转化为无序则是相关因素将要退出变异过程而表现出来的一种随机状态，就象各种社会人群（相关因素）在蜂拥挤入“结构”之门时所呈现出来的一时混乱、拥挤的状态一样。不经过这一阶段，变异无法挤进结构之门而转化为结构中的稳定层。在这一时期，富有特征性的现象是言语行为与心理认同已表现出明显的矛盾。重复调查的四个农民虽然前后的回答是有差异的，但他们的实际发音却是一致的，都是-iʏ。这就是说，尤、幽韵与鱼、虞韵的实际发音是有差异的，前者为-iʏ，后者为-y，但在两个音类趋于合流的时候，社会心理比言语行为跑得快，它先不理会两者之间的实际差别而参差地把其中的某些字看成为同音字，然后完全实现合流。

心理认同先于言语行为而合流，这可能是语言变异中的一种特有的现象。宁波方言的声调合并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特点。只有四个声调的宁波人，原清上（435）、清去（44）的某些常用字的调值仍保留在他们的言语行为中，但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与清平（42）有什么差别。《方言调查字表》中的声调基础字，其中清上的“纸、走、短、碗、口、草、好、手、死”等在五个基本发音人中都经常念435的调值（个别字相互间有出入）。但当问他“手”[ɕiʏ]和“休”[ɕiʏ]是否同音时，他们都会回答“同音”，而且会用“休”的42调值去读“手”的音。只有在反复比较时，有的人才会感到它们之间有点儿差异。

心理认同先于言语行为而合流，其实质恐怕是要用“心理认同”的“同”的标准去改造有差异的言语行为，使之划一、有规则。宁波人或者笔者家乡的农民，不管男女老幼或“三教九流”，现在在日常交谈中谁都不会理会上述尤幽韵字和鱼虞韵字的读音异同，他

们平时也根本感觉不到这两类字音之间有什么差别。相反，他们对语言学家专门找出这些字来进行调查却感到奇怪，纷纷询问"你怎么会想出要调查这些字音的异同"。由于言语社团对这些变异中的差异已听之任之，认同为一，因而也就失去了对实际有差异的言语行为的规范和校正的功能。前面同音对比调查的"异"或"同"的反应，应该说，多数人是经过仔细辨认之后"逼"出来的，不是自然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言语行为的差异会随着心理认同的"同"而消失。这样，这一变异的有序、无序的相互转化运动到此结束，连续性的变异转化为离散性的结构。

有序和无序的相互转化是语言结构动态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这种转化不是孤立的，如果一个子系统有若干个变异成分，那么它们大体上都会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变异，因而在表面杂乱的变异中呈现出规则性和系统性。宁波方言-iʏ 的变异不是孤例，它是以 i、y 为介音的韵母重新调整"前:后"或"圆:展"相关关系的一个环节。-iʏ 由于在系统中既无"前:后"的相关关系，也无"圆:展"的相关关系(即既无-uʏ，也无-yʏ 与之相配)，因而处于被调整的地位，或者说，是发出变异指令的中心。-iʏ 和其他无"前:后"或"圆:展"相关关系的介呼韵一起接受变异的指令，通过变异改进宁波音系的结构。

四、语言史研究的新领域

考察有序和无序的相互转化使语言在几十年至几百年的时间历程中的运转、变化呈现在观察者的面前，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进入语言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语言史的研究方法除了按年代顺序排比书面材料之外，主要是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和词汇扩散等。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研

究“现在”以前的“过去”，而不注意现实语言的变化。这是历史语言学的一块空白，梅耶（1925）早就对此感到遗憾，认为“我们本来可以直接观察，然而很可惜，大家对正在发生的事却几乎睬也不睬”（95页）。什么是“正在发生的事”？如何去研究？梅耶主要指小孩儿如何学习语言，共同语如何替代地方土语之类，不是指语言变异之类的现象；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研究的是语言变异，但仅仅把它看成正在进行中的微观变化（Weinreich 等，1968），没有看到变异所隐含、浓缩的漫长时间长度，失于偏颇。现在，我们通过变异对时间进行横向的计量分析，考察变异中有序和无序之间的相互转化，就可以从“正在发生的事”中探索语言的演变。系统中不规则现象的解释是语言史研究的一个难点，变异的分析或许可以为解释这种难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

宁波方言谆韵（平赅上去，下同）的精、知、章组字和真韵的知、章组字在言语社团中读音异常分歧。先请比较下列例字的语音差异⑦：

	城（忻）	城（张）	城（朱）	城（王）	江东（周）	南门（李）	西门（张）
俊	tsʏŋ	tɕyʏŋ	tsʏŋ	tɕyoŋ	tsoŋ	tsoŋ	tsʏŋ
询	sʏŋ	ɕyʏŋ	ɕiŋ	ɕyoŋ	ɕyʏŋ	ɕyoŋ	sʏŋ
迅	ɕiŋ	ɕiŋ	ɕiʏŋ	ɕyoŋ	ɕiŋ	ɕiŋ	ɕiŋ
巡	zʏŋ	ʑyʏŋ	ʑiʏŋ	zoŋ	zoŋ	zʏŋ	zʏŋ
准	tsyŋ	tsoŋ	tsʏŋ	tsoŋ	tsoŋ	tsʏŋ	tsʏŋ
春	tsʻʏŋ	tsʻoŋ	tsʻoŋ	tsʻoŋ	tsʻoŋ	tsʻʏŋ	tsʻʏŋ
闰	zʏŋ	yoŋ	ȵiŋ	zoŋ	yoŋ	yoŋ	yʏŋ
震	tsʏŋ	tsoŋ	tsoŋ	tsoŋ	tsoŋ	tsoŋ	tsʏŋ
身	ɕiŋ	ɕiŋ	ɕiŋ	sʏŋ	ɕiŋ	ɕiŋ	ɕiŋ
人（文）	zʏŋ	zoŋ	zoŋ	zʏŋ	zoŋ	zʏŋ	zʏŋ
人（白）	ȵiŋ	ȵiŋ	ȵiŋ	ȵiŋ	ȵiŋ	ȵiŋ	ȵiŋ

这里的变异形式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声母有 tɕ—ts 的区别，韵母有-iʏŋ、-yʏŋ、-ʏŋ、-oŋ、-yoŋ、-iŋ、-ɤŋ 七种形式的不同，在声韵配合上甚至还保留一些尖音的痕迹。⑧横行的差异是宁波方言的内部分歧，竖行的不同是同一变异成分在同一发音人中的语音差异。这些变异形式在27个发音人中的分布频次是（扣除失去的样品）：

	—iʏŋ	-yʏŋ	-ʏŋ	-oŋ	-yoŋ	-iŋ	-ɤŋ
俊		5	11	8	2		1
询		4	9	5	4	2	
迅	2	3		2	2	17	
巡	1	4	11	9	2		
准			11	15			1
春			9	17			1
闰		2	5	5	11	2	
震			7	17			3
身				2		24	1
人（文）			15	9			2
人（白）						27	

前七个字是谆韵字，后三字属真韵。这种杂乱、参差的变异形式是对语言演变理论的挑战，也是对有序变异理论的严峻考验。光用"例外"两字把它撇在一边，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还需要从变异的有序和无序的相互转化中去探索这些杂乱变异形式的成因。

根据现在能看到的有关宁波方言的历史材料，最早的是《汇解》(1876)，而后是《音节》(1901)。这两种材料的音系和单字的归类基本上是一样的，可以看成一种类型的材料。此后比较系统的记载是《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和《鄞县通志》(三十年代)。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从《音节》的分类注音谈起。

谆、真韵的知、章组(也包括谆韵的精组字)在《音节》中的注音,韵母都为-ing,而声母分 ts-、c-两系。我们先把两系所辖的例字列举于下:

ts-系:诊蘋甄侦桢袗畛疹轸缜真祯贞珍(ts-)趁(ts‘-)臣陈蔯尘阵(dz-)迅讯申伸身绅汛呻抻胂(s-)

c-系:震骏谆赈瞋馂镇缜盹准峻準屯振隼峻迍俊隽逡肫焌锋娠(c-)春皴疢椿蠢踳瑃鰆(c‘-)(dj-有音无字)舜瞬旬徇洵郇恂笋榫殉濬询驯簨浚荀蚼鴝珣(sh-)人韧蕈闰润慎顺认轫仞肾纯纫鹑蜃忍淳循漘唇晨宸辰神巡仁儿(j-)

ts-系除“迅”字有息晋、私闰两切外都是真韵字;c-系中带黑点儿的也是真韵字,不过它已与不带黑点儿的谆韵字同音,说明真韵字早在百年以前就开始了它的变异进程,其中“缜”字两见。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 cing 中声母和韵母的性质,不然就难以讨论与谆、真韵字变异有关的一些问题。《汇解》《音节》有三套舌音塞擦音:ts、c、ky[tɕ]。c 的音值根据《音节》的描写是:c=t+sh,dj=d+J,sh 是“舌横向下凹所形成的舌尖清擦音,而 J 是 sh 的浊音”,如用国际音标来描写,应该是舌叶音 tʃ、tʃ‘、dʒ、ʃ、ʒ。韵母的性质,从表面现象来看,是齐齿韵-ing,不圆唇。但是,这个“不圆唇”的记音可能事出有因,它的实质仍与“圆唇”有关。我们检查 c 组声母在音节中的组合规则,后面都有一个圆唇元音(ɔ、o、ч),只有谆、真韵的 cing 以及和它相配的入声 cih(如“出拙”等)与此规则不合。⑨这可能有其特殊的原因。与 cing 中的-ing 对立的圆唇韵母是-iüng,它只出现在 ky[tɕ]组声母之后,例如 kyiüng 下辖“均君钧军莙皲”等字。所以,cing 中的-ing 和-iüng 出现的条件互补,历史来源相同,都是谆、文韵字(真韵字下面再说),可以看成为同一音位(类)的两个变体,在音位处理上可以把 cing 中的-ing 看成为圆唇性质的韵母。

我们这样的看法还得到来自声母方面的支持。真韵字在《汇解》《音节》中分属 cing 和 tsing 两个音组，把 cing 中的-ing 看成为圆唇性质的韵母，c-和 ts-也就可以在音位(类)上看成为同一音位的两个变体：c-出现在前高圆唇元音前，ts-出现在前高不圆唇元音(自然还有其他开口韵)前。这样处理，既符合音系的结构原理，也与历史来源相符(都是知、章组和圆唇元音前的精组字)，而且也与往后 tʃ>ts 的发展一致。

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说《汇解》《音节》的 cing 音节中的-ing 是一种圆唇性质的韵母。既然这样，它们为什么会记成-ing 而不是-iüng 呢?这可能与 cing 中-ing 的圆唇的特点有关。这个特点可能是：它在听感上既象齐齿韵，又象撮口韵，但是它既不是齐齿韵，又不是撮口韵-iüng，当时找不到合适的音标，就作了上述似有矛盾的处理。赵元任的《研究》虽然只是列表，例字少，但在"谆、文、(真)"(52页)和"真人"(50页)下注-ʏŋ。《汇解》《音节》中 cing 的 ing 大概就是这个-ʏŋ。这样的解释也可以得到现代宁波方言的有力印证。这个-ʏŋ 就是谆、真韵知、章组字变异的始发点。

从《汇解》《音节》到《研究》《通志》，c-发生了离散性变异，c-系字一个一个地变入 ts-系。这个过程在《汇解》《音节》的时代就开始了，因为《音节》说得很清楚，说 dj 在 o 前的读音象 dz。《汇解》在 o、ɔ 等圆唇元音前已有不少 tʃ～ts 两读的例子(注音已用国际音标改写)：

终	tʃoŋ/tsoŋ	中	tʃoŋ/tsoŋ	充	tʃʻoŋ/tsʻoŋ
章	tʃɔŋ/tsɔŋ	掌	tʃɔŋ/tsɔŋ	娼	tʃʻɔŋ/tsʻɔŋ
常	dʒɔŋ/dzɔŋ	脏	dʒɔŋ/dzɔy	钻	tʃyn/tsøn
粥	tʃoʔ/tsoʔ	辱	ʒoʔ/zoʔ	嘱	tʃoʔ/tsoʔ

《通志》的记载也证实了这种演变过程："声韵之变迁，如五六十年

前鄞之城厢读音(按:指读书音),舌上音知徹澄三母之字与齿头音精清从三母之字尚画然区分,今则知与资、痴与雌、池与慈多不别”(3084页)。今天的宁波话知、章组字与精组字已完全合流,都为ts-。声母的这种由 tʃ-到 ts-的离散性变异是导致-ʏŋ 韵变异的一个重要条件:它或者继续保持开口韵的特点而说成-ʏŋ(即表中的tsʏŋ),或者变成齐齿韵-iʏŋ 或撮口韵-yʏŋ,因为 tʃ-这种舌叶音在与高元音韵母组合时容易寄生一个-i-介音(受声母的影响)或-y-介音(受后面圆唇元音 ʏ 的影响)。-ʏŋ、-iʏŋ、-yʏŋ 是《汇解》《音节》时的 cing 在现代宁波方言中三种基本变异形式。同一音类的字,齐、撮并存,这在宁波方言中不是孤例。“家”在口语中可以tɕyo～tɕio 两读(以 tɕyo 为常),宵、萧韵字也可以-io～-yo 两念(以-io 为常)。⑩所以,-ʏŋ、-iʏŋ、-yʏŋ 在言语社团的心理反应中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是心理认同先于言语行为而合流的又一个例证。至于“俊、准”等字的-oŋ、-yoŋ 这两种变异形式,那是-ʏŋ、-yʏŋ第二层次的再变异,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新旧变异形式并存,增加了变异的复杂性和不规则性。

还有-iŋ 和-ʏŋ 两个变异形式。-ʏŋ 是臻摄一等字的读音,-iŋ是三等真、殷韵字的读音。和-ʏŋ 变异有纠缠的主要是真韵的知、章组字。我们如对谆、真韵字的读音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发现谆韵字没有文白异读,⑪而真韵的知、章组字现在还有文白对立的痕迹。

	文		白
人仁认	꜀zʏŋ	꜀zoŋ	꜀ȵiŋ
日	zøʔ꜆	zoʔ꜆	ȵieʔ꜆

《音节》的作者莫棱道夫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认为白读形式所代

表的时间比较早，接近古代的读音，“人”最早读 ȵin，后来读 ȵiŋ，而文读形式是晚近产生的，大多由外省的教员首先带人学校，而后逐步扩散，其读音接近现代的北方官话，因而形成文与白的对立。根据这一线索，我们可以发现真韵知、章组字的读音在《汇解》和《音节》中已归入文白两系：

文读-ɤŋ：镇震……（见前面 c-系带黑点儿的例字）

白读-iŋ：珍趁陈尘阵真诊疹身申伸臣人仁认

白读的-iŋ 与真韵的帮、精、见、喉各组字的语音一致。根据白读音提供的线索，我们可以推知，知、章组字的读音原来都是-iŋ，与其他各系字的韵母一样。《通志》的写作年代虽然比《音节》和《汇解》晚30—50年，但它毕竟是本地人写的，比洋人更能了解宁波方言的底层，因此在真韵知、章组字的文白归类上似更接近宁波土话。《音节》中属文读系统-ɤŋ 韵的“辰仁神賑肾震刃慎忍镇”等字在《通志》中都读 in（2709页）。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支持我们的推测。

文读形式的产生是外方言影响的结果，但是它的具体读音必须经过本方言语音系统的改造，用音系中已有的或近似的音去代替。比方说，宁波方言没有北方话的 ʅ-，《汇解》《音节》以前的时代就用 ʒ-去代替。韵母也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改造。真韵知、章组字的读音在当时的宁波音系中最接近北方官话的恐怕就是谆韵的精、知、章组的读音 cing。这样，它的读音因受北方方言的影响而分成两类：“真珍……”读-iŋ，“震慎……”读-ɤŋ。至于个别字某些人说-ɤŋ，那是追随一等字的读法，也可能是郊县（如慈溪）方言影响的结果。

经过这样的清理之后，“俊准”和“震”之类谆、真韵字的杂乱变异就显出了头绪，它最初的基本变异形式是-ɤŋ、-iɤŋ 和-yɤŋ 三种；-oŋ、-yoŋ 是-ɤŋ、-yɤŋ 的再变异，使其与通摄字合流；真韵的

知、章组字混入谆韵字的读音是文、白异读的产物。由于不同时间层次、不同性质(如文白)的变异形式混杂在一起,因而就使谆、真韵知、章组字的变异显得特别复杂而不规则。但是,这种不规则的现象却是研究语言史的很好的材料,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窥知谆、真韵字百余年的演变情况。

谆、真韵字的变异只涉及一个变异成分(-ɣŋ)的几个变异形式。如果语言中同时有几个相互有联系的变异成分,那么变异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更复杂,因为它们在从有序、无序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可能会因发展的不平衡而使几个变异成分的"序"相互绞在一起,"破坏"了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宁波方言覃、谈、寒三韵和哈、泰两韵赵元任称之为"h 系字"(晓匣影喻)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证。覃、谈、寒三韵"h 系字"的音值有-i、-e、-ɛ、-ɛɪ(参看第185—189页的分析),咍、泰韵"h 系字"的情况与此类似,也有-e、-ɛ、-ɛɪ 等形式。它们相互叠合交叉,人们看了有"乱套"的感觉,分不清某一个字究竟属于哪一类韵。这些叠合交叉的变异形式在35个发音人中的分布频次(扣除失去的样品)是:

	i	e	ɛ	ɛɪ
汉		25	2	6
罕	1	19	3	6
含		7	1	18
安		13	1	14
海		25	1	
哀		17	1	10
爱		22	3	3

后三行为咍、泰韵字。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破坏"规律的状况?这是

由于在元音高化的变异过程中，这两个变异成分的变异速度在社会人群中有快慢的区别。覃、谈、寒三韵“h 系字”从-en 变为-e 就与哈、泰韵的-e(<-ε)合流，社会人群中这些超前的变异正好赶上灰、泰合韵非见系字的-e 复元音化为-ɛɪ，因而它们就一起复元音化。两个变异成分的-ε 都是滞后的变异，其中覃、谈、寒三韵“h 系字”的-ε 来自-εn，哈、泰韵的-ε 是覃、谈、寒三韵还没有消失鼻化成分时的读音，尚未高化。“罕”的 hi 音是追随见母字(如“甘”读 ki)变化的结果。因此，两个变异成分的超前变异为-ɛɪ，滞后的变异保留旧读-ε，一般的情况下都为-e，这样，两个变异成分的变异序因发展速度的交叉而相互绞在一起，使本来有别的两类韵出现交错混杂，与非“h 系字”的变化发生分歧。这样，语言中就留下了不规则的例外。

在变异中呈现出来的不规则现象的发展前途不外是两个：一个是不同的变异形式在演变中渐渐趋于一致，表现为语言演变的规律性，其特点犹如青年语法学派所说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另一个是，每个字的读音不管同一音类中的其他字音而在言语社团中趋于一致，比方说，真韵的“镇”都说 tsoŋ，“身”都说 ɕiŋ，谆(稕)韵的“迅”也都说 ɕiŋ，没有差异，那么这些字音就摆脱了变异过程的连续性，实现了离散化，这样，后人就只能接受这种不规则的遗产而不能恢复变异前的状态。宁波方言谆、真韵知、章组字的语音变异、覃哈两类韵“h 系字”的语音变异恐怕都只此一途。现在语言中的一些不规则现象和形态中的不规则变化，大都是由这种原因造成的。

如上所述，时间观是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变异的分析对时间进行横向的计量，可以克服以往语言研究中时间的“点”与

"线"相互分离的欠缺。时间是客观存在的。"纵"与"横"只是计量方法的差异,不会改变时间的实质。"纵""横"两种计时方法在运用的时候可以相互印证,说明"横"的时间与"纵"的时间存在着一致性,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去认识。我们前面的研究引用了一些"纵向"的历史材料以辅助变异的分析,这是由于有条件这样做,而且可以用确切的"纵向"时间说明"横向"变异所浓缩的时间量。如果我们在语言研究中找不到代表纵向时间的书面材料,那么着眼于变异的分析同样可以探索有关的问题。这里虽然难以定出具体的时间长度,但可以作出全局性的判断,定出一个概数,犹如猜测一个小孩儿的年龄那样。关键是要弄清楚变异成分的几种共存变异形式的先后序列、有序和无序的相互转化以及变异的方向、目标等问题,不然就无法实现预期的目的。

(原载于《中国语文》1989年第2期)

【附注】

①这个论断的英译文为 Sound change takes place according to laws that admit no exception,直译为"语音规律不允许有例外"。见 W. P. Lehmann,1973,87页。

②赵元任(1965)对"共时"作了这样的解释:"语言纯共时状态的观念在方法论上可以比诸在一定时点上的速度或加速度观念。瞬间值定为包括该时点在内的一个时段的时间的平均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为了方法论的方便而立出的科学的虚构。"

③《浙江吴语分区》(傅国通等)的考察与我们一致,现代宁波话有阳上而无阳去。见《杭州大学学报》,1985.9—10。

④这是根据城区166人的语音状况而作出的统计。它由我当时的研究生陈保亚同志提供。

⑤桓韵和合口的删、仙两韵的精、知、照系字,大多数宁波人也都是-iʏ

音。

⑥我们在其他方言中也发现过类似的现象，例如山西的祁县方言，只要不是向普通话靠拢的变化，四乡的变异速度比城关快。

⑦表中的发音人是从37个发音人中挑选出来的，以便展示宁波方言的内部歧异。“城”指城市中心区。这几个发音人的基本情况是：忻美英，女，51，教师；（城）张亚海，男，21，学生；朱晓强，男，38，干部；王威，男，18，学生；周晨初；男，39，医生；李建，女，29，教师；（西门）张明余，男，65，干部。宁波话的单字调往往因人因字而异，这里从略。

⑧汪一心（男，68，教师）老先生的“真”读 tɕiŋ，“诊”读 tsiŋ，两字不同音。

⑨麻三章组字的韵母为-æ、ô（ɔ），读-æ 的字有“奢犊猞舍赦蛤涻”（sh-）“惹蛇社”（J-）；读-ô 的字有“吒奼”（c-）“扯撦”（cʻ）。看来-æ 正通过离散性变异向-ô 转移，因为现代宁波方言这些字的韵母全都是-o，无一例外。

⑩据我们的调查为-io，据傅国通等的《浙江吴语分区》的材料为-yo。

⑪只有一个“闰”字有两人次读 ȵiŋ，与“认”的白读同音。不过这是“日”母的白读，与“谆”韵无关，因声母是 ȵ-，后面的韵母只能是-iŋ。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

用"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这个公式对语言系统进行动态的分析，核心的问题是要弄清结构中为什么会产生变异，即语言演变的原因。这是语言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不知道语言为什么会变化，我们就很难了解语言的运转和演变的因果关系。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很多语言学家的注意力现在似已开始向这方面转移，原因问题的研究可能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语言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马尔基耶尔（1985，212）认为："在今后几年，我想历史语言学将越来越多地开展关于因果性、原因方面的研究。有意思的将不是原始事实的发现，而是什么东西引起了变化。这样，青年语法学派作出音变是盲目的假设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从语言事实的描写到因果关系的探索，这将是语言研究征途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一、语言演变原因的研究的缓慢进展

继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盲目说之后，在语言演变原因问题研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布龙菲尔德（1923）的不可知论："语言的变化最终是由于个人偏离僵硬（rigid）的系统。但即使在这里，个人的变异也是无效的。要形成一个变化，必须是整群说话者由于我们不知道的某种原因而都作同样的偏离。语言的变化并不反映个人的变异，似乎是群众的、一致的和逐渐的演变，在任何时候系统都象别

的时候那样那么僵硬”,没有弹性。这种论断由于以语言是没有弹性的僵硬系统为前提,因而认为语言的变化总是绝对的:要么整群说话人恪守着僵硬的系统,没有变化;要么整群说话人同时偏离这种僵硬的系统,产生语言的变化,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显然,这与语言的实际状况大相径庭。至于整群说话人为什么会同时偏离僵硬的语言系统,布龙菲尔德认为是“由于我们不知道的某种原因”。这个结论在他的《语言论》(1933,477)中说得更明确,认为“音变的原因是不知道的”。这个论断对此后的语言研究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马尔丁内(1952,121)在总结这一影响时认为:“事隔20年之后,今天多数语言学家似乎很愿意无保留地同意布龙菲尔德提出的‘音变原因不可知’的理论。所有探求音变原因的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因此,不少人从这种事实中推断出同样的结论。把语言学看作描写科学(无论是共时平面还是演变事件)的学者们,很自然地会喜爱这些观点,因为他们对语言的说明很少超出可以直接观察的事实。”布龙菲尔德的一个论断,看来整整影响了一代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

盲目说也好,不可知论也好,都说明语言学家在事关语言生命的重要问题面前有点力不从心,缺乏办法。比较有特点的研究,恐怕要首推萨丕尔(1921,154,163)。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由看不见的、不以人意为转移的沿流(drift)模铸着。这正是语言的生命。无可争辩,这沿流有一定的方向”。他以此为基础具体地考察了英语和德语之间的平行变化,认为“它们都根源于一个共同的、早于方言的沿流”。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沿流,二是方向。什么是沿流?萨丕尔没有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意思显然是指一种运动着的语言结构,因而所谓“沿流模铸”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结构制约着变化的过程和方向。

这说明,萨丕尔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语言演变的原因一不是不可知,二不是盲目。只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对此进行充分的论述,因而难以对实际的语言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三十年之后,语言演变原因的研究出现了一次重大的突破,标帜就是马尔丁内(1952)的《功能、结构和音变》一文的发表。他从功能(交际的需要)与音变的关系批评音变的盲目说;从音变与结构的关系批评音变的不可知论,具体分析音变的原因。这比萨丕尔的"沿流模铸"说和雅科布逊(1927)针对盲目说提出来的音变目的论(teleological criterion)深入而具体,其中最有特点的是关于结构与音变关系的分析。马尔丁内根据语音的区别特征分析音系的结构,认为(辅音)发音方法相同的几个音位构成"列"(series),发音部位相同的几个音位构成"行"(order);同样,(元音)舌位相同的几个音位构成"列",而开口度相同的几个音位构成"行"。"行"与"列"纵横交错相配,构成音位间的相关关系(correlation);不处于这种位置上的音位就不是相关关系的成员。马尔丁内以此为结构框架分析语音的演变。例如:

f	s	š	x
v	z	ž	

x 在理论上不是相关矩阵的成员,因为没有与它配对的浊音 ɣ。如果语言中有一个小舌颤音 r,它就可能会失去"颤"的特征而变成"擦";由于 r 在发音时声带振动,因而容易变成舌根浊擦音 ɣ,与 x 配对,从而使不完善的相关矩阵完善化。马尔丁内在功能、结构与音变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演变的经济原则:交际的需要和人类的记忆与发声的惰性永远处于矛盾状态,语言的经济原则就是在这种矛盾的需求中寻求平衡,力图使语言固定化,排斥一切过于明显的创新。这样,马尔丁内在语言演变因果

关系的研究上迈出了艰难而意义重大的一步。它冲破了音变原因盲目说和不可知论的禁区，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此后的研究虽然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一些设想，但就总体水平来说似乎都没有超过马尔丁内的研究。生成一转换学派关于语言在代代相传中有创新的理论虽然被认为是对语言演变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Jeffers 等，1982，96)，但由于它只在一个封闭的、理想的说话一听话人的范围内研究，难以反映语言演变的实际状况，因而受到人们的有说服力的批评(Weinreich 等，1968，144—146)。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强调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影响，把变异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限制(constraints)、过渡(transition)、包孕(embedding)、评价(evaluation)，分析具体，论据充分，纠正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泛泛空论的倾向，弥补了语言因果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空缺。魏茵莱什、拉波夫等人(1968，186)认为，这四个阶段的研究可以逼近语言的起变(actuation)：语言何以在此时此地发生变化，而在彼时彼地不发生变化？但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起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演变的原因。这是语言变异理论需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只是暂时还没有解决的可能，因而认为“在最近的将来能够作出的全部解释都可能只是追究语言演变的事实”。这一论断虽有其合理性，但似乎消极了一点，其原因可能与它离开结构而孤立地研究变异成分的变异这种方法论原则有关(参看第175—179页的分析)。

百年来，语言演变原因的研究，从盲目说、不可知论到沿流模铸说、目的论、经济原则、变异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说，步履艰难，进展缓慢，与它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不断地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势必影响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现在，科学思潮的发展和语言变异的深入研究似乎已为这一问

题的探索提供了一些新的前景。我们希望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能为实现这一前景做一块铺路石。

二、改进因果关系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语言演变原因的研究难以取得进展，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对语言系统性质的认识有欠缺；二、取材不当。

对语言系统性质的认识过去一般都以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同质说为基础，只强调它的封闭性、无时无空的静态性和其内部结构的平衡对称性，而忽视它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和其内部结构方式的复杂性。这与现代科学对系统的认识有距离。如何认识语言系统的性质和特点，这恐怕是改进语言演变因果关系研究的一个关键。

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交际，它需要适应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交际需要，因此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采取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度，而且有特殊的机制和渠道接受交际中反馈回来的社会对交际的要求，并据此改进自己的结构。语言系统如果没有这种开放性特点，它就无法实现交际功能，因而也就会失去自身的存在价值。其次，语言因适应交际的需要而不断地改进自己结构的时候，不依靠任何外力，全靠系统内部的自我调整。任何人（不管他是“天王老子”，还是平头百姓）都只能乖乖地适应这种调整的要求，而不能制定什么计划对它进行“大修”或“改造”；语言要发生变化，从来不向使用它的主人“请示汇报”，而完全“自行其是”，顺着它自己的运行轨道向前发展。所以，语言系统不是语言学家或别的什么人组织起来的，而是语言自身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自组织性，这是语言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再次，语言系统的自组织性必然会伴随着另一个特点：自我调整的自发性，即调整是在人们不知不觉的自发状态下进行的，人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语言学家化

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弄不清楚的问题，语言的发展却有条不紊地遵循着一定的轨道而自发地运转。这些都说明，语言系统的性质不是僵硬的、静态的、靠外力组织起来的，而是有弹性的、动态的、自组织的开放系统。我们如果能够在系统中找出这种自发地进行自我调整的杠杆和机制，语言发展的原因即起变问题的解决也就会有一些眉目了。

从什么地方入手去寻找这种杠杆和机制？比较理想的语言材料是现实语言的变异。以往人们认为变异只涉及细微的变化，在语言研究中意义不大，可以略去不计，因而只根据已经完成的变化去考察语言的发展。这样，我们就只能看到语言变化的结果，而无法考察起变的状态和演化的过程。其实，这是语言研究的战略性失策。我们现在已经弄清，变异中隐含着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量（参看第196—207页），同样属于中观语言史（meso-history）的范畴，是研究语言运转机制的比较理想的材料，因为人们可以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那样进行调查、分析、研究，从容地"横"观语言在漫长时间中的发展动程。只要我们能够把变异与结构联系起来，从结构中考察变异的产生和演化，就有可能发现系统何以会进行自我调整的原因。

语言自组织系统的结构是无形的，需要通过无穷无尽的表面现象的分析才能清理出它的组织框架和网络。索绪尔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理论，是他对语言结构的认识，揭示了语言系统的一些重要特点。我们可以以此为起点，从封闭系统中走出来，考察语言的演变。

组合关系是线性的结构，聚合关系是语言成分在某一线性结构位置上的替换关系。这是一种以线性结构为基础的语言理论，影响很大，但不能成为我们考察语言变异的结构基础，因为我们在这

里很难找到语言系统向社会“开放”的大门;而且,我们也无法用组合关系来解释各个结构层面之间的关系。美国结构语言学的语言系统说是以线性的组合结构为基础的,结果把语义排除出语言研究的领域;音位的线性组合构成语素的理论也矛盾百出,最后不得不宣告放弃(Hockett,1961;Palmer,1971)。即使就某一个结构层面来说,线性的组合结构也难以系统地解释语言的演变。比方说,语音层面,线性的组合会引起变化,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且对同化、异化和换位之类的变化作过详尽而具体的描写。但是这种变化大多是零散的,在演变中难以引起系统的效应。历史上一些有名的语音规律,例如格里姆定律、早期现代英语长元音系统的大转移等都不是以音位的组合条件为基础整理出来的。因此,研究语言演变的结构基础看来不能是线性的组合结构,而只能从非线性结构中去探索语言演变的因果关系。马尔丁内的研究也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根据我们前而提到的目标,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非线性结构的单位已经失去它的独立性,一切决定于它在系列中的位置,例如汉语中的音位p与p‘的关系就犹如数学中的“正”和“负”,它们只是在其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而每一个独立出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种单位如果要发生变化,那就是一种结构关系的变化,带有系统的性质。第二,在非线性结构中容易发现单位在结构地位上的特点,是否处于平衡、对称的位置上,一眼就可以看清楚。比方说,下面的辅音音位矩阵:

ts	ts‘	s	
tʂ	tʂ‘	ʂ	ʐ
tɕ	tɕ‘	ɕ	

很明显,ʐ在结构上处于不平衡、不对称的位置上。弄清楚这种结构的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对语言演变的研究来说或许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它可能是语言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大门。如果把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同系列之间相互冲突的因素，例如"送气"和"不送气"，"清"与"浊"等等，犹如"正"和"负"，相互制约，形成规则，使它们平衡地"和平相处"。我们把结构系列之间的这种相互制衡的关系叫做结构关联。关联中参与制衡的两个系列的单位，如果都类似"正"和"负"那样两两相对，那么它在结构上就有平衡性、对称性的特点，不易发生变化。相反，关联中参与制衡的系列，彼此的结构单位多寡不一，无法一一形成两两相对的制衡关系，那么它在结构上就是不平衡的，不对称的。例如上述辅音矩阵中的ʐ，在"浊"的系列中只有它一个单位，"清：浊"相互制衡的力量很小，因而就容易闹点"独立性"，发生变化。语言中不与任何结构系列发生结构关联的单位，一般说是没有的。在汉语的声母系统中或许可以把"0"看成这种无关联的单位，但由于系统中只有一个这样的单位，它就容易钻结构的空子，象麻将中的"百搭"(也叫"混子")那样，就近寻找结构上的依靠，使开、齐、合、撮四呼的"0"依附于不同的部位而成为"ʔ j w ɥ"；只要系统的自我调整有需要，它就会脱缰而出，摆脱其依附的地位而担负起改进结构的重要角色。总之，结构上不平衡、不对称的单位最容易发生变异，这使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假设：非线性结构中的结构不平衡性是变异之源，是语言系统自发地进行自我调整的内在杠杆和机制，从这里发出变异的指令而敞开结构的开放之门。

结构关联，就语音层面来说，它与马尔丁内所说的"行""列"相关关系有联系，因为处于相关关系中的单位总是处于结构关联之中的，或许可以说，"行""列"相关关系是结构关联中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两个概念的差异。一个单位虽然可以同时与几个系列构成结构关联(例如 tʂ 既与不同发音部位的 ts

和 tɕ 构成“舌尖前：舌尖后：舌面中”的结构关联，也可以与同部位的 tʂ‘构成“不送气：送气”的结构关联)，但参与演变的，一次只能涉及其中的一个关联，因此我们不必强调纵横交错的“行”“列”相关关系，而只要着眼于几个相互平行的系列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就可以了。这样，它受到的限制会小一些，但说明问题的能力却要大得多。“行”“列”相关关系的概念无法解释处于“行”“列”相关关系中的音位的变化，也无法把它推而广之去研究语音和语义、语音和语法等各个结构层面之间的结构关系。“结构关联”这一概念可以摆脱这些方面的局限，能够解释“行”“列”相关关系无法解释的一些语言变化(具体问题后面再讨论)。在一个结构层面内部，或者在各个结构层面之间，我们如果能够通过结构关联的分析面找到结构的不平衡性，那也就找到了探索语言演变因果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这样说来，语言的演变好象都决定于非线性的结构关联，那线性的组合结构在语言演变的研究中是不是没有作用和价值了呢？不是的！只是需要作一点小小的限制：必须以非线性的结构关联的分析为基础，以便使其进入系统的网络。格里姆定律三组例外的解释可以为此提供很好的例证。要是格里姆没有整理出第一次日耳曼语辅音转移的规律，产生这三组例外的组合条件就永远只能淹没在一堆没有条理的语言材料中，既谈不上规律和例外，更谈不上为例外寻找原因和规律。因此，以非线性结构为基础去考察结构与变异的关系，可能是探索语言演变原因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结构的不平衡性、变异和系统的自我调整

结构的不平衡性是变异之源，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视角去考察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发生和发展，从中探索语言演变的原因。

各种语言中差不多都有 r 和 l 这两个音位。雅科布逊(1941)

认为这是儿童最后掌握的两个音位，也是失语症者最先丧失的两个音位。和这两个音位相当的汉语语音表现就是传统的日母和来母，在现在的普通话中就是ʐ和l。它们在音系的非线性结构中都处于不平衡的结构位置上，因而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容易产生变异。在上古，根据谐声字提供的线索，l在结构上简直"无法无天"，在同族词中差不多能够和任何辅音交替（雅洪托夫，1960，43—47）。而在现代，它在不同的方言中也是变化方式最多的一个音位：或与n自由变异，或相当自由地扩大它的变异范围、"侵"入传统浊声母的发音领域（陈蒲清，1981），或因"气流换道"而与s交替（张光宇，1989）。这些都是因结构的不平衡性而使它易于变异的一些具体表现。不过l的组合能力还比较强，这或许能牵制它的一些变异范围。ʐ音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既在非线性结构中处于不平衡地位上，能与之组合的韵母又很少，因而它的结构地位就不大稳固，现在在不少方言中它都处于积极的变异状态中。变异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通过变异而使它消失；二、促使别的音位系列也产生一个或几个可与它一起构成"浊音"系列的新音位。武汉话采用第一种办法（或消失，或与其他音位交替），北京话采取第二办法，使合口呼零声母产生w/v变异（沈炯，1987）。在山西、河北等地的方言中，合口呼零声母产生新声母v的，音系中一定有一个浊音音位ʐ或z，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的假设。

宁波方言韵母系统的变异很复杂，而且情况也与北京话不同，它不是产生新的音位，而是使那些处于结构不平衡关系中的音位或音类消失，请比较：

	变异成分	变异方向	例　　字
一、	e(h 系)	ɛɪ	含暗……

二、	iʏ	y	流抽周丘休优(尤，赅上去，下同)丢幽幼(幽)钻酸算(桓精)闩篡(删$_{\text{合}}$)全宣传川(仙$_{\text{合}}$)
	ie～iɛ	e	皆偕谐械(皆$_{\text{开}}$)懈(佳$_{\text{开}}$)者也冶(麻$_{\text{三}}$)茄(戈$_{\text{开三}}$)念(添)验(盐)廿(深)唸(先)
三、	yo	io	家假～使嘉(麻二见)佳(佳)
	ʏŋ	oŋ	镇振神晨人忍(真知章)俊椿荀春(谆精知章)
	yŋ	yoŋ	均匀允(谆见)君军群勳云韵(文见)
	yɔ̃	ɔ̃	降～落伞(江见)
	øʔ	oʔ	实失室日(质章)戌出恤術述(術知章)

这里的变异成分分成三组。第一组-e 的变异仅限于"h 系字"，已见于第185～189页的分析。第二组变异成分的共同特点是以 i 为介音的齐齿韵，它们在结构上的地位比较孤单，缺乏与之制衡的结构单位。-iʏ 主要是尤幽韵字，原可与侯韵字构成开与齐的结构系列，但由于侯韵字的元音在宁波音系的结构调整中已经低化和复化，现读圆唇的-œʏ，与不圆唇的-ɛɪ 构成"圆：展"的结构关联，而它们又与-ɐʊ(主要是歌韵字)构成"前：后"的结构关联，因而使-iʏ 在音系结构中陷入孤立的不平衡地位，只能以连续式变异向-y 漂移。-ie～-iɛ 组的例字比较杂，在言语社团中的读音也相当参差，有-ie、iɛ 和-e 的差异，但以-ie 为主。发音时因介音 i 的有无声母也有相应的变化：有 i 介音的念舌面音，无 i 介音的念舌尖音。和-iʏ 一样，-ie 在结构上也是比较孤立的，没有-ye、-ue 与之配对、制衡，而

开口韵的-e 又经历了一次动荡：原来的-e 复元音化为-ɛɪ，而咍、泰韵的-ɛ 则高化为-e，这些都使它增加了结构的不稳定性。

第三组变异成分-ʏŋ 是开口韵，其他都是撮口韵，但变异的方向一致：尽可能消除前高元音的圆唇特点，或者简单地说，消除 y 介音。-ʏŋ、-yŋ(严式应记为 yʏŋ)是臻摄的谆(文)真韵字。它们在结构上没有与之配对、制衡的齐齿韵和合口韵，既没有“圆：展”的结构关联，也没有“前：后”的结构制衡，音系结构的这种不平衡性促使它们通过离散式变异的方式并入通摄的-oŋ、-yoŋ(øʔ 随舒声而并入 oʔ)。-yɔ̃仅江韵的“降”一个字，只用于“降落伞”之类的少数特殊的词语，势孤力单，功能负荷很低，结构上也没有“圆：展”的结构关联，因而现在已趋向于消失，多数人已变读为tsɔ̃。y 介音在音系中趋向于消失，这恐怕是结构调整中的一种潜流，-yo 变读为-io，大概也是由这种潜流的影响造成的。现在舒声韵中的撮口韵比较稳定的只有一个-yoŋ，从发展趋势看，它也不一定能持久，可能会向 ioŋ 转移。

所以，如果着眼于结构系列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关系，宁波方言韵母系统的繁杂变异也就呈现出比较简单的线索，特点就是使那些在结构上处于不平衡地位的韵母通过变异而消失，以改进音系的结构。

汉语的中古音有浊音音位。现代的吴、湘两大方言也还有浊音音位。它们在音系的结构中处于马尔丁内所说的“行”“列”相关关系中，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行”“列”相关关系的解释在这里碰到了困难。但是从平行的结构系列的结构关联来看，“浊”这一系列显然处于结构不平衡的地位上：清塞音和清塞擦音有不送气和送气两个系列，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却只有一个系列，没有送气不送气之分。一浊对二清，这种结构的不平衡性就成为浊音系列的音位发生

变异的温床。改变的办法和途径，从理论上说，有两种可能：一是通过变异去掉浊音音位，使音系中只留下“不送气：送气”的结构关联；二是去掉清音中的某一个系列（或送气，或不送气），构成“清：浊”的结构关联。汉语的多数方言采取第一种办法，而湖北通城一带的方言则采取第二种办法，塞音、塞擦音的送气系列的声母与原浊音系列的声母合流，都读浊音（张归璧，1985）。两种途径，一个目标，都是使不平衡的结构转化为平衡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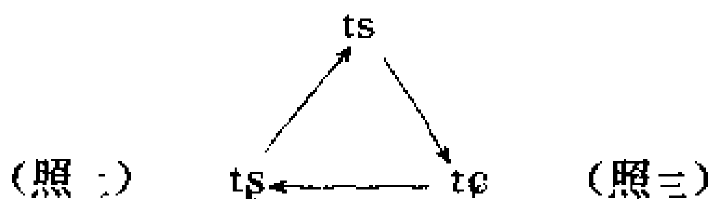
浊音清化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现实语言的变异或许有助于了解这种过程的一二。根据现代实验语音学的研究，现代的吴方言正处于浊音清化的过程中，其基本的特点是：“在单念或作为连读上字时，其声母跟相对应的清母字的一样，是真正的清辅音；在作为连读下字时，其声母才是真正的浊辅音。”（曹剑芬，1982，275）历史上的浊声母可能也是通过这种过程或其他类似的过程而清化，使音系的结构产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动。

山西祁县方言音系中的卷舌音 tʂ tʂʻ ʂ 在非线性结构中与 tɕ tɕʻ ɕ、ts tsʻ s 处于平衡、对称的结构关系中，可是它们现在却正通过离散式变异而渐次归入 ts tsʻ s（徐通锵、王洪君，1986）。为什么会产生变异？能否从非线性结构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这给“变异源于结构的不平衡性”的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马尔丁内（1952）也谈到了这类现象，由于无法把它们纳入“行”“列”相关关系的结构框架去研究，他就把这一类现象分离出来，用功能去解释：“功能论者对这些问题的基本假设是：音变的进行不是不顾交际的需要的，决定音变的方向、甚至音变的面貌的因素之一是通过保护有效的音位对立来保证相互理解的基本需要。”这样说当然可以，但是回避了需要解释的问题。功能指“一个语言成分在话语中和在它和别的成分的结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哈特曼等，138），而

结构则是指语言的内部组织网络，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虽然都需要研究，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功能是结构运转的舞台和背景，只能给结构的演变提供外部条件，无法对结构本身的演变进行具体的解释。变化是在结构中发生的，我们还得在结构中去寻找它的原因。附带说一句，马尔丁内的功能论和雅科布逊的目的论都从语言功能的角度批评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盲目说，这好象也与青年语法学派的本意"语音定律以盲目的自然力量起作用"有距离，因为它离开了结构（语音定律）去解释语音变化的原因和目标。如果着眼于变异与结构的关系的分析，这些问题似都不难解决：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变异有它的方向和目标，这就是使不平衡的结构转化为平衡的结构。所以，类似山西祁县方言 tʂ tʂʻ ʂ 向 ts tsʻ s 的转移还得从结构中去寻找它的演变原因。

祁县方言的 tʂ tʂʻ ʂ 来自中古照三的开口字。精（*ts）、照二（*tʂ）、照三（*tɕ）在近千年的发展中呈现出一种循环式的变化状态：

（精、齐撮呼）



照二的*tʂ 首先变为 ts，留出空格吸引照三的*tɕ 变为 tʂ；照三的变化又留出空格吸引齐、撮呼前的*ts 变为 tɕ。结构的制约使精、照二、照三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拉链（drag chain）式的循环变化。从语音系统的非线性结构来说，它们没有"变"，因为每一个音位在音系结构中的地位都没有发生变化，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平衡、对称的结构关系；但是从音义的结合关系来说，它们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为语词读音的分合界线发生了变动。这类变化的成因可能

很复杂，不仅有语音内部的原因，而且还涉及它与语义的关系、语言与交际需要（功能）之间的关系。语音层面与语义层面的结构关联是区别性：汉语音节结构中每一位置的音位替换必然与语义的区别相对应；反之亦然，语义的区别必然与音位的替换相对应。音位的推链（push chain）或拉链式的变化必然会干扰音义之间相互制衡的区别性关系：原来的不同音词变为同音词，给交际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为求取新的平衡，就需要对语词的音义结合关系作出适当的调整。音位链移式的循环变化可能是实现这种目标的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手段，因为它在保持音系结构稳定性、不变性的情况下对语词的音义结合关系作出符合交际需要的调整，在总体上保持了音义关联的区别性。至于是什么力量引起了链移式变化中第一个成员的变化，各个语言、各个方言的情况可能不同。祁县方言拉链式的循环变化恐怕与“等”（组合）有关，因为从“等”的结构来看，照$_二$（庄）只有二等，照$_三$（章）只有三等，缺乏制衡的力量。宁波方言元音系统的推链式变化与-n 韵尾的消失有关。英语长元音系统拉链式大转移和格里姆所揭示的第一次日耳曼语辅音的拉链式大转移，由于都是已经完成的变化，其具体状况我们难以推断。魏茵莱什等人（1968，175--176）在谈到变异成分的相互关系时认为第一个变异成分的变异与某种社会因素存在着一种共变关系（co-variation），而其他与此有关的变异成分的变异则可能受此变异的链移式影响。这是用社会因素去解释拉链或推链式变化的第一个推动力。拉波夫（1972）就用外来移民的影响去解释英语史中 ā、ē 和 ea 之间的分合纠缠。这可能有道理，因为语言是一种开放系统，它通过交际而与周围环境发生密切的联系。但第一个推动力是不是都是社会因素？好象不能一概而论。祁县方言 ts、tʂ、tɕ 之间的链移式变化就难以离开结构而用社会因素去解释。

以上的考察还没有涉及到语法。语音和语法是语言系统中两个重要的结构层面。语音的结构单位是音节，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在汉语中，音节和词的关系大体上是一对一的对应，即一个音节实现一个词，一个词的语音形式是一个音节。过去人们很忌讳说汉语的单音节性，以为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汉语的“落后”，因而总想在汉语如何复音化上做文章。我们在这里要唱一点反调，认为：语言的结构特点与“先进”“落后”无关；音节和词的一对一的对应是汉语结构的重要特点，体现语音和语法这两个结构层面的结构关联；它是汉语自发地进行自我调整的一个重要结构模型。对音节和词的一对一对应的干扰和破坏就会使结构出现不平衡，从而导致语言的演变。在汉语的发展中，语音层面由于浊音清化、韵尾简化等原因，使语言中出现了大量同音词，给交际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困难（也就是语言与交际需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因而产生了大量复音词。这就破坏了音节和词之间一对一的平衡和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结构关联就会自发地调整相互之间的矛盾，其表现形式就是语音和语法之间出现了竞争：是用音节结构规则去改造、融化语法复音词的语音面貌、直至融化语法的构词规则呢，还是维护和保持复音词中每一个“字”的独立的语音面貌、从而破坏音节和词之间的一对一的结构关联？汉语的音节结构分声、韵、调三个方面，由于语音和语法这两个结构层面的结构关联的要求，它在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用单音节的结构规则去改造、融化复音词的语音面貌，使之单音节化，其具体的办法和途径就是变声、变韵和变调。变声在汉语中比较少见，但有些方言的儿化的“化”是用变化声母的办法来解决的（徐通锵，1981；马风如，1984；董绍克，1985）。变韵比较普遍，现在的研究已有相当的进展（贺巍，1983；侯精一，1985）。儿化是一种现实的变韵，在汉语的方言中有多种多样

的表现形式。变声和变韵的共同目标都是要使两个语素的两个独立的音节融化为一，挤入一个音节的结构框架，实现单音节化。这个过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迫使语法的构词规则也融化于音节结构之中，从而使语音的发展规律出现例外。语言演变的这种事实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修正青年语法学派、布龙菲尔德(1933,452)关于音变是纯语音过程的假设(参看第81—86页的分析)。如果无法用变声、变韵这两种办法去实现复音词的单音节化，那就在声调上想办法，于是出现了变调。变调的实质就是使复合词的几个语素的单字调融化为一，实现单字调化，以此与词组相区别。五臺(1986,4)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很好的考察，提出"语音词"概念，认为"一个语音词的所有音节的声调融合在一起，联合构成一个跟某单音节调相同的声调"。这个看法很有见地，抓住了变调的实质。文中分析苏州话连读变调的调型基本上与舒声的单字调相同的情况(这在吴方言中可能不是个别的，宁波方言的变调也与此类似)恐怕就是这种实质的具体体现。轻声是一种介于儿化和连读变调之间的语言现象，它在结构上与儿化相似，第二个语素已经变为后附成分，但不能象"儿"那样"化"入第一个音节，因而只能在声调上找出路；但后附成分已失去它词根语素的资格，因而又不同于一般的连读变调，于是出现了轻声。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变调。后附语素由于其发音上的"轻"，在语言的发展中就有可能由"轻"而走向消失，只在第一个语素的声调上留下它的痕迹，从而使语言的声调系统出现异于规律的例外。山西的晋城方言(沈慧云,1983)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例子，相当于北京话"子"尾的词在那里都是通过不同于单字调的特殊声调表现出来的。浙江的温岭方言(李荣,1978)、广东的信宜方言(叶国泉、唐志东,1982)异于单字调的特殊调型的调值也可以归属于这种类型。

变声、变韵、变调可以统称为变音，其实质就是用"变"的办法实现汉语结构的自我调整，保持音节与词之间的一对一的平衡、对应的结构关联。这种结构关联好象是汉语演变中的一个"纲"，历史上的同族词、联绵词和现实语言的变音等可能都只是这个"纲"上的几个"目"。变音的过程现在还正在进行过程中，这是我们考察语言系统如何围绕这种结构关联而进行自我调整的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可以从中了解语言系统动态性的"动"的特点；并且，由于变音"变"出来的单位很难用现在流行的"对立""分布""音位""语素音位"之类的概念去分析，因而还可以以此为基础发展我们的语言理论研究。

前面从不同的侧面考察结构与变异的关系，基本的精神是：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语言系统以此为起点进入自我调整的过程，使不平衡的结构转化为平衡的结构。结构的不平衡性决定了语言演变的必然性，至于语言在何时何地发生变化，以什么方式变化，则与偶然性因素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四、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和它对系统自我调整的影响

语言的演变始自变异。变异在其产生之初都是无序的，在言语社团中呈随机的分布状态，各种各样的因素（如年龄、性别、阶层、文化程度、职业、风格……）都可以对它施加影响。它究竟接受哪一种因素的影响而建立起相关关系，从而使某一变异形式进入有序状态，开始演变的过程，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往研究语言演变的时候由于只着眼于已经完成的变化，因而不可能考察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结构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结构规律，自然也不会考虑这种作用。索绪尔以来的大语言学家似乎只有萨丕尔（1921，138）模糊地提到过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认为"个人变异本身只是偶然的现

象，就象海水的波浪，一来一去，无目的地动荡”。他怕人们对“偶然的”一词的含义有误解，专门为此作了一个脚注：“当然，最终还不是偶然的，只是相对地如此而已。”在决定论占支配地位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实在不容易，随着科学思潮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偶然性、暂时性、随机性在事物的运转和变化中有重要的作用（普里戈金等，34）。吸取科学思潮中的这种精神有助于我们认识语言演变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它的变化方式的多样性。

北京话的 w/v 变异，如前所述，是由于 ʐ-（浊）的结构要求而产生的。对变异形式（w u β ʋ v）起作用的因素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其中哪一种因素会起关键性的作用，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北京，青年人的 v 型发音多，约为老年人的两倍，而在青年人中又以文化程度高的人 v 型比例数最高（沈炯，1987）。看来“年轻”“文化程度高”这些因素在 w/v 变异中起着导向的作用。不过，偶然性是相对于必然性说的，北京话所以会选择 v，这是由于偶然中有必然，与结构的制约有关。北京话原有一个 f 音位，产生 v 就可以“f：v”配对，与“ʂ：ʐ”一起建立“清：浊”的结构关联，改进音系的结构。文化程度高的青年人的 v 变异由于适合结构的要求，因而它在言语社团的运用中反馈给结构时，就容易为结构所接受。与北京话类似的方言点在山西有大同、太原、太谷、洪洞、万荣等。对比山西的祁县方言，由于那里没有 f 音位，因而合口呼零声母也就不可能有 v 变异，而是向带喉塞音 ʔ 的开口呼转化（徐通锵、王洪君，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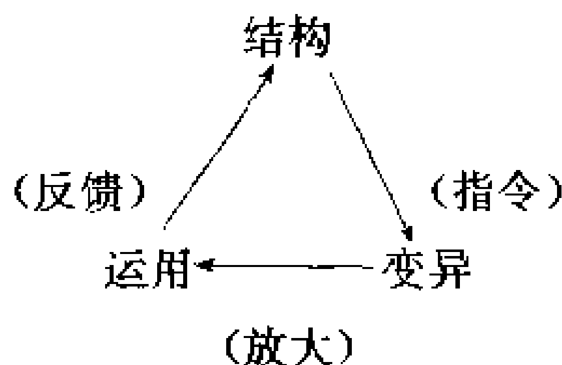
合口呼零声母有各种不同的音节。哪些音节先产生 v 变异，这仍有其偶然性。北京话选择了 wen 组，而没有选择 wu 组，这是由于“地域和语音结构的因素对 w/v 倾向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年龄

和文化，再其次是性别”（沈炯，1987，359）。昆明方言是北方方言的一个分支，它的零声母合口呼的 w/v 变异在语音结构中的表现与北京话正好相反，v 变异产生于 wu 音节（材料由原研究生陈保亚提供）：

	老年	青年
污乌舞侮鹉	ø	v
武务雾	ø/v	v
五伍午吴误悟无巫	v	v

两地的对比说明不同的偶然性因素在对 w/v 变异施加影响时选择了不同的音节。

为什么相同的原因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涉及到语言运转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的结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而变异在言语社团的交际中运行。这里的结构、变异、运用三个方面的关系大体上如下图：



结构发出“指令”，使处于结构不平衡地位上的单位产生变异；在众多的变异形式中有一个形式被某一社会人群选择、放大（即从无序转化为有序）；而这种被放大的变异形式通过运用再反馈给结构。如果结构不接受这种反馈，变异的过程就被抑制，不可能再继续进行；如果结构接受了这种反馈，那么它就会“指令”变异的过程继续进行，因而也就会使所选择的变异形式再继续放大，如此循环往

复，就使某一种变异形式取得支配的地位，并逐步扩大运用的范围，最后转化为结构。这一过程会产生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哪一个变异形式被放大？在什么时候被放大？结构开始接受哪一个反馈来的变异形式？偶然性因素有重大的作用，不同的地区由于接受不同的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而选择、放大不同的变异形式，这就使相同的原因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出现了方言的差异。第二，由这一原因产生的语言系统的演化方式一定是连续的渐进性过渡，不大可能是离散的突发性跳跃。陕西的关中方言可以为讨论这些问题提供很好的例证。

"关中"指"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的地区，辖44个县。1933年白涤洲曾对该地区42个县的50个方言点进行过详细的调查，记录了极为宝贵的资料。1954年喻世长把它整理出版，名为《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关中方言的辅音的变化很多与高元音的高化和紧化有关。前高元音 i 的高化和紧化迫使与它组合的声母（除唇音外）发生诸如腭化之类的变化，后高元音 u 的高化和紧化也迫使与之组合的卷舌音声母前化和双唇音声母的唇齿化。i、u 前的声母需要变化，这是结构提出的要求，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变化方式，各地大概是由于不同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而呈现出一分二、二分四这种分杈式的演化。舌位前于 i 的辅音声母（除唇音外）有t t'和 ts ts'（为简化分析，这里不列擦音 s）两组。它们的发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法有别，都有可能接受因 i 的高化和紧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除了栒邑、邠县、淳化、富平、美原、义龙、白水、郃阳八个方言点保持原来的声韵配合关系外，其他各点分两个类型变化：

一、腭化区，即t t'或 ts ts'发生腭化，计有25个方言点。

二、互变区，即t t'转化为 ts ts'，或ts ts'转化为t t'，计有17个方言点。

这是由 i 的高化和紧化而引起变异的第一个分杈点，而后各区又进一步分化为两个亚类。这是变异引起的第二个分杈点。腭化区分杈的两个亚类是：

一甲：i 前的 ts ts'变为tɕ tɕ'，而 t t'不变，计有西安、耀县、咸阳、武功、醴泉、乾县、永寿、陇县、亚柏、周至、终南、鄠县、华阴、潼关、朝邑、韩城等16个方言点。这与汉语的其他方言的尖音团化一致。

一乙：i 前的 t t'和 ts ts'都腭化为 ȶ ȶ'(商县、泾阳、宝鸡、凤翔、兴平、铁炉、同官)或tɕ tɕ'(雒南)。蓝田一点介于两者之间：t t'腭化为 tɕ tɕ'，而 ts ts'腭化为 ȶ ȶ'。显然，这些差异都是通过连续性变异的方式形成的，而且根据白涤洲的说明，这一变异过程当时还在进行中，因而有些点的音值还不稳定。例如，"铁炉镇端齐与精齐混，同读 ts ts'，近于 ȶ ȶ'，偶闻之又似 t t'，以 ȶ ȶ'注之""雒南的 ti tɕi 之分甚乱，端系齐齿不送气读 ti，送气读 tɕ'i，然 tɕ'i 字有时又读 t'i 或 ȶ'i"(99)。这是连续性变异的典型表现形式，是腭化过程的具体见证。

互变区与上述的腭化区一样，也可以分杈为两个亚类：

二甲：t t'变为 ts ts'，计有郿县、扶风、岐山、汧阳、麟游、长武、瓜坡等七个方言点。

二乙：ts ts'变为 t t'，计有华县、渭南、故市、临潼、高陵、三原、蒲城、荆姚、大荔等九个方言点。

澄城一点介于两个亚类之间，t t'和 ts ts'可以互变：i 前的送气塞音变为送气塞擦音，而不送气塞音保持不变；反之，i 前的不送气塞擦音变为不送气塞音，而送气塞擦音保持不变。这说明澄城的"送气"这一区别特征在变异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塞音和塞擦音出现反向的变化。这或许可以看成为二甲和二乙之间的一个

中间过渡状态。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观察，各个亚类还可以再细分为两类，因而在分化过程中呈现出第三次分杈。比方说，二甲可以分为二甲A和二甲B，前者的特点是：i前的t t'全部变为ts ts'(鄠县、瓜坡)；后者的特点是：i前的不送气塞音保持不变，而送气的塞音变为送气的塞擦音(长武、扶风等)。其他各类情况与此类似，不一一列举。

语言现象是复杂的。非线性结构中原来处于平衡、对称结构关系中的几个音位由于受到不同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也可能会出现非对称性的变化。关中方言的i和u处于"前：后"配对的结构关联中，由于链移式元音高化的影响，它们都会发生高化和紧化，从而影响声母的变化。i的紧化以其"舌面"的特征影响舌尖前辅音的腭化，而u则以其"唇齿(u在发音时唇齿微微接触，舌根上抬)"的特征对其他各类辅音的变化产生影响：k'-变为f-、唇音的唇齿化、卷舌音的唇齿化或舌尖化(介音由u变为ʮ)。在这一点上，"前：后"的作用是平行的、对称的，明显地表现出结构对变异的制约作用，但各方言点如何实现这种影响，"前"与"后"在有层次的分杈式演化中的影响区域可能是不同的。比方说，卷舌音的唇齿化计有西安等9个方言点，与i前的舌尖塞擦音腭化区16个方言点(一甲)相互呈交叉的状态，只有少数几个点是重合的。所以，如果综合考察各个变异成分在各地的变异，我们就会发现方言之间严重的歧异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疆域的扩大和方言间相互影响的加深，这种歧异的状态也就会日趋严重。

关中方言通过连续式变异而渐次形成的有层次的分杈有点类似语言的谱系树式的分化，区别只在于它只讲变异成分的变异，不是指整个语言的分化。这种变化方式造成的方言差异在地域上的分布一定呈连续性的渐进过渡状态。它体现语言的纵向自我分化。

如果方言间的差异不是这种状态，而是呈离散性的，例如北京话与周围方言的关系（俞敏，1984；林焘，1987），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知，它与语言的纵向自我分化无关，而是语言的横向波浪式扩散留下来的痕迹。方言差异的两种不同类型体现语言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式，可以成为我们观察方言历史关系的一个窗口。

五、结构平衡的相对性和语言系统自我调整运动的永恒性

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通过自我调整而使不平衡的结构转化为平衡的结构。根据这一假设，语言在经过千百万年的发展之后，结构中的各种不平衡性应该都已通过变异转化为平衡的结构，为什么在现实的语言中还处处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不平衡特点呢？这是由于有一系列因素在不断地破坏结构的平衡性，其"罪魁祸首"往往就是语音。

语音是通过发音器官的协同动作发出来的，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各部位相互协同配合的发音能力是不平衡的，有些强，有些弱。比方说，有些发音部位的发音比较"易"，因而发音的机会就多，如双唇、舌尖、舌根等，而有些发音部位由于受到发音器官协同配合的生理限制，发音比较"难"，因而用它来发音的机会就比较少。再如，前元音的发音空间大于后元音；前元音易发成不圆唇元音，而后元音却容易发成圆唇元音；能够发成圆唇的前元音也是以高元音为主，低元音很少，例如 a 就很难发出与之相对的圆唇元音；即使在同一个发音部位形成的各个音位，发音器官的协同配合的发音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舌根音 k k'就比较稳固，而 ŋ 就容易发生变化，因为舌根上抬和软腭下垂这两个发音动作的配合容易产生矛盾。在元辅音的配合关系中，舌根辅音与前元音（特别

是前高元音)的组合容易腭化,因为一前一后、一高一低,矛盾的特征难以协同配合,所以梅耶(1925,71—72)认为这种腭化几乎已经成为语言变化中的一种普遍特征。不过这些举例性的说明都是从语言现象中概括出来的,只是一种"量"的统计,不是"质"的规定。有些发音部位的协同配合比较"难",但不是"不能"。这些都可能给音系的结构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即使不管不同发音器官的协同配合,仅就音节中各个音素的发音音量来说,其强弱也是不平衡的。在汉语中,音节开头的音量强于末尾,因而在语言的发展中辅音韵尾容易因磨损而弱化或消失;复元音容易单化,以致出现只有单元音的语言系统(如上海话),使雅科布逊(1957,10)的"在全世界记录下来的语言中"没有单元音系统的假设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正。总之,从发音的生理能力来说,相互协同配合的能力是绝对不平衡的,这就与语言结构的要求产生矛盾。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它要求用最简明、最经济的办法去满足交际的需要。经济而有效的办法来自有条理的组织,因为它可以使人们以最简单的规则去驾驭最复杂的现象。语言为实现这种以简驭繁的要求,就在发音生理能力的不平衡、不对称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平衡、对称的结构,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一些比较"难"的发音器官的协同配合。在语言的发展中,言语社团因避"难"就"易"而使"难"的协同配合易位,从而破坏了音系中的平衡和对称。所以,音系结构的平衡性、对称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是暂时的,而发音器官协同配合能力的不平衡性、不对称性则是永恒的。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就会使音系的结构永远在这种平衡与不平衡、对称与不对称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因而音系中永远无法消除某些不平衡、不对称的因素。

语言的结构是分层次的。通过变异而改进结构的不平衡性是

在各个层次的范围内分头进行的。每一个层次的变异只求自己的结构平衡和对称，而不管由此而可能给其他层次带来的影响。因此，某一层次的结构平衡性运动就可能在另一个层次上留下了不平衡的结果。汉语的浊音清化使声母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不平衡结构消失了，但是在声、韵、调的配合关系上却出现了一个大漏洞。在浊音清化之前，不管是阴声韵还是阳声韵，都有平声，由于浊音清化，浊塞音和浊塞擦音依声调的平仄而分别归入相应的送气清音（平）和不送气清音（仄），因而在北方的很多方言中阳声韵的不送气塞音、塞擦音没有阳平字（丁声树，1952）。语音与语义、语音与语法之间的关系也与此类似，这已见于前面的分析。总之，不同层面由变异而产生的结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是独立地进行的，甲层面的平衡性运动可能会给乙层面带来不平衡的结果。仅就这一点来说，语言的发展就永远不可能堵塞结构不平衡性的漏洞。

语言结构的不平衡性是语言系统自发地进行自我调整、改进结构的内在杠杆和机制，是语言保持活力的一个条件。萨丕尔（1921，33—34）已明确地意识到这种结构不平衡性的价值："假如有一种完全合乎语法的语言的话，它就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不幸，也许正是大幸，没有一种语言是这样霸道地强求内部一致的。所有的语法都有漏洞。""漏洞"，就是结构不平衡性的一种表现。如果一种语言的结构没有任何"漏洞"，一切都处于完善的平衡、对称的状态，那么语言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原载于《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

语义句法刍议*

——语言的结构基础和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初探

80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对西方的语法理论、方法有所补正；第二，开始以北京话为基础进行方言间的横向比较研究和古今汉语的纵向比较研究，突破了索绪尔以来关于共时和历时的机械划分。但是有一些老大难的问题，例如词类的划分，句子成分的分析等，至今还矛盾重重，进展缓慢。自《马氏文通》以来，这些问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这恐怕与我们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这种思路有关。要摆脱这种思路的束缚，首先需要弄清楚语言系统的内在结构基础，为语法研究确立方法论的根据。这或许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一种语言的结构特点，为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提供一种

---

* 本文所述的主要内容原是前三篇论文的续篇，重点讨论"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这个公式中的"结构"的自组织性的动态性质。1991年3月因参加《世界汉语教学》和《语言教学与研究》两个编辑部联合召开的语法研究座谈会，就把它改造为《语义句法刍议》，发表于1991年第3期的《语言教学与研究》。邢公畹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在肯定大方向的同时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这里根据邢先生和其他读者的意见对《刍议》进行了一些修改、调整和补充。主要有三点：一、突出"字"在汉语结构关联中的地位，以代替原文中的"音节"；二、有关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原来依附于"语义句法的结构框架"一节，现在独立成为本文的第四节；三、有关语义句法结构框架的分析，原来太简单、抽象，现在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

可供选择的途径。我们这里以这一认识为基础讨论汉语的语义句法问题。

一、词位句法和义位(语义)句法

自结构语言学兴起之后，大多数语言学家都把语言看成为一种能进行形式运算的数学系统，而把语义排除在语言研究的大门之外。转换—生成语法的出现把数学运算的研究方法升华到了顶点，认为依据少数的语法规则就能生成语言中全部合乎语法的句子。物极必反。一种理论，哪怕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理论，一旦进入极端，就会暴露出很多矛盾而走向它的反面。转换—生成的运算规则虽然能够生成语言中一些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句子，但是也能够生成形式上虽然合乎语法规则但在语义上却根本说不通、在实际语言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句子，例如：

Tomorrow the sleeping table married its jumping lake.

(明天那睡着的桌子嫁了它的跳跃着的湖)

为了解释这种违反常规的句子，兰姆(S. M. Lamb，1969)认为应进行词位句法(lexemic syntax)和义位句法(sememic syntax)的研究：在词位句法中人们碰到的范畴是名词、动词、介词、形容词等，而在义位句法中这些范畴并不出现，人们碰到的是“分类等级所给予的”，“义位句法规定哪些义位的结合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例如动作义位的等级和事物义位的等级就有联系，联系的方式是规定只有某些类事物能施行某些类动作，又只有某些类的事物能作为某些动作的对象。只有有生之物能够实行死的动作；只有食物可以吃，只有歌儿可以唱”。兰姆认为，符合词位句法规则的句子不一定符合义位句法，只有符合词位句法的句子同时符合义位句

法的规则才能成为现实语言的真实句子;"这两种句法模式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应该分别加以独立的研究。

词位句法和义位句法的区分是语法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进展。在传统语法中这两类句法是混而不分的,主、宾语和施、受事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就是两类句法相互纠缠的具体例证。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纠缠在一起的不同现象应该区分开来进行独立的研究,不然就难以掌握每一类现象的性质和特点。实践证明,格语法、生成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的诞生以及它们对义位句法或与义位句法有关现象的研究已为语法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语义作为语法结构的一项内容,已在语法研究中确立了它不可动摇的地位。

义位句法的提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这一概念的名称则有商榷的必要。义位(sememe)是瑞典语言学家诺伦(A. Noreen)于1908年首创的一个概念。1926年布龙菲尔德把它引入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指一个最小的意义("一个最小的形式就是 morpheme,它的意义就是 sememe")。兰姆的义位概念又是另一种理解,既指多义词的一个义项,也指一个义项的语义成分(如词位 mare 的两个义位是 horse"马"和 female"牝"),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语义分类等级。不同的语言学家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里没有必要详加讨论。就一个概念的本身含义来说,兰姆的独特理解无可非议,但就句法结构的原则来说,这样的理解似嫌狭窄。如我们将在后面分析的那样,以语义为基础的句法结构,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句法单位的组合顺序。义位句法这一概念不能确切反映这一特征,因而我们下面就干脆把这种句法称为语义句法。

语义句法在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印欧系语言一直以词位句法为基础开展语法结构的

研究，提炼出一整套理论和方法。现在流行的语法理论差不多都是这种理论的不同变体。汉语是一种孤立语，它的研究传统没有印欧语研究中的那种词位句法，而语义句法，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也没有“语义句法”这样的概念，但它的精神一直渗透于“注”和“疏”之中，一个句子，只要把词的意义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一个句子的意义也就弄清楚了。王力(1957，144—154)所说的“意合法”就是这种句法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我们的祖先不讲主语、谓语、宾语和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词位句法的概念，照样可以看书写文章，可以进行教学活动，而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一种语言可以不讲词位句法，但是必须有语义句法。语义句法在语言研究中应该占有它的重要地位，不要把它视之为不可思议的“怪物”。不过目前人们对这种句法还比较生疏，研究工作也还没有充分展开，因而我们的讨论也只能说是“刍议”。

二、语义句法和汉语

汉语的语法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一直师承西方的语法理论。吕叔湘(1986)曾就这一点指出：“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是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总结。面对西方语言理论的新变化，80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开始摆脱结构分析法的纯形式的研究，吸取义位句法的某些精神引入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之类的理论和方法，以辅助形式分析的不足(参看陆俭明，1989，1990)。汉语的语法研究又艰难地前进了一步。不过就总的情况来

看，结构分析法的基本格局还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语义特征之类的概念的运用也还比较零散，不系统，没有形成一些独立的理论和分析原则，即不是对语义句法进行独立的研究，而只是用来解释词位句法中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当然，这比以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但基本情况仍然是用西方的语法理论来解释汉语的现象，只涉及那些"说得通"的部分，而还有哪些"说不通"，还缺乏有效的研究。一种理论能不能成立，需要经得起那些"说不通"的反例的检验。这犹如语音规律，如果不能经受例外的考验，就很难说它是一条规律。现在语义特征这一类概念还没有经受这种检验。

"'结合'二字谈何容易"，这是老专家的经验总结，非常宝贵。确实，要做到"结合"，难度很大。结合，它不是国外的理论加汉语的例子，也不是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汉语，而是要参照国外语言理论的立论根据，从中吸取精神，在汉语的研究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以便能在宏观上把握汉语结构的特点；不能实现这样的要求，说明我们还没有摆脱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窠臼。根据这样的标准，我们的研究实际上离"结合"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汉语的研究传统一直是务"实"不务"虚"，重功力而轻理解（参看《国学季刊》发刊词，1923），不大注意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没有很好地探索如何从宏观上去把握汉语的特点。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的语法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但理论建树，应该老实地承认，并不很多。这与我们重功力而轻理解的研究传统有关。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汉学家由于其学术环境和我们不同，思想上的框框比国内语法学家少，因而思路比较开阔，已经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去把握汉语结构特点的理论和方法。戴浩一（1985，1989）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可以看成为这方面的两篇有

代表性的文章。他立足于 Perice 的临摹性(iconicity)原则,认为语法结构来自现实的象征,可以参照概念领域的原则来了解汉语语法的结构。他提出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时间顺序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戴浩一认为这条原则"在汉语语法中具有独立的依据和很高的解释价值。它在一条总原则下概括了至今被认为互不相干的大量的语序原则。它管辖着汉语中大多数可以定出的句法范畴的语序表现。因此 PTS 可以看成是一条总的句法限制""汉语语法的基本手法仿佛是按照某些具体的概念原则把句法单位编织在一起""它的语序跟思维之流完全自然地合拍"(18页)。戴浩一和其他的汉学家还提到一些其他的原则,如时间范围原则、整体先于部分的原则,等等。这些原则都是语义句法的结构规则,已经摆脱传统语法、结构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的束缚而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在虽然还比较粗疏,但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已为建立语义句法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语义句法的建立,这不是语言学家的个人癖好,而是由语言的性质决定的。语言与人类的认知活动有紧密的联系。认知,这是主观经过分析、综合、比较而对客观的认识,用语言将复杂、纷繁的现实现象编成各种各样的"码",人们依靠这种"码"的指引去认识现实。就这一点来说,语言就是现实的一种编码体系。不同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编码方式、编码原则的差异,而需要将现实编成"码",以实现认知现实、进行交际的功能,这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共同性质。临摹性是编码的一种方式。"语言中成素(elements)的次序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的顺序",这是 Peirce 关于临摹性原则的一句名言,研究语序的语言学家差不多都要引用这句话。前面

提到的时间顺序原则，整体先于部分的原则等都不过是这条总原则的具体表现，用它来考察汉语语句结构的规则，应该说是比较适合的。它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去认识汉语的结构特点。我们由于身处“庐山中”，不易认识庐山的真面目。国外的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这种特点非常敏感，洪堡特(1836—1840)早就说过汉语的句子跟思想的简单明确的顺序一致是汉语的特殊的优点。时间顺序原则等以临摹性为基础的句法结构规则实际上是洪堡特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

把临摹性原则看成为汉语句法结构规则的基础，这可是违背传统语法理论的一种“离经叛道”的大胆假设。它虽然得到了时间顺序之类的原则的支持和验证，但毕竟还只涉及汉语的一些局部情况。语言现象很复杂，一般的理论假设都不难从语言中找到一些必要的例证。时间顺序之类的原则是不是只是一些个别的、孤立的例证，汉语中是不是还有大量与这种原则相矛盾的现象，我们现在还不敢说。所以，临摹性原则是不是汉语语义句法研究中的一条简明而又有解释力的原则，还要看我们能不能在语言系统中找到它的立论根据。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系统，由很多个大小不等、层次不同的子系统联合组成的一种非线性结构。要为语义句法寻找立论的根据，需要弄清楚把各个子系统组成为一个结构整体的“纲”。根据现在流行的说法，这种“纲”就是索绪尔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不过我们不想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因为它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它以“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为前提，因而只能适用于无时无空、完全封闭的语言系统的分析。我们把语言看成为一种现实的编码体系，是在时、空中运转的开放系统，因而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系统的前提不一致。第二，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理论以语言的线性结构为基础，

虽然可以有成效地对同一结构层内的语言现象进行静态的研究，但是难以探索处于非线性结构中的各个子系统的结构关系。美国结构语言学派着眼于组合关系去考察各个结构层面(子系统)之间的结构，认为音位的线性组合构成语素，语素的线性组合构成语句，结果在方法论上留下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霍盖特，1961，7—13；帕默，1971，118—133)。第三，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概念只能用来分析完全静态的结构，无法用来研究在时、空中运动的动态系统。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讨论语言系统的结构时放弃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理论，而用结构关联这一概念来分析语言系统的非线性结构。结构关联的具体含意是：结构成分或结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衡，彼此组成一种组织有序、协同配合的函数关系，使语言能根据交际的需要而自发地进行自我调整；或者说，结构关联是协调、支配语言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其最有效地完成交际功能的结构原理和原则，而与子系统的性质无关。因此，从某一个子系统中提炼出来的结构原则或理论假设，如果在其他子系统中能够找到它的结构关联，那么这种理论假设不仅能够成立，而且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一种语言的结构特点，因而有很大的理论意义。我们现在需要对语言系统进行深入的结构分析，看看能不能为以临摹性为基础的汉语语义句法的研究找出它的立论根据。

三、汉语的结构基础

语言是现实的一种编码体系，而“码”的基本单位在语言中就是词。词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单位，语言中的各种特点，语音的，语法的，语义的，都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体现在词之中，因而很难给词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汉语中和词相当的单位，粗略地说，就是“字”。“五、四”以来的汉语研究都把“字”看成为文字问题，这未免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不错，"字"是文字，在有"字"之前，汉语早就存在，但"字"是语言结构特点的文字表现，没有语言的基础，"字"就不可能存在。印欧系语言为什么没有"字"？因为语言中没有这种结构特点。我们还得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去认识"字"的性质，认为"字"不光是文字问题，而且也是语言问题。"字"所反映的语言现象与印欧系语言的语素不同，它不是单层次的结构单位，而是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交汇点，需同时接受各个结构层面的结构规则的制约。它是一种立体性的结构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不管是哪一个领域，都以"字"的分析为基础。我们今天在分析汉语的结构时也不能毋视"字"或"字"所代表的语言现象的存在。但为了和文字的"字"区别开来，我们在行文中都给它打上引号。

编码的机制实质上就是音和义的关系。我们如果以词的语音形式为结构框架，考察每一个结构位置中结构成素的替换与对现实的编码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发现不同语言在编码方式上的一些特点。汉语的一个"字"在语音上是一个音节，包括声、韵、调三部分，构成语言中典型的词的音型（单音节词）。语音的区别特征，即对立项的选择（雅科布逊等，1951，3—4），不同的语言在性质上是差不多的，不外是口音、鼻音、清音、塞音……这一些特征。不同语言的特点主要是通过它为对立项的选择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框架表现出来的。汉语为对立项的选择提供的结构框架比较简单，而且很有规则，即：一个结构位置中只允许出现一个结构成素，即一个音节只允许有一个声母、一个韵母、一个声调；韵母这个层次又可以根据音位的出现位置而分出韵头、韵腹、韵尾，每一个位置也只允许出现一个结构成分，其中韵头和韵尾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这就是说，汉语"字"的结构基础是一个"1"，而结构格式就是"1×1＝1"：

层序	层组织	结构公式
1	(1个韵头)×1个韵腹×(1个韵尾)＝1个韵母	(1)×1×(1)＝1
2	1个声母×1个韵母＝1个音段	1×1＝1
3	1个音段×1个声调＝1个音节	1×1＝1
4	1个音节×1个概念(意义单位,下同)＝1个"字"	1×1＝1

这个"1×1＝1"的简单结构格式隐含着汉语自我运转、自我调整的结构机理,是不同子系统的非线性的结构关联的基本方式。它由下而上,以"1"为基础,层层关联,形成一种严密的结构。等号后的"1"是等号前的"1"的乘积。它是一种结构、一种子系统,但它又可以以"1"个结构成分的身份进入高层的结构。等号前后的"1",相互之间是一种函数式的结构关系:等号后的"1"是一个常数,而等号前的"1"是变数,即它可以是"2"、是"3",这就产生了"1×2(或3)＝1"这种奇怪的结构等式。语言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结构关联就会进行调节,通过变异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果常数"1"制约变数"2"或"3",使它们通过变异而转化为"1",那么语言就会出现通过变异而改进结构的格局,简单地说,就是结构(常数)制约着变异的方向和目标,借此以维持"1×1＝1"的结构格式。上古的复辅音已经根据这种结构格式进行了调整,在现代的各个方言中都已变成了"1"。联绵词的"2"原就是"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王国维),相当于一个音节。它是在语言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畸形儿,可能是始原汉语(Proto-Chinese language)经过"1×1＝1"这种结构格式的调整而在语言中留存下来的遗迹。它在始原汉语的研究中将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汉语存在着大量的复音词,似与这里所说的"1"矛盾,但是这种"2"或"3"已

经或正在接受结构关联的支配，通过变声、变韵、变调的办法进行单音节（“1”）化的改造（参看第233—235页的分析）。这些都是结构常数“1”制约变数（1、2、3）的变异方向和目标的一些具体例证。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变数“2”或“3”通过变异而迫使常数“1”的值发生变化，那么语言结构的类型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动态的系统，这种“动”不是外力推动的，而是语言系统内部相关系列相互制衡的结果，“1×1＝1”这一结构格式可以从结构上解释语言系统的动态性。这种结构格式是语言的一种结构格局，非常稳固，汉语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形成如此复杂的方言差异，但是这种结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些讨论好象与前面所说的以临摹性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结构原则没有什么关系，但这却是探索和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基点。

汉语的“字”音型，由于一个结构位置只能出现一个“1”，因而它为音位“对立项的选择”提供的活动舞台简单而有规则，即使把声调包括在内，一共也只有五个位置，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为如下的公式：

$$\frac{T}{C(M)V(E)}$$

（T：声调；C：声母；M：韵头；V：韵腹；E：韵尾；

（　　）表示其中的结构成分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声调是驾凌于整个音段之上的语音特征，是音位进行“对立项的选择”的一种环境，应另作讨论。这样，汉语的音位就只能在C(M)V(E)这样四个结构位置上进行“对立项的选择”。所谓“对立项的选择”，它的实质就是对现实的编码，只要在“字”音型的结构位置上进行“对立项的选择”，就能编成语言的“码”。假定说，在C(M)V(E)这个公式中每个位置上能出现的音位是：

C＝p，t，k，ts

M＝ø,i,u,y

V＝a,o,e,i,u,y

E＝m,n,ŋ,i,u,y,ø

我们可以根据收集到的"字"音型的样品制定一条编码规则：每个位置上每次选择一个音位，并依次组合起来，就能直接编成语言中的"码"。根据这条规则，我们就能编成如pam、pioŋ、ta、tiau、tuen、kaŋ、kyen、tsim、tsan……这样的语码形式，其中有些是汉语中实际存在的"码"的语音形式，如tiau、tuen、kaŋ……，有些则不是（至少在某一方言中），如pam，kyen……，但这不能否定规则的编码能力，因为这些在语言（例如北京话）中现在不存在的语音组合序列同样是符合汉语"字"音型的结构规则的，它们可能在过去用过，只是后来在发展中废弃不用了；将来一旦有需要，语言也会毫不犹豫地用这些语音序列对现实进行编码，成为词的语音形式。这种在语音规则上可以接受，但在实际语言中未被实现的语音组合序列是"码"的一种潜在语音形式，与iempt……之类的不合规则的语音组合完全不同。这种潜在的形式在语言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是语言系统富有弹性的一种具体表现。如果说，一种语言没有任何规则上允许而在实际语言中未被实现的潜在的语词语音形式，那么这个语言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根据上面这条编码规则，也能生成如piii，tuau……之类的形式。为了防止这一类形式的出现；我们可以制定一条补充规则：同一音位不能依次连续出现；如果隔位出现，语音的异化作用会促使语言通过变异而进行自我调整。皆、佳、夬三韵（赅上去）的开口字在北京话的语音表现可以为这一条补充规则提供一个具体的例证。它们原为二等字，语音可以合并拟测为*-ai，见系字"皆阶"等由于在语言发展中产生了一个介音（韵头）i，即-ai变为-iai。这样音

位i就隔位重复出现，与同一音位不能在韵母的不同位置上同现的原则发生冲突，因而出现变异：iai变为-iɛ（皆阶稭介界疥届戒诫械，佳街解懈涯崖捱鞋蟹），还有一部分字（揩楷骇挨矮隘）则抗拒介音的进入，仍保持旧读-ai。1950年出版的《增注中华新韵》，“厓崕崖”等字还读-iai。合口韵“乖怪怀”等字的韵尾仍为-i，因为它们的介音是u，没有违背上述不能同现的原则，因而形成开、合口的韵尾不配套的结构格局。

根据上面两条规则，汉语就能以“字”音型中的“1”为基础，直接编出语言中的“码”。对比英语等印欧系语言，情况就不同了。英语是多音节语，而“对立项的选择”只能在单音节的结构框架中进行，这就迫使语言学家挖空心思地去寻找为数有限的一些单音节词，为音位找出最小的对立环境（霍盖特，1958，15—24），而后以此为基础去分析以多音节为特征的音系的结构。音系中的单音节词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语素。所以，从原则上说，英语等印欧系语言为“对立项的选择”提供的结构框架只是语素的语音形式，词的结构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组合。其次，即使以那些单音节词的语音形式为基础，我们也无法概括出象汉语那样的编码规则，因为印欧系语言的词音型为“对立项的选择”提供的结构基础不是“1”，一个音位能出现在音节的哪一个结构位置上是不定的，而一个位置能出现几个音位（复辅音、复元音）也是不定的。这两方面的原因给编码规则带来的影响是：印欧系语言从“对立项的选择”到“码”需要分两步实现：第一步先编出半成品——语素，它不能直接用于交际；第二步把语素组合成词，实现对现实的编码。语素虽然也是一种“码”，但只能说是“码”的初胚或半成品，不能独立；独立的标志是音段必须有特定的、能使长短不定的音节组合内聚为一个整体的超音段特征（声调、重音、音长或元音和谐）。所以，

从“对立项的选择”到交际中能独立使用的“码”，汉语是直接的，一次实现；英语等印欧系语言是间接的，分步骤实现。为行文方便，下面把汉语称为直接编码型语言，英语等为间接编码型语言。

编码方式的差异进一步给语言的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直接编码型语言由于“字”的音型短，音位的组合规则简单，它的功能负荷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因而能直接编出来的“码”就多，即根词的数量大，用不着什么构词法。汉语除了上古汉语的同族词需要另待研究以外，我们传统的研究根本就没有什么构词法；现在的所谓联合式、偏正式、述宾式的复合词和以子、儿、头之类的词缀为特征的派生词，都是语言发展中的产物，是词组凝固为单词，即把词降格为语素的结果，而不是组语素为词，因而谈不上什么“法”。刘叔新(1990，241，245)曾对此有很好的分析，认为“复合词结构无论其词素的顺序形式还是意义关系，都无句法性质，也非词法现象，而只是词汇性的”，其中唯一有可能成为语法形式的东西就是词素序，“但是词素序不仅不是句法的词序，而且根本上不成其为语法形式。原因在于，无论词性还是词素意义关系类型，都往往不与特定的词素序形式相因应，即一种词素序可表示多种词性和不同的意义关系，不同的词素序则可表示同样的词性和意义关系”。这段话我引述得长一点，因为我们思想中的印欧语习见太深，需要进行一些冲击。相反，间接编码型语言由于要分步骤实现编码的要求，语素的数量相对地说是有限的，但通过它的不同组合而构成的词，数量上却可以比它大几十倍到上百倍。所以这种类型的语言的构词法很复杂，需要重点讲清楚词缀、词尾、词根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成为语言学家重点研究的对象。两种不同语言的结构差异说明，直接编码型语言由于直接地一次编码成功，因面不需要或不大需要用构词法进行二次再编码。汉语构词法的贫乏

反映汉语的结构特点，它是由"字"音型的结构基础"1"决定的。

其次，以词为单位，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在语言发展中也会呈现出重大的差别。在创造新词的时候，间接编码型语言偏重于组合，特点是"加"，根据构词的规则一个语素加一个语素就可以构成一个词，反正词的结构基数不是"1"，一个词有几个音节、几个语素，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而直接编码型语言则偏重于"整合"或"化合"，特点是"合二为一"，把本来已经组合起来的词组通过"变音"的办法而"整合"为一个词，使"2"或"3"通过变异而转化为"1"。两种不同的过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特点，由"加"而产生的语言单位可以从分布的角度加以分析，而由"合二为一"的"化合"产生的语言现象，如儿化之类，"化"到一定程度就会混同于音节的结构，很难用对立、互补、语素音位之类的分布分析法来分析。这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独立的探索，并从中总结相应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语言是现实的一种编码体系，现实的特征都会在语言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反映。总的情况是：它在直接编码型语言中会得到直接的反映，因而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一致；而在间接编码型语言中则是间接的或屈折的反映，表现为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的不一致。间接编码型语言都有形态变化，借此以体现与概念范畴相对应的语言范畴。象英语这种间接编码型语言，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是不一致的：

	性	数	格	时	体	式	人称
语言范畴	gender	number	case	tense	aspect	mood	person
概念范畴	sex			time			

"性"和"时"分别用不同的词表示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数"

"格"等只有一个表示语言范畴的词,除格范畴外,它们都以概念范畴为基础,但必须以特殊的词形变化表示它们的语言范畴的性质。这里,"性"和"时"各自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表示不同性质的范畴,这一点耐人寻味。"性"范畴的实质是名词的语义分类,与自然的"性"(sex)并无必然的联系。语法"性"的语义基础可以是 sex,也可以是形状、质地、颜色、可食性等等,总之任何一套自然的属性都可以成为语法的"性"的基础。印欧系语言的"性"既然不等于自然的性别,那为什么还要和 sex 联系在一起?那纯粹是为了方便,因为"我们找出了这些差别,就需要给它们一个名称。我们选择最容易记住的名称:它们主要要有助于记忆而不要求别的什么。语言学并不是用这样一种方法的唯一的学科。大熊猫单纯靠竹子生活,但是按照动物学却把它列入食肉动物"(帕默,1971,93)。"性"是名词的各种范畴的基础,格与数的变化方式往往与"性"的语义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从总的特点来说,"性"和以"性"为基础的语言范畴表示空间,因为典型的事物都占有一定的空间,表现出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多少等特征。"时"(tense)是动词各项范畴的核心,以 time(时间)为基础。"性"和"时"是集中体现名词和动词的结构特点的两个特殊的语法范畴,它们以概念范畴为基础,但又不等于概念范畴。这样,间接编码型语言在造句的时候就需要调整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的关系,因而语法的形式结构比较复杂,而直接编码型语言在这方面就要简单很多。

词音型的结构基础"1"还是非"1"直接导致编码方式的"直接"或"间接",而这又给语句结构的原则带来了重大的差异。

四、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

前面我们用"汉语的眼光"附带地考察了印欧系语言的编码方

式，这恐怕难以说明其中的奥秘。为了反衬汉语的特点，为了摆脱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我们这里有必要再用"印欧语的眼光"来分析印欧语编码方式的特点，以便为语义句法的结构框架的研究清除理论上的一些障碍。

如前所述，语言是现实的一种编码体系，是人们认知现实、进行交际的工具。不同的语言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共同的性质，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的结构基础或结构常数都是一个"1"，它决定、控制着语言的基本结构面貌。不同语言的差异主要决定于这个控制语言各子系统的"1"处于哪一个结构层次上。汉语的"1"以"字"的结构规则（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交汇点）为基础，由此产生前述的一系列结构特点。象英语等印欧系语言，它的结构基础"1"不在词上，而是在句子上，由句子的"1"控制着整个语言的结构特点，其结构格式也是"1×1＝1"：

1个主语×1个谓语＝1个句子

每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主语，而且也只能有一个主语，即使在语义上找不到谓语的主语，也得在形式上造出一个"虚位"主语来，例如英语的 it 和 there（It is hot in here/There is a cat in the garden）；每个句子必须有一个谓语，而且也只能有一个谓语。其次，在主语的位置上只能出现一个名词，在谓语的位置上只能出现一个动词（广义的动词，即可以包括一般所说的形容词），即主语和名词、谓语和动词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结构关联。谓语中如出现名词，它必须接受动词的支配（支配关系），使它依附于动词，一起构成一个句法单位。由于这种关联，印欧系语言就可以以名词或动词为中心展开句法结构的研究。比方说，在谓语的位置上只允许出现一个动词，那就可以研究动词的"向"（place），分出单向动词和双向动词，并进而研究与此相联系的句法结构；可以研究"格"（case

grammar 中的 case)，说明动词和其他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这些理论虽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都没有离开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1"，因而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把这种理论系统地用于汉语的研究，那就会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在汉语的句子中往往能够出现几个不同的动词。

语言是复杂的，主语位置上虽然只允许出现一个名词，在谓语的位置上只允许出现一个动词，但实际上却可以出现几个名词或动词。在这种情况下，结构关联的"1"就会自发、自动地调整名词之间的关系，于是出现了变格，使不同格的名词执行各种特殊的功能。谓语位置上的动词需要与主语名词(名词主格)保持形式上的一致关系，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几个动词，也需要进行功能性的转换工作。由于形式上结构关联的要求，印欧系语言都有一系列办法进行词的功能转化，简单地说，这就是名词的变格和动词的变位，使不同格的名词或不同位的动词执行某种特殊的功能；或者加上前缀、后缀，使词性发生转化；或者使用关联词使有关的词语转入分句，以便在分句中保持主、谓语的身份，而分句在语法上的作用只相当于某一词性的词；或者采取别的办法，使词暂时失去它的固有性质(如动词的不定式之类)。这些变化都是受句子的"1"的制约而产生的，也就是它需要将主语、谓语位置上的非"1"改造成为"1"，以维持"1×1=1"的结构格式。印欧系语言为什么有复杂的派生构词法，即采用间接编码的方式构词?为什么会有复杂的词形变化?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结构上的答案。比较汉语和英语等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常数"1"，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理论上的结论：

第一，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的结构基础都是一个"1"，它是一个结构常数，由它控制语言的结构。不同的语言由于这个"1"处于不同的结构层面上，因而产生一系列的结构差异。这种控制语言结

构特点的常数“1”我们称为结构关联的基点。英语等印欧系语言控制语言结构特点的“1”在句法层，一个句子要求由一个名词充当的主语和由一个动词充当的谓语组合构成。汉语的常数“1”集中在“字”上，由此产生一系列语义句法的结构特点。粘着语的结构常数“1”处于词的平面，可在一个词根的基础上加上若干个语素组成一个词(1×1×1……=1)，由元音和谐使不同的“1”内聚为一个整体——词。元音和谐从不超出一个词的范围。

第二，结构单位的分类与结构关联的基点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单位的分类由控制语言结构特点的“1”决定。名词、动词的分野是由句子的“1”控制的，因为结构关联的要求需要把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词和出现于谓语位置上的词分成两类，前者叫名词，后者叫动词。亚里斯多德等人首先把词分成名词和动词(包括后来分出来的形容词)，这有它深刻的语言结构基础。汉语的词类划分为什么那么困难?这是由于汉语的结构关联的基点不是句子层面的“1”，因而无法根据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框架来划分汉语的词类。相反，汉语的音位却可以根据它出现的位置而加以分类，分出声母、韵母以及韵母中的韵头、韵腹和韵尾，因为汉语的结构关联的基点是“字”，它为“对立项的选择”提供的结构框架为这样的分类奠定了基础。汉语划分词类的困难正象英语的音位无法根据汉语音节结构的位置而把它们分别归入声母、韵头、韵腹、韵尾的音位类那样。语言中的各个子系统是通过结构关联的原则逐层地组织起来的。接近结构关联基点的子系统最易受结构常数“1”的控制，而与常数“1”的结构距离较远的子系统，“1”的控制力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汉语的句法结构离结构关联的基点比较远，因而语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就相当自由，不容易根据印欧系语言的结构特点把它们分类。英语的音位离结构关联的基点比较远，因而它也不容易受

"1"的控制，在音节结构中的位置也比较自由。这一切都说明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都需要有适合于自己结构特点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结构关联的基点处于哪一个层面上，对思维理论、语言理论有直接的影响。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对语言研究影响最深的思维理论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亚里斯多德把逻辑范畴分为实体（substance）和偶有性（accidents）两大类，实体在判断的结构中是主词，表现在语言中就是主语，由名词充当；偶有性在判断的结构中是宾词，表现在语法中就是谓语，由动词（包括后来所说的形容词）充当。这种以二分法为基础的思维理论和语法理论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有些语言学家说，如果亚里斯多德说的是另外一种结构类型（如汉语）的语言，他就会建立另外一种逻辑理论体系（Lyons，1977，274）。这一论断是很有道理的。这种在语言结构基础上产生的思维理论一旦形成，就可以反过来成为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研究，宽泛地说，以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分析语句的结构，从而得出主语、谓语和名词、动词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建立在语言结构基础上的思维理论、语言理论是有它的生命力的。汉语的结构基础与印欧系语言不同，因而用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解释汉语的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显得格格不入，难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不摆脱"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思想束缚，汉语的研究恐怕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不同语言的结构常数都是一个"1"，这是语言的共性；而这个控制语言结构网络的"1"处于哪一个结构层次上则决定语言的结构类型和结构特点。语言研究需要抓住这种特点，以便据此建立语言的语法结构框架。

五、语义句法的结构框架

不同结构基础的语言有不同的结构框架，本族人能自发地运用这种框架去组织语言材料，调整语言范畴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结构框架。只要能简明地、广泛而有效地说明语言现象，它可能就是一种符合语言实际的结构框架。印欧语是间接编码型语言，它调整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的关系的结构框架就是一般所说的“主语——谓语”。这是语法的结构标志，因而间接编码型语言又可以简称为语法型语言。直接编码型语言由于不需要调整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的关系，因而可以简称为语义型语言，以与语法型语言相对应。这种分类的方法与目前流行的看法大相径庭。其实，这不完全是我们的新发明。索绪尔(1916，184—185)早就说过：“不可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到最低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语法的”“超等词汇的典型是汉语，而印欧语和梵语却是超等语法的标本”(着重号是原有的)。我们与索绪尔不同的地方只在于把词中音义关系不可论证性之类的特点放到语言非线性结构的总体中去考察，弄清楚语言的结构基础，说明语义规律在汉语句法结构中的特殊地位。

“主语——谓语”是语法型语言的结构框架，人们对此已很熟悉，这里没有必要赘述。语义型语言的结构，过去人们也是用“主语——谓语”的框架来分析的，由于语言的共性，某些局部的事实可以依据这种框架作出说得通的分析，但用来分析汉语的整体，就显得格格不入，难以有效地说明语言的结构。不妨先看两个例子：

1. 那狗黄毛，黑眼圈，长身材，细高腿，特别地凶猛，
要咬住人，不见点血腥味儿，决不撒嘴。
2. 王亦东，推了自行车进了门，瞧见李贵在刷油漆，

他的老伴儿，陪在一旁给打扇子，真是从心眼里羡慕。

用"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来分析，很难有效地说明它们的结构。比方说例1，"主语"是"那狗"，后面的部分都是"谓语"，但"谓语"的部分很复杂，"黄毛，黑眼圈，长身材，细高腿，特别地凶猛"是五个并列的偏正结构作谓语，"要咬住人，不见点血腥味儿，决不撒嘴"中的"咬住人""撒嘴"都是述宾结构，其中的"咬住"是述补结构。如果作这样的分析，那"不见点血腥味儿"是什么成分？"谓语"中的偏正结构和述宾结构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很难用现在流行的理论来解释。例2的情况也是一样，如"他的老伴儿"之类的结构成分不大好给它贴上"主语""宾语"之类的标签；如果一定要贴这种标签，那就只能说例2有三个并列谓语，其中第二个"谓语"述宾结构中的"宾"包含两个并列的主谓结构。这种分析繁琐臃肿，而且很难说明实质性问题，人们无法依靠这种"主语""谓语"之类的概念真正掌握汉语的结构规律。我们如果采用"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的顺序"的临摹性原则来分析，那就会简单、明确、有效得多。例1是从说话人观察事物的先后顺序的角度有层次地说明"那狗"的特征和说话人对它的判断，例2是根据"王亦东"进门后看到的现象的先后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反映安排各个小句的顺序。至于每个小句中各个结构成分的关系，则需要再进一步进行语义规则的分析。比较例1、例2和印欧系语言的句法结构，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则区别。第一，这里的"主语"和"谓语"不受一致关系的支配；第二，语句的排列顺序和句中结构成分的排列顺序基本上都"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的顺序""与思维之流完全自然地合拍"；第三，出现在句首的成分犹如文章的"题目"，而后面的部分则是就这个题目"做文章"，说明它的实际含意。所以，这种类型的句子很难纳

入“主语——谓语”这种框架中去分析，而用“话题——说明”(topic—comment)的框架可能比较合适。

“话题——说明”始见于结构语言学家霍盖特(1958,251—253)的《现代语言学教程》，实际上这是由于结构语法进入尽头，自发地从义位句法的角度提出来的语义结构。这种框架摆脱了“主语——谓语”框架的形式束缚，而以词序为枢纽，分析句子的语义结构：“主谓结构的最一般的特点可以从它的直接成分的名称‘话题’和‘说明’两个术语来认识：说话人先宣布一个话题，然后就它作出说明。”这里由笔者打上着重号的“先”与“然后”就是根据词序的先后而作出的说明，虽然它们与主语、谓语这两个概念纠缠在一起，但霍盖特已经明显地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在英语和大家熟悉的欧洲语言里，通常话题也是主语，说明也是谓语，在 John | ran away 中就是这样。但是这种一致在英语口语里有时达不到，正式英语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经常达不到，在有些非欧洲的语言里更达不到”，例如在 That new book by Thomas Guernsey | I have't read yet(托马斯写的新书，我还没有读过)这个句子中，that new book by Thomas Guernsey 之所以先说，是因为它指明说话人要谈论的是什么：它是句子的话题，虽然不是主语。话题同时又是动词 haven't read(yet)的宾语，而动词的主语是 I，属于整个句子的说明部分”。这些情况都清楚地说明，“主语——谓语”和“话题——说明”是语句的两种不同的结构原则，应该严格地区分开来，不要把“话题——说明”纳入到“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中去认识。“话题——说明”这种结构原则的解释力比较强，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因而受到语言学家的广泛赞赏和积极评价(Lyons，1977，335)。我们着眼于语言的结构关联，分出语法型语言和语义型语言，“话题——说明”正好成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框架。前面提到的

以临摹性为基础的结构原则都可以纳入这一框架进行研究。

在汉语的研究中首先用“话题——说明”来分析汉语的句法结构的是赵元任(1968,45)。他认为“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可以是动作者和动作的关系。但在汉语里:这种句子(即使把被动的动作也算进去,把‘是’也算进去)的比例是不大的,也许比50%大不了多少。因此,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比较合适,主语不一定是动作的动作者,在‘是’字句里不一定等于‘是’字后边的东西;在形容词谓语前头不一定具有那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它可以是这种种,但不是必得是这种种”。这里虽然是在“主语——谓语”的框架中考察汉语的话题和说明,但对主、谓语的性质的认识与以往已有重要区别,“因此”后面的一段话清楚地指明了汉语不同于印欧系语言的一些重要特点。Charles Li & Sandra Thompson(1976)在理论上又比赵元任前进了一步,干脆把“话题——说明”和“主语——谓语”作为语言结构类型的两种分类标准,认为可以据此把语言的结构分成四种类型:注重主语(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注重话题(topic-prominent)的语言;主语与话题并重的语言和主语与话题都不注重的语言。汉语分入“注重话题的语言”,英语等印欧系语言分入“注重主语的语言”。这种分类标准是有参考价值的,它与兰姆的词位句法与义位句法的划分,我们关于语法型语言与语义型语言的划分在理论上显然有明显的联系,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主语——谓语”和“话题——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结构框架,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主语”和“话题”的原则区别。根据现在的研究,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语”和“谓语”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一致关系,而“话题”和“说明”与这种关系无关;

第二，"话题"是有定的，是说话人想要说明的对象，只能置于句首，而"主语"是无定的，决定于和谓语动词的一致关系，不一定置于句首；

第三，"主语"和"谓语"之间因为有一致关系的联系，因而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而"话题"与"说明"之间的联系却非常松散，因为词语的省略使它们的联系简直松散到在别的语言里将成为不合语法的句子。赵元任(1968,45)为此所列举的很多例子，如"你(的小松树)要死了找我"，很能体现汉语的特点。

为什么会形成这些原则的区别?这主要是，"主语——谓语"的结构决定于形式上的一致关系，用 Lamb 的话来说，它属于词位句法的范畴，而"话题——说明"的结构不受一致关系制约，但需要同时受到说——听话人的交际意图、语境和语言规则三方面因素的制约，属于语义句法研究的范围。这种原则的差异使不同的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语语法的特点，朱德熙(1985,4)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就是通常说的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朱德熙原想以这些"特点"的研究为基础反对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但问题是，这种"印欧语的眼光"在中国语言学家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并不是主观上想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反对"印欧语的眼光"的人，他本身的"眼光"就不一定不是"印欧语"的。朱德熙所说的汉语语法的两个"特点"，恐怕就是以印欧语的语法结构为基轴来观察汉语的结果，或者说，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印欧语的结构基础"1"和它的基本结构格式"1×1＝1"是在句法层，由此产生了句子成分与词类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结构关联)。用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的眼光来看汉语，就会发现汉语是"一对多"(主宾语"对应"

于名词、动词、形容词，谓语"对应"于动词、形容词、名词，定语"对应"于名词、形容词、动词，等等)。"一对一"叫对应，是语言结构规律的具体体现，那么错综交叉的"一对多"就不能叫"对应"，说明这里不存在规律性的联系。汉语的语法研究为什么费力而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词类问题、主宾语问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基本的原因我看就是在这种"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下一定要在这种不存在规律的地方找规律，用"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来研究汉语，结果只能是顾此失彼，难以有效地说明汉语的结构规律。紧紧扣住汉语结构关联的基点，用"话题——说明"的结构框架来观察汉语，或许可以把汉语句法结构的特点表述为：

第一，印欧系语言的句法结构，一致关系决定了"主语"和"谓语"是句中的核心成分，不能省略，而汉语的句法结构以"话题"为中心，如果它可由环境暗示或提示，就可以省略，即一个句子可以不出现"话题"，而这种"残缺"一点也不影响句子结构的完整性，也不影响"话题"的有定性。霍盖特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说在回答"你好吗"时只要说一个"好"或"很好"就行，不必把"我"放进去。"话题"既是中心，却又可以省略，这种矛盾只能从制约句子构成的三方面因素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第二，"主语——谓语"框架中的主语只能有一个，受语法型语言的结构基础"1"控制，而"话题——说明"框架中的"话题"不受这种"1"的制约，因而可以有几个。霍盖特在提出"话题——说明"的结构框架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说"说明"部分本身也可以由"话题——说明"构成，就象中国的套盒那样一层套一层。他举了一个汉语的例子："我今天城里有事"，"我"是"话题"，"今天城里有事"是"说明"；而在这个"说明"中，"今天"是"话题"，而"城里有事"是"说明"；而这个"说明"中的"城里"是"话题"，而"有事"是"说明"；甚至

不包括“话题”的“有事”也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套盒”的比喻很形象，说明“话题——说明”结构的层次性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性的：“话题”先于“说明”是时间上的“先”与“后”；不同层次的“话题”层层套合，其实质是从大到小的空间的层次。这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普通规则可能蕴含着一系列影响语言结构特点的语义规则。语言学家需要说明规则之间的蕴含关系，就象在印欧语的研究中依据“主语——谓语”的结构说明一系列语法规则之间的蕴含关系那样。结构上这种层层套合的特点可以有效地说明朱德熙所说的汉语语法第二个特点的成因。“话题——说明”中每一个层次的词的组合都是词组，由于“话题”是有定的，只要环境允许，它就可以省略，这样剩下来的“说明”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而这个“说明”本身又可以是由“话题——说明”构成，因而出现“词组＝句子”的结构格局。这是语义型语言的结构特点，不必参照印欧语的词形变化来说明汉语的词组和句子的关系。

第三，根据“主语——谓语”这种结构框架造句，句子的结构规则是封闭性的，只有两根“柱子”(主语和谓语)一根“梁”(一致关系)，其他成分只能支撑两根“柱子”，因而只是句子的附属成分。每一个成分都不能越出一致关系所控制的范围，因而呈现出封闭性特点。而“话题——说明”的结构框架，由于没有一致关系这种形式规则的控制，因而句子的结构规则是开放性的。层层套合的“话题”可以进行有层次的“说明”，使句子的形成过程有点儿象“意识流”，“流”到什么地方，决定于说——听双方的协作配合和环境的限制。

上述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在结构上的主要差异，概括起来，就是以“主语——谓语”为结构框架的语法型语言重“形”，以“话题——说明”为结构框架的语义型语言重“序”。“形”的特点是词的形式变化，讲究词与词之间在形式上的配合规律，如一致关

系、支配关系等。“序”以思维的顺序为基础，即前面提到的“语序跟思维之流完全自然地合拍”。过去把“序”也纳入“形”去认识，其实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形”，不必而且也不应该把它们纠缠在一起。“序”的实质是根据思维之流来安排句法单位的排列顺序，与词形变化没有任何联系。前述的时间顺序原则、整体先于部分的原则、“话题——说明”中话题居先的原则等都是根据思维之流的顺序把有关的句法单位组织起来，构成句子的。序，这是语义型语言的句法结构的一条总纲。如果要对“序”进行调整，那可以辅之以虚词。虚词和“序”一样，应该成为汉语句法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形式上的这种特点有其深厚的结构基础。汉语以“字”中的“1”为基础，通过“1×1＝1”的结构格式，由下而上，由简单到复杂，从为“对立项的选择”提供以“1”为基础的结构框架开始，到编码原则、语言范畴和逻辑范畴的关系，直至语句结构的“话题——说明”原则，都是环环相扣，层层关联，在不同的层次上为“语义句法”奠基。汉语的句法结构以“序”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语义型语言。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汉语的句法研究为什么可以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就是由于我们在语言系统中找到了它的立论根据。

不同质的矛盾应该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应该有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一定要把汉语这种语义型语言纳入到语法型语言的结构框架“主语——谓语”中去研究，或者说，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肯定会毋视汉语的结构特点，使句法研究陷入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现在汉语语法学界已经意识到这种处境，因而提出语法、语义、语用三结合的研究途径。“三结合”的精神是对的，不过我想补充两点。第一，“三结合”应该以语义为基础。第二，“三结合”应该有一个结构框架，没有框架的“结合”只能是杂凑。“主语——谓语”不能成为以语义为基础的语言的

结构框架，这已见于前面的分析；“主位——述位”（theme——rheme）适用于语用的分析，而“话题——说明”的框架则比较适合于语义的研究，可以成为“三结合”研究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结构框架。这或许有利于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有利于汉语特点的研究。

六、不同类型的语言的结构转换

语法型语言也好，语义型语言也好，它们的功能都是相同的，都是认知现实、进行交际的工具。由于语法型语言与现实的联系是间接的，因而“主语——谓语”的结构在认知过程中需要转换为“话题——说明”，使间接转换为直接。霍盖特从结构语法的困境中提出“话题——说明”的理论，兰姆从有悖常理的转换——生成能力中提出划分词位句法和义位句法，实际上都已经感到这种转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转换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其中起枢纽作用的是词序的调整，把“话题”置于句首。印欧系语言的主语大多在句首，与话题叠合，说明言语社团已尽可能使词位句法符合义位句法（语义句法）的要求，以减少表达中的转换。总之，根据语言的性质，“主语——谓语”的结构需要转换成“话题——说明”，不然就难以实现语言的认知功能。语法型语言和语义型语言的语句结构规则为什么有一系列原则的差异，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现在流行的语法理论大体上都是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先入为主。我们接受了这套语法型语言的理论和方法之后也就用它来解释汉语的语句结构，也就是先把语义型语言的“话题——说明”的结构转换为“主语——谓语”，而后再来解释以“话题——说明”为结构基础的语言现象，这就无异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虽然有些话题可以解释为主语，但有很多情况无法作这

样的解释。着眼于语言的性质和认知功能，"话题——说明"没有必要转换为"主语——谓语"；如果一定要进行这种转换，那就会碰到很多困难：一是往往转换不过去，因为"所有语言都有话题——说明结构"，但"并非所有的语言都有主语——谓语结构"(Charles Li等，1976，38)；二是多此一举，去走一段没有必要走的冤枉路。《马氏文通》以后，汉语的语法研究恐怕就走了这样的一段弯路。汉语的词类划分和主、宾语问题，特别是词类问题，为什么会引起周期性的争论？恐怕正是语义型语言难以纳入语法型语言的结构框架的一个具体证明。这种研究的弊端，陈承泽(1922，14页)已经说得很清楚："今使不研究国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则削趾适履，扞格难通，一也；比附不切，求易转难，二也；为无用之分析，徒劳记忆，三也；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歧异，靡所适从，四也；举国文中有裨实用之变化而牺牲之，致国文不能尽其用，五也。"其中"削趾适履""求易转难""系统歧异，靡所适从"三条，经过几十年语言研究的检验，应该承认，它击中了"西化"的模仿道路的要害。

语法型语言为什么要划分词类？主要的原因不外是两条：第一，词类与句子成分存在着结构关联；第二，为了讲语法，"区分词类，是为的讲语法的方便"(吕叔湘，1954，134)。第二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的必然结果，二者实际上是二而一，即词类与句法结构成分之间的结构关联是划分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结构根据。汉语不存在这种根据，因而名、动、形的划分、句子成分的解释就出现如陈承泽所说的"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歧异，靡所适从"的状况。根据傅雨贤(1988，85)提供的统计，汉语的词类划分，多的有17类，少的只有9类，至于各类交叉的现象，恐怕就不好统计了。这说明汉语的词类理论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不过本文无法讨论这些问题，而只

想从反面说明，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不必纳入到语法型语言的结构框架中去分析。它宜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去开展句法结构的研究。

汉语的研究可以为建立语义型语言的理论、方法和原则开辟前进的道路。

（原载于《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白涤洲，1954，《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喻世长整理），中国科学出版社。

Bloomfield, L., 1923, Review of Jesperson's《Philosophy of Grammar》，见 Hockett 编集的 AL. Bloomfield Anth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0。

——，1923，Review of Saussure，见 Hockett 编集的A L. Bloomfield Anthology，Indiana Univ. Press，1970。

——，1933，《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

Bodman，N. C. Historical Linguistics，见 Sebeok 主编的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卷2，1967。

Bynon，T. 1979，Historical Linguistics，G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曹剑芬：《常阴沙话古全浊声母的发音特点》，《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

陈承泽，1922，《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57年。

陈宁萍：《现代汉语名词类的扩大——现代汉语动词和名词分界线的考察》，见《中国语文》1987年第5期。

陈蒲清，《益阳方言的边音声母》，《方言》1981年第3期。

Chomsky，N. 1965，《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陈寅恪，1936，《东晋南朝之吴语》，史语集刊第7本第1分。

戴浩一，1985，《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1期。

——，1989，《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同上，1990年4期

- 1991年1期。

丁邦新,1981,《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之检讨》,见台湾《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组)。

丁声树,《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中国语文》1952年创刊号。

董绍克,《阳谷方言的儿化》,《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

董同龢,《汉语音韵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

冯志伟,1985,《数理语言学》,上海知识出版社。

傅国通等,1985,《浙江吴语分区》,《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9-10期。

傅雨贤,1988,《现代汉语语法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宝泰,1985,《兰州方言音系》,甘肃人民出版社。

高本汉,1915—1926,《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

——,1930,《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史语集刊,一本三分。

——,1940,Grammata serica.

——,1949,The Chinese Language,New York.

——,1954,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BMFEA,No. 26,Stockolm.

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贺巍,1983,《获嘉方言的一种变韵》,《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

侯精一,1982,《平遥方言志》,《语文研究》增刊。

——,《晋东南地区的子变韵母》,《中国语文》1985年第2期。

——,《平遥方言的文白异读》,《语文研究》,1988年第2期。

Hockett,C. F. 1942. A System of Discriptive Phonology,载 M. Joos 编集的 Readings in Linguistics,New Youk,1958.

——,1958,《现代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1961,《语言的各种单位及其关系》,译文见《语言学资料》1964年1期。

——1970,The State of the Art,Mouton.

洪堡特,1836—1840,《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发展影响》,见《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胡双宝,1984,《文水方言志》,《语文研究》编辑部。

胡坦,《藏语的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民族语文》1984年第3期。

Jakobson,R,1927,The Concept of the Sound Law and the Teleological Criterion,见 R. Jakobson Selected Writings,Mouton & Co. S-Gravenhage,1962。

——,1941,《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译文摘刊于《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3期。

,1957,《类型学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语言学资料》1962年第10期。

雅科布逊等,1951,《语音分析初探》,《国外语言学》1981年3—4期。

Jeffers,R. J. ,I. Lehiste,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The MIT Press,1982。

Kurylowicz, J. On the Methods of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CM. Preprints of Papers for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Cambridge,Mass,1962.

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拉波夫:《在社会环境里研究语言》,见《语言学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972,On the Use of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见 P. Baldi 和 R. N. Werth 编集的 Readings in Historical Phonology,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

, Resolving the Noegrammarian controversy, Language, No. 2, 1981.

——,《纽约市百货公司(r)的社会分层》,见《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莱普斯基,乔利奥.C. 1970,《结构语言学通论》(朱一桂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Lamb, S. M,《词汇学和语义学》,见 Linguistics Today, 1969, New York,Edited by A. A. Hill.

Lehmann, W. P. 1973, An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Li,Gharles N,Sandra Thompson,1976,《主语与主题: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学》,《国外语言学》1984年2期。

李荣，1952，《切韵音系》，中国科学院。

——，1957，《汉语方言调查手册》，科学出版社。

——，1965，《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

——，1965，《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

——，《温岭方言的变音》，《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

——，《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见《方言》1983年第1期。

李守秀，《榆次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

林焘，《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

刘广和：《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

刘叔新，《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中国语文》1990年4期。

刘勋宁：《离石方言字表》（未发表，1980）。

罗宾斯，1979，《语言学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罗常培，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二。

——，1931，《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

——，1933，《汉语方音研究小史》，见《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63年。

——，1941，《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年。

罗杰瑞，1973，《闽语声调的演变》，《中南民族学院院报》1985年第4期。

——，《闽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中国语文》1986年第1期。

陆俭明，《十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管见》，《国外语言学》1989年2期。

——，《9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趋势》，《语文研究》1990年4期。

陆志韦，1947，《古音说略》，见《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

吕叔湘，《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国语文》1954年第9期。文章收入《汉语的词类问题》，中华书局，1956年。

——，1986，《中国语法学史稿·序》（龚千炎，语文出版社1987年）。

Lyons，J.，1977，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马凤如,《山东金乡话儿化对声母的影响》,《中国语文》1984年第4期。

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

马文忠、梁述中,1986,《大同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Malkiel,Y.,The Inflectional Paradigm as an Occational Determinant of Sound Change,载 W. P. Lehmann 和 Y. Malkiel 编集的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Univ. of Texas Press.

——,1984,《马尔基耶尔教授谈历史语言学》(徐通锵整理),《语言学论丛》第13辑。

Martinet,A,1952,Function,Structure,and Sound Change,见 Readings in Historical Phonology,1978.

梅耶,1925,《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

Möllendorff,P. G. Von,1901,The Ningpo Syllabary,上海。

Morrison,W. T.,1876,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上海。

帕默,F.,1971,《语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潘耀武,1989,《清徐(清源)话的文白异读》,《山西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潘尊行,1923,《原始中国语初探》,《国学季刊》1卷3期。

平田昌司,《休宁音系简介》,《方言》1982年第4期。

——,《闽北方言"第九调"的性质》,《方言》1988年第1期。

普里戈金,伊·、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钱玄同,1927,《关于国语罗马字字母的选用及其他》,《新生》周刊1卷8期。

钱曾怡:《文登、荣城方言中古全浊平声字的读音》,《中国语文》1981年第4期。

桥本万太郎,1977,《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任瑚琏,《汾阳方言字表》(未发表,1980年)。

萨丕尔,1921,《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

沈慧云,《晋城方言的"子尾"变调》,《语文研究》1983年第4期。

沈炯,《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1987年第5期。

索绪尔,1916,《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

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

Silsby,J. A. 1911,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Shanghai Vernacular,上海广协书局。

王福堂,《湘乡方言字表》,(未发表,1974年)。

王洪君,《高安方言字表》(未发表,1986年)。

——,《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

——,《文白异读和叠置式音变》,《语言学论丛》第17辑。

王力,1957,《汉语语法纲要》,新知识出版社。

Wang, William S-Y(王士元),1969,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Language 45.9 — 25。

王士元,1983,《语言的演变》,《语言学论丛》第11辑。

Weinreich, U. , W. Labov, M. I. Herzog, 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载于 W. P. Lehmann 和 Y. Malkiel 主编的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exas University Press。

温端政:《太原方言词汇》,《方言》1981年第4期。

五臺,《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

谢纪锋,1984,《从<说文>读若看古音四声》,载于《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徐通锵,《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1词"》,《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

——,《山西祁县方言的新韵尾-m 和-β》,《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

——,《语言变异的研究和两种对立语言观的结合》,《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991,《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徐通锵、王洪君,《说"变异"》,1986a,《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

——,1986b,《祁县方言字表》(未发表,1985年)。

——《山西闻喜方言的声调》,《语文研究》1986年第4期。

徐通锵、叶蜚声:《译音对勘与汉语的音韵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0年第1期。

——，《内部拟测方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

雅洪托夫，《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4期。

杨耐思，1981，《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述祖，1983，《太谷方言志》，《语文研究》增刊。

叶国泉、唐志东，《信宜方言的变音》，《方言》1982年第1期。

俞敏，《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方言》1984年第4期。

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音初探》，《语言研究》1982年第2期。

——，《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张光宇，《闽方言古次浊声母的白读h-和s-》，《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

张归璧，1985，《草开方言的浊音和入声》，《语言论文集》（北京市语言学会编），商务印书馆。

张琨，1984，《张琨教授谈汉藏系语言和汉语史的研究》（徐通锵整理），《语言学论丛》第13辑。

——，1983，《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消失》，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集刊第54本第一分。

——，1984，《论比较闽方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第3分。

——，1985，《切韵的前＊a和后＊α在现代方言中的演变》，同上，第56本第1分。

——，1988，《<建州八音>的声调》，《中国语文》1988年第6期。

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1957年。

赵元任，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6年。

——，1941，Distinction Within Acient Chinese，见《哈佛燕京学报》（HJAS）第5卷第2期。

——，1965，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8，《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儿化词的语音变化》（《方言》1980年第4期和1981年第1期）。

周法高，1948，《古音中的三等韵兼论古音的写法》，史语集刊第19本。

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见《音韵学研究》第一辑。

朱德熙,1985,《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1989,《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

《方言》编辑部:《＜方言＞两年》,1981年第1期。

《国学季刊·发刊词》,1923。

洛阳地方志办公室:《洛阳方言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闻喜县志》(1918)。

《鄞县通志·文献志·方言志》

《增注中华新韵》(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商务印书馆1950年。

跋

收入这本集子的十篇文章是我从1979年以来所写的近30篇论文中选出来的。分两组，第一组(前六篇)重点讨论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二组(后四篇)讨论语言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每组中的文章根据脱稿时间的先后排列，因为发表时间的早晚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不一定能反映我的思路的发展过程。

语言理论研究过去有一个比较大的弊病，就是很少研究实际的语言现象，而满足于"空对空"的理论推导，用人们惯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克服这种弊病的有效办法就是把西方的语言理论、方法和汉语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却很困难。"'结合'二字谈何容易"，吕叔湘先生在为龚千炎同志《中国语法学史稿》写的序言中说的这句话就是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宝贵的经验总结。"结合"，尽管有困难，但是为了前进，为了摆脱"理论脱离实际"的因袭重负，我们还得想办法寻找"结合"的途径和方法。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探索。首先，我和叶蜚声同志合作，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和音韵研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评述，借以了解以往研究中西方的语言理论和汉语实际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从中吸取前贤在"结合"道路上的经验与教训。本书的第一篇文章《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历史比较研究》就是这一系列中的一篇论文。这些总结性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离开汉语的研究就谈不上

"结合"。这使我们下决心去走一些迂回的道路,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我首先对自己的家乡话宁波方言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后又和王洪君同志一起对山西的闻喜方言、祁县方言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这些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里的基本精神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根据"因我之需,为我所用"的原则去消化、吸收、补正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揭示隐蔽于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希望能以此为西方语言理论和汉语的结合找出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和方法。这本集子里的最后一篇文章《语义句法刍议》讨论了"结合"中的一个新问题,提出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是实现"结合"的最大思想障碍。为了找出一条摆脱这种障碍的途径,这篇文章重点研究了语言的结构基础,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假设。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现在还缺乏研究,而且个人的力量也无法完成这样的研究。它需要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我的一些粗浅看法如果能成为一种引"玉"之"砖",那也就实现了我的愿望。以上所述,大体上就是我在"结合"道路上的摸索过程;这本集子里的十篇文章就是这一过程的一种具体体现。

这里的十篇文章大部分只作了一点个别字句的变动,以使某些不够确切的表述准确化,不统一的术语加以统一。有两篇文章在内容上作了一点调整和补充。一篇是《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原来在分析"中断的变化"时用了文白异读的材料,这不确切。"中断的变化"是离散式变异的中断,体现语言在时间上的变化,而文白异读是方言间相互影响的产物,体现语言在空间上的演变,两者貌似神异,不能混在一起,因而将文白异读的材料从"中断的变化"中抽出,放入文白异读部分去讨论。另一篇是《语义句法刍议》,原文的个别提法不够准确,有些部分的分析太简单,因而作了一些调整

和补充。详细的情况可参看有关的注释和题解。

这几篇文章的注释一律放于文后，而参考文献则都集中附于书后，统一编排，以节省篇幅。这些文章在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曾与叶蜚声、王福堂、王洪君等同志多有讨论，承他们提供不少好的意见，使作者得益匪浅；这本集子的编辑与出版，得感激吕叔湘、曹先擢、李行健三位先生的推荐和河南教育出版社对语言学的热心支持。对于师友和同仁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作者不胜感激，谨此致谢。

徐通锵

1992年6月3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重印说明

趁这次重印之机，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漏，主要是音标的错误。个别语言现象的理论解释，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作者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为保持文章的本来面貌，行文不作修改，只在文末作一点注释性的说明。

徐通锵

1999年3月13日

作者简介

徐通锵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攻理论语言学。他是浙江宁海人，1931年11月16日出生于该县北乡的一个小山村。1946.9——1949.6，就读于奉化中学初中。1949.9——1952.7，浙江省立宁波中学高中。1952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师从高名凯教授学习理论语言学。1979年晋升副教授，1985年晋升教授，并担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1982年9月至1983年9月曾去美国柏克莱加大进修历史语言学。先后讲授的主要课程有"语言学概论""理论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研究方法论"等。主要的著作有《语言学纲要》(与叶蜚声合作)、《历史语言学》和有关语言演变、语言变异的一系列论文。《历史语言学》是徐通锵的代表作，它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重点讨论了语言史研究中的历史比较法、结构分析法、扩散理论、变异理论和汉语的文白异读。国内过去还没有这一类著述，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历史语言学的一块空白。

我们的语言理论研究过去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满足于"空对空"的推导，而不大注意实际语言现象的研究，因而学术界对它的评价也不大好。徐通锵在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把主要的精力转入汉语的研究。他先与叶蜚声同志合作，就《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音韵研究进行了必要的总结，从方法论的角度探索以往语言研究中西方语言理论和汉语实际相结合的途径、方法以及它们的经验和教训；而后集中对浙江的宁波方言和山

西的闻喜、祁县两处方言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具体考察方言的内部歧异、方言之间的差异和语言演变的关系。他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把西方的语言理论、方法和汉语的实际结合起来，并根据汉语的研究检验、修正、补充现有的理论。《历史语言学》是他的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

徐通锵的语言理论研究已不只是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已开始在汉语的研究基础上提炼、总结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这已在文白异读和语言变异的研究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文白异读是普遍存在于汉语方言中的一种重要语言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研究。徐通锵从这里入手，总结出一种新的音变理论——叠置式音变，用来解释因方言之间的接触而产生的语言演变，并据此对语言史研究中的内部拟测法、历史比较法的改进提出了系统的补正性设想。这一理论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好评，认为它“对传统的构拟音值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影响”（见《中国语文天地》1987年第4期《汉语音韵学研究方法问题》）。语言变异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徐通锵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已提炼出一些新的理论，其中关于时间的横向空间计量和语言结构的动态性、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结构关联和语言的非线性结构等的研究比较有特色，可以补充以往语言理论研究的一些不足。

以汉语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研究，徐通锵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徐通锵自选集
作者＝
页数＝２８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